

斯大林全集

第六卷

斯大林全集

第六卷



斯大林全集

第六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635×927公厘1/16·印張 $23\frac{3}{4}$ ·插頁6·字數261,000

1956年11月第1版

195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36,500 定價(5)3.20元

統一書號1001·311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И.В.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6

1924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依照『斯大林全集』俄文版譯出的。『斯大林全集』俄文版是根據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決定，由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編輯，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六年開始出版的。

第六卷說明

『斯大林全集』第六卷包括約·維·斯大林一九二四年的著作。

一九二四年是布爾什維克黨和蘇聯人民失去弗·伊·列寧以後，在斯大林同志領導下繼續進行建設社會主義的創造性工作的第一年。斯大林同志把黨團結在中央委員會的周圍，並動員黨爲在蘇聯建成社會主義而鬥爭。

編入本卷的斯大林同志的著作，在從思想上粉碎托洛茨基主義及其他反列寧主義集團方面，在保衛、論證和發展列寧主義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第六卷是以斯大林同志和羅斯塔社記者『關於爭論』的談話和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會議上『關於黨的建設的當前任務』的報告開始的。這兩篇談話和報告是爲揭穿托洛茨基主義和爭取布爾什維克黨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統一而做的。

斯大林同志在全蘇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所做的『悼列寧』的演說中，代表布爾什維克黨做了嚴格遵守和實現弗·伊·列寧遺訓的偉大宣誓。

編入本卷的還有約·維·斯大林的名著『論列寧主義基礎』。這篇著作對列寧主義作了精闢的闡

述和理論上的論證。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向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組織報告』、『關於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總結』、『論國際形勢』、『關於黨在農村中的當前任務』以及其他著作論述了國際形勢、黨內生活和黨的鞏固、工農聯盟、以社會主義精神教育和改造勞動羣衆等問題。

本卷以『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這篇著作結束。這篇著作從理論上概括了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論證並發展了列寧的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學說。

本卷第一次發表了『給傑米楊·別德內依同志的信』。

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

目 錄

3499/05

第六卷說明	一一三
關於爭論（一九二四年一月九日和羅斯塔社記者的談話）	三—四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會議（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六日至十八日）	五—四一
一 關於黨的建設的當前任務的報告（一月十七日）	七一—四
二 結論（一月十八日）	三五—四一
悼列寧（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在全蘇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四一—四
論列寧（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克里姆林軍校學員晚會上的演說）	四七—五七
山鷹	四七
謙遜	四九
邏輯力量	五〇
不灰心	五〇
不驕傲	五一

原則性·····	三
相信羣衆·····	六
革命天才·····	七
論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矛盾（一九二四年四月三日在俄共（布）中央委員會 召開的關於青年工作問題會議上的演說）·····	六—六
論列寧主義基礎（在斯維爾德洛夫大學的講演）·····	三—五
一 列寧主義的歷史根源·····	四
二 方法·····	七
三 理論·····	九
四 無產階級專政·····	六
五 農民問題·····	二
六 民族問題·····	三
七 戰略和策略·····	三
八 黨·····	四
九 工作作風·····	三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	三—五

中央委員會的組織報告(五月二十四日)	一六九—一七三

一、把黨和本階級聯系起來的羣衆組織	一七〇

二、國家機關	一七五

三、黨員成分。爲紀念列寧而吸收黨員	一七八

四、黨的領導機關的成分。幹部和新黨員	一八〇

五、黨的宣傳鼓動工作	一八三

六、黨在登記、分配和提拔工作人員方面的工作	一八四

七、黨內生活	一八五

八、結論	一八六

結論(五月二十七日)	一八六—一八七

關於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總結(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在

俄共(布)中央縣委書記訓練班的報告)	一八六—一八七

外部狀況	一八七

結合問題	一八八

勞動羣衆的教育和改造問題	一八九

黨	一九〇

關於縣級工作人員的任務	二六
論工人通訊員(和『工人通訊員』雜誌工作人員的談話)	二六—二九
關於波蘭共產黨(一九二四年七月三日在共產國際波蘭委員會會議上的演說)	三〇—三六
給傑米楊·別德內依同志的信(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五日)	三七—四〇
論雅·米·斯維爾德洛夫	四一—四三
論國際形勢	四四—六〇
一 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和平主義』時代	四四
二 美國對歐洲事務的干涉和協約國的倫敦賠款協定	四九
三 歐洲工人運動中革命因素的加強。蘇聯國際威信的提高	五五
關於黨在農村中的當前任務(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在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召集的農村支部書記會議上的演說)	六—一七
各地報告的缺點	六一
黨的主要缺點是黨的農村工作薄弱	六二
我們黨在城市中的力量在哪裏?	六三
我們農村工作的薄弱表現在哪裏?	六四

基本任務是在黨的周圍培養農民積極分子	二六四
必須使蘇維埃活躍起來	二六五
必須改變對待農民的态度	二六六
格魯吉亞暴動的教訓	二六六
必須以敏銳的態度對待農民	二六八
黨的基本任務	二六九
工作的條件	二六九
主要是和千百萬非黨羣衆保持聯系	二七〇
關於黨在農村中的任務（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在俄共（布）中央全會上的演說）	二七一—二七七
在『狄納莫』工廠留言簿上的題詞（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七日）	二七八
致騎兵第一集團軍	二七九
致『農民報』	二八〇
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共產黨黨團全會上的演說）	二八一—二八九
一 關於十月起義的一些事實	二九一

二 黨和十月革命的準備	二六七
三 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	二〇〇
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書序言）	三〇一—四八
一 十月革命的內外環境	三三〇
二 論十月革命的兩個特點，或十月革命和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	三三三
三 關於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的策略的幾個特點	三三〇
四 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開端和前提	三四三
註釋	三四九—三六〇
年表（一九二四年）	三六一—三六九

一九二四年

關於爭論

(一九二四年一月九日和羅斯塔社記者的談話)

只有在星期後將要舉行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才能對俄共（布）黨內和黨的刊物上已經廣泛展開的爭論做出最後的總結。現在根據各地黨組織送來的決議已經可以看出，俄共（布）全體黨員羣衆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毫無疑問是贊同中央委員會的立場的。

黨很了解，我們的敵人企圖利用已經展開的爭論來散佈他們所臆造的各種關於俄共（布）瓦解、蘇維埃政權削弱等等的謠言。對我們的爭論做這樣的估計至少是可笑的。實際上，我們黨內屢次發生爭論的結果總是把意見分歧消除了。黨通過這些爭論總是變得更團結更鞏固了。這一次的爭論表明，作爲蘇聯國家權力的體現者的工人羣衆在政治上已經非常成熟。必須說明——任何一個知道爭論內容的人都會相信這一點——在政治和經濟的一切基本問題上，黨內絕大多數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我們的對外政策和對內政策的基礎始終是不可動搖的。

在各級黨組織所有一切會議上爭論得十分熱烈的問題的實質如下：

(一) 我們黨應當成爲有統一意志的統一獨立的有機體，還是相反地，應當容許在黨內成立作爲

締約雙方的個別派別組織和集團？

(二)所謂新經濟政策證明基本上是正確的，還是需要修改？

中央委員會和黨內絕大多數都認為黨應當成爲統一的黨，新經濟政策不需要修改。包括幾個有名人物在內的人數不多的反對派集團却堅持着和全黨不同的另一種觀點。

黨力求通過全面而又完全公開的爭論來弄清楚這個問題的全部細節。黨的代表會議將在這個問題上做出對全體黨員都有約束力的權威決定。

斯大林同志最後說：我深信，黨通過爭論將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有力和更加統一，並能在已經開始的經濟和文化迅速高漲的條件下更好地執行領導巨大國家的生活的任務。

載於一九二四年一月十日

『東方曙光報』第四七三號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會議⁽¹⁾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六日至十八日)

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第十三次代表會議公報
一九二四年莫斯科版

一 關於黨的建設的當前任務的報告

（一月十七日）

同志們！通常我們在爭論會議上發言的同志總是先談問題的經過：黨內民主問題是怎樣產生的，誰先談了什麼，誰後來又談了什麼等等。我認為這種方法對我們是不適用的，因為它只會帶來無謂糾紛和相互責備的因素，而不會有絲毫的好處。我認為如果我們先談黨怎樣對待後來為中央全會批准的政治局關於民主的決議^{（三）}的問題，那要好得多。

我必須指出，這項決議大概是我們黨的全部歷史中經過對民主問題的激烈爭論後得到全黨完全（我可以說，簡直是一致）贊同的唯一的一項決議。即使是一向對黨內多數和中央委員會懷有反對情緒的反對派的組織和支部，即使是這些竭力設法遇事就吹毛求疵的組織和支部，也沒有找到吹毛求疵的藉口和理由。這些組織和支部通常在自己的決議中一面承認政治局關於黨內民主的決議的基本論點是正確的，一面又力求和其他組織有所不同，給決議加上一些尾巴，比如說：是的，你們一切都很好，但是不要欺負托洛茨基；或者還這樣說：你們一切都正確，但是晚了一點兒，這一切做得早一點就好了。這裏我不提誰欺負誰的問題。我認為如果好好地分析一下，那就可以看出，關於齊特·齊梯

奇①的著名的話對托洛茨基是十分合適的：『齊特·齊梯奇，誰欺負你了？你自己在欺負一切人。』（笑聲）我說過，我不來多談這個問題。就算真的有什麼人欺負托洛茨基。但是，難道問題在這裏嗎？在欺負的問題上究竟有什麼原則性的東西呢？要知道，問題在於決議的原則方面，而不在於誰欺負了誰。我想以此說明，即使是激烈而粗暴的反對派的支部和組織，也不敢在什麼原則上反對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的決議。我肯定這一事實是爲了再一次指出，在我們黨的全部歷史中很難找到另一個類似的事實，就是決議經過水火不相容的激烈爭論後不僅得到了大多數的贊同，而且簡直是得到了全黨一致的贊同。

由此我得出兩個結論。第一個結論就是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決議完全符合黨在目前的需要和要求。第二個結論就是黨通過這次關於黨內民主問題的爭論變得更鞏固了，更團結了。這個結論可以說正擊中了我們國外的敵對分子的要害，他們早就因爲我們發生爭論而得意洋洋，他們以爲我們的黨將會由於爭論而削弱，政權將會瓦解。

我不來多談黨內民主的實質。黨內民主的原則已經在決議中闡明，而決議是經全黨詳盡無遺地討論過的，我何必還在這裏重複呢？我只談一點，就是廣泛的民主、完全的民主顯然是不會有的。顯然，黨內民主將是第十次、第十一次和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所規定的範圍內的民主。這個範圍是什麼，你們知道得很清楚，我也不在這裏重複了。我也不來多談提高黨員羣衆的積極性和自覺性是使黨內民主成爲我們黨的血和肉的基本保證的問題。這一點在我們的決議中也十分詳細地談到了。

現在我來談談我們某些同志和某些組織把民主問題偶像化，把民主看做某種絕對的、超出時間和空間以外的東西的問題。我想以此說明，民主不是某種在一切時間和一切條件下都一成不變的東西，因為有時候實行民主是不可能的和沒有意義的。爲了使這種黨內民主成爲可能，就需要有兩個條件或者兩類條件，即內部條件和外部條件，沒有這兩類條件是談不上什麼民主的。

第一、必須使工業發展起來，使工人階級的物質生活狀況不惡化，使工人階級在數量上增長起來，使工人階級的文化水平不斷提高，使工人階級在質量上也增長起來。必須使黨這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首先也在質量上，而且首先是靠吸收國內無產階級分子增長起來。爲了能够提出真正實行黨內民主而不是在紙上實行黨內民主這個問題，這些內部性質的條件是絕對必要的。

但是單靠這些條件是不夠的。我已經說過還有第二類條件，即外部性質的條件，沒有這種條件，黨內民主是不可能的。我指的是某些多少能够保證和平，保證和平發展的國際條件，沒有這種條件，黨內民主是不可思議的。換句話說，如果有人侵犯我們，而我們不得不拿起武器來保衛國家，那就根本談不上什麼民主，因爲那時必須把民主收起來。黨要動員起來，我們大概要使它軍事化，關於黨內民主的問題自然就不存在了。

正因爲如此，我認爲應該以條件爲轉移來看民主，不應該把黨內民主問題偶像化，因爲你們知道，實行黨內民主是以每一個時期的時間和地點的具體條件爲轉移的。

爲了不會再有過多的迷戀和毫無根據的責備，我還必須提醒你們注意黨在實行民主方面所面臨

的那些障礙。即使在上述兩個主要的有利條件即內部條件和外部條件都具備的情況下，這些障礙也妨礙民主的實行。同志們，這些障礙是存在的，它們深刻地影響到我們黨的工作，因此，我沒有權利不談它們。這些障礙是什麼呢？

同志們，第一、這些障礙就是我們一部分工作人員的頭腦中還存在着過去戰爭時期的殘餘，即我們黨實行軍事化時期的殘餘，這些殘餘產生了某些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認為我們黨似乎不是一個有獨立的思想生活和實際生活的獨立的有機體，而是一種類似由下級、中級和上級機關組成的機關系統的東西。固然，這種絕對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在任何地方都還沒有形成，在任何地方都還沒有以完備的形式表現出來，但是這種觀點的因素却在我們一部分担任黨的職務的工作人員頭腦中存在着，這些因素妨礙他們徹底實行黨內民主。正因為如此，同這種觀點作鬥爭，同中央和地方的戰爭時期的殘餘作鬥爭，是黨的當前任務。

在實行黨內民主道路上的第二個障礙就是官僚主義的國家機關對黨的機關、對我們黨的工作人員的壓力。這種龐大的機關對我們黨的工作人員的壓力不總是明顯的，不總是惹人注目的，但這種壓力是一秒鐘也不停止的。龐大的官僚主義國家機關的這種壓力歸根到底表現在我們中央和地方的許多工作人員往往不由自主地完全不自覺地離開了黨內民主，離開了他們相信它是正確的可是往往不能貫徹的那條路線。請你們想一想，官僚主義國家機關擁有一百萬職員，其中大部分是黨的異己分子，而我們黨的機關的工作人員不過兩三萬人，他們却負有使國家機關服從黨，使國家機關社會主

義化的使命。沒有黨的支持，我們的國家機關有什麼價值呢？沒有我們黨的機關的幫助和支持，我們的國家機關可惜是沒有多大價值的。因此，每當我們黨的機關把自己的觸角伸進國家管理機關的各個部門時，它往往不得不使這些機構中的黨的工作和國家機關的路綫相適應。具體地說：黨必須對工人階級進行政治教育，必須提高工人階級的覺悟，同時也要徵收糧食稅，進行某種運動，因為沒有運動，沒有黨的幫助，國家機關是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務的。我們的工作人員在這裏是處於兩條火綫中間：一方面必須糾正按舊方式活動的國家機關的工作路綫，另一方面必須保持同工人的聯系。而我們的工作人員在這裏往往自己也官僚主義化了。

這就是第二個障礙，克服這個障礙是有困難的，但是爲了便於實行黨內民主，無論如何必須克服這個障礙。

最後，在實現民主的道路上還有第三個障礙，這就是我們的許多組織和支部，特別是邊疆地區（決沒有侮辱它們的意思）的組織和支部的文化水平很低，妨礙了我們的黨組織徹底實行黨內民主。你們知道，實行民主要求支部的成員和整個組織具有某種最低限度的文化水平，要求具有可以選舉出來放到工作崗位上去的某種最低數量的積極的工作人員。如果組織內沒有這種最低數量的積極的工作人員，如果組織本身的文化水平很低，那該怎麼辦呢？這裏自然就不得不放棄民主而採取委派負責人員等等的辦法。

這就是過去擺在我們面前、將來還會擺在我們面前的障礙。爲了誠實而徹底地實行黨內民主，我

們必須克服這些障礙。

我所以提醒你們注意擺在我們面前的這些障礙和那些外部的和內部的條件（沒有這些條件，民主就會變成空洞的煽動性的詞句），是因為有些同志把民主問題偶像化和絕對化了，他們以為民主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條件下都是可能的，似乎只是『機關工作人員的』『惡』意妨礙着民主的實行。同志們，我提醒你們注意實行民主的條件和目前擺在我們面前的障礙，就是要反對這種唯心主義的觀點，反對這種不是我們的、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不是列寧主義的觀點。

同志們，我本來可以在這裏結束我的報告，但是我認為我們必須對爭論做出總結，並從這些總結中得出某些對我們會有重大意義的結論。我想可以把它們在爭論方面即在民主問題上的整個鬥爭劃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反對派攻擊中央委員會，責備中央委員會在最近兩年中，在整個新經濟政策時期內的整個路綫似乎是不正確的。這是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的決議公佈以前的時期。這裏我不談誰對和誰不對的問題。這些攻擊是猛烈的，而且你們知道，這些攻擊不是常常有根據的。但有一點是很清楚的，就是這個時期可以稱為反對派攻擊中央委員會最激烈的時期。

第二個時期是從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決議公佈的時候開始的，當時反對派有必要提出什麼完整的和具體的東西來和中央委員會的決議相對立，但是當時反對派任何完整的和具體的東西都沒有提出來。這是中央委員會和反對派最接近的時期。看來，只要反對派同中央的路綫有某種調和，

問題就會結束或者可以結束了。我記得很清楚，在莫斯科，在這個論戰的中心，大概是十二月十二日，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圓柱大廳的會議上提出了一個決議案，這個決議案由於某種原因被否決了，但這個決議案和中央的決議差別很少。這個決議案在原則上，甚至在某些次要的條文上，都和中央的決議完全沒有分歧。當時我以為再沒有什麼可以爭吵的了；有中央的決議，它使所有的人，至少使十分之九的人都感到滿意，反對派本身顯然也感到這一點，並贊成這個決議，因此，我們也許會就此消除意見分歧。這是第二個時期即調和時期。

但是接着就到了第三個時期。這個時期是以托洛茨基的發動，即發出告各地區書開始的。他的發動一下子就消除了調和的趨勢，把一切都顛倒過來了。在托洛茨基的這個發動以後，激烈的黨內鬥爭時期開始了，——如果托洛茨基不在他贊成政治局決議後的第二天發表自己的那封信，鬥爭是不會發生的。你們知道，在托洛茨基的第一次發動以後隨即就有第二次，在第二次以後又有第三次，鬥爭因而更加尖銳起來了。

同志們，我認為托洛茨基在這幾次發動中至少犯了六個嚴重的錯誤。這些錯誤造成了黨內鬥爭的尖銳化。我現在來分析這些錯誤。

托洛茨基的第一個錯誤表現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決議公佈後的第二天他發表文章這件事上，這篇文章只能看做和中央委員會的決議相對立的政綱。我再說一遍而且着重指出，這篇文章只能看做和中央委員會一致通過的決議相對立的新政綱。同志們，只要想一想，政治局和中央監察

委員會主席團在某日舉行會議並提出關於黨內民主的決議的問題，決議被一致通過，在這以後只過了一天，托洛茨基就違背中央委員會，違反中央委員會的意志，越過中央委員會，把文章分發給各個地區，這篇文章是重新提出機關和黨、幹部和青年、派別組織和黨的統一以及其他等等問題的新政綱，所有的反對派都抓住這個政綱，把它拿來和中央委員會的決議相對立。這只能看做把自己和中央委員會相對立。這是托洛茨基公開地尖銳地把自己和整個中央委員會相對立。於是在黨的面前就出現了一個問題：我們有作爲領導機關的中央委員會，還是再也沒有了？有全體委員尊重自己一致通過的決議的中央委員會，還是只有不受法規約束，今天可以贊成中央委員會的決議，明天又可以公佈和提出新的政綱來反對這個決議的、站在中央委員會上面的超人？同志們，如果有一個中央委員在衆目睽睽之下公然藐視中央委員會和中央一致通過的決議，那就不能要求工人遵守黨的紀律。不能沒有兩種紀律：一種是工人的紀律，另一種是要人的紀律。紀律應當只有一種。

托洛茨基的錯誤就在於他把自己和中央委員會對立起來，並自命爲站在中央委員會上面，站在它的法規上面，站在它的決議上面的超人，這樣就給一部分黨員造成藉口來進行破壞這個中央委員會的信用活動。

某些同志對『真理報』和個別中央委員在某些文章中指出托洛茨基的這種反黨行爲表示不滿。同志們，我必須回答這些同志說：任何一個黨的中央委員會，如果在一個中央委員企圖站在整個中央委員會之上這種困難的時刻不顯示出自己的能力來捍衛黨的尊嚴，那末它是不會得到這個黨的尊重

的。如果中央委員會放過托洛茨基的這種企圖，那末它就是在精神上毀滅自己。

托洛茨基所犯的第二個錯誤就在於他在整個爭論時期都表現出曖昧的態度，粗暴地藐視希望知道他的真正立場的黨的意志，外交式地逃避許多組織所直截了當地提出來的問題：托洛茨基到底擁護誰，擁護中央委員會還是擁護反對派？進行爭論不是爲了支吾搪塞，而是爲了公開地真誠地在黨的面前說出一切真話，像伊里奇所善於做的那樣，像每個布爾什維克所應當做的那樣。據說托洛茨基病得很厲害。就算他病得很厲害吧。但是他在生病的時候寫了三篇文章，並給他今天出版的小冊子寫了另外的四章。托洛茨基完全有可能寫兩三行字來說明他擁護反對派還是反對反對派，以滿足詢問他的那些組織的要求，這難道還不明顯嗎？無須證明，這種藐視許多組織的意志的態度不能不使黨內鬥爭尖銳化。

托洛茨基所犯的第三個錯誤就在於他在自己的發動中把黨的機關和黨對立起來，提出同一「機關工作人員」作鬥爭的口號。布爾什維主義是不能同意把黨和黨的機關對立起來的。我們黨的機關實際上是山什麼組成的呢？黨的機關就是中央委員會、區域委員會、省委員會、縣委員會。它們是不是服從黨呢？當然是服從的，因爲它們百分之九十是由黨選舉出來的。有些人說，省委員會是委派的。說這種話的人是不正確的。同志們，你們知道，我們的省委員會正如縣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一樣，是選舉出來的。它們是服從黨的。但是它們被選舉出來以後就必須領導工作，問題就在這裏。不這樣，即中央委員會由代表大會選舉出來以後，省委員會由省的代表會議選舉出來以後不領導工作，黨的

工作還能進行嗎？要知道，不這樣，我們黨的工作就不能進行。要知道，這是一種否認黨的工作的領導原則的輕率的無政府主義孟什維克的觀點。我忧心托洛茨基（我當然不想把他和孟什維克混爲一談）把黨的機關和黨這樣對立起來會促使我們黨的某些沒有經驗的分子像無政府主義孟什維克那樣主張組織上的鬆懈和渙散。我就心托洛茨基的這個錯誤會使我們整個黨的機關受到沒有經驗的黨員的打擊，而黨是不可能沒有機關的。

托洛茨基所犯的第四個錯誤就在於他把青年和我們黨的幹部對立起來，他毫無根據地責備我們的幹部正在蛻化。托洛茨基把我們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混爲一談，他援引馬克思的某些學生即老社會民主黨人的蛻化做例子，由此做出結論說我們黨的幹部也面臨着這種蛻化的危險。一個中央委員昨天還同機會主義者和孟什維克携起手來反對布爾什維主義，而現在，在蘇維埃政權成立的第七個年頭，竟企圖斷定說（雖然是用推測的方式），在同孟什維主義和機會主義進行鬥爭中誕生、成長和鞏固起來的我們黨的幹部似乎面臨着蛻化的境地，這本來是應當置之一笑的。我再重複一遍，這種企圖本來是應當置之一笑的。但是既然這種論調不是在平時，而是在爭論時說出來的，既然這裏的問題是把那些可能蛻化的幹部和據說沒有這種危險或者幾乎沒有這種危險的青年對立起來，那末這種實質上是可笑的不嚴肅的推測就可能帶有而且已經帶有某種實際意義。正因為如此，我認爲我們應當談談這個問題。

有時候人們說，應當尊敬老年人，因爲他們比青年人日子過得多些，知道得多些，並且能够給予

較好的指示。同志們，我必須說，這種觀點是完全不正確的。不是任何老年人都應當受到尊敬的，也不是任何經驗對我們都是重要的。要看是什麼經驗，全部問題就在這裏。德國社會民主黨有自己的很有經驗的幹部，如謝德曼、諾斯克、維爾斯和別的一些人都是非常具有經驗的幹部，他們都富有鬥爭經驗……但他們是同什麼作鬥爭的呢？是同誰作鬥爭的呢？要看是什麼經驗，全部問題就在這裏。在那裏，有些幹部是在同革命精神作鬥爭中、在不是爭取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中成長起來的。這是豐富的經驗，但這種經驗是不好的。同志們，青年有責任來粉碎這種經驗，消滅這種經驗，驅逐這種老年人。在德國社會民主黨那裏，青年沒有同革命精神作鬥爭的經驗，青年要比老年幹部接近革命精神或者接近馬克思主義，因為老年幹部擁有同無產階級革命精神作鬥爭的經驗，擁有擁護機會主義反對革命主義的鬥爭經驗。這樣的幹部應當受到痛擊，而我們的全部同情應當給予那些青年，我再重複一遍，青年沒有這種同革命精神作鬥爭的經驗，因而更容易領會爭取無產階級專政和反對機會主義的新的鬥爭方式和新的鬥爭方法。在德國，這樣提出問題我是理解的。如果托洛茨基講的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和這個黨的幹部，那我雙手擁護他的聲明。但是要知道，我們這裏講的是另一個黨，即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黨，這個黨的幹部是在同機會主義作鬥爭中誕生的，是在同機會主義作鬥爭中鞏固起來的，是在同帝國主義作鬥爭中、是在同帝國主義的各色機會主義走狗作鬥爭中成長起來並取得政權的。這裏有原則上的差別，這難道還不明顯嗎？如果不是昧着良心而是憑良心說話，怎麼能把我們的幹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幹部混為一談呢？我們的幹部是在維護革命精

神的鬥爭中成長起來的，他們進行了維護革命精神的鬥爭，他們在反對帝國主義的戰鬥中取得了政權，他們震盪着世界帝國主義的基礎；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幹部從前同威廉勾結在一起反對工人階級，現在同謝克特勾結在一起，他們是在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精神的戰鬥中鞏固和成長起來的。怎麼能把這兩種原則上不同的幹部混為一談，怎麼能把他們混淆起來呢？在這兩種幹部之間存在的鴻溝是不可逾越的，這難道很難了解嗎？托洛茨基的這種粗暴的歪曲和這種粗暴的混淆是打算破壞我們的革命幹部，即我們黨的核心威信，這難道很難了解嗎？這種歪曲只會燃起怒火並使黨內鬥爭尖銳起來，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托洛茨基所犯的第五個錯誤就在於他在自己的信中提出了向學生青年，向這個『我們黨的最可靠的晴雨表』看齊的理由和口號。他在自己的第一篇文章中寫道：『青年是黨的最可靠的晴雨表，他對黨的官僚主義的反應最敏銳。』爲了使人不致懷疑他指的是哪種青年，托洛茨基在第二封信中補充說：『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對官僚主義的反應特別敏銳的是學生青年。』如果從這個絕對不正確的、理論上錯誤的和實踐上有害的論點出發，那就應當更進一步提出下面的口號：『我們黨內要有更多的學生青年，我們黨的大門要爲學生青年開得更大大些。』

直到現在情況是這樣：我們依靠的是我們黨的無產階級成分，我們說，黨的大門要爲無產階級分子開得更大大些，並且我們黨是靠吸收無產階級成分發展起來的。現在托洛茨基却把這個公式完全顛倒過來了。

關於我們黨內的知識分子和工人的問題對我們來說並不是新問題。這個問題還在我們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討論到黨章第一條關於黨員資格的條文時就已經提出來了。大家知道，馬爾托夫當時要求爲非無產階級分子放寬入黨的條件，反對要求堅決限制非無產階級分子入黨的列寧同志。後來，在我們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上，這個問題又更加尖銳地提出來了。我記得，列寧同志在大會上尖銳地提出了關於我們黨內的工人和知識分子的問題。當時列寧同志是這樣說的：

『有人指出，領導分裂的通常總是知識分子。指出這一點是很重要的，但是它不解決問題……我認爲應當把問題看得廣一些。吸收工人參加委員會不僅是一個教育任務，而且是一個政治任務。工人具有階級本能，工人只要有一點政治經驗就能相當快地成爲堅定的社會民主黨人。我很贊成我們委員會中有兩個知識分子就有八個工人。』（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八卷第三七五頁、第三七六頁）

還在一九〇五年就這樣提出問題了。從那時起，列寧同志的這個指示就成了我們在黨的建設方面的領導思想。而現在托洛茨基竟向我們提出實質上是要我們離開布爾什維主義的組織路線的建議。

最後，托洛茨基的第六個錯誤表現在他宣佈集團的自由。是的，是集團的自由！我記得，還在一起草關於民主的決議草案的小組委員會上，我們曾經和托洛茨基爭論關於集團和派別組織的問題。托洛茨基不反對禁止派別組織的存在，却堅決地主張容許黨內有集團存在。反對派就是站在這個立場上的。看來這些人不懂得，容許集團的自由就是爲米雅斯尼柯夫分子打開方便之門，使他們有可能欺

騙黨，有可能拿派別組織冒充集團。而集團和派別組織有什麼差別呢？只有表面上的差別。下面就是列寧同志對派別活動的評定，他把派別活動歸入集團一類：

『還在全黨爭論工會問題以前，黨內就已經顯露出派別活動的某些徵兆，即產生了幾個具有特別政綱、力求在某種程度上搞小圈子和規定自己的集團紀律的集團。』（見『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速記記錄』第三〇九頁）

可見派別組織和集團實質上是沒有差別的。既然在這裏，在莫斯科，反對派建立了以謝烈布利雅柯夫為首的特別委員會，分派了自己的發言人，責成他們在某些大會上發言，提出某種反對意見；既然反對派分子在鬥爭進程中被迫退却並按照命令改變自己的決議，那末這當然就是集團，就是集團的紀律。有人說這不是派別組織，那末什麼是派別組織呢？請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解釋吧。托洛茨基的發動，他的關於青年一代和派別組織問題的信和文章，都是要迫使黨容許自己內部有集團存在。這是一種使派別組織，首先是使托洛茨基的派別組織合法化的企圖。

托洛茨基硬說，集團的產生是由於中央委員會的官僚主義制度，如果我們沒有官僚主義制度，也就不會有集團了。同志們，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說法。我們這裏所以有集團出現而且將來還會有集團出現，是因為我國存在着各種各樣的經濟形式，從社會主義的萌芽形式到中世紀的形式。這是第一。其次，我們在實行新經濟政策，就是說，容許資本主義存在，容許恢復私人資本和恢復相應的思想，這種思想滲入黨內來了。這是第二。第三、因為我們黨內有三種成分，有工人，有農民，有知識分

子。如果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問題，那末這就是某些分子離開黨而組織集團的原因，這些集團我們有時應當用外科手術來剷除，有時却應當通過爭論從思想方面來消除。

這裏問題不在於制度。如果我們有極端自由的制度，那末集團就會多得多。因此，罪過不在於制度，而在於我們生活的條件，在於我國現有的條件，在於黨本身發展的條件。

如果在這種情況下，在這種複雜的情況下還容許集團存在，我們就會斷送黨，就會把黨從完整的團結一致的組織變成彼此締結條約、建立臨時聯合和取得臨時協議的集團和派別組織的聯盟。這將不成其爲黨，這將是黨的瓦解。布爾什維克從來沒有，一分鐘也沒有把黨看做別的東西，只把它看做由一塊材料鑿成的完整的組織，它有一個意志，它在工作中把思想上的各種差異匯集在一條實際活動的洪流中。

而托洛茨基提出的建議是非常錯誤的，它違反布爾什維克的組織原則，會使黨必然瓦解，會使黨渙散，會使黨軟弱，會使統一的黨變成集團的聯盟。在我們所處的資本主義包圍的環境中，我們需要的不僅是一個統一的黨，不僅是一個團結一致的黨，而且是一個能够經得住無產階級敵人的攻擊、能够引導工人去進行決戰的真正鋼鐵般的黨。

結論是什麼呢？

第一個結論就是：我們做出了明確具體的關於這次爭論總結的決議，我們說，我們不能容忍集團和派別組織，黨應當是統一的和完整的；不能把黨和機關對立起來，不能胡說幹部有蜕化的危險，因

爲這些幹部是革命的；不能在這些革命幹部和青年之間找空子，因爲青年和這些幹部現在步調一致地前進，將來還會步調一致地前進。

我們也得出某些肯定的結論。第一個和基本的結論是：黨今後要堅決指靠我們黨的無產階級成分並向他們看齊，收緊並縮小非無產階級分子進入我們黨的入口，或者完全堵死這個入口；對於無產階級分子，門要開得大一些。

至於集團和派別組織，我認爲已經到了我們應當公佈關於統一的決議中的一項條文的時候了，這項條文根據列寧同志的提議，由我們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通過，當時並沒有公佈。黨員把這項條文忘記了。恐怕不是大家都記得這項條文的。直到現在還被保守秘密的這項條文應當公開了，它應當列入我們就要通過的關於爭論總結問題的決議中。如果你們允許的話，我就讀一讀。這項條文說：

『爲在黨內和整個蘇維埃工作中執行嚴格的紀律，並取締一切派別活動以求得最高程度的統一，代表大會授權中央委員會，如遇違反紀律、恢復或容許派別活動的情事發生，可以採取黨內一切處分辦法，直到開除出黨；而對中央委員就把他降爲候補中央委員，甚至採取非常措施，把他開除出黨。凡是對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採取這種非常措施時，應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並請全體候補中央委員和全體中央監察委員參加。在這種黨內最高領導者全體會議上，如果有三分之二票數認爲必須把某個中央委員降爲候補中央委員或開除出黨時，那末這項措施就應當立即實行。』

我認爲我們應當把這項條文放到關於爭論總結的決議中去，並把它公佈。

最後，談一談反對派經常提出的但是不一定經常得到滿意答覆的一個問題。他們時常問道：我們反對派反映的是誰的情緒呢？我認爲反對派反映的是我們黨內非無產階級成分的情緒。我認爲反對派不由自主地做了我們黨內非無產階級分子情緒的不自覺的傳播者，也許他們自己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我認爲反對派無限制地鼓吹他們常常加以絕對化和偶像化的民主，就是放縱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

你們知道像學生馬爾丁諾夫、卡查爾楊等等這樣一些同志的情緒嗎？你們讀過『真理報』上霍多羅夫斯基的小品文嗎？他引了這些同志的演說中的一些話。例如馬爾丁諾夫（原來他是個黨員）的講話：『我們的工作是做決定，而中央委員會的工作是執行，並且少進行一些討論。』這裏指的是交通人民委員部直屬高等學校的支部。但是，同志們，我們黨總共有不下五萬個支部，如果每一個支部都這樣對待中央委員會：支部的工作是做決定，而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不是進行討論，那末恐怕我們永遠也不會有任何決議。馬爾丁諾夫分子的這種情緒是從哪裏來的呢？這哪裏是無產階級的情緒呢？而馬爾丁諾夫分子是擁護反對派的，——請注意這一點。馬爾丁諾夫和托洛茨基之間有沒有差別呢？差別只在於托洛茨基向黨的機關展開攻擊，而馬爾丁諾夫要消滅黨的機關。

還有一位高等學校學生卡查爾楊，原來他也是個黨員。他問道：『我們這裏是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共產黨對無產階級專政？』同志們，說這種話的不是孟什維克馬爾托夫，而是『共產黨員』

卡查爾楊。托洛茨基和卡查爾楊之間的差別在於：根據托洛茨基的說法，幹部在蛻化；根據卡查爾楊的說法，必須把幹部趕走，因為在他看來，幹部騎在無產階級的脖子上。

我要問一問：馬爾丁諾夫和卡查爾楊反映的是誰的情緒呢？是無產階級的嗎？當然不是。那末究竟是誰的呢？是黨內和國內非無產階級分子的情緒。這些反映非無產階級情緒的人擁護反對派是偶然的嗎？不，不是偶然的。（鼓掌）

二 結 論

(一月十八日)

我在報告中已經說過，我不想談問題的經過，所以不想談，是因為正像我說過的那樣，這會帶來無謂糾紛和相互責備的因素。但是既然普列奧布拉任斯基願意這樣，既然他要求這樣，那我就準備讓步，簡單地談談黨內民主問題的經過。

在中央委員會裏，關於黨內民主問題是怎樣發生的呢？第一次是在中央九月全會上發生的，發生的原因是由於各企業中爆發了衝突，是由於某些黨組織和工會組織有當時我們已經揭露的脫離羣衆的現象。當時中央委員會認為這個問題是嚴重的，缺點在黨內積累起來了，必須成立一個有威信的特別委員會來調查這個問題，研究這些事實，提出關於改善黨內狀況的具體建議。關於銷售危機，關於『剪刀差』問題也必須這樣說。無論是提出問題，無論是選舉黨內狀況委員會和『剪刀差』委員會，都沒有反對派參與其事。當時反對派在哪裏呢？如果我沒有弄錯，當時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克里木，薩普龍諾夫在基斯洛沃得斯克，托洛茨基在基斯洛沃得斯克寫完了他的論藝術的文章，準備來莫斯科。在他們還沒有來到以前，中央委員會就已經在會議上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了。他們來到時一切都

已經準備好，他們既沒有參與一句話，也沒有對中央委員會的計劃提出任何反對的意見。關於黨內狀況的問題，捷爾任斯基同志在九月省委書記會議上做過報告。我肯定地說，無論在九月全會上，無論在書記會議上，現在的反對派分子對於『嚴重的經濟危機』或者『黨內危機』和『民主』連一句話都沒有講過。

由此可見，關於民主和『剪刀差』的問題是中央委員會自己提出來的，主動權完全操在中央委員會手裏，而反對派分子沒有講過什麼話，因為他們並沒有在場。

這可以說是第一幕，問題經過的第一個階段。

第二幕是從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十月聯席全會開始的。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反對派看到黨內存在着缺點，中央委員會已經着手處理這個問題，成立了委員會，——如果主動權仍舊操在中央委員會手裏，那就糟了，——於是他們就抱定決心，企圖把主動權從中央委員會那裏奪取過去，並企圖玩弄民主這個法寶，因為大家知道，這個法寶很靈，可以試用它來欺騙中央委員會。在這個基礎上就產生了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這裏詳細談到的那些文件，即四十六人的文件⁽³⁾和托洛茨基的一封信。就是這位托洛茨基，在九月，即在他進行派別發動的前幾天，在全會上還默不作聲，至少並沒有反對中央委員會的決定，過了兩個星期却突然宣稱，國家和黨就要毀滅，而他托洛茨基，這位官僚主義分子的頭子，沒有民主就活不下去。

從托洛茨基的嘴巴裏聽到關於民主的詞句，我們感到有些可笑，因為就是這位托洛茨基在黨的

第十次代表大會上曾經要求從上面來整刷工會。可是我們知道，第十次代表大會時期的托洛茨基和現在的托洛茨基是沒有多大差別的，因為無論在當時，無論在現在，他都主張整刷列寧式的幹部。差別只在於：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他要在工會範圍內從上面來整刷列寧式的幹部，而現在他要在黨的範圍內從下面來整刷還是那些列寧式的幹部。他需要民主，把它當做法寶，當做戰略手腕。全部花樣就在這裏。

因為如果反對派真的願意解決問題，真的願意實事求是地同志般地對待問題，他們就應當首先向九月全會各委員會提出自己的聲明，大致可以這樣說：『我們認為你們的工作是不能令人滿意的，我們要求你們向政治局報告你們工作的結果，我們要求召開中央全會，我們要向全會提出我們新的建議』等等。如果委員會沒有聽取他們的意見，如果政治局沒有聽取他們的意見，如果政治局忽視反對派的意見或者拒絕召開全會來審查托洛茨基和整個反對派的建議，那末在那個時候，並且只有在那個時候，反對派才有充分權利越過中央委員會而公開地發表告黨員書，並且向黨說：『國家瀕於滅亡，經濟危機日益擴大，黨就要毀滅，我們建議中央委員會各委員會審查這些問題，但是他們拒絕聽取我們的意見，我們曾試向政治局提出意見，但是毫無結果，我們現在不得不向黨控訴，要求黨自己來處理這件事。』我相信黨會回答說：『是的，這是實事求是的革命者，因為他們把問題的本質看得高於形式。』

但是，難道反對派這樣做了嗎？難道他們，哪怕只有一次也好，打算向中央委員會各委員會提出

自己的建議嗎？難道他們曾經想過、曾經打算在中央委員會或在它的機關範圍內提出問題並解決問題嗎？不，反對派沒有做過這樣的打算。很明顯，反對派不是想改善黨內狀況，幫助黨改善經濟狀況，而是想搶先走在中央委員會各委員會和中央全會的工作的前面，奪取中央委員會的主動權，玩弄民主這個法寶，趁時間還不晚，就吵吵嚷嚷，企圖破壞中央委員會的信用。看來，反對派急急忙忙地製造反對中央委員會的『文件』，即托洛茨基的信和四十六人的聲明，就是爲了能够把它們分發給斯維爾德洛夫大學的學生和各個地區，說他們反對派是擁護民主、主張改善經濟的，而中央委員會却從中作梗，說他們需要大家的幫助來反對中央委員會等等。

事實就是如此。

我要求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反駁我這些話。我要求他至少在報刊上反駁我這些話。讓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反駁這一事實，即各委員會在沒有反對派參與的情況下，在反對派進行發動以前，就由中央九月全會成立了。讓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反駁這一事實，即無論托洛茨基，無論其他的反對派分子都沒有打算向這些委員會提出自己的建議。讓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反駁這一事實，即反對派知道有這些委員會存在，但他們藐視這些委員會的工作，他們沒有打算在中央委員會的範圍內解決問題。

正因爲如此，當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和托洛茨基在十月全會上聲稱他們想通過民主來挽救黨，而中央委員會却瞎了眼睛什麼都看不見的時候，中央委員會就嘲笑他們說：不，同志們，我們中央委員會完全擁護民主，但是我們不相信你們的民主，因爲我們認爲你們的『民主』是被你們的派別活動利

用來反對中央委員會的戰略步驟。

當時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對黨內民主問題究竟做出了什麼決定呢？決定是這樣的：

『全會完全贊同政治局及時制定的黨內民主的方針，並完全贊同政治局提出的加強同浪費現象和新經濟政策對個別黨員的腐蝕影響作鬥爭的建議。

全會委託政治局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來加速政治局和九月全會所任命的下列各委員會的工作：（一）『剪刀差』委員會，（二）工資委員會，（三）黨內狀況委員會。

政治局對這些問題制定必要措施後應立即付諸實施，並在下屆中央全會上做出關於這一問題的報告。』

托洛茨基在他給中央委員會的一封信中寫道，十月全會是『機關官僚主義路線的最高表現』。托洛茨基的這個聲明是對中央委員會的誣蔑，這難道還不明顯嗎？只有失掉理智和被派別活動弄得頭暈目眩的人才會在文件公佈以後說十月全會是官僚主義的最高表現。

當時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對托洛茨基和四十六人的『民主的』手腕做出了什麼決定呢？決定是這樣的：

『有十個黨組織的代表參加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認為，托洛茨基在世界革命和黨所經歷的最嚴重的關頭進行發動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這尤其是因為托洛茨基對

政治局的攻擊在客觀上具有派別發動的性質，使黨的統一有遭受打擊的危險並造成黨的危機。全會遺憾地認為，托洛茨基爲了提出他所涉及的問題，選擇了發表告各個黨員書的辦法，而不選擇唯一可行的辦法，即先把這些問題提交托洛茨基也担任委員的委員會討論。

托洛茨基所選擇的辦法是走向派別集團的信號（四十六人的聲明）。

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以及十個黨組織的代表堅決斥責四十六人的聲明，認為它是派別分裂政策的一個步驟，不管簽署這個聲明的人的本意如何，這個政策是帶有派別分裂的性質的。這個聲明有使黨在最近幾個月來的全部生活處在黨內鬥爭標誌下的危險，從而在決定世界革命命運的最嚴重的關頭削弱黨。』

同志們，可見上述事實完全駁倒了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這裏所描述的那種情況。

第三幕或者問題經過的第三個階段是十月全會以後的時期。十月全會決定建議政治局採取一切辦法來保證大家同心協力地工作。同志們，我應當聲明，在十月全會以後的時期內，我們採取了一切辦法要和托洛茨基同心協力地進行工作，雖然必須說明，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我們曾經和托洛茨基舉行過兩次非正式會議，談到了經濟方面和黨方面的一切問題，並且取得了某些沒有引起任何分歧的意見。這些非正式會議和這些想使政治局內部同心協力工作的嘗試的下一步驟，我昨天已經報告過，就是成立三人小組委員會。這個小組委員會還起草了一個決議草案，這個草案後來成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關於民主的決議。

情況就是如此。

我們以爲既然決議已經一致通過，就再沒有理由進行爭論，沒有理由進行黨內鬥爭了。事實上，在托洛茨基進行新的發動即發表他的告各地區書以前，情況就是這樣的。但是，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員會的決議公佈後的第二天違背中央委員會並越過中央委員會而進行的發動，却把一切事情都攪亂了，使情況根本改變了，它把黨拉向後退去進行新的爭論，去進行比過去更爲尖銳的新的鬥爭。有人說，中央委員會應當禁止登載托洛茨基的文章。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是一種對中央委員會非常危險的步驟。請你們試試禁止已經在莫斯科各區發表的托洛茨基的文章吧！中央委員會是不能採取這種輕率的步驟的。

問題的經過就是如此。

從上面所講的應該得出結論：反對派的問題與其說是擁護民主，不如說是利用民主的思想來損害中央委員會，我們的反對派不是一些願意幫助黨的人，而是一個對中央委員會心懷叵測的派別組織，他們暗自忖度：『也許中央委員會會犯錯誤，會有失策的地方，那我們就揍它一頓。』有一批黨員，他們埋伏在胡同口等候黨的中央機關，利用欺收或者切爾文貶值的機會，或者黨的其他困難，以便暗地裏從埋伏的地方跳出來揍黨的腦袋，這就是派別組織。是的，中央委員會在十月裏是正確的，當時它告訴過你們，反對派分子同志們，民主是一回事，而陷害黨是另一回事；民主是一回事，而利用民主的叫囂來反對黨的多數是另一回事。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問題的經過就是這樣。我本來不想在這裏談問題的經過，但是我終究對你的頑強的願望做了讓步，不得不講到了這個問題。

反對派歌頌列寧同志是天才人物中最有天才的人，這已經成了他們的老一套。恐怕這種讚揚不是真誠的，這裏也含有戰略上的詭計：他們想以叫嚷列寧同志的天才來掩護他們離開列寧的行爲，同時來強調列寧同志的學生們的弱點。當然，我們這些列寧同志的學生不會不了解列寧同志是天才中最有天才的人，這樣的人物經過幾百年才產生一個。但是請問你，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爲什麼你在布列斯特和約問題上和這個最有天才的人發生了分歧呢？爲什麼你在困難的時刻離開了這個最有天才的人，不聽他的話呢？你當時是待在哪裏，待在哪一個陣營裏呢？

薩普龍諾夫現在虛偽地僞善地讚揚列寧同志，而正是這位薩普龍諾夫曾經在一次代表大會上無恥地罵列寧同志是『不學無術的人』，是『寡頭政治家』！如果他真的認爲列寧同志是天才中的天才，那末爲什麼，比如說，他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不支持天才的列寧，爲什麼在困難的時刻始終站在對立的陣營裏呢？列寧同志向第十次代表大會提出關於統一的決議，要求把派別分子開除出黨，其中就有薩普龍諾夫，這一點薩普龍諾夫是否知道呢？

還有，爲什麼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不僅在布列斯特和約時期，而且後來在工會問題爭論時期也站在和最有天才的列寧相敵對的陣營裏呢？這一切都是偶然的嗎？這裏就沒有某種規律性嗎？（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我打算根據自己的見解工作。』）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你想根據自己的見解工作，這很可嘉許。但是請看結果怎樣呢？在布列斯特和約問題上，你根據自己的見解工作，結果失敗了；後來在工會問題爭論中，你又打算根據自己的見解工作，結果又失敗了；現在我不知道你是根據自己的見解還是根據別人的見解工作，但是要知道，你似乎又失敗了。（笑聲）我始終認為，如果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現在多根據自己的見解而少根據托洛茨基在十月八日的信上所表明的那種見解來工作，那末他對我們會比對托洛茨基接近些。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責備中央委員會，他說，當伊里奇領導我們的時候，問題的解決是及時的，不耽誤的，因為伊里奇善於掌握還在萌芽狀態的新事變，並善於提出預告事變的口號。而現在，他說，在伊里奇不能視事以後，中央委員會就開始落在事變的後面了。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想以此說明什麼呢？想說明伊里奇比他的學生們高明嗎？但是難道有誰懷疑這一點嗎？難道有誰懷疑，伊里奇和他的學生們相比顯然是歌利亞^②嗎？如果指的是黨的領袖，不是指接到一大堆賀電的報刊上的領袖，而是指真正的領袖，那末我們的領袖只有一個，就是列寧同志。正因為如此，我們不止一次地說過，在目前列寧同志暫時不能視事的情況下，需要採取委員會制的方針。至於說到列寧同志的學生，可以舉出同克遜的最後通牒^③有關的事變做例子，這些事變對列寧同志的學生是一種典型的鍛鍊和考驗。常時我們擺脫了困難而沒有使事業受到損失，這件事實毫無疑問地說明列寧同志的學生已經從自己的導師那裏學會了一些東西。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硬說我們黨在過去的年代裏沒有落在事變的後面，這是不正確的。所以不正

確，是因為這種說法在實際上是不真實的，在理論上是不正確的。可以引證許多例子。就拿布列斯特和約來說吧。難道我們的布列斯特和約不是簽訂得遲了嗎？難道我們不是由於德國人的進攻和我們士兵的普遍逃跑這些事實才最後了解到和約的必要嗎？戰綫的崩潰，霍夫曼的進攻^⑤，他向彼得堡的進軍，農民對我們的壓力，——難道我們不是由於這一切事實才了解到國際革命的速度並不像我們所希望的那樣迅速，我們的軍隊並不像我們所想像的那樣鞏固，農民並不像我們有些人所想像的那樣能忍耐，農民希望和平，他們要用強力取得和平嗎？

或者就拿廢除餘糧收集制來說吧。難道我們的餘糧收集制不是廢除得遲了嗎？難道我們不是由於喀琅施塔得和唐波夫^⑥這些事實才了解到不能再在戰時共產主義的條件下過日子了嗎？難道伊里奇自己不是承認，我們在這條戰綫上所遭到的失敗要比同鄧尼金和高爾察克作戰的戰綫上的任何一次失敗都更嚴重嗎？

黨在這一情況下都落在事變的後面，都稍微遲了一點，這個事實是偶然的嗎？不，不是偶然的。這是合乎規律的。很明顯，既然這裏的問題不是一般的理論上的預見，而是直接的實際領導，那末掌握政權而被捲進日常事變的執政黨不可能立刻看出和掌握住生活深處所發生的過程，需要外界的推動力和新過程一定程度的發展，才能使黨看出這些過程並依據它們來確定方針。正因為如此，我們黨過去稍微落在事變的後面，將來還會落在事變的後面。這裏問題完全不在於落後與否，而在於了解事變的意義，了解新過程的意義，然後按照總的發展趨向來巧妙地掌握這些事變和過程。如果我

們用馬克思主義者的眼光，而不是用到處找罪魁的派別分子的眼光來看事物，那末問題正是這樣。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因中央委員會的代表們講到托洛茨基的離開列寧主義的傾向而表示憤怒。他表示憤怒，但是實質上沒有提出什麼反對的意見，並且根本不打算爲自己的憤怒提出根據，他忘記了憤怒並不就是論據。是的，托洛茨基在組織問題上確實離開了列寧主義。我們過去這樣斷定而且現在還是這樣斷定。布哈林所寫的在『真理報』上發表的題爲『打倒派別活動』的著名文章，完全是論述托洛茨基的離開列寧主義的傾向問題的。爲什麼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不從實質上提出意見來反對這篇文章的基本思想呢？爲什麼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不打算提出論據或者類似論據的東西來論證自己的憤怒呢？昨天我已經說過，今天還要重複一遍：把自己和中央委員會對立起來，忽視許多組織要求托洛茨基明確回答問題的意志，把黨和黨的機關對立起來，把青年和黨的幹部對立起來，要黨指望學生青年和宣佈集團自由，——托洛茨基的這些行爲和列寧主義的組織原則是不相容的。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究竟爲什麼不打算反駁我這種說法呢？

有人說托洛茨基受到了攻擊，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和拉狄克都談到這一點。同志們，我必須聲明，這些同志關於攻擊的說法完全不符合實際情況。爲了使你們有可能判斷，我提醒你們注意兩個事實。第一個事實就是中央九月全會上發生的事件，當時托洛茨基聽到中央委員柯馬羅夫關於中央委員不能拒絕執行中央委員會決議的話，站起來就退出了全會會議。你們記得，中央全會當時派了一個『代表團』到托洛茨基那裏去，請求他回到全會會議上來。你們記得，托洛茨基拒絕接受全會的請求，這

就表現出他對自己的中央委員會毫不尊重。

或者再拿另一個事實的經過來說。雖然中央委員會曾經兩次通過決議，要托洛茨基一定擔任蘇維埃機關的工作，但是托洛茨基堅決拒絕在蘇維埃中央機關，在勞動國防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工作。你們知道，托洛茨基根本不打算執行中央委員會的決議。究竟為什麼托洛茨基不想在勞動國防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工作呢？為什麼喜歡大談計劃的托洛茨基對我們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不屑一顧呢？一個中央委員蔑視中央的決議，這種情況能不能認為是正常的呢？這一切事實不是說明了關於攻擊的說法是無中生有的謠言，說明了如果要責備什麼人，那就應該責備托洛茨基自己（因為他的行為只能看做是對中央委員會的侮辱）嗎？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關於民主的論斷是完全不正確的。普列奧布拉任斯基這樣提出問題：或者我們有集團，那就有民主；或者你們禁止集團，那就沒有民主。他的集團自由和民主是彼此密切聯系着的。我們不是這樣理解民主的。我們所理解的民主是提高黨員羣衆的積極性和自覺性，經常吸引黨員羣衆不僅參加討論問題，而且參加領導工作。集團的自由，即派別組織的自由（兩者是一回事）是一種禍害，它使黨有遭到分裂和變成爭論的俱樂部的危險。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你揭露了自己，因為你堅持派別組織的自由。黨員羣衆所理解的民主是創造條件保證黨員積極參加我們國家的領導事業，而兩三個反對派知識分子却把民主理解為給反對派建立派別組織的機會。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你揭露了自己。

爲什麼你們這樣害怕關於黨的統一的第七條呢？這裏有什麼可怕的呢？第七條說：『爲在黨內和整個蘇維埃工作中執行嚴格的紀律，並取締一切派別活動以求得最高程度的統一……』難道你們反對『在黨內和整個蘇維埃工作中執行嚴格的紀律』嗎？反對派同志們，難道你們反對這一點嗎？同志們，我可不知道你們是反對這一點的。薩普龍諾夫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難道你們反對求得最高程度的統一和『取締派別活動』嗎？請直截了當地說出來，也許我們會做小小的修正。（笑聲）

再往下看：『代表大會授權中央委員會，如過違反黨的紀律或恢復派別活動的情事發生，可以採取黨內處分的辦法……』難道你們也害怕這一點嗎？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拉狄克，薩普龍諾夫，難道你們想違反黨的紀律，恢復派別活動嗎？要是你們不想這樣做，那末究竟害怕什麼呢？同志們，你們身上的驚惶情緒揭露了你們自己。很明顯，既然你們害怕關於統一的決議的第七條，你們就是擁護派別活動，擁護違反紀律，反對統一。如果你們不反對這一切，那末你們究竟爲什麼驚惶不安呢？如果你們心地純正，如果你們擁護統一，反對派別活動和反對違反紀律，那末黨的懲罰的手是不會碰到你們的，這難道還不明顯嗎？你們究竟害怕什麼呢？（有人喊道：『既然沒有什麼可怕，你爲什麼提出來呢？』）

我們是提醒你們。（笑聲，鼓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你在嚇唬黨。』）

我們是嚇唬派別分子，不是嚇唬黨。普列奧布拉任斯基，難道你認爲黨和派別分子是一回事嗎？大概是做賊心虛。（笑聲）

再往下看：「而對中央委員就把他降為候補中央委員，甚至採取非常措施，把他開除出黨。凡是對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採取這種非常措施時，應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

這裏有什麼可怕的呢？如果你們不是派別分子，如果你們反對集團的自由，如果你們擁護統一，那末，反對派同志們，你們應當贊成第十次代表大會決議的第七條，因為它是專門對付派別分子，專門對付破壞黨的統一、黨的威力、黨的紀律的人的。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現在來談談拉狄克。有一種人，他們長了舌頭是爲了控制它和支配它的。這是平常人。還有一種人，他們自己服從自己的舌頭並且受舌頭的支配。這是特殊的人。拉狄克就屬於這種特殊的人。一個人如果長了舌頭不是爲了支配它，而是爲了讓自己服從自己的舌頭，那他就不能知道，舌頭會在什麼時候順口說出什麼話來。如果你們有機會聽過拉狄克在各種會議上的發言，你們對他今天的演說就會感到驚奇。拉狄克在一次爭論會議上肯定地說，黨內民主問題是不值得一談的問題，他拉狄克，老實說是反對民主的，現在的問題實質上不是關於民主的問題，而是中央委員會考慮怎樣對待托洛茨基的問題。就是這個拉狄克在另一次爭論會議上又聲明說，黨內民主問題並不重要，中央委員會內的民主才是最重要的問題，因為在他看來，中央委員會裏已經成立了一個執政內閣。還是這個拉狄克今天却又公開聲明說，黨內需要民主正像需要空氣和水一樣，因為照他說來，沒有民主就不能管理黨。在這三個拉狄克中，叫我們相信哪一個呢？相信第一個，相信第二個，還是相信第三個呢？有什麼可以保證拉狄克或者他的舌頭在最近的將來不會做出新的意外的聲明來反駁他以前的一切聲明呢？能

不能信賴拉狄克這樣的人呢？既然如此，拉狄克的關於撤銷鮑古斯拉夫斯基和安東諾夫的某些職務是由於『派別性的考慮』的聲明還能有什麼價值呢？

同志們，關於鮑古斯拉夫斯基我已經談過了……至於安東諾夫——奧弗申柯，讓我告訴你們以下的事實。根據中央全會所批准的中央組織局的決議，撤銷了安東諾夫在工農紅軍總政治部的職務。他所以被撤職，首先是因為他沒有通知中央委員會，也沒有得到中央委員會的同意，就分發了附有國際形勢、黨的建設等等議程的關於召開高等軍事學校支部和空軍支部代表會議的通知，雖然安東諾夫知道，工農紅軍總政治部是以中央委員會的一個部的權限進行工作的。此外，所以撤銷他在工農紅軍總政治部的職務，是因為他違反中央委員會的意志，不顧中央委員會所提出的關於運用黨內民主的方式的指示必須和中央委員會的計劃相符合的警告，把這個指示分發給所有的軍隊支部了。最後，他所以被撤職，是因為他送給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一封口氣十分不禮貌而內容絕對不可容忍的信，威脅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要它們使『肆意妄爲的領袖們』守規矩。

同志們！可以而且應該容許反對派分子擔任職務。可以而且應該容許中央委員會各部部长批評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但是不能容許以中央委員會的一個部的權限進行工作的工農紅軍總政治部的部長經常拒絕和自己的中央委員會建立事務上的聯系，不能容許負責工作人員藐視起碼的禮節。不能把教育紅軍的工作託付給這樣的同志。關於安東諾夫的問題就是如此。

最後，我必須簡單地談一談反對派同志們在他們的演說中反映的究竟是誰的情緒的問題。我必

須回到交通人民委員部訓練班的卡查爾楊同志和馬爾丁諾夫同志的『事件』上來。這個『事件』說明，一部分高等學校學生的情況並不是一切都很好，他們身上的黨性已經腐朽，他們內心裏已經和黨斷絕關係，正因為如此，他們樂意擁護反對派。但是，同志們，請原諒我這樣說，在贊成中央委員會決議的人中間是沒有而且不可能有這種在黨性方面腐朽透頂的人的。同志們，我們這裏是沒有這種人的。在我們這裏，在我們的隊伍中，沒有人會說：『我們這裏是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共產黨對無產階級專政？』這是馬爾托夫和唐恩的話。這是社會革命黨人『日報』的話。反對派同志們，如果在你們那裏，在你們的隊伍中有這樣的擁護者，你們的立場究竟還有什麼價值呢？或者拿另一個同志即馬爾丁諾夫同志來說吧。他認為中央委員會應該默不作聲，而由支部來做決定。他說：你們中央委員會可以執行我們支部的決定。但是我們有五萬個支部。如果由它們來做決定，例如做關於克遜最後通牒問題的決定，那末我們花兩年的時間也不能做出這個問題的決定。要知道，這是十足的無政府孟什維主義。如果這些失掉理智和在黨性方面腐朽透頂的人待在你們的派別組織裏，你們的派別組織究竟還有什麼價值呢？（喊聲：『他們是黨員嗎？』）

是的，很遺憾，他們是黨員，但是我決心採取一切辦法使這種人不再做我們黨的黨員。（鼓掌）我說過，反對派所反映的是黨內外非無產階級分子的情緒和意圖。反對派自己沒有意識到他們在放縱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反對派的派別活動幫助了我們黨的敵人，幫助了那些想削弱和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人。這一點我昨天已經說過，今天再把它肯定下來。

但是也許你們想聽聽其他新證人的話吧？好吧，我可以滿足你們的要求，舉出你們大家知道的斯·伊萬諾維奇所說的話做例子。這個斯·伊萬諾維奇是什麼人呢？他是孟什維克，當我們和孟什維克同在一個黨內的時候他是黨員。後來他脫離了孟什維克中央，成了右派孟什維克。右派孟什維克是孟什維克武裝干涉主義者的集團，他們的首要任務是推翻蘇維埃政權，即使要靠外國武力的幫助。他們的機關刊物是『曙光』雜誌〔C〕。這個機關刊物的編輯就是斯·伊萬諾維奇。這個右派孟什維克是怎樣對待我們的反對派的呢？他是怎樣褒獎反對派的呢？請聽吧：

『我們要感謝反對派，因為它把俄國共產黨這個可怕的道路上的罪惡淵藪的情景如此逼真地描繪出來了。我們要感謝它，因為它給了俄國共產黨以精神和組織上的嚴重打擊。我們要感謝它，因為它的工作幫助了所有那些認為推翻蘇維埃政權是社會主義政黨的任務的人。』

反對派同志們，這就是給你們的褒獎。

我在結束演說的時候，還是要對反對派的同志們表示一個希望，希望斯·伊萬諾維奇的這個吻不致在他們臉上貼得太緊。（鼓掌多時）

① 齊特·齊梯奇是阿·尼·奧斯特洛夫斯基所著『代人受過』一劇中的主角。他是一個富商，一個白私自利、不學無術、剛愎自用的資產階級典型人物。——譯者註

② 據舊約記載，歌利亞是一個巨人。——譯者註

悼 列 寧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在全蘇蘇維埃

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同志們！我們共產黨人是具有特種性格的人，我們是由特殊材料製成的。偉大的無產階級戰略家的軍隊，列寧同志的軍隊，就是由我們這些人組成的。在這個軍隊裏做一個戰士，是再光榮不過的了。以列寧同志為始人和領導者的這個黨的黨員稱號，是再高尚不過的了。並不是任何人都能做這個黨的黨員。並不是任何人都能經得住這個黨的黨員所必須經歷的種種苦難和風暴。工人階級的兒女，在貧困和鬥爭中成長起來的兒女，在千辛萬苦和英勇奮鬥中成長起來的兒女，——首先就是這些人應當成為這個黨的黨員。正因為如此，列寧主義者的黨，共產主義者的黨，同時也叫作工人階級的黨。

列寧同志和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要珍重黨員這個偉大稱號，並保持這個偉大稱號的純潔性。列寧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我們一定要光榮地執行你的這個遺囑！

二十五年來列寧同志培養了我們黨，把我們黨培養成為世界上最堅固最有鍛鍊的工人黨。沙皇

政府及其走狗的打擊，資產階級和地主的瘋狂暴行，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的武裝襲擊，英國和法國的武裝干涉，一切資產階級報刊異口同聲的造謠和誣蔑，——二十五年來所有這一切惡毒的攻擊都落在我們黨的頭上。可是，我們黨像一座石山一樣屹立着，打退了敵人無數次的攻擊，引導工人階級向勝利前進。我們黨在殘酷的戰鬥中鍛鍊了自己隊伍的統一和團結。它依靠統一和團結戰勝了工人階級的敵人。

列寧同志和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要保護我們黨的統一，如同保護眼珠一樣。列寧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我們也一定要光榮地執行你的這個遺囑！

工人階級的命運痛苦不堪。勞動者備受折磨和苦難。奴隸和奴隸主，農奴和農奴主，農民和地主，工人和資本家，被壓迫者和壓迫者，——自古以來世界就是這樣構成的，而且現在絕大多數國家都還是這樣的。千百年來，勞動者數十次數百次地企圖推翻壓迫者，使自己成爲自己生活的主宰。但是他們每一次都遭到失敗，受到侮辱，不得不退却，不得不把委屈和恥辱、憤怒和絕望埋在心裏，仰望茫茫的蒼天，希望在那裏找到救星。奴隸制的枷鎖依然如故，或者舊枷鎖只是被一些同樣沉重同樣侮辱人的新枷鎖所代替。只有在我們國家裏，被壓迫被踐踏的勞動羣衆才推翻了地主和資本家的統治，建立了工人和農民的統治。同志們，你們知道，而且現在全世界都承認，這個偉大的鬥爭是由列寧同志和他的黨領導的。列寧的偉大首先就在於他創立了蘇維埃共和國，從而在事實上向全世界被壓迫羣衆表明了：得救的希望並沒有喪失，地主和資本家的統治是不會長久的，勞動王國是可以靠勞

動者自身的努力來建立的；勞動王國是應該建立在地上，而不應該建立在天上的。這樣，他就激發了全世界工農爭取解放的熱望。這也就說明爲什麼列寧的名字成了被剝削的勞動羣衆最愛慕的名字。

列寧同志和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要保護並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列寧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我們也一定不遺餘力來光榮地執行你的這個遺囑！

我國無產階級專政是建立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的。這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一個和根本的基石。工人和農民不結成這樣的聯盟就不能戰勝資本家和地主。工人沒有農民的支持就不能打倒資本家。農民沒有工人的領導就不能打倒地主。我國國內戰爭的全部歷史說明了這一點。可是鞏固蘇維埃共和國和鬥爭還遠沒有結束，它只是採取了一種新的形式。從前工農聯盟具有軍事聯盟的形式，因爲它是以反對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爲目標的。現在工農聯盟應當採取城市和鄉村間、工人和農民間經濟合作的形式，因爲它是以反對商人和富農爲目標的，因爲它是以工人和農民互相供給一切必需品爲目標的。你們知道，沒有一個人像列寧同志那樣堅決地執行過這個任務。

列寧同志和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要竭力鞏固工農聯盟。列寧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我們也一定要光榮地執行你的這個遺囑！

我國各民族勞動者的聯盟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二個基石。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巴什基里亞人和白俄羅斯人，格魯吉亞人和阿捷爾拜疆人，阿爾明尼亞人和達格斯坦人，韃靼人和柯爾克茲人，烏茲別克人和土爾克明人，——他們都同樣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鞏固休戚相關。不僅無產階級專政使這

些民族擺脫枷鎖和壓迫，而且這些民族也以他們對蘇維埃共和國的無限忠誠，以他們爲蘇維埃共和國犧牲的決心來使我們蘇維埃共和國免遭工人階級的敵人的暗算和襲擊。正因爲如此，列寧同志始終不倦地對我們說明我國各族人民自願聯盟的必要性，說明我國各族人民在共和國聯盟內實行兄弟合作的必要性。

列寧同志和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要鞏固並擴大共和國聯盟。列寧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我們也一定要光榮地執行你的這個遺囑！

我們的紅軍，我們的紅海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三個基石。列寧曾屢次對我們說過，我們從資本主義國家那裏爭得的喘息時機可能是很短的。列寧曾屢次向我們指出，鞏固紅軍和改善紅軍狀況是我們黨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和克遜最後通牒以及和德國危機（○）有關的事變再一次證實了列寧向來是正確的。同志們，我們來宣誓：我們一定不遺餘力地來鞏固我們的紅軍，鞏固我們的紅海軍！

處在資產階級國家汪洋大海包圍中的我國，像一座巨大的石山一樣屹立着。波浪一個接着一個地向它沖擊，聲勢洶洶地要把它淹沒，把它沖毀。但是這座石山仍然屹立不動。我國爲什麼這樣有力量呢？這不僅因爲我國建立在工農聯盟上，它體現着各自自由民族的聯盟，它受到紅軍和紅海軍的強有力的保護。我國所以有力量，所以堅強鞏固，還因爲它得到全世界工人和農民深刻的同情和堅決的支持。全世界工人和農民都想保全蘇維埃共和國，認爲這是列寧同志用他百發百中的妙手射入敵人陣營的一枝箭，是他們希望擺脫壓迫和剝削的靠山，是給他們指出解放道路的可以信賴的燈塔。他們

想保全蘇維埃共和國，不讓地主和資本家破壞它。我們的力量就在這裏。世界各國勞動者的力量就在這裏。全世界資產階級的軟弱也在這裏。

列寧從來沒有把蘇維埃共和國看做最終目的。他始終把它看做加強西方和東方各國革命運動的必要環節，看做促進全世界勞動者戰勝資本的必要環節。列寧知道，不僅從國際的觀點來看，而且從保全蘇維埃共和國本身的觀點來看，只有這樣的見解才是正確的。列寧知道，只有用這樣的方法，才能鼓舞全世界勞動者去進行爭取解放的堅決戰鬥。正因為如此，列寧這位無產階級英明的領袖中最英明的領袖，還在無產階級專政成立的第二天，就奠定了工人國際的基礎。正因為如此，列寧始終不倦地擴大並鞏固全世界勞動者的聯盟——共產國際。

這幾天你們已經看見有幾萬幾十萬勞動者來拜謁列寧同志的靈柩。過一些時候你們會看見有幾百萬勞動者的代表們來拜謁列寧同志的陵墓。用不着懷疑，在幾百萬勞動者的代表們後面，一定會有全世界各地幾千萬、幾萬萬勞動者的代表們接踵而至，以證實列寧不僅是俄國無產階級的領袖，不僅是歐洲工人的領袖，不僅是殖民地東方的領袖，而且是全球整個勞動世界的領袖。

列寧同志和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要忠實於共產國際的原則。列寧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我們一定誓不顧身地來鞏固並擴大全世界勞動者的聯盟——共產國際！

載於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

【真理報】第二十三號

論 列 寧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克里姆林軍校
學員晚會上的演說）

同志們！我接到通知，說你們這裏要舉行回憶列寧的晚會，並邀請我也來做一個報告。我認為沒有必要做一個關於列寧的生平事業的連貫性的報告。我想，倒不如只把一些表明列寧的爲人和他作爲一個活動家的某些特點的事實告訴大家。這些事實相互間也許沒有什麼內在的聯系，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得到一個關於列寧的總的概念。不管怎樣，我這一次向你們講的不可能比我剛才所答應的更多。

山 鷹

我最初和列寧認識是在一九〇三年。固然，這次認識並不是經過親自會面，而是經過互相通信。但是這次認識給我留下了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我在黨內工作的整個時期中，這個印象始終沒有消

失過。那時我正被流放在西伯利亞。當我知道列寧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末，特別是從一九〇一年以後，在『火星報』〔二〕出版以後的革命活動的時候，我就深信列寧是一個非常的人物。當時在我看來，他不是我們黨的一個普通的領導者，而是我們黨的實際創造人，因為只有他一個人才了解我們黨的內部實質和迫切的需要。當我拿列寧和我們黨的其他領導者比較的時候，我總覺得列寧的戰友普列漢諾夫、馬爾托夫、阿克雪里羅得等人都遠不如列寧，列寧和他們比較起來不單是一個領導者，而且是一個最高典型的領導者，是一隻山鷹，他在鬥爭中不知恐懼為何物，大胆地引導我們黨沿着前人未曾走過的俄國革命運動的道路前進。這個印象竟這樣深深地印入了我的心靈，使我感到必須寫封信給一位僑居國外的好友，把這個印象告訴他，要他評論一下。過了不久，當我已經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時候——這是一九〇三年末——我收到了我那位朋友的熱情的答覆，以及列寧的一封信簡單而內容豐富的信，原來我的朋友把我那封信給列寧看過了。列寧的這封信雖然比較短，但是它對我們黨的實際工作做了大胆無畏的批評，並對我們黨在最近時期的全部工作計劃做了非常明確扼要的說明。只有列寧才善於把最複雜的事情描寫得這樣簡單和明確，這樣扼要和大膽，——他說的每一句話都是一顆子彈。這封簡單而大膽的短信使我更加確信列寧是我們黨的山鷹。可惜我按過去秘密工作者的習慣，把列寧的這封信同其他許多信一樣燒掉了，這是我不能寬恕自己的。

從那時起，我就和列寧認識了。

謙遜

我第一次會見列寧是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塔墨爾福斯（在芬蘭）布爾什維克代表會議上。我本來希望看見我們黨的山鷹，看見一個偉大的人物，這個人物不僅在政治上是偉大的，而且可以說在體格上也是偉大的，因為當時列寧在我的想像中是一個魁梧奇偉的巨人。當我看見他原來是一個和凡人毫無區別，簡直是毫無區別的、最平常的、身材比較矮小的人的時候，我是多麼失望呵……

通常，『偉大人物』照例是開會遲到，使會場上的人望眼欲穿地等他出現的；而且在『偉大人物』就要出現之前，會場上的人彼此警告說：『噓……靜一點……他來了。』我當時覺得這一套並不是多餘的，因為它能令人肅然起敬。當我知道列寧比代表們到得更早，躲在一個角落裏樸實地同那些參加代表會議的最平常的代表們進行最平常的談話的時候，我是多麼失望呵。老實說，我當時覺得這未免有點違背某些必要的常規。

後來我才明白，列寧這樣樸實謙遜、這樣不願表現自己、至少是不想惹人注目、不擺架子的特點，正是他的最大長處，正是他這種新羣衆的新式領袖；即人類最『下層』普通羣衆的新式領袖所具有的最大長處。

邏輯力量

列寧在這次代表會議上發表了兩個精彩的演說：論目前形勢和論土地問題。可惜這兩篇演說詞都沒有保存下來。這是兩個使人興奮的、使代表會議全場歡欣鼓舞的演說。非凡的說服力，簡單明瞭的論據，簡短通俗的詞句，沒有矯揉造作，沒有專為加深聽衆印象的令人頭暈的手勢和力求效果的詞句，——這一切都使列寧的演說遠勝於通常『議會』演說家的演說。

可是當時使我佩服的還不是列寧演說的這一方面。當時使我佩服的是列寧演說中那種不可戰勝的邏輯力量，這種邏輯力量雖然有些枯燥，但是緊緊地抓住聽衆，一步進一步地感動聽衆，然後就把聽衆俘虜得一個不剩。我記得當時有很多代表說：『列寧演說中的邏輯好像萬能的觸角，用鉗子從各方面把你鉗住，使你無法脫身；你不是投降，就是完全失敗。』

我認爲列寧演說中的這個特點是他的演說藝術中最強有力的地方。

不灰心

我第二次會見列寧是在一九〇六年我們黨的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二）上。大家知道，在這次代表

大會上布爾什維克佔了少數，遭到失敗。當時我第一次看見列寧處於失敗者的地位。他絲毫不像那些失敗後就灰心喪氣的領袖。恰恰相反，失敗使列寧更加精神百倍，鼓舞自己的擁護者去作新的戰鬥，爭取未來的勝利。我現在說的是列寧的失敗。但這究竟是怎樣的失敗呢？必須看一看列寧的反對者，即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上的勝利者——普列漢諾夫、阿克雪里羅得和馬爾托夫等人：他們很少像真正的勝利者，因為列寧用他對於孟什維主義的無情的批判把他們打得體無完膚了。我記得當時我們這些布爾什維克代表都聚集在一起，望着列寧，問他的意見。在某些代表的言論中流露出疲倦和氣餒的情緒。我記得列寧對於這種言論用諷刺的蔑視的口氣回答說：『同志們，不要灰心，我們一定會勝利，因為我們是正確的。』憎恨灰心失望的知識分子，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勝利，——這就是列寧當時告訴我們的。當時令人感到布爾什維克的失敗是暫時的，布爾什維克在最近的將來一定會勝利。

『不因失敗而灰心』，——這就是列寧活動中的一個特點，這個特點使他能够把一支忠實到底和相信自己力量的軍隊團結在他的周圍。

不驕傲

在下一大代表大會上，即在一九〇七年倫敦代表大會（三）上，布爾什維克成了勝利者。當時我第一次看見列寧處於勝利者的地位。通常勝利總會使某些領袖衝昏頭腦，使他們驕傲自大起來。在這

種情形下，他們往往就誇耀勝利，高枕而臥。但是列寧絲毫不像這種領袖。恰恰相反，正是在勝利以後，列寧特別警惕和戒備起來。我記得當時列寧十分堅決地教導代表們說：『第一件事就是不要陶醉於勝利，不要驕傲；第二件事就是要鞏固自己的勝利；第三件事就是要徹底消滅敵人，因為敵人只是被打敗了，但是遠遠沒有被徹底消滅。』他狠狠地嘲笑那些輕率地斷言『孟什維克從此完蛋了』的代表。他毫不困難地證明：孟什維克在工人運動中還有基礎，我們還必須善於和他們作鬥爭，竭力避免過高估計自己的力量，尤其要避免過低估計敵人的力量。

『不因勝利而驕傲』，——這就是列寧性格中的一個特點，這個特點使他能够冷靜地估計敵人的力量，保證黨不遭可能發生的意外。

原則性

黨的領袖不能不尊重黨內多數的意見。多數，這是領袖不能不重視的力量。列寧對這一點的瞭解並不亞於黨內其他任何領導者。但是列寧從來沒有做過多數的俘虜，尤其是當這個多數沒有原則立場的時候。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有過黨內多數的意見或黨的眼前利益同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相抵觸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下，列寧總是毫不猶豫地堅持原則，反對黨內多數的意見。而且在這種情況下，他簡直不怕獨自一人去反對全體，因為他認為——正如他自己常說的那樣——『原則性的政策是唯一

一 正確的政策。

下面兩個事實可以特別明顯地說明這一點。

第一個事實。在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一年時期，黨被反革命勢力打敗，處於完全解體的狀態。這是人們不相信黨的時期；這是不僅知識分子，而且一部分工人也紛紛退黨的時期；這是人們否定地下活動的時期；這是取消主義的時期，瓦解的時期。當時不僅在孟什維克中，而且在布爾什維克中也有許多派別組織和派別思想，而且大部分都是脫離工人運動的。大家知道，正是在這個時期產生了要完全取消秘密組織而把工人組織成爲合法的自由主義的斯托雷平黨的思想。當時只有列寧一人沒有隨波逐流，而高舉着黨性的旗幟，以驚人的耐心和非常的堅忍精神來收集黨的零散殘部，猛烈攻擊工人運動中所有一切反黨派別，以非常的勇氣和空前的毅力來捍衛黨性。

大家知道，在這個爲黨性而進行的爭論中，後來列寧成了勝利者。

第二個事實。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帝國主義戰爭熾烈的時期，所有的或幾乎所有的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黨都染上了流行的愛國主義狂熱，替本國的帝國主義盡忠效勞。這是第二國際在資本面前放下自己的旗幟，連普列漢諾夫、考茨基和蓋得等等一類人物都抵擋不住沙文主義浪潮的時期。當時只有列寧一人，或幾乎只有列寧一人掀起了反對社會沙文主義和社會和平主義的堅決鬥爭，揭露蓋得之流和考茨基之流的變節行爲，痛斥騎牆派『革命家』的不徹底性。列寧明知跟隨他走的只有很少的少數，但是他認爲這沒有決定的意義，因爲他知道，徹底的國際主義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有前途

的政策；因為他知道，原則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

大家知道，在這個爲新國際而進行的爭論中，列寧成了勝利者。

『原則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這就是列寧的公式，列寧用這個公式攻佔了許多新的『不可攻佔的』陣地，把無產階級優秀分子爭取到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方面來。

相信羣衆

有些政黨的理論家和領袖雖然知道各族人民的歷史，鑽研過革命歷史的始末，可是他們有時患着一種很不體面的病症。這種病症就叫做害怕羣衆，不相信羣衆的創造能力。在這個基礎上，有時就產生了領袖對羣衆的某種貴族態度，而羣衆雖然不熟悉革命歷史，却負有破壞舊制度和建立新制度的使命。怕自發勢力洶湧澎湃，怕羣衆『破壞得太多』，想充當保姆的角色，竭力照書本去教導羣衆，而不願意向羣衆學習，——這就是這種貴族態度的基礎。

列寧和這種領袖完全相反。我不知道有第二個革命者像列寧這樣深信無產階級的創造力，深信無產階級的階級本能適合於革命。我不知道有第二個革命者善於像列寧這樣無情地打擊那些傲慢批評『革命的混亂狀態』和『羣衆的胡鬧行爲』的人。我記得在一次談話中，有一位同志提出意見說『革命後必須建立正常的秩序』，列寧諷刺地回答說：『如果想做革命者的人竟忘記了革命秩序是歷史上

最正常的秩序，那就糟了。」

因此，列寧總是鄙棄那些瞧不起羣衆，想照書本去教導羣衆的人。因此，列寧總是不倦地教誨我們：要向羣衆學習，要理解羣衆的行動，要細心研究羣衆鬥爭的實際經驗。

相信羣衆的創造力，——這就是列寧活動中的一個特點，這個特點使他能够理解自發勢力，把自發運動引上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

革命天才

列寧是爲革命而誕生的。他真正是組織革命爆發的天才和領導革命的偉大能手。他在革命動盪時代覺得比任何時候都自在、愉快。我完全不是想以此說明，列寧對任何革命動盪都同樣嘉許，或者他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條件下都主張革命爆發。完全不是。我只是想以此說明，列寧的英明遠見在任何時候都不像在革命爆發時期那樣充分和明顯地表現出來。在革命的轉折關頭，他真是才華畢露，洞察一切，預見到各階級的行動和革命進程的可能曲折，他對這些東西簡直是瞭如指掌。難怪我們黨內常說：『伊里奇在革命波浪裏游泳，就像魚在水裏一樣。』

因此，列寧的策略口號是『驚人的』明確，列寧的革命計劃是『出奇的』大胆。

我記得有兩個事實可以特別明顯地說明列寧的這個特點。

第一個事實。在十月革命前夜的時期，爲後方和前線的危機所激動的千百萬工人、農民和士兵要求和平和自由，將軍和資產階級準備軍事專政，以求『作戰到底』；整個所謂『輿論界』，一切所謂『社會主義的政黨』都反對布爾什維克，誣蔑他們是『德國間諜』；克倫斯基企圖把布爾什維克黨驅入（而且已經把一部分驅入）地下，還很強大的有紀律的德奧聯軍同我國疲憊的處於瓦解狀態的軍隊對峙着，而西歐的『社會主義者』安然和本國政府結成聯盟，以求『作戰到完全勝利』……

在這樣的關頭舉行起義是什麼意思呢？在這樣的情況下舉行起義就是孤注一擲。但是列寧不怕冒險，因爲他知道，因爲他用洞察一切的目光看見：起義必不可免，起義一定會勝利，俄國的起義一定會準備好結束帝國主義戰爭的條件，俄國的起義一定會鼓舞西方受盡苦難的羣衆，俄國的起義一定會使帝國主義戰爭變爲國內戰爭，起義的結果一定會成立蘇維埃共和國，而蘇維埃共和國一定會成爲全世界革命運動的堡壘。

大家知道，列寧的這個革命預見後來空前準確地實現了。

第二個事實。在十月革命後的最初幾天，人民委員會打算使叛亂的將軍杜鶴寧總司令停止軍事行動並開始同德軍進行停戰談判。我記得當時列寧、克雷連柯（後來的總司令）和我前往彼得堡總參謀部去用電報同杜鶴寧直接談判。時機十分危急。杜鶴寧和大本營堅決拒絕執行人民委員會的命令。當時軍隊的指揮人員完全掌握在大本營手裏。至於士兵，誰也不知道這一千四百萬隸屬於蓄意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所謂各集團軍組織的軍隊會表示什麼態度。大家知道，當時在彼得堡正醞釀着士官生

的暴動。此外，克倫斯基正向彼得堡進軍。我記得列寧在電報機旁沉默了一會，忽然容光煥發。他顯然是打定主意了。他說：『我們到無綫電台去吧，無綫電台會幫助我們；我們下一道特別命令把杜鵑寧將軍撤職，委任克雷連柯同志做總司令，越過指揮人員去號召士兵包圍將軍，停止軍事行動，同德奧士兵聯歡，把和平事業拿到自己手裏。』

這真是『冒險的一躍』。但是列寧不怕這『一躍』，反而樂於進行這『一躍』，因為他知道軍隊希望和平，軍隊將掃除和平道路上所有一切障礙而爭得和平；因為他知道用這種方法來奠定和平對德奧士兵不會沒有影響，用這種方法一定會毫無例外地使所有戰綫上要求和平的趨向加強起來。

大家知道，列寧的這個革命預見後來也完全準確地實現了。

天才的遠見，迅速抓住並看透即將發生的事變的內在意義的才能，——這就是列寧的一個特點，這個特點使他能够制定正確的戰略和革命運動轉折關頭的明確的行動路綫。

載於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二日
『真理報』第三十四號

論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矛盾

(一九二四年四月二日在俄共(布)中央委員會
召開的關於青年工作問題會議(三)上的演說)

首先，我必須稍微談一談共青團中央對黨內爭論問題所採取的立場。在各地地方組織已經表明了態度以後，俄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仍然頑固地保持沉默，這是錯誤的。但是，如果拿保守中立來解釋共青團中央的沉默，那是不正確的。這簡直是過於謹慎了。

現在稍微談談你們討論的問題。我認為你們中間並沒有原則上的分歧。我研究了你們的提綱和文章，始終沒有發現原則上的分歧。但是有一些糊塗思想和一大堆臆造出來的『不可調和的』矛盾。

第一個矛盾就是把作爲黨的『後備軍』的共青團和作爲黨的『工具』的共青團對立起來了。共青團是什麼，是後備軍還是工具？它既是後備軍又是工具。這是很清楚的，並且在同志們自己的演說中也講到了這一點。共產主義青年團是後備軍，是由農民和工人組成的後備軍，黨就是用它來補充自己的隊伍的。但它同時又是工具，是黨用來影響青年羣衆的工具。可以更具體地說，團是黨的工具，是黨的輔助工具，這就是說，共青團的積極分子是黨用來影響團外青年的工具。這兩個概念彼此並不

矛盾，決不能把它們互相對立起來。

第二個似乎不可調和的矛盾就是某些同志認為『團的階級政策不是決定於成分，而是決定於領導人的堅定性』。他們把堅定性和成分對立起來了。這個矛盾也是臆造出來的，因為俄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階級政策既決定於前者，也決定於後者，既決定於成分，也決定於領導人的堅定性。如果堅定的人受到團內異己成分的影響（因為團員是享有同等權利的），那末這種成分的存在對團的工作和政策的影響就不會不發生影響。為什麼黨要調整自己的成分呢？因為黨知道成分會影響它的工作。

最後，還有一個也是臆造出來的關於團的作用和團的農民工作問題的矛盾。有些人這樣提出問題：說團的任務似乎是『鞏固』它在農民中的影響，却不是擴大這種影響，而另一些人似乎想『擴大影響』，但是不同意鞏固這種影響。他們想根據這種提法做出爭論的綱領。很明顯，這兩個任務的對立是人為的，因為大家都很了解，團必須同時鞏固和擴大它在農村中的影響。固然，在俄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的提綱中有一個地方關於農民工作有一句不妥當的話。但是無論塔爾哈諾夫，無論俄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的多數的其他代表都沒有堅持這句不妥當的話，並且同意修改。既然如此，何必為小事爭論呢？

但是在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生活和活動中存在着一個矛盾，一個實際的而不是臆造出來的矛盾，關於這個矛盾我想說幾句話。我指的是團內存在着兩種傾向：工人傾向和農民傾向。我指的是這兩種傾向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是可以感覺到的，是不容忽視的。關於這個矛盾的問題在各個發言人的

講話中是一個最薄弱的地方。大家都說，必須廣泛吸收工人入黨，但是談到農民，談到吸收農民的問題時，大家就吞吞吐吐起來了。連那些不故作聰明和不要手腕的發言人也對這個問題吞吞吐吐起來了。

很明顯，在俄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面前擺着兩個問題：工人問題和農民問題。很明顯，既然共青團是工人和農民的團，那末團內的這兩種傾向，團內的這種矛盾今後仍然會存在。有些人會說，應該吸收工人，對農民却隻字不提；另一些人會說，應該吸收農民，對團內的領導成分即無產階級成分的作用却估計不足。團本身所具有的這種內部矛盾也就使得發言人吞吞吐吐起來了。人們在講話中拿共青團和黨相比擬。但是問題在於這種比擬實際上不能成立，因為我們的黨是工人的黨，不是工人和農民的黨，而共青團却是工人和農民的團。正因為如此，共青團不可能只是工人的團，它應當既是工人又是農民的團。有一點是很明顯的，就是在目前這種團的結構下，團的內部矛盾和兩種傾向之間的鬥爭今後也是不可避免的。

有些人說應該吸收中農青年入黨，這是對的；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必須謹慎，不能站在工農黨的立場上。可是甚至某些負責的工作人員有時也會轉到這種立場上去的。許多人大聲喊道：『你們吸收工人入黨，爲什麼不在同樣的程度上吸收農民入黨呢？讓我們吸收十萬或二十萬農民入黨吧。』中央反對這種意見，因為我們的黨必須是工人的黨。工人佔百分之七十或百分之八十，非工人佔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二十五，——這就是黨內成分應有的大概比例數。共青團的情況和黨却有些不同。共產主

義青年團是工農青年中的革命分子的自願和自由參加的組織。沒有農民，沒有農民青年羣衆參加，共青團就不成其爲工人和農民的團了。但是同時應當這樣提出問題：領導作用要屬於無產階級成分。

第一次載於約·斯大林「論共產主義青年團」一書

一九二六年莫斯科版

論列寧主義基礎^(一)

(在斯維爾德洛夫大學的講演)

獻給

爲紀念列寧而吸收入黨的同志們

納·斯大林

列寧主義的基礎是個很大的題目。要詳盡地論述這個題目就得寫一整本書，甚至要寫好幾本書。因此，我的講演自然就不能詳盡地說明列寧主義，至多也只能簡要地敘述列寧主義的基礎。雖然如此，我認爲做這樣一個敘述來指出幾個爲順利研究列寧主義所必需的基本出發點，還是有益處的。

敘述列寧主義的基礎並不是敘述列寧的世界觀的基礎。列寧的世界觀和列寧主義的基礎按範圍來說並不是一回事。列寧是馬克思主義者，他的世界觀的基礎當然也就是馬克思主義。但是由此決不能得出結論說，敘述列寧主義應當從敘述馬克思主義的基礎開始。敘述列寧主義就是敘述列寧在他的著作中所加進馬克思主義總寶庫的，因而自然和列寧的名字分不開的那些特別的和新的貢獻。

我在我的講演中只想從這個意義上來敘述列寧主義的基礎。

那末，列寧主義是什麼呢？

有些人說，列寧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環境的特殊條件下的應用。這個定義含有一部分真理，可是它遠沒有概括全部真理。列寧確實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俄國實際情況中，而且應用得十分巧妙。但是，如果列寧主義僅僅是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特殊環境中的應用，那末列寧主義就純粹是一國的而且僅僅是一國的現象，純粹是俄國的而且僅僅是俄國的現象了。可是我們知道，列寧主義是根源於整個國際發展過程的國際現象，而不僅僅是俄國的現象。正因為如此，我認為這個定義帶有片面性。

另一些人說，列寧主義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因素的復活，而和四十年代以後的馬克思主義不同，據說四十年代以後的馬克思主義已經變成溫和而不革命的了。如果撇開這種把馬克思的學說分為革命部分和溫和部分的愚蠢庸俗的見解不說，那就必須承認，即使這個完全不充分、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定義也含有一部分真理。這一部分真理就在於列寧確實復活了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所埋沒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內容。但這只是一部分真理。關於列寧主義的全部真理是：列寧主義不僅復活了馬克思主義，而且更進一步，在資本主義和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新條件下向前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列寧主義究竟是什麼呢？

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確切些說，列寧主義一般是無產階級

革命的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馬克思和恩格斯是處在革命（我們指的是無產階級革命）以前的時期，帝國主義還沒有充分發展的時期，準備無產者去進行革命的時期，無產階級革命還沒有成爲必不可免的直接實踐問題的時期。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生列寧却處在帝國主義充分發展的時期，無產階級革命開展起來的時期，無產階級革命已經在一個國家內獲得了勝利、打破了資產階級民主制、開闢了無產階級民主制紀元即蘇維埃紀元的時期。

正因爲如此，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的發展。

人們通常都指出列寧主義具有非常戰鬥、非常革命的性質。這是完全正確的。可是，列寧主義所以具有這個特性，是由於以下兩個原因：第一，列寧主義是從無產階級革命中產生出來的，它不能不具有無產階級革命的特色；第二，列寧主義是在和第二國際機會主義搏鬥中成長和鞏固起來的，而這個機會主義作鬥爭，向來就是對資本主義進行勝利鬥爭所必需的先決條件。不要忘記，在馬克思恩格斯兩人和列寧之間隔着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獨佔統治的整個時代，和這個機會主義作無情的鬥爭不能不是列寧主義的極重要的任務之一。

一 列寧主義的歷史根源

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條件下，即在資本主義的矛盾已經達到極點、無產階級革命已經成爲直

接實踐的問題、準備工人階級去進行革命的舊時期已經達到盡頭而轉變爲直接衝擊資本主義的新時期的條件下成長和形成的。

列寧把帝國主義叫做「垂死的資本主義」。爲什麼呢？因爲帝國主義使資本主義的矛盾達到極端，達到頂點，接着就是革命的開始。在這些矛盾中，最重要的有下列三個。

第一個矛盾是勞動和資本之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工業國裏壟斷性的托拉斯和辛迪加、銀行和財政寡頭擁有莫大的勢力。和這種莫大的勢力作鬥爭，工人階級通常採用的手段，如工會和合作社、議會政黨和議會鬥爭等等已經完全不夠了。或者向資本屈服，依舊過着每況愈下的非人生活；或者拿起新的武器，——這就是帝國主義在千百萬無產階級羣衆面前提出的問題。帝國主義把工人階級引向革命。

第二個矛盾是各財政集團之間以及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爲爭奪原料產地、爭奪別國領土而發生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向原料產地輸出資本，就是爲獨佔這些原料產地而進行瘋狂的鬥爭，就是爲重分已經被瓜分完的世界而進行鬥爭，就是尋找「陽光下的地盤」的新起財政集團和列強對死抓住既得贓物不放的老舊財政集團和列強進行特別猛烈的鬥爭。各資本家集團之間的這種瘋狂鬥爭的特點就在於它包含有不可避免的因素，即帝國主義戰爭，爲奪取別國領土而進行的戰爭。而這個情況的特點又在於它使帝國主義者彼此削弱，使整個資本主義陣地削弱，使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機加速到來，使無產階級革命必然實現。

第三個矛盾，是爲數極少的佔統治地位的「文明」民族和世界上一十多億殖民地 and 附屬國人民之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對極廣大的殖民地和附屬國內十多億居民施行最無恥的剝削和最殘忍的壓迫。榨取超額利潤就是這種剝削和壓迫的目的。可是，帝國主義在剝削這些國家時不得不在那裏敷設鐵路，設立工廠，建立工商業中心。無產者階級的出現，本地知識分子的產生，民族意識的覺醒，解放運動的加強，就是這個「政策」的不可避免的結果。所有一切殖民地和附屬國內革命運動的加強都明顯地證明了這一點。這個情況對於無產階級所以重要，就因爲它根本破壞資本主義的陣地，把殖民地和附屬國由帝國主義的後備軍變爲無產階級革命的后備軍。

帝國主義的主要矛盾，使舊的「繁榮的」資本主義變成了垂死的資本主義的那些矛盾，大體上就是這樣。

十年前爆發的帝國主義戰爭的意義，也就在於它把所有這些矛盾集合在一起投入天平盤裏，因而加速和便利了無產階級的革命戰鬥。

換句話說，帝國主義不僅使革命成了必不可免的實踐問題，而且造成了直接衝擊資本主義堡壘的有利條件。

這就是產生列寧主義的國際環境。

有人會向我們說：這一切都不錯，但是這和當時並不是而且不可能是典型的帝國主義國家的俄國究竟有什麼關係呢？這和首先是在俄國而且爲俄國工作的列寧究竟有什麼關係呢？爲什麼正好是

俄國成了列寧主義的策源地，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的誕生地呢？

因為俄國當時是帝國主義所有這一切矛盾的集合點。

因為俄國當時孕育着革命的程度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大，所以只有俄國才能用革命方法來解決這些矛盾。

首先，沙皇俄國是以最殘忍最野蠻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各種壓迫——資本主義壓迫、殖民地壓迫和軍事壓迫的策源地。誰不知道，在俄國，資本的萬能和沙皇制度的暴虐是融合起來了呢？誰不知道，俄羅斯民族主義的侵略性和沙皇制度對非俄羅斯民族的屠殺政策是融合起來了呢？誰不知道，對土耳其、波斯、中國廣大地區的剝削和沙皇制度對這些地區的侵佔，和侵佔領土的戰爭是融合起來了呢？列寧說得對：沙皇制度是『軍事封建帝國主義』。沙皇制度把帝國主義各種最壞的因素集中起來，並使之變本加厲了。

其次，沙皇俄國是西方帝國主義最大的後備軍，這不僅是說它任憑外國資本自由進口活動，讓外國資本操縱俄國國民經濟中像燃料和冶金業這樣一些有決定意義的部門，而且是說它能拿出千百萬士兵去供西方帝國主義者使用。請回想一下一千四百萬俄國軍隊爲了保證英法資本家極高的利潤而在帝國主義戰線上流血犧牲的事實吧。

再其次，沙皇制度不僅是帝國主義在東歐的看門狗，而且是西方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它從巴黎和倫敦、柏林和布魯塞爾得到借款，而從人民身上榨取幾億盧布來繳付利息。

最後，沙皇制度是西方帝國主義在瓜分土耳其、波斯和中國等等勾當中的最忠實的同盟者。誰不知道，帝國主義大戰是沙皇政府和協約國帝國主義者聯合進行的呢？誰不知道，俄國是這次戰爭的重要角色呢？

正因爲如此，沙皇制度的利益就和西方帝國主義的利益交織在一起，終於融合爲統一的帝國主義的利益。

西方帝國主義會不會不竭盡全力拚命反對俄國革命以維持和保存沙皇制度，而甘心喪失像舊時沙皇資產階級俄國這樣一個東方強大的支柱，這樣一個富有人力物力的來源呢？當然不會！

由此應該得出結論：誰想打擊沙皇制度，誰也就必然要動手打擊帝國主義；誰起義反對沙皇制度，誰也就必須起義反對帝國主義。因爲誰要是真想不僅打破沙皇制度，而且徹底剷除沙皇制度，那末他推翻沙皇制度也就必須推翻帝國主義。這樣，反對沙皇制度的革命就和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接近起來，並且一定要轉變爲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轉變爲無產階級革命。

而且當時在俄國又掀起了最偉大的人民革命，領導這個革命的是世界上最革命的無產階級，這個無產階級又擁有俄國的革命農民這樣一個重要的同盟者。這樣的革命決不會半途而廢；它一勝利就一定要舉起反帝國主義的起義旗幟，繼續前進，這難道還要證明嗎？

正因爲如此，俄國當時一定要成爲帝國主義的各種矛盾的集合點，這不僅因爲這些矛盾正是在俄國帶有特別醜惡和特別不堪的性質而最容易暴露出來，也不僅因爲俄國當時是把西方財政資本和

東方殖民地聯結起來的，西方帝國主義的最重要的支柱，而且因為當時僅僅在俄國才有能够用革命方法來解決帝國主義矛盾的現實力量。

由此應該得出結論：俄國革命不能不成爲無產階級革命，它不能不在一開始發展時就具有國際性質，因而也就不能不震撼世界帝國主義的基礎。

在這樣的實際情況下，俄國共產黨人能不能把自己的工作局限於俄國革命的狹隘民族範圍內呢？當然不能！恰恰相反，當時整個環境，無論是國內環境（深刻的革命危機）或國外環境（戰爭），都推動他們把自己的工作超出這個範圍，把鬥爭搬到國際舞臺上去，割開帝國主義的驕奢，證明資本主義必然破產，粉碎社會沙文主義和社會和平主義，並推翻本國資本主義，替無產階級鍛鍊出新的鬥爭武器，即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以促進世界各國無產者推翻資本主義的事業。俄國共產黨人不能不這樣行動，因為只有在這條道路上才可以指望國際環境發生某種變化，使俄國能够避免資產階級制度的復辟。

正因爲如此，俄國成了列寧主義的策源地，俄國共產黨人的領袖列寧成了列寧主義的創造者。

俄國和列寧的『遭遇』差不多同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德國和馬克思恩格斯的『遭遇』一樣。德國當時孕育着資產階級革命，正像俄國在二十世紀初期一樣。當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上寫道：

『共產黨人現在的視綫主要是繫注於德國，因為德國正處在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因為德國將在一概歐洲文明更進步的條件下，具有比十七世紀英國和十八世紀法國更發展得多的無產階

級去實現這個革命。因此，德國資產階級革命一定要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序幕。』（見換句話說，當時革命運動的中心移到德國了。）

幾乎用不着懷疑，馬克思在上述這段話中所指出的情況，大概正是德國成了科學社會主義的誕生地、德國無產階級的領袖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創造者的原因。

關於二十世紀初期的俄國也必須這樣說，而且更必須這樣說。這個時期的俄國正處在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它應當在歐洲更進步的條件下，具有比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德國（英法更不用說）更發展的無產階級去實現這個革命，並且一切事實都表明這個革命一定會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酵母和序幕。

不能認為下面這個事實是偶然的，就是早在一九〇二年，當俄國革命剛剛萌芽的時候，列寧就在他的『做什麼？』一書中寫了以下的預言：

『歷史向我們（即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斯大林註）提出的當前任務是比其他任何一國無產階級的一切當前任務都要革命的任務。』

『實現這個任務，即摧毀這個不僅是歐洲的同時也是（我們現在可以說）亞洲的反動勢力的最強大的堡壘，就會使俄國無產階級成為國際革命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五卷第三四五頁）

換句話說，革命運動的中心一定要移到俄國來。

大家知道，俄國革命的進程足以證實列寧的這個預言而綽綽有餘。

既然如此，那末進行過這樣的革命和具有這樣的無產階級的國家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的誕生地，這又有什麼奇怪呢？

俄國無產階級的領袖列寧同時也成了這個理論和策略的創造者以及國際無產階級的領袖，這又有什麼奇怪呢？

二 方 法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在馬克思恩格斯兩人和列寧之間隔着第二國際機會主義佔統治的整個時代。爲了說得確切起見，我應當補充一下：這裏所指的不是機會主義在形式上的統治，而只是機會主義在事實上的統治。在形式上，當時領導第二國際的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是『正統派』，即考茨基等人。可是在事實上，第二國際的基本工作是按照機會主義的路綫進行的。機會主義者由於他們那種慣於遷就的小資產階級天性而遷就了資產階級，而『正統派』又爲了和機會主義者『保持統一』，爲了維持『黨內和平』而遷就了機會主義者。結果就造成了機會主義佔統治的局面，因爲資產階級的政策和『正統派』的政策已經完全結合起來了。

這是資本主義比較和平發展的時期，即所謂戰前的時期。當時帝國主義的那些毀滅性的矛盾還

沒有十分明顯地暴露出來；當時工人的經濟罷工和工會還比較『正常地』發展着；當時用選舉鬥爭和議會黨團還能收到『衝昏頭腦的』成效；當時人們把合法鬥爭形式捧到天上，並想用合法手段來『打死』資本主義，——總而言之，當時第二國際各黨養得肥肥胖胖，不願意認真地想到革命，想到無產階級專政，想到羣衆的革命教育。

不是完整的革命理論，而是脫離了生動的羣衆革命鬥爭並變成了陳腐教條的一些自相矛盾的原理和理論片斷。爲了裝飾門面，他們當然也記起馬克思的理論，但目的是要閹割這個理論中活的革命的精髓。

不是革命政策，而是萎靡的庸俗見解和小氣的政客手腕，議會的外交手腕和議會的拉攏行爲。爲了裝飾門面，他們當然也通過一些『革命的』決議和口號，但目的是要把這些決議和口號擱置起來。

不是使黨根據本身的錯誤來接受教育和學習正確的革命策略，而是小心躲避迫切的問題，掩飾和抹殺這些問題。爲了裝飾門面，他們當然也不反對談談迫切而困難的問題，但目的是要用一種『橡皮性的』決議來敷衍了事。

第二國際的面目，它的工作方法，它的武庫，就是這樣。

然而帝國主義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搏鬥的新時代已經來臨。在財政資本的莫大勢力面前，舊的鬥爭方法顯然已經不夠而無能爲力了。

當時必須重新審查第二國際的全部工作及其整個工作方法，必須驅除庸俗見解、狹隘觀點、政客手腕、叛徒行爲、社會沙文主義和社會和平主義。必須檢查第二國際的整個武庫，拋棄一切生鏽的陳腐的東西，鍛鍊出新式的武器。不做這種預備工作，就根本不能去和資本主義作戰。不做這種預備工作，無產階級在新的革命搏戰面前就會陷於武裝不足甚或完全沒有武裝的危險境地。

對第二國際的慌憐的馬廐做一番總檢查和總清洗這一光榮任務就落到了列寧主義的肩上了。列寧主義的方法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產生和鍛鍊出來的。

這個方法的要求是什麼呢？

第一、要在羣衆的革命鬥爭的烈火中，在生動的實踐的烈火中檢驗第二國際的各種理論教條，就是說，要恢復那個被破壞了的理論和實踐的一致，消滅理論和實踐分離的狀態，因爲只有這樣，才能創立具有革命理論武裝的真正無產階級的黨。

第二、要根據第二國際各黨的實際行爲，根據它們的行動，而不根據它們的口號和決議（它們的口號和決議是不可相信的），來檢查第二國際各黨的政策，因爲只有這樣，才能獲得無產階級羣衆的信任，而且值得受到這種信任。

第三、要按新的革命的風格，根據教育羣衆和準備羣衆去進行革命鬥爭的精神去改造全部黨的工作，因爲只有這樣，才能準備羣衆去進行無產階級革命。

第四、要無產階級政黨進行自我批評，要無產階級政黨根據本身的錯誤來學習和接受教育，因爲

只有這樣，才能培養出黨的真正幹部和真正領袖。

列寧主義的方法的基礎和實質就是這樣。

這個方法是如何實際應用的呢？

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有一些理論教條，他們總是反覆地搬弄這些教條。現在就拿其中的幾個教條來看吧。

第一個教條：關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條件。機會主義者硬說：無產階級本身如果在全國人口中不佔多數，就不能而且不應當奪取政權。一點證據也沒有，因為無論在理論上或實踐上都不可能為這個荒謬的論點辯護。列寧回答第二國際的先生們說：就算是這樣吧；可是既然形成了這樣的歷史環境（戰爭、農業危機等等），使雖佔人口少數的無產階級有可能把極大多數勞動羣衆團結在自己周圍，那末，為什麼它不應當奪取政權呢？為什麼無產階級不應當利用順利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環境來突破資本戰綫，加速總爆發呢？難道馬克思不是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就已經說過，如果當時在德國可以用『再版的農民戰爭』^{（註）}來支持無產階級革命，那末德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情況就會『很好』了嗎？難道不是每個人都知道，當時德國無產者，比如說，和一九一七年俄國無產者比較起來是相對地少些嗎？難道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踐沒有表明，第二國際的英雄們所喜愛的這個教條對於無產階級是毫無實際意義的嗎？羣衆革命鬥爭的實踐打擊和打破了這個陳腐的教條，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第二個教條：無產階級如果還沒有足夠的、現成的、能够組織國家管理的文化幹部和行政幹部，

就不能保持政權，因此首先必須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造就這種幹部，然後才奪取政權。列寧回答說：就算是這樣吧；可是，爲什麼不能把事情顛倒過來，先奪取政權，爲無產階級的發展造成有利條件，然後一日千里地前進，來提高勞動羣衆的文化水平，來造就很多工人出身的領導幹部和行政幹部呢？難道俄國的實踐沒有表明，在無產階級政權下，工人出身的領導幹部的增長要比在資本政權下迅速百倍和牢靠百倍嗎？羣衆革命鬥爭的實踐也無情地打破了機會主義者的這個理論教條，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第三個教條：政治總罷工的方法是無產階級不能採用的，因爲這種方法既然在理論上沒有根據（見恩格斯的批評），在實踐上有危險（會破壞國家經濟生活的常態，會耗盡工會的基金），它就不能代替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即議會鬥爭形式。列寧主義者回答說：好吧；可是，第一、恩格斯當時所批評的並不是任何總罷工，而只是某種總罷工，即無政府主義者爲代替無產階級的政治鬥爭而提出的無政府主義者的經濟總罷工（二），——這和政治總罷工的方法有何相干呢？第二、什麼人在什麼地方證明了議會鬥爭形式是無產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呢？革命運動的歷史難道不是證明議會鬥爭僅僅是組織無產階級的議會外鬥爭的學校和助力嗎？難道不是證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運動的基本問題是要用暴力，用無產階級羣衆的直接鬥爭，用他們的總罷工，用他們的起義來解決的嗎？第三、關於用政治總罷工的方法來代替議會鬥爭這個問題是從哪裏來的呢？主張政治總罷工的人在什麼時候和在什麼地方曾經打算用議會外鬥爭形式來代替議會鬥爭形式呢？第四、難道俄國革

命沒有表明，政治總罷工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最大的學校，是在衝擊資本主義堡壘的前夜動員和組織最廣大的無產階級羣衆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嗎？——這和那些因爲怕破壞經濟生活的常態、怕耗盡工會的基金而發出的庸俗怨言有何相干呢？革命鬥爭的實踐也粉碎了機會主義者的這個教條，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如此等等。

正因爲如此，列寧說，「革命理論不是教條」，它「只有和真正羣衆的、真正革命的運動的實踐密切聯系起來才能最終形成」（『幼稚病』⁽²²⁾），因爲理論應當服務於實踐，因爲「理論應當回答實踐所提出的問題」（『人民之友』⁽²³⁾），因爲理論應當由實踐材料來檢驗。

至於第二國際各黨的政治口號和政治決議，只要回憶一下「以戰爭對付戰爭」這一口號的歷史，就足以了解這些以堂皇的革命口號和決議來掩飾自己的反革命勾當的黨的政治實踐是如何虛偽和腐敗。大家都還記得第二國際在巴塞爾代表大會⁽²⁴⁾上舉行的堂皇的示威，當時第二國際恐嚇帝國主義者說，如果帝國主義者敢於發動戰爭，那就要遇到可怕的起義；他們提出了「以戰爭對付戰爭」的嚇人口號。可是過了不久，在戰爭就要爆發的時候，却把巴塞爾決議束之高閣，而向工人提出了新的口號，即爲了資本主義祖國的光榮而自相殘殺的口號，這一點有誰不記得呢？革命的口號和決議如果不加以實現，是一個錢都不值的，這難道還不明顯嗎？只要把列寧的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的政策和第二國際在戰爭時期的叛賣政策比較一下，就可以了解機會主義的政客是如何卑鄙，而列寧

主義的方法是如何偉大。

這裏我不能不引證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書中的一段話，他在這本書中無情地痛斥了第二國際首領卡·考茨基企圖不按實際行動去判斷黨，而按紙上口號和文件去判斷黨的機會主義態度：

『考茨基實行典型的市儈庸人政策，以爲提出口號就能改變事情……全部資產階級民主史打破了這個幻想。爲了欺騙人民，資產階級民主派總是提出種種「口號」。問題是要考察他們的誠意，把他們的言論和他們的行動做個比較，不要聽唯心的或騙人的空話，而要徹底找到階級的現實。』（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六〇頁）

至於第二國際各黨害怕自我批評的態度，它們那種竭力掩飾自己的錯誤、抹殺迫切而困難的問題、用一些只能把生動的思想消磨盡淨而使黨難於根據本身的錯誤去接受革命教育的粉飾太平的虛偽詞句來掩蓋自己的缺點的態度，那就更不用說了，它們的這種態度已經受到列寧的譏笑和痛斥。列寧在他的『幼稚病』一書中談到無產階級政黨的自我批評問題時寫道：

『一個政黨對自己的錯誤所持的態度，是檢驗這個黨是否嚴肅、是否真正執行自己對本階級和勞動羣衆所負的義務的最重要和最可靠的尺度之一。公開承認錯誤，揭露犯錯誤的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就是嚴肅的黨的標誌，這就是黨執行自己的義務，這就是對階級以至對羣衆的教育和訓練。』（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三十

九頁）

有些人說：揭露本身的錯誤和進行自我批評，這對於黨是有危險的，因為這會被敵人利用來反對無產階級政黨。列寧認為這種反駁是不嚴肅的，是完全不正確的。關於這一點，列寧還在一九〇四年，當我們黨還幼弱的時候，就在他的『進一步，退兩步』一書中說過：

『他們（即馬克思主義者的敵人。——斯大林註）看見我們爭論，就幸災樂禍，洋洋得意；他們爲着自己的目的，當然會竭力斷章取義，摘引我這本專門談論我們黨內種種缺點的書中的個別地方。可是，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已久經戰鬥，決不會爲這些小小的針刺所驚擾，却能够不管這些針刺，繼續進行自我批評並無情地揭露自己的缺點，這些缺點是一定會而且必然會被工人運動的發展克服的。』（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七卷第一九〇頁）

列寧主義方法的特徵大體上就是這樣。

列寧的方法的原理，在馬克思的學說中基本上已經有了。這個學說，照馬克思的話說來，『在本質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III）。列寧的方法正是從頭到尾都貫串了這種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的。可是，如果以爲列寧的方法僅僅是馬克思的方法的恢復，那是不正確的。事實上列寧的方法不僅是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方法的恢復，不僅是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辯證法的恢復，而且是這個方法的具體化和進一步發展。

三 理 論

關於這個題目我來講三個問題：

(甲) 理論對於無產階級運動的意義；

(乙) 對自發『論』的批判；

(丙) 無產階級革命論。

(一) 理論的意義。有些人認為列寧主義是實踐重於理論，就是說，列寧主義的主要點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原理變為事實，是『執行』這些原理，至於理論，列寧主義似乎是很不關心的。大家知道，普列漢諾夫曾經屢次嘲笑列寧對於理論，特別是對於哲學的『不關心』。大家也知道，現在許多列寧主義的實際工作者不很喜歡理論，特別是因為他們由於環境關係而不得不忙於浩繁的實際工作。我必須指出：對列寧和列寧主義所持的這種非常奇怪的見解是完全不正確的，而且是絲毫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實際工作者忽視理論的趨向是和列寧主義的全部精神相矛盾的，而且對工作是有很大的危險的。

理論是概括起來的各國工人運動的經驗。當然，離開革命實踐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而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可是，理論如果是在和革命實踐密切聯系中形成的，那末它就能成

爲工人運動的極偉大的力量；因爲理論，而且只有理論，才能使運動具有信心，使它有確定方針的能力，使它能了解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因爲理論，而且只有理論，才能使實踐不僅了解各階級在目前如何行進和向哪裏行進，而且了解這些階級在最近的將來會如何行進和向哪裏行進。不是別人而正是列寧說過和重複過幾十次下面這個著名的原理：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五卷第三四一頁）

列寧比誰都更了解理論的重要意義，特別是對於我們黨這樣一個黨的重要意義，因爲我們黨負有國際無產階級的先進戰士的作用，因爲我們黨處於複雜的國內環境和國際環境中。列寧還在一九〇二年預察到我們黨的這種特殊作用時，就認爲必須指出：

『只有以先進理論爲指南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同上，第三四二頁）

幾乎用不着證明，現在當列寧的關於我們黨的作用的預言已經成爲事實的時候，列寧的這個原理具有特別巨大的力量和特別重大的意義。

依據唯物主義的哲學，把從恩格斯到列寧這個時期最重要的科學成就概括起來，並從各方面去批判馬克思主義者隊伍裏的反唯物主義的派別，這是一個極重大的任務，而負責完成這個任務的不是別人，正是列寧，——這個事實可以說是列寧異常重視理論的最明顯的表現。恩格斯說：『唯物主

義應當隨同每一個新的偉大發現而採取新的形式。〔二〕大家知道，不是別人，正是列寧在他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三〕這部傑作中爲自己的時代完成了這個任務。大家知道，喜歡嘲笑列寧『不關心』哲學的普列漢諾夫竟不敢認真着手執行這個任務。

（二）對自發論的批判，或關於先鋒隊在運動中的作用。自發『論』是機會主義的理論，是崇拜工人運動自發性的理論，是實際上否認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即工人階級政黨的領導作用的理論。

崇拜自發性的理論堅決反對工人運動的革命性質，反對使工人運動循着反對資本主義基礎的路綫行進，而主張使工人運動僅僅循着資本主義『可以履行的』『可以接受的』要求的路綫行進，完全主張採取『阻力最小的路綫』。自發論是工聯主義的思想體系。

崇拜自發性的理論堅決反對使自發運動帶有自覺的和有計劃的性質，反對黨走在工人階級的前面，反對黨把羣衆提高到自覺的水平，反對黨領導運動，而主張使運動中的覺悟成分不致妨礙運動循着自己的道路行進，使黨只依從自發運動，做運動的尾巴。自發論是降低覺悟成分在運動中的作用的理論，是『尾巴主義』的思想體系，是一切機會主義的邏輯基礎。

還在俄國第一次革命以前，這個理論就已經登台，而在實際上使它的那些信徒即所謂『經濟派』否認俄國有建立獨立的工人政黨的必要，反對工人階級進行推翻沙皇制度的革命鬥爭，鼓吹運動中的工聯主義政策，把工人運動完全交給自由資產階級去領導。

舊『火星報』的鬥爭和列寧在『做什麼？』一書中對『尾巴主義』理論的精彩批判不僅粉碎了所

謂『經濟主義』，而且還建立了俄國工人階級真正革命運動的理論基礎。

當時如果沒有這個鬥爭，就休想在俄國建立獨立的工人政黨，就休想使這個黨在革命中起領導作用。

可是，崇拜自發性的理論不僅是俄國的現象。它在第二國際所有的黨內都是流行得最廣泛的，雖然形式稍有不同。我指的是被第二國際的首領們庸俗化了的所謂『生產力』論，這個理論爲一切事物辯護，使所有的人都調和起來，當某些事實已經被大家聽厭以後，才指出這些事實並加以解釋，而指出以後，就萬事大吉。馬克思說：唯物主義的理論不能只限於解釋世界，它還應當改變世界（五）。可是，考茨基及其同夥却不管這一點，他們寧願停留在馬克思的公式的前半段上。

請看應用這個『理論』的許多例子中的一個吧。有人說，在帝國主義戰爭以前，第二國際各黨曾經發表恐嚇言論，說如果帝國主義者發動戰爭，它們就宣佈『以戰爭對付戰爭』。有人說，在戰爭就要爆發的時候，這些黨却把『以戰爭對付戰爭』這個口號束之高閣，而實行了一個相反的口號——『爲帝國主義祖國而戰』。有人說，這樣變更口號的結果，幾百萬工人犧牲了生命。可是，如果以爲這裏應該歸咎於什麼人，這裏有什麼人叛變了或出賣了工人階級，那就錯了。絕對沒有這樣的事情！所有這些已經發生的事情都是一定要這樣發生的。第一、因爲國際是『和平的工具』，而不是戰爭的工具。第二、因爲在當時的那種『生產力水平』下，再沒有別的辦法可想。『應該歸咎於』『生產力』。考茨基先生的『生產力論』正是這樣向『我們』解釋的。而誰要是不相信這個『理論』，誰就不是馬克思主義

者。黨的作用呢？黨在運動中的意義呢？可是，黨對於像『生產力水平』這樣的決定因素又有什麼辦法呢？……

這種假冒馬克思主義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一大堆來。

幾乎用不着證明，這個以掩蓋機會主義的真面目爲使命的冒牌『馬克思主義』，不過是還在俄國第一次革命前就受到列寧攻擊的那個『尾巴主義』理論在歐洲的變形罷了。

幾乎用不着證明，打破這種理論上的假冒，是在西方建立真正的革命政黨的先決條件。

(三) 無產階級革命論。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論是從三個基本原理出發的。

第一個原理：財政資本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內佔統治地位；發行有價證券是財政資本的一種主要業務；向原料產地輸出資本是帝國主義的基礎之一；財政寡頭的莫大勢力是財政資本統治的結果，——所有這些都揭露出壟斷資本主義的粗暴的寄生性，使資本主義的托拉斯和辛迪加的壓迫百倍沉重起來，使工人階級對資本主義基礎的憤怒更加增長，把羣衆引上無產階級革命這條唯一的生路。（見列寧『帝國主義』(1917)）

由此得出第一個結論：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革命危機日益尖銳化，『宗主國』內部的無產階級戰綫上的爆發因素日益增長。

第二個原理：加緊向殖民地和附屬國輸出資本；擴大『勢力範圍』和殖民地領土，直到佔領整個地球；資本主義已經成爲極少數『先進』國對地球上大多數居民進行財政奴役和殖民壓迫的世界體。

系，——所有這些，一方面使各個民族的經濟和領土變成所謂世界經濟的整個鍊條的各個環節，另一方面又把地球上的居民分裂成兩個陣營：一方面是剝削和壓迫廣大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極少數資本主義『先進』國，另一方面是不得不爲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而鬥爭的佔極大多數的殖民地和附屬國。（見『帝國主義』）

由此得出第二個結論：殖民地國家內的革命危機日益尖銳化，外部的殖民地戰綫上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憤怒因素日益增長。

第三個原理：獨佔『勢力範圍』和殖民地；各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不平衡使那些已經搶得領土的國家和那些希望得到自己的『份額』的國家爲重分世界而進行瘋狂的鬥爭；帝國主義的戰爭是恢復已經被破壞的『均勢』的唯一手段，——所有這些都使第三條戰綫即資本主義國家間的戰綫緊張起來，因而使帝國主義削弱，並使頭兩條反帝國主義戰綫即革命的無產階級戰綫和殖民地的解放運動戰綫易於聯合起來。（同上）

由此得出第三個結論：在帝國主義下，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歐洲的無產階級革命和東方的殖民地革命必然聯合爲一條世界革命戰綫，來反對世界帝國主義戰綫。

列寧把上面一切結論綜合爲一個總的結論說：『帝國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①（見『列寧

①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一七五頁）

因此，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及其性質、範圍和深度問題的看法，以及這個革命的一般方案，也就隨着改變了。

從前，通常都是根據某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去分析無產階級革命的前提。現在，這種看法已經不夠了。現在必須根據一切國家或多數國家的經濟狀況，根據世界經濟狀況來觀察這個問題，因為個別國家和個別民族的經濟已經不是獨立自在的單位，已經變成所謂世界經濟的整個鍊條的各個環節，因為舊的『文明的』資本主義已經轉變為帝國主義，而帝國主義是極少數『先進』國對地球上大多數居民進行財政奴役和殖民壓迫的世界體系。

從前，通常都是說，在個別國家內，或者確切些說，在某一個發達的國家內，是否已經具有無產階級革命的客觀條件。現在，這種觀點已經不夠了。現在必須說，在世界帝國主義經濟這一整體的整個體系中已經具有革命的客觀條件；而且，如果整個體系，或者確切些說，因為整個體系已經成熟到發生革命的程度，這個體系中存在着工業不夠發達的國家並不能成為革命的不可克服的障礙。

從前，通常都是說某一個發達的國家內的無產階級革命，認為這是個別的獨立自在的現象，而以個別的民族的資本戰綫為敵方。現在，這種觀點已經不夠了。現在必須說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因為個別的民族的資本戰綫已經變成所謂世界帝國主義戰綫的整個鍊條的各個環節，必須拿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的總戰綫來對抗這個世界帝國主義戰綫。

從前，總是把無產階級革命看做純粹是某一個國家內部發展的結果。現在，這種觀點已經不夠了。現在首先應當把無產階級革命看做帝國主義世界體系中各種矛盾發展的結果，看做世界帝國主義戰綫的鍊條在某個國家內破裂的結果。

革命將在哪裏開始呢？資本戰綫首先會在哪裏，會在哪個國家內被突破呢？

從前，通常都這樣回答：在工業比較發達的地方，在無產階級佔多數的地方，在文化水平較高的地方，在民主成分較多的地方。

列寧主義的革命論反駁說：不，不一定在工業比較發達等的地方。資本戰綫將在帝國主義鍊條最薄弱的地方被突破，因為無產階級革命是世界帝國主義戰綫的鍊條在其最薄弱的地方破裂的結果；而且開始革命的國家，突破資本戰綫的國家，也許是資本主義比較不發達的國家，而其他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國家却仍然留在資本主義範圍內。

在一九一七年，世界帝國主義戰綫的鍊條在俄國比在其他國家薄弱些。這個鍊條就在這裏被突破，而使無產階級革命得以爆發。爲什麼呢？因為當時在俄國展開了最偉大的人民革命，領導這個革命的是革命的無產階級，這個無產階級又擁有千百萬被地主壓迫和剝削的農民這樣一個重要的同盟者。因爲當時在俄國和革命對立的是沙皇制度這樣一個極醜惡的帝國主義代表，它沒有絲毫威信，爲全體人民所痛恨。雖然當時俄國資本主義不如法國或德國、英國或美國發達，但是帝國主義的鍊條在俄國却比較薄弱。

在最近的將來，這個鍊條將在什麼地方被突破呢？還是在它最薄弱的地方。比如說，這個鍊條可能在印度被突破。爲什麼呢？因爲印度有年輕的戰鬥的革命無產階級，而這個無產階級又擁有民族解放運動這樣一個無疑是偉大的和重要的同盟者。因爲在印度和革命對立的是外國帝國主義這樣一個盡人皆知的敵人，它沒有絲毫威信，爲印度全體被壓迫被剝削羣衆所痛恨。

這個鍊條也很可能在德國被突破。爲什麼呢？因爲，比如說，在印度發生作用的那些因素，在德國也開始發生作用；同時，印度和德國在發展水平上的巨大差別，當然不能不影響到德國革命的進程和結局。

正因爲如此，列寧說：

『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到社會主義……不會是經過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裏平衡「成熟」，而會是經過一些國家對另一些國家進行剝削，經過對帝國主義戰爭中第一個戰敗國家進行剝削，再加上對整個東方進行剝削的道路來完成的。另一方面，正是由於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的影響，東方已經最終加入了革命運動，最終捲入了全世界革命運動的總漩渦。』（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五七頁）

簡單地說：帝國主義戰綫的鍊條通常一定要在它最薄弱的環節被突破，但是無論如何不一定要在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無產者佔百分之幾、農民佔百分之幾等等的地方被突破。

正因爲如此，個別國家內無產階級在人口總數中所佔百分數的統計數字，在解決無產階級革命

問題時已經失去了第二國際的那些不了解帝國主義的、像害怕瘟疫那樣害怕革命的書獃子們所喜歡賦予它的特殊意義。

其次，第二國際的英雄們曾經斷定說（現在仍然斷定說）：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之間隔着一道鴻溝，或者至少是一座萬里長城，使這兩個革命之間隔着一個相當長的間斷時期，在這個間斷時期中，已經獲得政權的資產階級發展資本主義，而無產階級則積聚力量，準備反對資本主義的『決鬥』。這個間斷時期通常是以好幾十年來計算的，甚至更長些。幾乎用不着證明，這種萬里長城『論』在帝國主義環境中是毫無科學根據的，它只是而且只能是資產階級反革命慾望的掩蔽物和粉飾品。幾乎用不着證明，在孕育着衝突和戰爭的帝國主義環境中，在『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的環境中，當『繁榮的』資本主義已經變為『垂死的』資本主義（列寧），而革命運動正在世界各國發展的時候，當帝國主義同包括沙皇制度和農奴制度在內的所有的一切反動勢力聯合起來，因而使一切革命勢力，從西方的無產階級運動到東方的民族解放運動，都必須聯合起來的時候，當不和帝國主義作革命鬥爭就不能推翻封建農奴制殘餘的時候，——幾乎用不着證明，在這種條件下，在一個比較發達的國家內，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定會和無產階級革命接近，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定會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俄國革命的歷史顯然證明了這個原理是正確的和不容爭辯的。無怪乎列寧還在一九〇五年，俄國第一次革命的前夜，就在他的『兩個策略』一書中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看做一個鍊條的兩個環節，看做俄國革命規模的一幅完整的圖畫：

『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把農民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便用強力打破專制制度的反抗，並麻痺資產階級的不穩定性。無產階級應當實現社會主義革命，把居民中的半無產階級分子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便用強力打破資產階級的反抗，並麻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不穩定性。這就是無產階級的任務，而新火星派在其關於革命規模的一切議論和決議中，却把這些任務看得非常狹隘。』（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九卷第八十一頁）

我且不說列寧的其他較晚的著作，在這些著作中，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爲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是列寧主義的革命論的基石之一這一點比在『兩個策略』中表現得更爲明顯。

有些同志却以爲列寧在一九一六年才產生這種思想，以爲列寧在一九一六年以前還認爲俄國革命將停滯在資產階級的範圍內，於是政權也將從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的機關下裏轉到資產階級手裏，而不是轉到無產階級手裏。據說這種論斷竟流傳到我們共產黨的報刊上來了。我必須指出，這種論斷是完全不正確的，是完全不合乎實際情況的。

我可以引證列寧在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一九〇五年）上的著名演說，他在這篇演說中不是把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即民主革命的勝利稱爲『秩序』組織，而是稱爲『戰爭組織』（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八卷第三三頁）

其次，我還可以引證列寧『論臨時政府』（一九〇五年）的幾篇著名論文，他在這幾篇論文裏描述俄國革命的發展前途時向黨提出的任務是『力求使俄國革命成爲多年的運動，而不是幾個月的

運動，使這個革命不僅得到執政當局的微小讓步，而且要完全推翻這個執政當局」；他在這幾篇論文裏進一步闡明這個前途並把這個前途和歐洲的革命聯系起來時繼續寫道：

『如果能做到這一點，那時……那時革命的火燄將延燒到歐洲，在資產階級反動勢力下備受折磨的歐洲工人也將發動起來，向我們表明「該怎麼辦」；那時歐洲的革命高潮就會反過來影響俄國，使幾年的革命時代變成幾十年的革命時代……』（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八卷第二五九頁）

其次，我還可以引證列寧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發表的著名論文，他在這篇論文中寫道：

『無產階級現在爲奪取政權，爲建立共和國、爲沒收土地……爲吸引「非無產階級人民大衆」參加使資產階級俄國擺脫軍事封建「帝國主義」（即沙皇制度）的解放運動而奮鬥，將來也要不屈不撓地爲此目的而奮鬥。無產階級將立刻利用資產階級俄國由沙皇制度及地主的土地佔有權之下所獲得的這種解放，聯合歐洲各國的無產者來完成社會主義革命，而不是幫助富裕農民來反對農業工人。』（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八二頁至第三八三頁）

最後，我還可以引證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書中的一段著名言論：他在這裏援引了我們剛才從『兩個策略』中引證過的那段關於俄國革命規模的話，而得出如下的結論：

◎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 見本卷第八十九頁。——編者註

『結果正同我們所說的一樣。革命進程證實了我們的論斷的正確。起初同「全體」農民一道，反對君主制度，反對地主，反對中世紀制度（因此，革命還是資產階級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然後同貧農一道，同半無產階級一道，同一切被剝削者一道，反對資本主義，反對農村的富人、富農和投機者，於是革命變成了社會主義革命。除了無產階級的準備程度，無產階級同貧農聯合的程度以外，企圖用其他東西來分開這兩個革命，企圖在它們中間建築一道萬里長城，就是極端地歪曲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用自由主義代替馬克思主義。』（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七六頁至第二七七頁）

看來已經够了。

有人會向我們說：既然如此，爲什麼列寧和『不斷（不間斷）革命』的思想作鬥爭呢？

因爲列寧主張『用盡』農民的革命能力，徹底利用農民的革命毅力，以便徹底消滅沙皇制度，以便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而『不斷革命』論者却不懂得農民在俄國革命中的重大作用，過低估計農民的革命毅力，過低估計俄國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力量和本領，因而妨礙了把農民從資產階級影響下解放出來的事業，妨礙了把農民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的事業。

因爲列寧主張以政權轉歸無產階級來完成革命事業，而『不斷』革命論者却想直接從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開始，他們不知道這樣做就是閉眼不看像農奴制殘餘這樣的『小事情』，就是不考慮到俄國農民這樣的重大力量；他們不知道用這種政策只能阻撓把農民爭取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的事業。

可見列寧和那些『不斷』革命論者作鬥爭並不是由於不間斷性問題，因為列寧自己就是主張不間斷革命的，而是由於他們過低估計了農民這一無產階級最大後備軍的作用，由於他們不懂得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

『不斷』革命的思想不能看做是一種新的思想。這種思想最初是馬克思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末期在他的著名的『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一八五〇年）中提出的。我們的『不斷論者』正是從這個文件中取得不間斷革命的思想的。必須注意到，我們的『不斷論者』從馬克思那裏把這個思想拿來以後，就多少改變了這個思想，而一改變了它，就把它『弄壞了』，使它不合實用了。當時需要列寧用老練的手法來糾正這個錯誤，取得馬克思的真正的不間斷革命的思想，而使它成為自己的革命論的基石之一。

請看馬克思在他的『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中列舉了他號召共產主義者應當爭取的許多革命民主要求以後，關於不間斷（不斷）革命的問題是怎樣說的：

『民主主義的小資產者希望至多只實行上述要求就趕快結束革命，而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就在於不間斷地進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的統治都消滅掉，直到無產階級奪得國家政權，直到無產者的聯合不僅在一個國家內而且在世界一切佔統治地位的國家內都發展到使這些國家的無產者間的競爭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決定意義的生產力集中到了無產者手裏的時候為止。』（二）

換句話說：

(甲) 馬克思根本沒有主張直接從建立無產階級政權來開始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德國革命事業，這和我們俄國的『不斷論者』的計劃是相反的；

(乙) 馬克思只是主張以建立無產階級國家政權來完成革命事業，一步一步地把資產階級派別從政權的高峯上逐個推下去，以便在爭得無產階級政權後再把革命火燄燃遍世界各國，這和列寧根據他在帝國主義環境中的無產階級革命論所教導我們的一切以及他在我們的革命過程中所實行的一切是完全符合的。

由此可見，我們俄國的『不斷論者』不僅過低估計了農民在俄國革命中的作用和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的意義，而且改變了（改壞了）馬克思的『不斷』革命的思想，使它不合實用了。

正因為如此，列寧嘲笑了我國『不斷論者』的理論，稱之為『奇特的』『漂亮的』理論，責備他們不肯『想一·想·究·竟·出·於·什·麼·原·因·整·整·十·年·的·實·際·生·活·都·沒·有·理·睬·這·個·漂·亮·的·理·論』。（列寧的這篇論文是在一九一五年，即在俄國『不斷論者』的理論出現後過了十年寫的。——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八一頁）

正因為如此，列寧認為這個理論是半孟什維主義的理論，說這個理論『從布爾什維克這裏攝取了號召無產階級進行堅決革命鬥爭並奪取政權的思想，而從孟什維克那裏攝取了否認農民作用的思想』（見列寧『論革命中的兩條路線』一文，『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八一頁至第三八

二頁)。

列寧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關於利用資產階級革命來『立刻』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就是這樣。

其次，從前認為革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是不可能的，以為要戰勝資產階級就必須要有一切先進國家內或至少要有多數先進國家內無產者的共同發動。現在，這個觀點已經不合乎實際情形了。現在必須從這種勝利的可能性出發，因為各種不同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帝國主義環境內發展的不平衡性和躍進性，帝國主義內部那些必然引起戰爭的災難性矛盾的發展，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的增長，——所有這一切都使無產階級在個別國家內的勝利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俄國革命的歷史已經直接證明了這一點。不過這裏必須記住：只有具備了某些完全必要的條件，才能順利地推翻資產階級；沒有這些條件，就根本談不到無產階級奪取政權。

請看列寧在他的『幼稚病』一書中關於這些條件是怎樣說的：

『一切革命，特別是二十世紀的三次俄國革命所證實的革命基本規律就是：為着革命，僅僅被剝削被壓迫羣衆認識到不能照舊生活並要求改變是不夠的；為着革命，還需要剝削者已不能照舊生活和統治。只有當「下層」不願照舊而「上層」也不能照舊時，只有在這種時候，革命才能獲得勝利。換句話說，這個真理就是：如果沒有全國性的危機（既觸及被剝削者，又觸及剝削者的危機），那末革命是不可能的。這就是說：為着革命，第一、必須多數工人（或至少是多數有

覺悟、有思想、在政治上積極的工人）完全了解革命的必要性，並抱有爲革命而犧牲的決心；第二、必須統治階級遭到政府危機，這種危機使甚至最落後的羣衆都捲入政治運動……使政府軟弱無力而使革命者有可能迅速推翻政府。」（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六十五頁至第六十六頁）

可是，在一個國家內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還不等於保證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革命獲得勝利的國家的無產階級既然已經鞏固自己的政權並領導着農民，就能够而且應當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是，這是不是說，它這樣就能獲得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即最後勝利呢？換言之，這是不是說，它單靠一個國家的力量就能够最終鞏固社會主義並完全保障國家免除外國武裝干涉，也就是免除復辟呢？不，不是這個意思。爲了達到這個目的，至少必須有幾個國家內革命的勝利。因此，發展和援助其他國家內的革命是獲得勝利的革命的重大任務。因此，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革命不應當把自己看做獨立自在的東西，而應當看做用以加速其他國家無產階級勝利的助力和工具。

列寧用一句話說明了這個意思，他說：獲得勝利的革命的任務就在於「最大限度地實現一個國家內所能實現的一切，以便發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國的革命」（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

①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六九頁)。

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論的特徵大體上就是這樣。

四 無產階級專政

關於這個題目我來講三個基本問題：

(甲)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工具；

(乙)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

(丙) 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

(一)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工具。無產階級專政問題首先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內容問題。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革命的進展、規模和成績，只有通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具體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工具，是這個革命的機關，是這個革命的最重要的據點；它的使命是：第一、鎮壓已被推翻的剝削者的反抗，鞏固自己的成績；第二、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使革命達到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沒有無產階級專政，革命也能戰勝資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可是，如果革命不在自己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特設機關作為自己的基本支柱，那末它就不能鎮壓資產階級的反抗，不能保持勝利並向前進展到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

『政權問題是任何一個革命的根本問題。』（列寧）這是不是說，事情只限於奪取政權，取得政權呢？不，不是這個意思。取得政權——這僅僅是事情的開始。在一個國家內被推翻的資產階級，由於許多原因，在長時間內還比推翻了它的無產階級有力量。因此，全部問題在於保持政權，鞏固政權，使它成爲不可戰勝的。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做些什麼呢？爲了達到這個目的，至少必須完成在革命勝利的『第二天』就擺在無產階級專政面前的三個主要任務：

（甲）打破已被革命推翻和剝奪的地主和資本家的反抗，消滅他們的一切恢復資本政權的行動；
（乙）用把一切勞動者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的精神來組織建設工作，並按照準備取消階級、消滅階級的方向來進行這一工作；

（丙）把革命武裝起來，組織革命軍隊，以便和國外敵人作鬥爭，和帝國主義作鬥爭。

所以需要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爲了執行這些任務，完成這些任務。

列寧說：『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整個歷史時代。只要這個時代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着復辟希望，並把這種希望變爲復辟行動。被推翻的剝削者不會料到自已會被推翻，他們不相信這一點，不顧想到這一點，所以他們在遭到第一次嚴重失敗以後，就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百倍增長的仇恨來拚命鬥爭，想恢復他們被奪去的「天堂」，保護他們從前過着甜蜜生活、現在却被「平凡的賤民」弄得貧困破產（或者從事「平凡的」勞動……）的家庭。而跟着剝削者資本家走的，還有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羣衆。世界各國幾十年來的歷史經驗證明，小資產階級

總是猶豫動搖，今天跟着無產階級走，明天又因革命遭遇困難而張皇失措，因工人遭受初次失敗或挫折而心慌意亂，焦躁不安，東奔西跑，痛哭流涕，從這個營壘跑進那個營壘。」（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三三頁）

而資產階級是有根據來企圖復辟的，因為資產階級被推翻以後在長時間內還比推翻了它的無產階級有力量。

列寧說：『如果剝削者只在一國內被打倒（這當然是典型現象，因為幾國同時發生革命是罕有的例外），他們就依然比被剝削者強大。』（同上，第二三二頁）

被推翻的資產階級的力量在哪裏呢？

第一、『在於國際資本的力量，在於資產階級的各種國際聯系牢固有力』（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頁）。

第二、『在於』在革命以後的長時期內，剝削者必然在事實上保有很大的優勢：他們還有貨幣（貨幣是不能一下子消滅的），有動產（往往是很多的），有聯系，有組織和管理的技能，有熟悉一切管理「秘訣」（習慣、方法、手段和機會）的知識，有較高的教育程度，同高等技術人員（過資產階級生活、有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員）有密切關係，有大得不可計量的軍事技能（這是很重要的），以及其他等等」（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三二頁）。

第三、『在於習慣的力量，在於小生產的力量。因為小生產在世界上可惜還保留着很多很多，

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並大量地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因爲『消滅階級不僅是驅逐地主和資本家——這一點我們已經比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還是消滅小商品生產者；但這種人是不能驅逐、不能鎮壓的，必須和他們和睦共處，只有用很長時期的、緩慢的、謹慎的組織工作才能（而且應當）改造他們，重新教育他們』（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頁至第八頁和第二十六頁至第二十七頁）。

正因爲如此，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新階級對較強大的敵人，對資產階級進行最奮勇的和最無情的戰爭，而資產階級因爲它被推翻而十倍加強它的反抗。』

『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對舊社會勢力及其傳統進行頑強的鬥爭，進行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同上，第七頁和第二十七頁）

幾乎用不着證明，要在短時期內完成這些任務，要在幾年內實現這一切，是絕對不可能的。因此，不應該把無產階級專政，把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看做瞬息即逝的時期，看做一批『革命的』法律和法令，而應該把它看做充滿國內戰爭和國外衝突、頑強的組織工作和經濟建設、進攻和退却、勝利和失敗的整整一個歷史時代。這個歷史時代所以必要，不僅是爲了創造社會主義完全勝利的經濟上和文化上的前提，而且是爲了使無產階級有可能：第一，把自己教育並鍛鍊成爲能够管理國家的力量；第二，按照保證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方向來重新教育並改造小資產階層。

馬克思向工人說過：『你們必須熬過十五年、二十年以至五十年的國內戰爭和國際鬥爭，以便不僅改變現存的關係，而且改變自己，使自已有能力進行政治統治。』（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第八卷第五〇六頁）

列寧繼續並發展馬克思這個思想時寫道：

『必須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重新教育千百萬農民和小業主，數十萬職員、官吏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使他們大家都服從無產階級的國家和無產階級的領導，戰勝他們中間的資產階級的習慣和傳統』，同樣，必須『……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上，在長期的鬥爭中重新教育無產者自己，因為無產者不是一下子就能擺脫自己的小資產階級偏見的，這些偏見不是用神術，不是依聖母的意旨，不是依口號、決議、法令的意旨所能擺脫的，而是只有在和廣泛的小資產階級影響進行長期的艱苦的羣衆鬥爭中才能擺脫的』（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九十五頁至第九十六頁和第九十四頁）。

（二）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從上面所說的可以看出，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在不侵犯舊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條件下進行的政府人員的普通的更換，『內閣』的更換等等。各國孟什維克和機會主義者害怕專政像害怕火一樣，竟用所謂『奪取政權』的概念來頂替專政的概念。他們通常都把『奪取政權』歸結爲更換『內閣』，歸結爲由謝德曼和諾斯克、麥克唐納和韓德遜這一類人來組織新內閣，上台執政。幾乎用不着解釋，諸如此類的內閣更換是和無產階級專政，和真正

的無產階級奪取真正的政權毫無共同之點的。麥克唐納之流和謝德曼之流在保留資產階級舊制度的條件下掌握政權，他們的所謂政府，只能是資產階級御用的服務機關，只能是帝國主義膿瘡的掩蔽物，只能是資產階級用來反對被壓迫被剝削羣衆的革命運動的工具。當資本沒有屏風就不便於、不利於、難於剝削和壓迫羣衆的時候，它需要這些政府來做屏風。當然，這種政府的出現是『在他們那裏』（就是說，在資本家那裏），『在施普卡』①並非平靜無事的徵兆；雖然如此，這種政府仍然不免是稍加粉飾的資本政府。麥克唐納政府或謝德曼政府是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相隔天壤的。無產階級專政不是政府的更換，而是擁有新的中央政權機關和地方政權機關的新國家，是在舊國家即資產階級國家的廢墟上產生的無產階級國家。

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在資產階級制度的基礎上產生的，而是在破壞資產階級制度的過程中，在推翻資產階級以後，在剝奪地主和資本家的過程中，在把基本的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社會化的過程中，在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的過程中產生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以對資產階級使用暴力為憑藉的革命政權。

國家是統治階級用來鎮壓其階級敵人的反抗的機器。就這一點來說，無產階級專政實質上和任何其他階級的專政毫無區別，因為無產階級國家是用來鎮壓資產階級的機器。但是這裏有一個本質上的差別。這個差別就在於以前所有的階級國家是少數剝削者對多數被剝削者的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則是多數被剝削者對少數剝削者的專政。

簡單地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它不受法律限制，憑藉暴力，得到被剝削的勞動羣衆的同情和擁護（列寧『國家和革命』）。

由此應當得出兩個基本結論：

第一個結論：無產階級專政不能是『完全的』民主，不能是對所有的人的民主，即既對富人又對窮人的民主；無產階級專政『必須是新型民主的國家（對無產者和一般窮人是民主的）和新型專政的國家（對資產階級是專政的）』（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八四頁）。考茨基及其同夥關於普遍的平等、『純粹的』民主和『完善的』民主等等的廢話是資產階級對被剝削者和剝削者不可能有平等這一無可置疑的事實的掩飾。『純粹的』民主論是帝國主義強盜所馴育和豢養的工人階級上層分子的理論。這個理論的使命就是要掩蓋資本主義的膿瘡，粉飾帝國主義，賦予它一種精神力量來反對被剝削羣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被剝削者是沒有而且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的，這至少是因為房屋、印刷所、紙張倉庫等等爲享有『自由』所必需的東西都是剝削者的特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被剝削羣衆是沒有而且不可能真正參加國家的管理的，這至少是因為即使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最民主的制度中，政府也不是由人民所指定，而是由路特希爾德之流和司丁尼斯之流、洛克菲勒之流和摩爾根之流所指定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民主是資本主義的民主，是少數剝削者的民主，是以限制多數被剝

剝削者的權利爲基礎並以反對這個多數爲目標的。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下，被剝削者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無產者和農民才可能真正參加國家的管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民主是無產階級的民主，是多數被剝削者的民主，是以限制少數剝削者的權利爲基礎並以反對這個少數爲目標的。

第二個結論：無產階級專政的產生不能是資產階級社會和資產階級民主制和平發展的結果，而只能是摧毀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資產階級的軍隊、資產階級的官僚機關、資產階級的警察的結果。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序言中說：『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給庫格曼的信中說，無產階級革命『……不應該像以前那樣，把官僚軍事機器從一些人的手裏轉到另一些人的手裏，而應該把它摧毀……這正是大陸上任何一個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2)。

馬克思的這句以大陸爲限的話竟被各國機會主義者和孟什維克作爲藉口來叫喊：可見馬克思曾經假定資產階級民主有和平發展到無產階級民主的可能，至少歐洲大陸以外的幾個國家（英國和美國）是有這種可能的。馬克思的確曾經假定有這種可能，並且有根據來給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英美兩國做這種假定，因爲當時還沒有壟斷的資本主義，還沒有帝國主義，當時在這些國家中由於特殊的發展條件，還沒有發達的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在發達的帝國主義出現以前的情形就是這樣的。可是經過三四十年以後，當這些國家中的情形已經根本改變，當帝國主義已經發展並普及於所有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當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也已經在英美出現，當英美和平發展的特殊條件已經消失的時

候，關於這些國家不在此限的說法自然就應當失去時效了。

列寧說：『現在，在一九一七年，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代，馬克思的這種有限制的說法已經失去時效了。英國和美國這兩個全世界最大和最後的盎格魯撒克遜「自由制」（就沒有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這個意義上說）的代表已經完全滾到一般歐洲式的、號令一切、壓制一切的官僚軍事機關的污濁血腥泥潭中去了。現在，無論在英國或美國，粉碎並毀壞「現成的」（那裏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間就達到了『歐洲式的』一般帝國主義的完備程度）「國家機器」是「任何一個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八七頁）

換句話說，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規律，摧毀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是這種革命的先決條件的規律；是全世界帝國主義國家革命運動的必然規律。

當然，在遙遠的將來，如果無產階級在那些最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如果現在的資本主義包圍被社會主義包圍所代替，那末某些資本主義國家走上『和平』發展的道路是完全可能的，這些國家的資本家由於國際環境的『不利』，會認為最好是『自願地』向無產階級做重大的讓步。可是，這個假定所涉及的只是遙遠的和可能的將來。對於最近的將來，這個假定是沒有任何根據的，是完全沒有任何根據的。

因此，列寧說得對：

『不用暴力摧毀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不用新機器代替它，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的。』（見

『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一七頁)

(三)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無產階級專政的勝利就是鎮壓資產階級，摧毀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以無產階級的民主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這是很明顯的。但是要依靠什麼組織才能完成這個巨大的工作呢？無產階級的在資產階級議會制基礎上成長起來的舊的組織形式不足以完成這個工作，這是不容置疑的。那末，無產階級的什麼新的組織形式能够起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掘墓人的作用，不僅能够摧毀這個機器，不僅能够以無產階級的民主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而且能够成爲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的基礎呢？

無產階級的這個新的組織形式就是蘇維埃。

蘇維埃優越於舊的組織形式的地方在哪裏呢？

就在於蘇維埃是無產階級的最能包括一切的羣衆組織，因爲蘇維埃，而且只有蘇維埃，才能包括所有一切工人。

就在於蘇維埃是能够團結所有的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工人和農民、士兵和水兵的唯一的羣衆組織，因此在這個組織中，羣衆先鋒隊即無產階級對羣衆鬥爭的政治領導就能够最容易和最充分地實現。

就在於蘇維埃是羣衆革命鬥爭、羣衆政治發動和羣衆武裝起義的最有力的機關，是能够摧毀財政資本及其政治附屬物的莫大勢力的機關。

就在於蘇維埃是羣衆本身的直接的組織，是最民主的，因而也是羣衆的最有威信的組織，這種組織能盡量便利羣衆參加新國家的建設和管理，能盡量發揮羣衆在毀壞舊制度的鬥爭中，在建設無產階級新制度的鬥爭中的革命毅力、首倡精神和創造能力。

蘇維埃政權就是把各地方蘇維埃統一成爲一個總的國家組織，統一成爲無產階級這個被壓迫被剝削羣衆的先鋒隊，這個統治階級的國家組織，即統一成爲蘇維埃共和國。

蘇維埃政權的實質就在於：正是從前受資本家和地主壓迫的那些階級的最羣衆化和最革命的組織現在成了『全部國家權力和全部國家機構的固定的和唯一的基礎』，『正是那些』在法律上有平等權利、『實際上却受到各種排擠不能參加政治生活和享有民主權利和自由（甚至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也是這樣）的羣衆，現在被吸引來經常參加對國家的民主管理並在其中起決定作用』（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四四三頁）。

正因爲如此，蘇維埃政權是新的國家組織形式，與舊的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和議會制的國家組織形式有原則上的差別，它是新的國家類型，不適合於剝削和壓迫勞動羣衆的任務，而適合於使他們完全擺脫任何壓迫和任何剝削的任務，適合於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

列寧說得對：自從出現了蘇維埃政權，『資產階級民主的議會制度的時代就結束了，世界歷史的

新的一章，即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就開始了。

蘇維埃政權的特徵在哪裏呢？

就在於蘇維埃政權是存在着階級的條件下可能有的。一切國家組織中最羣衆化和最民主的國家組織，因爲它既然是工人和被剝削農民在反對剝削者的鬥爭中結合和合作的場所，並在自己的工作中依靠這個結合和合作，它就是多數居民統治少數的政權，是這個多數的國家，是這個多數的專政的表現。

就在於蘇維埃政權是階級社會一切國家組織中最有國際性的組織，因爲它既然摧毀任何民族壓迫而依靠各族勞動羣衆的合作，它使這些羣衆易於在統一的國家聯盟內聯合起來。

就在於蘇維埃政權按本身結構來說，使被壓迫被剝削羣衆的先鋒隊，即無產階級這個在蘇維埃中最團結和最覺悟的核心易於領導這些被壓迫被剝削羣衆。

列寧說：『被壓迫階級的一切革命和一切運動的經驗、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教導我們，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够團結和領導被剝削的勞動人民中的渙散落後的階層。』（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四四頁）而蘇維埃政權的結構使這個經驗的指示易於實現。

就在於蘇維埃政權既然在統一的國家組織內把立法權和行政權結合起來，並用生產單位，用工廠來代替地域選舉區，就把工人和一般勞動羣衆同國家管理機關直接聯系起來，教導他們管理國家。就在於只有蘇維埃政權才能使軍隊不受資產階級長官的支配，把軍隊由資產階級制度下壓迫人民的工具變爲使人民從本國的和外國的資產階級壓迫下解放出來的工具。

就在於『只有蘇維埃國家組織才能真正一下子粉碎和徹底摧毀舊式的即資產階級的、官僚的、法官的機關』（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四四頁）。

就在於只有蘇維埃的國家形式才能吸收勞動者和被剝削者的羣衆組織無條件地經常參加國家的管理，只有它才能準備國家的消亡，這種消亡是將來的無國家社會即共產主義社會的基本因素之一。這樣，蘇維埃共和國就是那個找了很久而終於找到了的政治形式；在這個形式的範圍內必須實現無產階級的經濟解放，實現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

巴黎公社是這種形式的萌芽。蘇維埃政權是這種形式的發展和完成。

正因為如此，列寧說：

『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共和國不僅是更高的民主制度形式……而且是唯一○能够保證最無痛苦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形式。』（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三四〇頁）

五 農民問題

關於這個題目我來講四個問題：

○ 着重點是我加的。 斯大林

(甲) 問題的提法；

(乙)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的農民；

(丙) 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農民；

(丁) 蘇維埃政權鞏固後的農民。

(一) 問題的提法。有人以爲列寧主義中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以爲列寧主義的出發點是關於農民及其作用和比重的問題。這是完全不對的。列寧主義中的基本問題，列寧主義的出發點，並不是農民問題，而是無產階級專政、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等問題。農民問題，即無產階級在爲政權而鬥爭中的同盟者問題，是一個派生的問題。

可是，這個情況絲毫不會使農民問題失去它對無產階級革命無疑具有的重大而迫切的意義。大家知道，在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隊伍裏，認真研究農民問題正是在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年）前夜開始的，當時推翻沙皇制度和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已經全盤擺在黨的面前，無產階級在當前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同盟者問題已經具有迫切的性質。大家也知道，俄國農民問題在無產階級革命時期具有更迫切的性質，當時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爭取和保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引起了無產階級在當前無產階級革命中的同盟者問題。不言而喻，誰想奪取政權，誰準備奪取政權，誰就不能不關心自己的真正同盟者的問題。

從這個意義上說，農民問題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總問題的一部分，因而也就是列寧主義的最迫

切的問題之一。

第二國際各黨所以漠視農民問題，有時簡直否認農民問題，不僅是因為西方有特殊的發展條件，而且首先是因為它們不相信無產階級專政，害怕革命，不想引導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權。而誰要是害怕革命，誰要是不想引導無產者去奪取政權，誰也就不會關心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同盟者問題，因為在他看來，同盟者問題是無所謂的，不迫切的。第二國際的英雄們把自己譏笑農民問題的態度看做文雅風度的表現，『真正』馬克思主義的表現。其實，這裏一點馬克思主義的氣味也沒有，因為在無產階級革命前夜漠視農民問題這樣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就無疑是表明直接背叛馬克思主義。

問題是這樣：由於農民的某些生活條件而潛藏在農民內部的革命的可能性是否已經用完？如果還沒有用完，是否有希望，有根據把這種可能性用於無產階級革命，把農民，把農民中的多數被剝削者由資產階級的後備軍（從前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變為無產階級的後備軍，變為無產階級的同盟者？

列寧主義對這個問題的答覆是肯定的，即認為多數農民具有革命能力，認為可以把這種革命能力用於無產階級專政。

俄國三次革命的歷史完全證實了列寧主義關於這一點的結論。

由此得出一個實際結論，就是要援助勞動農民羣衆的反對奴役和剝削的鬥爭，擺脫壓迫和貧困

的鬥爭。這當然不是說，無產階級應當援助任何一種農民運動。這裏所說的是要援助直接或間接地便利無產階級解放運動、這樣或那樣地幫助無產階級革命、促使農民變為工人階級的後備軍和同盟者的那種農民運動和農民鬥爭。

(二)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的農民。這個時期包括俄國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年）和第二次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這個時期的特徵是農民擺脫自由資產階級的影響，離開立憲民主黨人，而轉到無產階級方面來，轉到布爾什維克黨方面來。這個時期的歷史是立憲民主黨人（自由資產階級）和布爾什維克（無產階級）爭奪農民的歷史。杜馬時期決定了這個鬥爭的命運，因為前後四屆杜馬時期給了農民一個實際教訓，這個教訓明明白白地向農民指出：他們從立憲民主黨人手中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沙皇完全擁護地主，而立憲民主黨人則擁護沙皇；農民所能指望得到幫助的唯一的力就是城市工人，即無產階級。帝國主義戰爭只是證實了杜馬時期的教訓，使農民最終離開資產階級，使自由資產階級最終陷於孤立，因為戰爭年份表明：希望從沙皇及其資產階級同盟者那裏得到和平完全是畫餅充飢，自欺欺人。如果沒有杜馬時期的實際教訓，就不可能有無產階級的領導權。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工農聯盟就是這樣形成的。在推翻沙皇制度的共同鬥爭中的無產階級領導權就是這樣形成的，而這個領導權就引導到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

大家知道，西方（英、法、德、奧）資產階級革命是循着另一條道路進行的。西方革命的領導權不是屬於當時由於本身幼弱而沒有成為並且不可能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的無產階級，而是屬於自由資

產階級。西方農民擺脫農奴制而獲得的解放不是從人數很少和沒有組織的無產階級手裏得到的，而是從資產階級手裏得到的。西方農民是和自由資產階級一道反對舊制度的。西方農民是資產階級的後備軍。因此，西方革命的結果使資產階級的政治比重大增加了。

而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所產生的結果却完全相反。俄國革命的結果不是使資產階級這個政治力量加強，而是使它削弱；不是使它的政治後備軍增加，而是使它失去了基本的後備軍，即失去了農民。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不是把自由資產階級提到了首位，而是把革命無產階級提到了首位，把千百萬農民團結在革命無產階級的周圍。

這也就說明為什麼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就轉變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領導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萌芽，是向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階段。

俄國革命為什麼有這個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歷史上沒有先例的獨特現象呢？這個獨特現象是從哪裏來的呢？

這是因為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是在比西方更發展的階級鬥爭條件下展開的，因為俄國無產階級在這個時候已經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而被無產階級的革命性所嚇倒的自由資產階級已經喪失任何革命性（尤其在一九〇五年的教訓以後），轉而同沙皇和地主結成聯盟來反對革命，反對工農。

必須注意下面幾個決定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獨特性的情況：

（甲）俄國工業在革命前夜的空前的積聚程度。例如大家知道，當時俄國在有五百工人以上的企

業中工作的工人佔全體工人的百分之五十四，而像美國這樣發達的國家在同樣的企業中工作的工人只佔全體工人的百分之三十三。幾乎用不着證明，單是這一個情況，在具備布爾什維克黨這樣一個革命政黨的條件下，就已經使俄國工人階級成爲全國政治生活中最大的力量了。

(乙) 企業中醜惡的剝削形式，加上沙皇走狗殘酷的警察壓制，——這個情況使工人的每一次重大的罷工都變成巨大的政治行動，把工人階級鍛鍊成爲徹底革命的力量。

(丙) 俄國資產階級的政治上的萎靡不振，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後已經變成對於沙皇制度的效忠和公開的反革命性，這不僅因爲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性使俄國資產階級投入沙皇制度的懷抱，而且因爲俄國資產階級直接依賴政府的定貨。

(丁) 農村中最醜惡最難堪的農奴制殘餘，加上地主的專權，——這個情況使農民投入了革命的懷抱。

(戊) 沙皇制度壓制一切有生機的東西，並以自己的專橫來加重資本家和地主的壓迫，——這個情況使工人和農民的鬥爭匯合成一條革命洪流。

(己) 帝國主義戰爭把俄國政治生活中的這一切矛盾融合爲深刻的革命危機，並使革命具有莫大的衝擊力量。

在這樣的條件下，農民應當向哪裏走呢？農民應當向誰尋求援助來反對地主專權、反對沙皇專橫、反對使農民經濟破產的毀滅性戰爭呢？向自由資產階級嗎？然而它是敵人，——這是前後四屈

杜馬的多年的經驗已經證明了的。向社會革命黨人嗎？社會革命黨人當然比立憲民主黨人『好些』，他們的政綱也是『合適的』，幾乎是農民的政綱。可是，既然社會革命黨人想單單依靠農民，既然他們在成爲敵人力量的主要泉源的城市中軟弱無力，那末，他們能够幹出什麼事情呢？什麼地方有一個新的力量，它無論在農村或城市中都能一往直前，勇敢地走到前列去同沙皇和地主作鬥爭，幫助農民擺脫奴役，擺脫沒有土地的情況，擺脫壓迫，擺脫戰爭呢？一般說來，當時在俄國是否有這樣的力量呢？是的，是有的。這就是俄國無產階級，它還在一九〇五年就已經顯示出自己的力量、自己的鬥爭到底的本領、自己的勇氣、自己的革命性。

無論如何，除了這個力量以外，別的力量是沒有的，而且是無從得到的。

正因爲如此，農民在離開立憲民主黨人而接近社會革命黨人以後，就覺悟到必須服從俄國無產階級這個勇敢的革命領袖的領導。

決定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獨特性的情況就是這樣。

(三)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農民。這個時期從二月革命(一九一七年)到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年)爲止。這個時期比較短，總共只有八個月；但是從羣衆所受到的政治教育和革命訓練來看，可以大胆地說，這八個月等於平常憲制發展時期的好幾十年，因爲這八個月是革命的八個月。這個時期的特點就是農民更加革命化，他們對社會革命黨人感到失望，他們離開社會革命黨人，他們重新轉向直接團結在無產階級的周圍，認定無產階級是唯一能够引導國家走向和平的徹底革命的力量。這個時期的

歷史是社會革命黨人（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布爾什維克（無產階級民主派）爭奪農民、爭取掌握多數農民的歷史。決定這個鬥爭的命運的，是聯合政府時期，克倫斯基統治時期，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拒絕沒收地主土地，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爭取繼續作戰，前綫六月進攻，士兵死刑，科爾尼洛夫暴動。

如果說從前，在前一時期，革命的基本問題是推翻沙皇和地主政權，那末現在，在二月革命以後的時期，當沙皇已經被推翻，而綿延不絕的戰爭已經使國家經濟完全破壞，使農民完全破產的時候，消滅戰爭的問題就成為革命的基本問題了。重心顯然已經從純粹國內性質的問題移到基本問題，即戰爭問題上了。『結束戰爭』，『擺脫戰爭』，——這就是疲憊不堪的全國人民首先是農民的共同呼聲。可是當時要擺脫戰爭，就必須推翻臨時政府，必須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必須推翻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政權，因為他們，而且只有他們，要把戰爭拖延到『勝利為止』。當時除了推翻資產階級，實際上沒有別的出路可以擺脫戰爭。

這是新的革命，無產階級的革命，因為它把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最後一個派別，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極左派，即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拋出政權以外，以便創立新的無產階級的政權，即蘇維埃政權，以便使革命無產階級的黨，主張進行革命鬥爭以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而爭取民主和平的黨，即布爾什維克黨掌握政權。大多數農民支持了工人為爭取和平、為蘇維埃政權而進行的鬥爭。

當時在農民面前沒有別的出路，而且不可能有別的出路。

這樣，克倫斯基統治時期給了勞動農民羣衆一個最大的實際教訓，因為它明明白白地指出：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政權下，國家是不能擺脫戰爭的，農民是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與立憲民主黨人不同的地方只在於他們有甜蜜的演說和虛偽的諾言，而事實上他們所執行的還是那個帝國主義的立憲民主黨的政策；只有蘇維埃政權才是唯一能夠引導國家走上大道的政權。戰爭的繼續拖延只是證實了這個教訓的正確，督促革命前進，推動千百萬農民和士兵羣衆直接團結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周圍。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孤立已成爲確定不移的事實。如果沒有聯合政府時期的實際教訓，就不可能有無產階級專政。

促使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爲無產階級革命的情況就是這樣。

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這樣形成的。

(四)蘇維埃政權鞏固後的農民。如果說從前，在革命的第一個時期，主要問題是推翻沙皇制度，而後來，在二月革命以後，首要問題是推翻資產階級以擺脫帝國主義戰爭；那末現在，在國內戰爭結束以後，在蘇維埃政權鞏固以後，經濟建設問題就成爲首要問題了。加強和發展國有化工業；爲了達到這個目的而通過國家所調節的商業把工業和農民經濟聯系起來；用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以便後來逐漸減少糧食稅額；做到用工業品去交換農產品；振興商業並發展合作社，吸引千百萬農民參加合作社，——這就是列寧爲建立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而擬定的經濟建設方面的當前任務。

有人說，這個任務也許是俄國這樣一個農民國家所不能勝任的。有些愛懷疑的人甚至說，這個任

務簡直是空想，是無法實現的，因為農民總是農民，——農民是由小生產者組成的，因此不能利用他們來建立社會主義生產的基礎。

但是，愛懷疑的人錯了，因為他們沒有估計到在這裏有決定意義的一些情況。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其中主要的情況。

第一、決不可把蘇聯農民和西方農民混為一談。蘇聯農民不能不和西方農民有所區別，因為蘇聯農民經過了三次革命的教訓，跟無產階級一起並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了反對沙皇和資產階級政權的鬥爭，從無產階級革命手裏獲得了土地與和平，並因此成為無產階級的後備軍；西方農民却是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在自由資產階級領導下進行了鬥爭，從這個資產階級手裏獲得了土地，並因此成為資產階級的後備軍。未必用得着證明：蘇聯農民既慣於重視他們和無產階級的政治友誼和政治合作，並因這種友誼和這種合作而獲得了自由，就不會不是無產階級實行經濟合作的最好對象。

恩格斯曾經說：『社會黨奪取政權已經是最近將來的事情』，『爲了奪取政權，黨首先應當從城市跑到農村，成爲農村中有力量的黨』（見恩格斯『農民問題』一九二二年版（1901））。他的這一段話是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寫的，他當時所指的是西方農民。俄國共產黨人在三次革命中在這方面做了巨大的工作，已經在農村中給自己造成了我們的西方同志所不敢夢想的影響和支柱，這一點還需要證明嗎？這個情況不能不根本促進俄國工人階級和農民實行經濟合作的事業，這一點怎麼能否認呢？

愛懷疑的人硬說小農是和社會主義建設不能相容的因素。可是，請聽一聽恩格斯關於西方小農

所說的話吧：

『我們堅決站在小農方面，我們將竭力設法使他們生活得好些，使他們易於轉到協作社，如果他們決定這樣做的話；如果他們還不能決定這樣做，那我們就設法給他們盡量多的時間，讓他們在自己的一小塊土地上考慮考慮這個問題。我們所以要這樣做，不僅是因為我們認為靠自己勞動爲生的小農可能轉到我們方面來，而且也是爲了黨的直接利益。被我們拯救而沒有下降爲無產者、還在農民地位時就被我們吸收到自己方面來的農民人數愈多，社會變革的實現也就愈迅速和愈容易。我們無須等到資本主義生產到處都發展到極限的時候，等到最後一個小手工業者和最後一個小農都變成資本主義大生產的犧牲品的時候，才來實現這個變革。我們在這方面爲了農民的利益而必須犧牲一些社會資金，這從資本主義經濟的觀點看來好像是白費金錢，然而這正是善於利用資本，因爲這種物質犧牲會使以後實行整個社會改造時節省大批經費，也許節省十分之九。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可以很慷慨地對待農民。』（見恩格斯『農民問題』一九二二年版）

恩格斯說這些話時所指的是西方農民。可是，恩格斯所說的這些話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像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那樣容易和那樣充分地實現，這難道還不明顯嗎？只有在蘇維埃俄國，才能立刻實行並完全實行使『靠自己勞動爲生的小農轉到我們方面來』，實行爲此所必需的『物質犧牲』，實行爲此所必需的『慷慨地對待農民』，而且有利於農民的諸如此類的措施已經在俄國實行，這難道還不明

顯嗎？這個情況也一定會便利並推進蘇維埃國家的經濟建設事業，這一點怎麼能否認呢？

第二、決不可把俄國農業和西方農業混爲一談。西方農業是按照通常的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是在農民深刻分化的情況下發展的，一個極端是大田莊和私人資本主義大地產，另一個極端却是大衆的貧窮困苦和僱傭奴隸地位。因此，在西方，解體和分化是十分自然的。在俄國却不是這樣。我國農業是不能循着這樣的道路去發展的，因爲單是蘇維埃政權的存在和基本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國有化的事實就不容許循着這條道路去發展。俄國農業應當循着另一條道路，即循着使千百萬小農和中農合作化的道路，循着在農村中發展那種由國家以優惠貸款的辦法來扶持的羣衆性的合作社的道路去發展。列寧在論合作制的論文中正確地指出我國農業應當循着新道路去發展，即循着通過合作社吸引多數農民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循着把集體制原則逐步應用於農業，起初應用於農產品銷售方面，然後應用於農產品生產方面這一道路去發展。

在這方面，由於農業合作社工作而在農村中發生的一些新現象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大家知道，在農業合作總社（СЗ）內產生了各個農業部門（亞麻、馬鈴薯、油類等部門）的新的巨大組織，這些組織是有廣大前途的。例如其中的亞麻合作總社包括許多麻農生產協作社。亞麻合作總社以種子和生產工具供給農民，然後向這些農民購買全部亞麻產品，在市場上大批銷售，保證農民也得到利潤，從而通過農業合作總社把農民經濟和國家工業聯系起來。怎樣稱呼這種生產組織形式呢？在我看來，這是國家社會主義大生產中的家庭農業體系。這裏所說的國家社會主義生產中的家庭農業體系，是和資

本主義的家庭工業體系，例如紡織業生產中的家庭工業體系相比擬而說的；在資本主義的家庭工業體系中，家庭手工業者從資本家那裏領得原料和工具，而把自己的全部生產品交給資本家，所以他們事實上是在家裏做工的半僱傭工人。這不過是指明我國農業應當循着哪一條道路發展的許多標誌之一。其他農業部門中的其他類似的標誌，我就不談了。

未必用得着證明：絕大多數農民樂意走這條新的發展道路，而拋開私人資本主義大地產和僱傭奴隸地位的道路，貧困和破產的道路。

請看列寧關於我國農業的發展道路所說的話吧：

『國家支配着一切大生產資料，無產階級掌握着國家權力，無產階級和千百萬小農及最小農結成聯盟，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已有保證等等，難道這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難道這不是我們通過合作社，而且僅僅通過合作社，通過我們從前鄙視爲買賣機關，並且現時在新經濟政策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視的合作社來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嗎？這還不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這已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八頁）

列寧往下講到必須給予合作社這個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組織居民的新原則』和新的『社會制度』以財政援助和其他援助時繼續說：

『每個社會制度的產生都需要有一定階級的財政援助。不用說，「自由」資本主義的誕生是

以好多億盧布爲代價的。目前我們應該特別援助的社會制度就是合作社制度，這一點我們現在應該認識到並具體加以執行。可是必須名副其實地進行援助，就是說，不應該把這種援助僅僅理解爲對隨便一種合作社周轉的援助，而應該把這種援助理解爲對確實有真正的民衆參加的合作社周轉的援助。』（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九頁）

所有這些情況說明什麼呢？

說明愛懷疑的人是不對的。

說明列寧主義是對的，因爲列寧主義把勞動農民羣衆看做無產階級の後備軍。說明執掌政權的無產階級能够運用而且應當運用這個後備軍，以便把工業和農業結合起來，發展社會主義建設，爲無產階級專政建立過渡到社會主義經濟所絕對必需的基礎。

六 民族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我來講兩個主要問題：

（甲）問題的提法；

（乙）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

（一）問題的提法。最近二十年來，民族問題發生了許多極重大的變化。第二國際時期的民族問

題和列寧主義時期的民族問題遠不是一回事。不僅按範圍來說，而且按內在性質來說，它們都是大不相同的。

從前，通常都把民族問題限制在主要和『文明』民族有關的問題的狹隘範圍內。愛爾蘭人、匈牙利人、波蘭人、芬蘭人、塞爾維亞人以及歐洲其他一些民族，——第二國際的活動家所關心的就是這些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的命運。而那些遭受最粗暴最殘酷的民族壓迫的千百萬亞洲人民和非洲人民，通常都不放在他們的眼裏。他們不敢把白種人和黑種人，『文明人』和『不文明人』相提並論。兩個空空洞洞、不痛不癢、竭力迴避殖民地解放問題的決議，——這就是第二國際的活動家所能藉以自誇的一切。現在，民族問題方面的這種兩重性和不徹底性可以說已經被消滅了。列寧主義揭露了這種極不相稱的現象，拆毀了橫在白種人和黑種人，歐洲人和亞洲人，帝國主義的『文明』奴隸和『不文明』奴隸之間的牆壁，因而把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聯結起來了。於是民族問題就由局部的和國內的問題變成了一般的和國際的問題，變成了附屬國和殖民地被壓迫民族擺脫帝國主義桎梏的世界問題。

從前，通常都把民族自決原則加以曲解，往往把它縮小為民族自治權。第二國際的某些首領甚至把自決權變成文化自治權，就是說，被壓迫民族有設立自己的文化機關的權利，而讓全部政權仍舊掌握在統治民族手中。結果就使民族自決的思想有從反對吞併政策的工具變成替吞併政策辯護的工具的危險。現在，這種糊塗觀念可以說已經被克服了。列寧主義擴大了民族自決的概念，把它解釋為附

屬國和殖民地被壓迫民族有完全分離的權利，各民族有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於是就排除了把自決權解釋爲自治權來替併政策辯護的可能。於是民族自決原則就由欺騙羣衆的工具（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期，它無疑是被社會沙文主義者用來做這種工具的）變成了揭露一切帝國主義野心和沙文主義陰謀的工具，變成了用國際主義精神對羣衆進行政治教育的工具。

從前，通常都把被壓迫民族問題看做純粹法權的問題。冠冕堂皇地宣佈『民族的平等權利』，發表無數關於『民族平等』的宣言，——這就是第二國際各黨所心滿意足的事情。它們抹殺了這樣一個事實，就是在帝國主義時代，當某些民族（少數）靠剝削另一些民族生存的時候，所謂『民族平等』不過是對於被壓迫民族的嘲弄。現在，民族問題方面的這種資產階級的法權觀點可以說已經被揭穿了。列寧主義把民族問題從大吹大擂的宣言的天空拉到地上來，指出如果無產階級政黨不直接援助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民族平等』的宣言就是空洞的虛偽的宣言。於是被壓迫民族問題就成了援助，幫助，真正地經常地幫助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爭取真正的民族平等，爭取成立獨立國家的問題。

從前，通常都用改良主義的觀點來看民族問題，把它看做一個單獨的孤立的問題，看做和資本政權、推翻帝國主義、實現無產階級革命這一總問題無關的問題。人們當時都默默地認爲：歐洲無產階級不和殖民地解放運動直接結成聯盟也能取得勝利；民族殖民地問題可以離開無產階級革命的大道，可以不進行反帝的革命鬥爭，而悄悄地『自流地』得到解決。現在，這種反革命的觀點可以說已

經被揭穿了。列寧主義已經證明，帝國主義戰爭和俄國革命也已經證實：民族問題只有和無產階級革命相聯系並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基礎上才能得到解決，西方革命必須同殖民地和附屬國反帝解放運動結成革命的聯盟才能取得勝利。民族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的一部分，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一部分。

問題是這樣：被壓迫國家革命解放運動所含有的革命的可能性是否已經用完？如果還沒有用完，是否有希望、有根據把這種可能性用於無產階級革命，把附屬國和殖民地國家由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後備軍變為革命無產階級的後備軍，變為革命無產階級的同盟者？

列寧主義對這個問題的答覆是肯定的，即認為被壓迫國家民族解放運動含有革命能力，認為可以以把這種革命能力用於推翻共同的敵人，用於推翻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發展的規律、帝國主義戰爭和俄國革命完全證實了列寧主義關於這一點的結論。

由此可見，「統治」民族的無產階級必須援助，必須堅決地積極地援助各被壓迫民族和附屬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

這當然不是說，無產階級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在每個具體情況下，都應當援助任何一種民族運動。這裏所說的是要援助目的在於削弱帝國主義、推翻帝國主義，而不在於鞏固和保持帝國主義的那種民族運動。有時候，個別被壓迫國家的民族運動會和無產階級運動發展的利益相衝突。不言而喻，在這種情況下是談不到什麼援助的。民族權利問題並不是一個獨立自在的問題，而是無產階級革

命總問題的一部分，它服從整體，要求從整體的觀點來觀察。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擁護波蘭人和匈牙利人的民族運動，而反對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運動。爲什麼呢？因爲當時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是『反動民族』，是歐洲的『俄國前哨』，是專制制度的前哨，而當時波蘭人和匈牙利人却是反對專制制度的『革命民族』。因爲當時援助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運動就是間接援助歐洲革命運動的最危險的敵人沙皇制度。

列寧說：『民主運動的個別要求，包括民族自決在內，並不是什麼絕對的東西，而是整個民主主義（現在是整個社會主義）世界運動中的一部分。在個別的具體情況下，部分可能和總體相矛盾，那時就必須拋棄這一部分。』（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三二六頁）

關於個別的民族運動問題，關於這些運動可能具有的反動性問題（當然，如果不是從形式上，不是從抽象的法權觀點，而是從革命運動的利益的觀點來具體地估量這些運動）就是這樣。

關於一般民族運動的革命性也應該這樣說。極大多數民族運動所無疑具有的革命性，也和某些個別的民族運動所可能具有的反動性一樣，是相對的和獨特的。在帝國主義壓迫的情況下，民族運動的革命性完全不一定要以這個運動有無產階級分子參加、有革命的或共和的綱領、有民主的基礎爲前提。阿富汗國王爲阿富汗獨立而進行的鬥爭在客觀上是革命的鬥爭，因爲這個鬥爭能够削弱、瓦解和毀壞帝國主義，雖然阿富汗國王及其戰友抱有君主制的觀點，可是像克倫斯基和策烈鐵里、列諾得爾和謝德曼、切爾諾夫和唐恩、韓德遜和克萊因斯這些『激烈的』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革

命家』和共和主義者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期所進行的鬥爭却是反動的鬥爭，因為這個鬥爭的結果是粉飾並鞏固帝國主義，使帝國主義取得勝利。埃及的商人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埃及獨立而進行的鬥爭，由於同樣的原因，在客觀上也是革命的鬥爭，雖然埃及民族運動的首領是資產階級出身，具有資產階級身分，並反對社會主義；然而英國『工人』政府為保持埃及的附屬地位而進行的鬥爭，由於同樣的原因，却是反動的鬥爭，雖然這個政府的閣員是無產階級出身，具有無產階級身分，並『擁護』社會主義。更不必說其他較大的殖民地 and 附屬國，如印度和中國的民族運動了。這些國家在爭取解放的道路上的每一步驟，即使違反形式上的民主的要求，也是對帝國主義的一個非常沉重的打擊，就是說，毫無疑問是革命的步驟。

列寧說得對，在估量被壓迫國家的民族運動時不要以形式上的民主為標準，而要以反帝國主義鬥爭總結算中的實際結果為標準，就是說：『不要孤立地看，而要以世界範圍為標準。』（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三二六頁）

(二) 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列寧主義在解決民族問題時是從下列原理出發的：(甲) 世界已經分成兩個陣營：一個是擁有財政資本並剝削地球上絕大多數居民的為數極少的文明民族的陣營，另一個是組成這個絕大多數的殖民地和附屬國被壓迫被剝削民族的陣營；

(乙) 被財政資本壓迫和剝削的殖民地和附屬國是帝國主義最巨大的後備力量和最重要的實力來源；

(丙) 附屬國和殖民地國家被壓迫民族所進行的反帝革命鬥爭是他們擺脫壓迫和剝削的唯一道路；

(丁) 最重要的殖民地和附屬國已經走上民族解放運動的道路，這個運動不能不引起全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

(戊) 發達的國家的無產階級運動和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利益，要求把這兩種革命運動結合成一條反對共同的敵人、反對帝國主義的共同的戰綫；

(己) 如果不建立並鞏固共同的革命戰綫，那末發達的國家中的工人階級就不能勝利，被壓迫民族就不能從帝國主義的桎梏下解放出來；

(庚) 如果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不直接而堅決地援助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來反對『本國的』帝國主義，那末就不可能建立共同的革命戰綫，因為『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自由的』（恩格斯）；

(辛) 這種援助就是堅持、維護和實行下列口號：民族有分離權，有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

(壬) 不實行這個口號，就不能保證各民族在統一的世界經濟中的聯合和合作，而這種統一的世界經濟是世界社會主義勝利的物質基礎；

(癸) 這種聯合只能是自願的，是在各民族相互信任和友愛的基礎上產生的。

由此就產生了民族問題上的兩個方面，即兩個趨向：一個趨向是在帝國主義壓迫和殖民地剝削的基礎上產生的，它力求在政治上擺脫帝國主義束縛而成立獨立的民族國家；另一個趨向是因世界

市場和世界經濟的形成而產生的，它力求使各民族在經濟上彼此接近。

列寧說：「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可以看見民族問題上的兩個歷史趨向。第一個趨向就是民族生活和民族運動的覺醒，反對一切民族壓迫的鬥爭，民族國家的建立。第二個趨向就是民族間各種聯系的發展和日趨頻繁，民族壁壘的破壞，資本、一般經濟生活、政治、科學等等的國際統一的形成。」

這兩個趨向都是資本主義的世界規律。第一個趨向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佔優勢，第二個趨向標誌着資本主義已經成熟而快要轉變到社會主義社會。」（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卷第十一頁）

對於帝國主義，這兩個趨向是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因為帝國主義如果不剝削殖民地，如果不用暴力把殖民地束縛在『統一的整體』範圍內，就不能生存；因為帝國主義只有靠吞併和奪取殖民地才能使各民族互相接近，否則它根本就不成其為帝國主義了。

對於共產主義，恰恰相反，這兩個趨向不過是一個問題即被壓迫民族擺脫帝國主義壓迫這一問題的兩個方面，因為共產主義知道：各民族在統一的世界經濟中的聯合，只有根據相互信任和自願協定的原則才能實現；民族的自願聯合，只有經過使殖民地從『統一的』帝國主義『整體』分離出來的道路，經過使殖民地變為獨立國家的道路才能達到。

因此，必須頑強地、不斷地、堅決地反對各統治民族（英、法、美、意、日等）的『社會主義者』的

大國沙文主義，這些『社會主義者』不願意反對本國帝國主義政府，不願意援助『他們的』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擺脫壓迫、爭取國家獨立的鬥爭。

不進行這樣的鬥爭，就不能以真正的國際主義精神，以接近附屬國和殖民地勞動羣衆的精神，以真正準備無產階級革命的精神來教育統治民族的工人階級。如果俄國無產階級沒有得到舊俄帝國內各被壓迫民族的同情和援助，那末俄國革命就不會勝利，而高爾察克和鄧尼金也就不會被擊潰。但是要取得這些民族的同情和援助，俄國無產階級當時首先必須打斷俄國帝國主義的鎖鍊，使這些民族擺脫民族壓迫。

不這樣做，就不能鞏固蘇維埃政權，就不能樹立真正的國際主義，就不能建立各民族合作的卓越組織，這個組織叫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它是各民族將來在統一的世界經濟中聯合的實際榜樣。

因此，必須反對各被壓迫國家社會黨人的民族閉關主義、狹隘觀點和單幹思想，這些社會黨人不願意超出自己的民族狹隘眼界，不了解本國解放運動和統治國無產階級運動之間的聯系。

不進行這樣的鬥爭，就不能保持被壓迫民族無產階級的獨立政策，就不能保持它和統治國無產階級在推翻共同的敵人、推翻帝國主義的鬥爭中的階級團結。

不進行這樣的鬥爭，就不能實現國際主義。

這就是以革命的國際主義精神來教育統治民族和被壓迫民族的勞動羣衆的道路。

請看列寧對於共產主義運動以國際主義精神教育工人的這個兩方面的工作是怎樣說的：

「這種教育工作……在壓迫的大民族中和被壓迫的小民族中，在吞併的民族中和被吞併的民族中，具體地說能夠相同嗎？」

顯然不能。要達到使一切民族有完全的平等權利、能密切接近和進而融合爲一的目的，顯然要走各不相同的具體道路，例如要達到一張紙的中心點，可以從紙的一端向左走，也可以從紙的另一端向右走。如果壓迫的、吞併的大民族中的社會民主黨人僅僅一般地鼓吹民族融合，而忘記了，哪怕是一分鐘忘記了「他的」尼古拉第二、「他的」威廉、喬治、彭加勒等等也主張和小民族融合（用吞併手段），忘記了尼古拉第二主張和加里西亞「融合」、威廉第二主張和比利時「融合」等等，那末這樣的社會民主黨人在理論上是可笑的教條主義者，在實踐上是帝國主義的幫兇。

在壓迫國家裏，工人的國際主義教育的重心就是要宣傳並堅持被壓迫國家的分離自由。否則就不會有國際主義。壓迫民族的任何一個社會民主黨人如果不進行這種宣傳，那末我們就可以而且應該把他鄙視爲帝國主義者，鄙視爲惡棍。這是一個無條件的要求，哪怕在社會主義未實現以前分離的機會只有千分之一是可能的和「可以實現的」……

相反地，小民族的社會民主黨人應當以我們這個總公式——各民族「自願聯合」的末尾兩個字爲其鼓動工作的重心。他可以既贊成本民族的政治獨立，又贊成本民族加入鄰近某個國家，而

不違反他的作爲國際主義者的義務。可是，他在任何場合都應當反對小民族的狹隘觀點、閉關主義和單幹思想，而主張顧全整體和總體，主張部分利益服從全體利益。

對問題未加思索的人會以爲壓迫民族的社會民主黨人堅持「分離自由」而被壓迫民族的社會民主黨人堅持「聯合自由」是「矛盾的」。可是只要稍微思索一下，就可以知道要達到國際主義和民族融合這一目的，除了實行這個原理以外，是沒有而且不可能有其他道路的。」（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三三〇頁至第三三二頁）

七 戰略和策略

關於這個題目我來講六個問題：

- （甲）戰略和策略是指導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科學；
- （乙）革命的階段和戰略；
- （丙）運動的來潮退潮和策略；
- （丁）戰略指導；
- （戊）策略指導；
- （己）改良主義和革命主義。

(一) 戰略和策略是指導無產階級鬥爭的科學。第二國際統治時期主要是在比較和平發展的環境中編制和訓練無產階級政治軍隊的時期。這是把議會制度當做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的時期。當時關於大規模的階級衝突的問題、關於準備無產階級去進行革命搏鬥的問題、關於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問題似乎都不是迫切的問題。當時的任務只是要利用一切合法的發展道路來編制和訓練無產階級軍隊，利用議會制度以適應無產階級處於在野黨地位並且似乎應當始終處於在野黨地位的那種條件。幾乎用不着證明，在這樣的時期和這樣了解無產階級任務的情況下，既不可能有完整的戰略，也不可能周密的策略。當時只有關於策略和戰略的一些片斷的零碎的觀念，但是沒有策略和戰略。

第二國際的滔天罪行並不在於它當時實行了利用議會鬥爭形式的策略，而在於它誇大了這種鬥爭形式的意義，幾乎把這種鬥爭形式看做唯一的鬥爭形式。而當公開的革命搏鬥時期到來的時候，當議會外鬥爭形式問題已經成為首要的迫切問題的時候，第二國際各黨竟避開了新的任務，不去接受這些任務。

只有在下一個時期：無產階級公開發動的時期；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期；當推翻資產階級的問題已經成為直接的實踐問題的時候，當無產階級的後備軍問題（戰略）已經成為一個最迫切的問題的時候，當一切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議會形式和議會外形式（策略）已經十分明顯地表現出來的時候，——只有在這個時期，才能制定無產階級鬥爭的完整的戰略和周密的策略。馬克思和恩格斯的

被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埋沒了的那些關於策略和戰略的英明思想，正是在這個時期被列寧發掘出來重見天日的。但是列寧並不限於恢復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個別策略原理。他還向前發展了這些原理，補充了一些新的思想和原理，把這一切結合爲指導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規則和指導原則的體系。列寧的『做什麼？』、『兩個策略』、『帝國主義』、『國家和革命』、『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以及『幼稚病』等書無疑是加進馬克思主義的總寶庫，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武庫的最寶貴的貢獻。列寧主義的戰略和策略是指導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科學。

(二)革命的階段和戰略。戰略就是規定無產階級在革命某一階段上的主要的打擊方向，制定革命力量（主要的和次要的後備軍）的相應的佈置計劃，在革命這一階段的整個過程中爲實現這個計劃而鬥爭。

我們的革命已經過兩個階段，十月革命後已進入第三個階段。與此相適應，戰略也有過變更。

第一個階段。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目的是推翻沙皇制度，徹底消滅中世紀制度的殘餘。革命的基本力量是無產階級。最親近的後備軍是農民。主要的打擊方向是孤立保皇派自由資產階級，這個資產階級力圖抓住農民並用和沙皇制度妥協的方法來消滅革命。力量的佈置計劃是工人階級和農民聯盟。『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把農民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便用強力打破專制制度的反抗，並麻痺資產階級的不穩定性。』（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九卷第八十一頁）

第二個階段。一九一七年三月至一九一七年十月。目的是推翻俄國的帝國主義，擺脫帝國主義戰

爭。革命的基本力量是無產階級。最親近的後備軍是貧苦農民。鄰國無產階級是可能的後備軍。曠日持久的戰爭和帝國主義的危機是有利的時機。主要的打擊方向是孤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這個民主派力圖抓住勞動農民羣衆並用和帝國主義妥協的方法來結束革命。力量的佈置計劃是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聯盟。『無產階級應當實現社會主義革命，把居民中的半無產階級分子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便用強力打破資產階級的反抗，並麻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不穩定性。』（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九卷第八十一頁）

第三個階段。這個階段是在十月革命後開始的。目的是在一國內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運用這個專政作為據點，以便在世界各國推翻帝國主義。革命已經超出一國範圍，世界革命的時代已經開始。革命的基本力量是一國的無產階級專政，世界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主要的後備軍是發達的國家的半無產階級羣衆和小農羣衆，殖民地和附屬國的解放運動。主要的打擊方向是孤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孤立第二國際各黨，這些黨是和帝國主義妥協。這一政策的基本支柱。力量的佈置計劃是無產階級革命和殖民地、附屬國的解放運動聯盟。

戰略是和革命的基本力量及其後備軍有關的。戰略因革命由一個階段轉入另一階段而變更，而在某一階段的整個時期基本上是不變的。

（三）運動的來潮、退潮和策略。策略就是規定無產階級在運動的來潮或退潮、革命的高漲或低落這個較短時期內的行動路線，就是通過以新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代替舊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

以新的口號代替舊的口號，通過把這些形式配合起來等等來爲實現這條路綫而鬥爭。戰略的目的，比如說，是要取得反對沙皇制度的戰爭或反對資產階級的戰爭的勝利，把反對沙皇制度的鬥爭或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進行到底，而策略的目的卻沒有這樣重大，因爲策略並不是要取得整個戰爭的勝利，而是要取得某些戰役、某些戰鬥的勝利，有成效地實行某些適合於革命某一高漲或低落時期的具體情況的運動和發動。策略是戰略的一部分，是服從於戰略的，是服務於戰略的。

策略是隨着來潮退潮而變更的。在革命第一階段的時期內（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戰略計劃始終沒有變更，策略却變更過幾次。在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五年的時期，黨的策略是進攻的，因爲當時革命處於來潮，運動是上升的，策略應當以這個事實爲出發點。與此相適應，鬥爭形式也是革命的，是適合於革命來潮的要求的。地方的政治罷工、政治示威、政治總罷工、抵制杜馬、起義和革命戰鬥口號就是這個時期內互相代替的鬥爭形式。當時的組織形式也因鬥爭形式的變更而變更了。工廠委員會、農民革命委員會、罷工委員會、工人代表蘇維埃和比較公開的工人政黨就是這個時期內的組織形式。

在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二年時期，黨不得不轉而採取退却的策略，因爲當時革命運動低落，革命處於退潮，策略不能不估計到這個事實。與此相適應，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也變更了。不是抵制杜馬，而是參加杜馬；不是杜馬外的公開的革命發動，而是杜馬內的發動和杜馬內的工作；不是政治總罷工，而是局部經濟罷工，或者簡直無聲無息。當然，黨在這個時期內應該轉入秘密狀態，而羣衆的

革命組織也就由文化教育組織、合作社組織、保險組織以及其他合法組織代替了。

關於革命的第二個階段和第三個階段也應該這樣說，在這兩個階段中，策略變更過幾十次，戰略計劃却始终沒有變更。

策略是同無產階級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有關的，是同這些形式的交替和配合有關的。策略在革命的某一階段上可以隨着革命的來潮或退潮、革命的高漲或低落而變更好幾次。

(四)戰略指導。革命的後備軍有兩種：

直接的：(甲)本國的農民和一般過渡階層，(乙)鄰國的無產階級，(丙)殖民地和附屬國的革命運動，(丁)無產階級專政的勝利品和成果，而無產階級爲了收買強大的敵人並取得喘息時機，可以在保持自己的實力優勢的條件下暫時放棄一部分勝利品和成果；

間接的：(甲)本國各個非無產者階級之間的矛盾和衝突，這些矛盾和衝突是無產階級可以利用來削弱敵人並加強自己的後備軍的，(乙)和無產階級國家敵對的各個資產階級國家之間的矛盾、衝突和戰爭（例如帝國主義戰爭），這些矛盾、衝突和戰爭是無產階級在進攻時或者在被迫退却相機行事時可以利用的。

關於第一種後備軍用不着多說，因爲它們的意義是大家都知道的。至於第二種後備軍，因爲它們的意義並不是任何時候都很明顯的，所以必須指出，它們有時候對於革命進程具有頭等的意義。例如第一次革命時期和第一次革命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社會革命黨人）和保皇派自由資產階級（立憲民

主黨人）之間的衝突的巨大意義是未必可以否認的，因為這種衝突在使農民擺脫資產階級影響這件事情上無疑起了相當的作用。十月革命時期各主要帝國主義者集團之間進行決死的戰爭這一事實的巨大意義更是不可否認的，當時帝國主義者忙於相互之間的戰爭，沒有可能集中力量來反對年輕的蘇維埃政權，正因為如此，無產階級就有可能來切實地組織自己的力量，鞏固自己的政權，並準備撲滅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現在，當帝國主義集團之間的矛盾日益加深，當它們彼此之間的新戰爭不可避免的時，這種後備軍對於無產階級一定會有愈益重大的意義。

戰略指導的任務就是要正確運用這一切後備軍來達到革命在某一發展階段上的基本目的。

怎樣才是正確運用後備軍呢？

就是要執行一些必要的條件，其中主要的是：

第一、當革命時機已經成熟，當進攻在以全力進行，當起義已經迫在眉睫，當使後備軍跟上先鋒隊已經成為決定勝負的條件的時候，在這個決定關頭，要把革命的主要力量集中在敵人最易致命的地方。黨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至十月這一時期的戰略可以說是這樣運用後備軍的實例。毫無疑問，這個時期敵人最易致命的地方是戰爭。毫無疑問，黨正是在這個基本問題上把廣大民衆集合到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周圍。黨在這個時期的戰略就是通過遊行示威來訓練先鋒隊去進行街頭的發動，同時通過後方的蘇維埃和前綫的士兵委員會使後備軍跟上先鋒隊。革命的結局表明，當時後備軍是運用得正確的。

列寧在談到革命力量的戰略運用這個條件時，把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武裝起義的著名原理變動了一下說：

『（一）無論何時不要把起義當做兒戲，在開始起義時就要切實懂得，必須把它進行到底。
（二）必須在決定的地點，在決定的關頭，集中很大的優勢力量，否則，更有準備、更有組織的敵人就會把起義者消滅。』

（三）既然起義已經開始，就必須以最大的決心行動起來並堅決轉入進攻。「防禦是武裝起義的死路」。

（四）必須抓住時機，趁敵軍還分散的時候，出其不意地襲擊他們。

（五）每天（如果以一個城市來說，可以說每一小時）都必須力求獲得勝利，即使是小小的勝利也好，無論如何要保持「精神上的優勢」。（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一五二頁）
第二、要選擇危機已經達到頂點、先鋒隊已經具有戰鬥到底的決心、後備軍已經具有援助先鋒隊的決心、敵人內部已經極端慌亂的時機作為施行致命打擊的時機，開始起義的時機。

列寧說：決戰時機可以說完全成熟了，如果『（一）一切敵視我們的階級力量已十分混亂，他們彼此之間的衝突已十分厲害，他們已因進行力不勝任的鬥爭而十分疲憊』；如果『（二）一切猶豫動搖而不穩定的中間分子，即和資產階級有區別的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已在人民面前充分揭露自己，已因實踐方面的破產而大丟其醜』；如果『（三）在無產階級中，羣衆支持最

堅決最奮勇的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行動的情緒已開始高漲並猛烈高漲起來。那時，革命時機就成熟了；那時，如果我們正確地估計到上述一切……條件，並正確地選擇時機，我們的勝利就有保證了』（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十四頁）。

舉行十月起義可以說是這種戰略的模範。

違背這個條件，就會造成危險的錯誤，即所謂『失其速度』，就是說，黨就會落在運動進程的後面，或者向前跑得太遠，因而造成失敗的危險。有一部分同志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企圖從逮捕民主會議代表來開始起義，可以說是這種『失其速度』的例子，不善於選擇起義時機的例子，因為當時在蘇維埃內部還表現動搖情緒，前綫還猶豫不決，後備軍還沒有跟上先鋒隊。

第三、要一往直前地實行既定的方針，不顧所有一切橫在前進道路上的阻難和障礙，只有這樣，才能使先鋒隊不致失去鬥爭的基本目的，使羣衆不致迷失道路，而能向着這個目的前進並努力團結在先鋒隊的周圍。違背這個條件，就會造成莫大的錯誤，即海員們所熟悉的所謂『失其方向』。我們在緊接民主會議以後所採取的決定參加預備國會這一錯誤的步驟，可以說是這種『失其方向』的例子。當時黨似乎忘記了預備國會是資產階級企圖把國家從蘇維埃道路轉移到資產階級議會制度道路上去的手腕，黨參加這種機關就會打亂全部計劃，就會使那些在『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下進行革命鬥爭的工農迷失道路。這個錯誤因為布爾什維克退出預備國會而被糾正了。

第四、當敵人力量強大，當退却不可避免，當接受敵人的挑戰顯然對自己不利，當在一定的力量

對比下退却是使先鋒隊免受打擊並保存其後備軍的唯一手段的時候，要機動調度後備軍來實行正確的退却。

列寧說：『革命政黨應當補習。它們已經學習過進攻。現在應當了解，除了學會進攻以外，還必須學會正確地退却。必須了解，——而且革命階級已經從本身的沉痛經驗中領會到，——不學會正確的進攻和正確的退却，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十一頁至第十二頁）

這種戰略的目的就是要贏得時間，瓦解敵人，養精蓄銳，以便後來轉為進攻。

締結布列斯特和約可以說是這種戰略的模範。這個和約使黨有可能贏得時間，利用帝國主義陣營中的衝突，瓦解敵人的力量，為自己保留農民，養精蓄銳準備向高爾察克和鄧尼金進攻。

當時列寧說：『我們締結單獨和約，就能在目前可能的最大程度上從彼此敵對的兩個帝國主義集團下擺脫出來，利用它們相互之間的敵視和戰爭，——這種敵視和戰爭阻礙它們勾結起來反對我們，——取得一定時期的行動自由來繼續並鞏固社會主義革命。』（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四〇七頁）

布列斯特和約簽訂後過了三年，列寧說：『現在就連頭號傻瓜也看得見，「布列斯特和約」這個讓步加強了我們的實力，分散了國際帝國主義的力量。』（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頁）

保證有正確的戰略指導的主要條件就是這樣。

(五) 策略指導。策略指導是戰略指導的一部分，是服從戰略指導的任務和要求的。策略指導的任務就是要掌握無產階級的一切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保證這些形式的正確運用，以便在一定的力量對比下取得爲準備戰略勝利所必需的最大成果。

怎樣才是正確運用無產階級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呢？

就是要執行一些必要的條件，其中主要的是：

第一、要把這樣一種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提到第一位，這種形式最適合於當時運動的來潮或退潮的條件，能够促進和保證把羣衆引到革命陣地上，把千百萬羣衆引到革命戰綫上，把羣衆佈置在革命戰綫上。

問題並不是要使先鋒隊覺悟到保存舊制度的不可能和推翻舊制度的必不可免。問題是要使羣衆，使千百萬羣衆了解這是必不可免的，使他們表示援助先鋒隊的決心。可是，羣衆只有從親身的經驗中才能了解這一點。任務就是要使千百萬羣衆有可能根據親身的經驗認識到推翻舊政權的必不可免，要提出適當的鬥爭方法和組織形式使羣衆易於根據經驗來認清革命口號的正確性。

如果黨在當時沒有決定參加杜馬，如果它沒有決定集中力量去進行杜馬內的工作，並在這一工作的基礎上去開展鬥爭，使羣衆易於根據親身的經驗認清杜馬的無用、立憲民主黨人的諾言的虛偽、和沙皇制度妥協的不可能、農民和工人階級聯盟的必不可免，那末先鋒隊就會脫離工人階級，而工人

階級就會失去它和羣衆的聯系。如果沒有羣衆在杜馬時期的經驗，就不可能揭露立憲民主黨人，就不可能有無產階級的領導權。

召回主義策略的危險性就在於它會使先鋒隊脫離自己的千百萬人的後備軍。

如果無產階級當時跟着一九一七年四月號召舉行起義的『左派』共產主義者走，那末黨就會脫離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就會失去它在廣大的農民和士兵羣衆中的影響，因為當時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還沒有揭露自己是戰爭和帝國主義的擁護者，因為當時羣衆還沒有根據親身的經驗認清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關於和平、土地和自由的言論的虛偽。如果沒有羣衆在克倫斯基統治時期的經驗，就不會使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陷於孤立，就不可能有無產階級專政。因此，『耐心說明』各小資產階級政黨的錯誤並在蘇維埃內部進行公開鬥爭的策略是當時唯一正確的策略。

『左派』共產主義者策略的危險性就在於它會使黨由無產階級革命的領袖變成一小撮徒託空言而沒有基礎的陰謀家。

列寧說：『單靠先鋒隊是不能勝利的。當整個階級、當廣大羣衆還沒有站在直接援助先鋒隊的立場上，或者沒有站在至少對先鋒隊嚴守善意的中立……的立場上的時候，單把先鋒隊投入決戰，這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罪惡。而要真正使整個階級、真正使廣大的勞動羣衆和被資本壓迫的羣衆都站到這個立場上來，要做到這一點，單靠宣傳鼓動是不夠的。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有這些羣衆親身的政治經驗。這是所有的大革命的基本規律，這個規律現在不僅被俄國而且被德

國十分有力地 and 明顯地證實了。不僅文化水平低的和多半是不識字的俄國的羣衆，就連文化程度高的和個個識字的德國的羣衆，也必須親身體驗到第二國際騎士們的政府真是軟弱無力、毫無氣節、束手無策、向資產階級獻媚、卑鄙醜陋，親身體驗到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就必不可免地是極端反動派（俄國的科爾尼洛夫，德國的卡普^②及其同夥）的專政，然後才會堅決地轉向共產主義。（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十三頁）

第二、要在每個一定的時機找出事變過程鍊條上的特殊環節，抓住了這個環節，就能掌握整個鍊條，爲取得戰略勝利準備條件。

問題是要從擺在黨面前的許多任務中挑出一個當前任務，解決這個任務是中心，實現這個任務就能保證順利地解決其他一切當前任務。

我們可以用兩個例子來說明這個原理的意義，一個例子可以引自很久以前的時期（黨形成時期），另一個例子可以引自我們最接近的目前時期（新經濟政策時期）。

在黨形成的時期，無數的小組和組織還沒有彼此聯系起來，手工業方式和小組習氣從上到下腐蝕着黨，思想上的混亂是黨內生活的特徵，——在這個時期，整個鍊條中的基本環節和擺在黨面前的各項任務中的基本任務就是創辦全俄的秘密報紙（『火星報』）。爲什麼呢？因爲在當時的條件下，只有通過全俄的秘密報紙才能形成黨內意見一致的核心，才能把無數的小組和組織聯結成一個整體，準備思想統一和策略統一的條件，從而爲真正的黨的形成奠定基礎。

在由戰爭過渡到經濟建設的時期，工業遭到破壞的毒手而奄奄一息，農業苦於工業品的不足，國營工業和農民經濟的結合已經成為順利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條件，——在這個時期，事變過程鍊條中的基本環節，許多任務中的基本任務，就是發展商業。爲什麼呢？因爲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工業和農民經濟只有通過商業才能結合，因爲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有生產而沒有銷路就是致工業於死命；因爲只有通過發展商業去擴大銷路，才能擴展工業；因爲只有在商業方面鞏固了，只有掌握了商業，只有掌握了這個環節，才能指望把工業和農民市場結合起來並順利地解決其他的當前任務，以便爲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創造條件。

列寧說：「僅僅一般地做一個革命家和社會主義擁護者或共產主義者是不够的……必須善於在每個時機找出鍊條上的一個特殊環節，必須全力抓住這個環節，以便抓住整個鍊條並穩穩地準備過渡到下一個環節……」

『目前……這樣的環節就是在國家的正確調節（指導）下活躍國內商業。商業正是在歷史事件的鍊條中，即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過渡形式中……必須全力抓住的環節。』（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八十八頁、第八十九頁）保證有正確的策略指導的主要條件就是這樣。

（六）改良主義和革命主義。革命的策略和改良主義的策略有什麼區別呢？

有些人以爲列寧主義反對一切改良，反對一切通融和妥協。這是完全不對的。布爾什維克和其

他任何人一樣清楚地知道：在某種意義上說來，真是『凡施皆善』；在某種條件下，改良，其中包括通融和妥協，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列寧說：『爲推翻國際資產階級而進行的戰爭，要比國家之間的普通戰爭中最頑強的戰爭困難百倍，持久百倍，複雜百倍；要進行這樣的戰爭而在事前拒絕採用機動手段，拒絕利用敵人之間的利害矛盾（哪怕是暫時的矛盾），拒絕與各種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暫時的、不穩固的、動搖的、有條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協，這豈不是可笑到極點嗎？這豈不是正像我們想攀登一座艱難險阻、未經勘察、未通人跡的高山，却在事前拒絕迂迴前進，拒絕走回頭路，拒絕放棄已經選定的方向而嘗試採取各種不同的方向嗎？』（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五十一頁）

問題顯然不在於改良或通融和妥協，而在於怎樣運用改良和妥協。

在改良主義者看來，改良就是一切，而革命工作不過是拿來做談話資料、藉以轉移視線的小事情。所以，改良主義策略下的改良，在資產階級政權存在的條件下，必然要變爲鞏固資產階級政權的工具，變爲瓦解革命的工具。

相反地，在革命者看來，主要的是革命工作，而不是改良，——在革命者看來，改良是革命的副產品。所以，革命策略下的改良，在資產階級政權存在的條件下，自然會變爲瓦解資產階級政權的工具，變爲鞏固革命的工具，變爲向前發展革命運動的據點。

革命者採用改良，是爲了利用它作爲掛鉤來把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聯結起來，是爲了利用它作

爲掩蔽物來加強秘密工作，以便用革命精神準備羣衆去推翻資產階級。

在帝國主義條件下按革命精神利用改良和妥協的實質就在這裏。

相反地，改良主義者採用改良，是爲了拒絕任何秘密工作，破壞準備羣衆去進行革命的事業，在『恩賜的』改良的福蔭下高枕而臥。

改良主義策略的實質就在這裏。

關於帝國主義條件下的改良和妥協的問題就是這樣。

可是在帝國主義被推翻後，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情形就有些改變了。在某種條件下，在某種環境中，無產階級政權也許不得不暫時離開用革命手段改造現存制度的道路，而走上逐漸改造現存制度的道路，走上列寧在『論金子的作用』⁽²⁾這篇著名論文中所說的那條『改良主義的道路』，走上迂迴行進的道路，走上改良和向非無產者階級讓步的道路，以便瓦解這些階級，給革命以喘息時機，養精蓄銳，準備舉行新進攻的條件。不能否認，這條道路在某種意義上說來是『改良主義的』道路。只是應當記住，這裏有一個根本特點，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的改良是來自無產階級政權方面的改良，它鞏固無產階級政權，它給無產階級政權以必要的喘息時機，它的使命不是要瓦解革命，而是要瓦解非無產者階級。

於是，在這種情況下，改良就變成了自己的對立物。

無產階級政權所以能够實行這種政策，是因爲而且只是因爲前一時期的革命規模已十分廣大，

因而開闢了十分廣闊的場所，因而可以實行退却，用暫時退却的策略，用迂迴行進的策略來代替進攻的策略。

這樣看來，從前，在資產階級政權下，改良是革命的副產品，而現在，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改良的來源却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勝利品，即由這些勝利品構成的、積累在無產階級手中的後備力量。

列寧說：『只有馬克思主義才確切地正確地規定了改良和革命的關係，但是馬克思只能從一方面，即只能從無產階級還沒有在一個國家內取得稍微穩固、稍微持久的初次勝利的情況下看到這種關係。在這種情況下，正確關係的基礎就是把改良看做無產階級的革命階級鬥爭的副產品……當無產階級即使只是在一個國家內取得勝利以後，在改良和革命的關係方面就出現了一種新東西。在原則上仍然和以前一樣，但是在形式上已經發生一種馬克思本人所不能預見的變化，這種變化只有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和政治觀點才能了解……在勝利以後，當取得勝利的國家經過極度緊張的鬥爭，顯然沒有充分的力量來用革命手段實行這種或那種過渡的時候，它們（即改良。——斯大林註）（在國際範圍內仍舊是『副產品』）還是一種必要的和合理的喘息時機。勝利提供了很多「後備力量」，使我們即使在被迫退却時也能堅持下去，——無論在物質方面或精神方面都能堅持下去。』（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九十一頁至第九十二頁）

八 黨

在革命前的時期，在比較和平發展的時期，第二國際各黨是工人運動中的統治力量，議會鬥爭形式是基本的鬥爭形式，——在這種條件下，黨沒有而且不可能有它後來在公開的革命搏鬥的條件下所具有的那種重大的和決定的意義。考茨基在第二國際遭受攻擊時替它辯護說：第二國際各黨是和平的工具，不是戰爭的工具，正因為如此，它們在戰爭時期，在無產階級的革命發動時期，就沒有力量採取什麼重大措施。這是完全對的。但是這說明什麼呢？說明第二國際各黨對於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是不適用的，它們不是引導工人去奪取政權的無產階級的戰鬥的黨，而是遷就議會選舉和議會鬥爭的選舉機關。正因為如此，在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統治的時期，無產階級的基本政治組織並不是黨，而是議會黨團。大家知道，事實上黨在這個時期只是議會黨團的附屬品和服役者。幾乎用不着證明，在這樣的條件下，在這樣的黨的領導下，是談不到準備無產階級去進行革命的。

可是，新時期一到來，情形就根本改變了。新時期是公開的階級衝突的時期，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發動的時期，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期，是直接準備力量去推翻帝國主義而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時期。這個時期在無產階級面前提出種種新的任務：要按新的革命規範去改造黨的全部工作，要用奪取政權的革命鬥爭精神去教育工人，要準備後備軍並使他們跟上來，要和鄰國的無產者結成聯盟，要

同殖民地 and 附屬國的解放運動建立鞏固的聯系，如此等等。如果以爲這些新任務可以用那些在議會制度的和平條件下教育出來的舊社會民主黨的力量來解決，那就是使自己陷於絕望的境地，遭到必不可免的失敗。肩負着這樣的任務而仍然以舊的黨爲領導，那就是完全解除武裝。幾乎用不着證明，無產階級是不能容忍這種情形的。

因此，必須有新的黨，戰鬥的黨，革命的黨。這個黨要有充分的勇氣，能够引導無產者去奪取政權，這個黨要有充分的經驗，能够認清革命環境的複雜條件；這個黨要有充分的機智，能够繞過橫在前進道路上的一切暗礁。

沒有這樣的黨，就休想推翻帝國主義，就休想爭得無產階級專政。

這個新的黨就是列寧主義的黨。

這個新的黨有什麼特點呢？

(一)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黨首先應當是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黨應當把工人階級的一切優秀分子，把他們的經驗，他們的革命性，他們對無產階級事業無限忠誠的精神都吸收進來。但是要成爲真正的先進部隊，黨應當用革命理論，用運動規律的知識，用革命規律的知識把自己武裝起來。否則它就不能領導無產階級的鬥爭，就不能引導無產階級。如果黨只限於記錄工人階級羣衆的感覺和思想，如果它做了自發運動的尾巴，如果它不善於克服自發運動的因循習慣和政治上的漠不關心，如果它不善於超出無產階級的一時的利益，如果它不善於把羣衆的水平提高到認識無產階級的階級

利益，那末它就不能成爲真正的黨。黨應當站在工人階級的前面，應當比工人階級看得遠些，應當引導無產階級，而不應當做自發運動的尾巴。鼓吹『尾巴主義』的第二國際各黨是資產階級政策的傳播者，而這個政策是要把無產階級變成資產階級手中的工具。只有採取無產階級先進部隊的觀點，能够把羣衆的水平提高到認識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的黨才能使工人階級離開工聯主義的道路，使它變成獨立的政治力量。

黨是工人階級的政治領袖。

我在上面已經說到工人階級鬥爭的困難，說到鬥爭環境的複雜，說到戰略和策略，說到後備軍和機動性，說到進攻和退却。這些條件的複雜程度，和戰爭條件比較起來，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誰能認清這些條件呢？誰能給千百萬無產者羣衆以正確的方針呢？無論哪一個作戰部隊如果不願意遭到失敗，就非有經驗豐富的司令部不可。無產階級如果不願意讓自己受死敵的宰割，就更加非有這樣的司令部不可，這難道還不明顯嗎？可是這個司令部在什麼地方呢？只有無產階級的革命的黨才能成爲這樣的司令部。工人階級沒有革命的黨，就等於軍隊沒有司令部。

黨是無產階級的戰鬥司令部。

可是，黨不能僅僅是先進部隊。黨同時還應當是本階級的部隊，即本階級的一部分，黨應當和本階級有根深蒂固的聯系。只要階級還沒有消滅，只要無產階級還由其他階級出身的人來補充，只要工人階級還不可能全部提高到先進部隊的水平，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和其餘羣衆之間的區別，黨員和

非黨員之間的區別是不會消滅的。可是，如果這個區別變成了隔離，如果黨把自己關在小圈子裏而非黨羣衆脫離，那末黨就不成其爲黨了。如果黨不和非黨羣衆聯系，如果黨不和非黨羣衆結合，如果非黨羣衆不接受黨的領導，如果黨在羣衆中沒有精神和政治上的信用，那末黨就不能領導階級。

不久以前，我們黨從工人中接收了二十萬新黨員。這裏最值得注意的情況，就是這些人與其說是自己走進黨內來的，不如說是被其餘的一切非黨羣衆送進黨內來的，這些非黨羣衆積極參加了接收新黨員的工作，而且接收新黨員都是經過他們贊同的。這件事實說明：廣大的非黨工人羣衆把我們黨看做他們自己的黨，看做親近的、親切的黨，他們深切關心黨的發展和鞏固，他們自願把自己的命運託付給黨的領導。幾乎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這種看不見摸不到的精神上的綫索把黨和非黨羣衆聯系起來，黨是不能成爲本階級的決定力量的。

黨是工人階級的不可分離的部分。

列寧說：「我們是階級的黨，因此，幾乎整個階級（而在戰爭時期，在國內戰爭時代，甚至整個階級）都應當在我們黨的領導下行動，都應當盡量密切地接近我們黨；可是，如果以爲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在什麼時候，幾乎整個階級或整個階級都能提高到自己的先進部隊即自己的社會民主黨的覺悟程度和積極程度，那就是馬尼洛夫精神和「尾巴主義」。還沒有一個明白事理的社會民主黨人懷疑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連工會組織（比較原始、比較接近落後階層的覺悟程度的組織）也不能包括幾乎整個工人階級或整個工人階級。忘記先進部隊和傾向於它的一切羣衆

間的區別，忘記先進部隊的經常責任是把愈益廣大的階層提高，到這個先進的水平，那就只是欺騙自己，漠視我們的巨大任務，縮小這些任務。」（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七卷第二四〇頁）

（二）黨是工人階級的有組織的部隊。黨不僅是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如果黨想真正領導本階級的鬥爭，那末它同時還應當是本階級的有組織的部隊。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黨的任務是非常巨大的繁雜的。黨應當在國內外發展非常困難的條件下領導無產階級的鬥爭；黨應當在環境要求進攻時引導無產階級去進攻；黨應當在環境要求退却時帶領無產階級避開強大的敵人的打擊；黨應當向千百萬無組織的非黨工人羣衆灌注鬥爭的紀律性和計劃性、組織性和堅定性。可是，黨只有當它自己是紀律性和組織性的體現者的時候，只有當它自己是無產階級的有組織的部隊的時候，才能完成這些任務。沒有這些條件，就談不到黨對千百萬無產階級羣衆的真正領導。

黨是工人階級的有組織的部隊。

關於黨是有組織的整體這個思想，是在列寧所提出的我們黨章第一條的著名條文中固定下來的，這個條文把黨看做組織的總和，把黨員看做黨內某一組織的成員。孟什維克還在一九〇三年就反對這個條文，而提出了自行列入黨的『制度』，要求把黨員的『稱號』擴大到每個『教授』和『中學生』，每個『同情者』和『罷工者』，即擴大到每個給黨以某種援助，但是並不加入而且不願加入黨的任何一個組織的人。幾乎用不着證明，如果這個奇特的『制度』在我們黨內鞏固起來，那就必然會使黨內充滿教授和中學生，使黨變成一個界限模糊、沒有定形、組織渙散而沉沒在『同情者』大海中的

『機構』，抹殺黨和階級間的界限，拋棄黨的把無組織羣衆提高到先進部隊水平的任務。不用說，在這種機會主義的『制度』下，我們黨是不能夠在我們的革命進程中實現工人階級的組織核心的作用的。

列寧說：『從馬爾托夫同志的觀點看來，黨的界限是極不固定的，因為「每個罷工者」都可以「宣佈自己爲黨員」。界限不清有什麼益處呢？不過是使「稱號」廣泛散佈而已。它的害處在於能夠造成一種把黨和階級混爲一談的使組織渙散的思想。』（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七卷第二四六頁）

可是，黨不僅是黨的各個組織的總和。黨同時還是這些組織的統一的體系，是這些組織正式結成的統一的整體，有上級的和下級的領導機關，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有全體黨員所必須執行的實際決議。沒有這些條件，黨就不能成爲能夠有計劃有組織地領導工人階級鬥爭的統一的有組織的整體。

列寧說：『從前，我們黨還不是正式的有組織的整體，而只是各個集團的總和，所以在這些集團間除了思想影響以外，別的關係是不可能有的。現在，我們已經成爲有組織的黨，這也就是說，形成了一種權力，思想威信變成了權力威信，黨的下級機關應該服從黨的上級機關。』（同上，第三二八頁至第三三九頁）

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黨的工作由中央來領導的原則，往往引起那些不堅定的分子的攻擊，他們斥責這種原則是『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等等。幾乎用不着證明，如果不實行這些原則，那末作爲

一個整體的黨的有計劃的工作和對工人階級鬥爭的領導就會是不可能的。列寧主義在組織問題上是始終一貫地實行這些原則的。列寧把反對這些原則的行爲叫做『俄國的虛無主義』和『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認為這種行爲應該受到譏笑和痛斥。

列寧在他的『進一步，退兩步』一書中對於這些不堅定的分子是這樣說的：

『這個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是俄國的虛無主義者所特有的。黨的組織在他們看來是兇惡可怕的「工廠」，部分服從整體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在他們看來是「農奴制」……他們一聽見在中央領導之下實行分工，就發出可憐又可笑的號叫，反對把人們變成「小輪子和小螺絲釘」……他們一聽見有人提起黨的組織章程，就做出瞧不起人的嘴臉，發表鄙視的……意見，說完全不要章程也是可以的。』

『看來很明顯，高喊所謂官僚主義，不過是要掩蓋對中央機關人員的不滿，不過是要掩蓋……醜惡行爲。你是官僚主義者，因為你是代表大會不按照我的意見而違反我的意見委派的；你是形式主義者，因為你依據代表大會的形式上的決議，而不依據我的同意；你做事極端機械，因為你憑藉黨的代表大會的「機械的」多數，而不顧到我想補選進去的願望；你是專制君主，因為你不願意把權柄交給舊時的親熱伙伴①。』（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七卷第三六一頁和第三三

① 這裏所說的「伙伴」指阿克雪里羅得、馬爾托夫、波特列索夫等人，他們不服從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決議，而宣稱列寧犯了「官僚主義」的毛病。——斯大林

五百

(三)黨是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黨是工人階級的有組織的部隊。可是，黨並不是工人階級的唯一組織。無產階級還有其他許多為順利地進行反對資本的鬥爭所絕對必需的組織，如工會、合作社、工廠組織、議會黨團、非黨婦女團體、出版機關、文化教育組織、共青團、革命戰鬥組織（在公開的革命發動時期）以及作為國家組織形式的代表蘇維埃（當無產階級執掌政權時）等等。這些組織極大多數都是非黨的，其中只有某一部分直接接近黨或者是黨的支脈。所有這些組織，在某種條件下都是工人階級所絕對必需的，因為如果沒有這些組織，就不能鞏固無產階級在各種鬥爭中的階級陣地；因為如果沒有這些組織，就不能鍛鍊無產階級這個負有以社會主義制度代替資產階級制度的使命的力量。可是，既然有這樣多的組織，怎樣實現統一的領導呢？怎樣才能保證領導上不會因為有很多組織而發生各自為政的現象呢？有人會說，這些組織各在自己的特別範圍內進行工作，因此不會互相妨礙。這當然是對的。可是還有一點也是對的，即所有這些組織都應當按照一個方向進行工作，因為它們都是為一個階級，即為無產者階級服務的。試問：誰來決定這一切組織在進行工作時所必須遵循的路綫，即總方向呢？哪裏有這樣一個中央組織，它不僅因為有必要的經驗而能制定這條總路綫，並且因為有充分的威信而能推動這一切組織去實現這條路綫，以達到領導上的統一，排除發生不協調現象的可能呢？

這樣的組織就是無產階級的黨。

黨具備爲此所必需的一切條件，第一、因爲黨是工人階級優秀分子的集合點，這些分子和無產階級的非黨組織有直接聯系，並經常領導它們；第二、因爲黨既是工人階級優秀分子的集合點，所以它是培養能够領導本階級各種組織的工人階級領袖的最好的學校；第三、因爲黨既是培養工人階級領袖的最好的學校，所以按其經驗和威信來說，它是能把無產階級鬥爭的領導集中起來的唯一組織，因而也就是能把工人階級所有一切非黨組織都變成使黨跟本階級聯結起來的服務機關和引帶的唯一組織。

黨是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

這當然不是說，非黨組織，如工會、合作社等等，應該正式服從黨的領導。這只是說，參加這些組織的黨員，這些無疑是有威信的人，應該採取一切說服辦法，使這些非黨組織在自己的工作中跟無產階級政黨接近，並自願接受這個黨的政治領導。

正因爲如此，列寧說：黨是『無產者的階級聯合的最高形式』，它的政治領導應當普及到無產階級的其他各種組織中去。（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三十二頁）

正因爲如此，主張非黨組織『獨立』和『中立』的機會主義理論，繁殖出獨立的議員和脫離黨的出版家、狹隘的工會活動家和市儈化的合作社運動者的機會主義理論，是和列寧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完全不能相容的。

（四）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黨是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黨是無產者階級內部和無產者

階級各個組織中的主要的領導基礎。可是由此決不能得出結論說，可以把黨看做日的本身，看做至高無上的力量。黨不僅是無產者的階級聯合的最高形式，而且又是無產階級手中用來爭得專政（當無產階級還沒有爭得專政時）用來鞏固並擴大專政（當無產階級已經爭得專政時）的工具。如果政權問題沒有擺在無產階級的面前，如果帝國主義的條件、戰爭的不可避免以及危機的存在沒有要求把無產階級的一切力量集中到一點，把革命運動的一切綫索集中在一個地方，以便推翻資產階級而爭得無產階級專政，那末黨的作用就不能提得這樣高，黨就不能超過無產階級的其他一切組織。無產階級所以需要黨，首先因為黨是無產階級順利奪取政權所必需的戰鬥司令部。幾乎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一個能够把無產階級的羣衆組織集合在自己的周圍、在鬥爭進程中把整個運動的領導都集中起來的黨，那末俄國無產階級就不能實現自己的革命專政。

可是，無產階級所以需要黨，不僅是爲了爭得專政，而且更是爲了保持專政，爲了鞏固專政並擴大專政，以求取得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

列寧說：『大概現在幾乎任何人都已看得見，如果我們黨內沒有極嚴格的真正鐵一般的紀律，如果我們黨沒有得到工人階級全體羣衆即工人階級中所有一切有思想、誠實、奮不顧身、有威信、能引導或吸引落後階層的人最完全最忠誠的擁護，那末，布爾什維克就不僅不能把政權保持兩年半，甚至不能保持兩月半。』（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頁）

可是，『保持』和『擴大』專政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要向千百萬無產者羣衆灌注紀律性和

組織性；這就是說，要在無產者羣衆中間造成能够防禦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和小資產階級習慣勢力的腐蝕影響的屏障和堡壘；這就是說，要加強無產者在重新教育和改造小資產階層方面的組織工作；這就是說，要幫助無產者羣衆把自己教育成爲能够消滅階級並準備條件來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力量。可是，如果沒有一個因爲本身具有團結性和紀律性而强有力的黨，要做到這一切是不可能的。

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對舊社會勢力及其傳統進行頑強的鬥爭，進行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千百萬人的習慣力量是最可怕的力量。沒有在鬥爭中百鍊成鋼的黨，沒有受到本階級全體忠誠分子信任的黨，沒有善於注意羣衆情緒並善於影響羣衆情緒的黨，要順利地進行這樣的鬥爭是不可能的。』（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二十七頁）

無產階級所以需要黨，就是爲了爭得和保持專政。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

由此應該得出結論：隨着階級的消滅，隨着無產階級專政的消亡，黨也一定會消亡。

（五）黨是意志的統一，是和派別組織的存在不相容的。如果沒有一個因爲本身具有團結性和鐵的紀律而强有力的黨，要爭得和保持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沒有意志的統一，如果沒有全體黨員行動上的完全的和絕對的統一，黨內鐵的紀律是不可思議的。這當然不是說，因此就排斥了黨內爭論的可能。恰恰相反，鐵的紀律不是排斥黨內的批評和爭論，而是以此爲前提的。這更不是說，紀律應當是『盲目的』。恰恰相反，鐵的紀律不是排斥自覺自願的服從，而是以此爲前提的，因爲

只有自覺的紀律才能成爲真正鐵的紀律。可是，當爭論已經結束，批評已經完結，決議已經通過後，全體黨員意志的統一和行動的統一就是保證黨內統一和黨內鐵的紀律所絕對必需的條件。

列寧說：『在目前緊張的國內戰爭時代，共產黨只有按最集中的方式組織起來，只有有近乎軍事紀律的鐵的紀律，只有使黨的中央成爲擁有廣泛的權力，受到黨員普遍信任的權威機關，才能履行自己的職責。』（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八五頁）

在爭得專政以前的鬥爭條件下黨內紀律的問題就是這樣。

關於爭得專政以後的黨內紀律也應該這樣說，而且更應該這樣說。

列寧說：『誰只要稍微削弱無產階級政黨的鐵的紀律（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那他事實上就是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同上，第二十七頁）

由此應該得出結論：派別組織的存在，無論和黨內統一或黨內鐵的紀律都不能相容。幾乎用不着證明，有派別組織就會產生幾個中央，有幾個中央就是表明黨內沒有共同的中央，就是分散統一的意志，就是削弱和破壞紀律，就是削弱和破壞專政。第二國際各黨既然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不願意引導無產者去奪取政權，當然是可以容許派別組織自由這種自由主義的，因為它們根本就不需要鐵的紀律。可是，共產國際各黨既然把爭得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作爲自己工作的基礎，就不能容許『自由主義』，也不能容許派別組織自由。

黨是意志的統一，是排斥任何派別活動和黨內權力分散現象的。

因此，列寧『從保持黨內統一和實現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意志的統一是保證無產階級專政勝利的
基本條件這一觀點』來說明『派別活動的危險性』，這個說明已經載入我們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關
於黨的統一』的專門決議（三）中。

因此，列寧要求『徹底消滅任何派別活動』並『立即毫無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論按何種政綱組成的
集團』，否則就給以『立即無條件地開除出黨』的處分。（見『關於黨的統一』的決議）

（六）黨是靠清洗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分子而鞏固起來的。黨內的機會主義分子是黨內派別
活動的來源，無產階級並不是一個和外界隔絕的階級。農民、小市民、知識分子出身的那些因資本主
義的發展而無產階級化的人不斷地流入無產階級的隊伍。同時，無產階級上層分子又正在腐化，他
們多半是資產階級利用從殖民地得來的超額利潤所豢養的工會領袖和議員。列寧說：『這個按生活方
式、工資數額和整個世界觀說來已經完全市儈化的資產階級化的工人或「工人貴族」階層是第二國際
的主要支柱，而現在則是資產階級的主要社會（不是軍事）支柱。因為這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
真正走狗，是資本公司階級在工人中間的代理人……是改良主義和沙文主義的真正傳播者。』（見『列寧
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一八二頁）

所有這些小資產階級集團用種種方法鑽進黨內，把動搖和機會主義的情緒，把腐化和猶疑的情
緒帶到黨內來。他們是派別活動和瓦解現象的主要來源，是渙散黨和從內部破壞黨的現象的主要來
源。後方有這樣的『同盟者』而去和帝國主義者作戰，就會受到兩面夾攻，陷於腹背受敵的境地。因

此，對這種分子進行無情的鬥爭，把他們驅逐出黨，是順利進行反帝國主義鬥爭的先決條件。

主張用黨內思想鬥爭的方法來『戰勝』機會主義分子的理論，主張在一個黨的範圍內來『消除』機會主義分子的理論，是一種腐朽而危險的理論，它有使黨麻痺和害慢性病的危險，有使黨被機會主義宰制的危險，有使無產階級喪失革命政黨的危險，有使無產階級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喪失主要武器的危險。如果我們黨在自己的隊伍裏有馬爾托夫之流和唐恩之流、波特列索夫之流和阿克雪里維得之流，那末我們黨就不能走上大道，就不能取得政權和組織無產階級專政，就不能在國內戰爭中獲得勝利。如果說我們黨已經建立了自己內部的統一和自己隊伍的空前的團結，那末這首先是因為它及時清洗了機會主義的骯髒東西，從黨內驅逐了取消派和孟什維克。無產階級政黨發展和鞏固的道路就是把機會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社會帝國主義者和社會沙文主義者、社會愛國主義者和社會和平主義者從黨內清洗出去的道路。

黨是靠清洗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分子而鞏固起來的。

列寧說：『在自己的隊伍裏有改良主義者，有孟什維克，就不能在無產階級革命中取得勝利，就不能捍衛住無產階級革命。這在原則上是很明顯的。這是已經由俄國和匈牙利的經驗具體證實了的……在俄國有過很多次困難情況，當時如果讓孟什維克、改良主義者、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留在我們黨內，那末蘇維埃制度就一定會被推翻……大家都承認，意大利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爲了爭奪國家政權，就要進行決戰。在這樣的時機，不僅把孟什維克、改良主義者、屠拉

梯主義者驅逐出黨是絕對必要的，甚至把那些會動搖和正在動搖，要去和改良主義者「統一」的出色的共產黨員從各個重要崗位上撤下來，也可以說是有益的……在革命的前夜和在爲爭取革命的勝利而進行最激烈的鬥爭的時候，黨內最小的動搖都能葬送一切，都能破壞革命，都能使無產階級喪失政權，因爲這個政權還沒有鞏固，因爲對這個政權的攻擊還非常猛烈。如果動搖的領袖在這個時候滾開，那末這不會削弱而會加強黨，加強工人運動，加強革命。」（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三五七頁、第三五八頁、第三五九頁）

九 工作作風

這裏所指的不是文學作風。我指的是工作作風，是列寧主義實踐中能够造就特種類型的列寧主義工作者的那種很特殊的要素。列寧主義是理論的和實踐的學校，它能培養特種類型的黨的工作者和國家工作者，造成特殊的列寧主義的工作作風。

這種作風的特徵是什麼呢？它的特點是怎樣的呢？
它的特點有兩個：

（甲）俄國人的革命胆略；

（乙）美國人的求實精神。

列寧主義的作風就是黨的工作和國家工作中的這兩個特點的結合。

俄國人的革命胆略是消除因循習慣、守舊思想、保守主義、思想停滯以及對老舊傳統的盲從態度的藥劑。俄國人的革命胆略是一種振奮人心的力量，它能喚起思想，推動前進，破壞舊事物，開闢前途。沒有這種革命胆略，就一步也不能前進。

可是，如果不把俄國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國人在工作中的求實精神結合起來，那末它在實踐中就很可能墮落為空洞的『革命的』馬尼洛夫精神。這種墮落的例子是不勝枚舉的。誰不知道『革命的』臆造主義和『革命的』設計主義的病症的根源就是相信法令能安排一切和改造一切呢？有一位俄國作家伊·愛倫堡在他的『共產主義的完人』（完善的共產主義的人）這篇小說中描寫過一些患有這種病症的『布爾什維克』的典型，說他們立意擬定一個理想的完人的標準……結果竟在這個『工作』中『淹死了』。這篇小說雖然有過於誇大的地方，它正確地抓住了這種病症却是毫無疑義的。可是，誰都沒有像列寧那樣苛刻無情地譏笑過患有這種病症的人。他把這種迷信臆造主義和發號施令主義的病症鄙視為『共產黨員的驕誇』。

列寧說：『共產黨員的驕誇，就是說，參加了共產黨而還沒有被清洗出去的人妄想用共產黨員名義發號施令來解決自己的一切任務。』（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五十四頁）

列寧通常總是用日常平凡的事情來和這種『革命的』高調相對立，以此着重指出：『革命的』臆造主義是和真正列寧主義的精神與字句絕對相反的。

列寧說：『少說些漂亮話，多做些日常平凡的事情……』

『少唱些政治高調，多注意些極平凡的但是生動的……共產主義建設事實……』（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三九五頁和第三八六頁）

相反地，美國人的求實精神却是消除『革命的』馬尼洛夫精神和虛幻的臆造主義的藥劑。美國人的求實精神是一種不可遏止的力量，它不知道而且不承認有什麼阻礙，它以自己的求實的堅忍精神排除所有一切障礙，它一定要把已經開始的事情進行到底，哪怕這是一件不大的事情；沒有這種力量，就不可能有認真的建設工作。

可是，如果不把美國人的求實精神和俄國人的革命胆略結合起來，那末它就很可能墮落為狹隘的無原則的事務主義。誰不知道狹隘的實際主義和無原則的事務主義的病症往往使某些『布爾什維克』蛻化而脫離革命事業呢？勃·皮爾尼亞克的『荒涼年份』這篇小說反映過這種特殊的病症，描寫過某些俄國『布爾什維克』的典型，說他們充滿了意志和實踐的決心，『幹得』很『起勁』，可是看不見前途，不知道『幹工作』是爲了什麼，因而離開了革命工作的道路。誰都沒有像列寧那樣辛辣地譏笑過這種事務主義的病症。列寧把這種病症鄙視爲『狹隘的實際主義』，『無頭腦的事務主義』。他通常總是用生動的革命事業和我們全部日常工作中所必須具有的革命前途來和這種病症相對立，從而着重指出：無原則的事務主義，也同『革命的』臆造主義一樣，是和真正的列寧主義絕對相反的。

俄國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國人的求實精神結合起來，就是黨的工作和國家工作中的列寧主義的

實質。

只有把這兩者結合起來，我們才能有完整的列寧主義工作者的典型，列寧主義的工作作風。

載於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和三十日、五月九日、十一日、十四日、十五日和十八日「真理報」第九十六、第九十七、第一〇三、第一〇五、第一〇七、第一〇八和第一一一各號

① 俄土戰爭（一八七七——一八七八年）時，曾在巴爾幹的施普卡山隘進行激戰，當時俄軍司令部却發出戰報說：「在施普卡平靜無事。」——譯者註

② 卡普（一八六八——一九二二年）是德國一九二〇年反革命政變——「卡普行動」的主要領導者，政變後成為政府首領，他的政府僅存在數日即被德國工人的總罷工推翻。——譯者註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 （續）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

載於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
『真理報』第一一八號和第一一九號

中央委員會的組織報告

(五月二十四日)

同志們！一年來在國內和黨的周圍所形成的總的環境可以說是有利的環境。主要的事實是：國內經濟高漲，積極性普遍提高，特別是工人階級的積極性提高，黨的生活活躍。

問題歸結起來就是：一年來黨在利用這個環境來加強自己在周圍羣衆組織中的影響方面做得怎樣，黨在改善自己的成分、改善自己的整個工作、改善對負責工作人員的登記、分配和提拔方面做得怎樣，以及黨在改善自己組織的內部生活方面做得怎樣。

因此，我想談八個問題：

(甲) 圍繞在黨的周圍並把黨和本階級聯系起來的羣衆組織的狀況和共產黨在這些組織中的影響的增長；

(乙) 國家機關即各人民委員部的機關和實行經濟核算的機關以及下層蘇維埃機關的狀況和共產黨在這方面的影響的增長；

(丙) 黨的成分和爲紀念列寧而吸收黨員；

(丁)黨的領導機關的成分，黨的幹部和新黨員；

(戊)黨的宣傳鼓動工作、農村工作；

(己)黨在登記、分配和提拔黨員和非黨員負責工作人員方面的工作；

(庚)黨內生活；

(辛)結論。

我必須在下面舉出一些數字，因為沒有這些數字，報告將是不全面的和不能令人滿意的。同時應當預先說明，我不相信這些數字是絕對正確的，因為我們的統計工作很蹩腳，而這是因為，很遺憾，不是所有的蘇維埃統計人員都有起碼的職業榮譽感。

做了這個必要的說明之後，我來談談數字。

一、把黨和本階級聯系起來的羣衆組織

(甲)工會。根據統計材料，去年組織在工會裏的有四百八十萬人。今年有五百萬。人數無疑是增加了。如果拿十二個基本產業工會來看，拿在這些生產部門中工作的工人人數和有組織的人數來看，那末有組織的工人佔百分之九十二。在基本工業部門，組織在工會裏的工人佔整個工人階級的百分之九十一至九十二。這是工業方面的情況。

農業方面的情況就差了。農業工人約有八十萬，如果拿不在國營企業中工作的農業工人來看，那

末組織在工會裏的人數是百分之三。

至於共產黨在工會中的影響，這裏有省工會委員會和專區工會委員會主席的數字。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以前，地下黨員担任主席的佔百分之五十七強。在這次代表大會以前，只佔百分之三十五。減少了。但是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後入黨的人的百分數增加了。這是因為組織在工會裏的人數增加了，地下黨員不夠，幹部要靠新黨員來補充。在這些主席中，過去工人佔百分之五十五，現在佔百分之六十一。領導機關的社會成分改善了。

(乙)合作社。這方面的數字比其他任何方面更混亂，不能令人相信。消費合作社去年約有五百萬社員，今年就約有七百萬了。即使上帝讓我們天天過新年，我也不相信這些數字，因為消費合作社還沒有完全實行自願原則，這裏無疑有死魂靈。農業合作社去年似乎有二百萬社員（可是去年我從農業合作社總社得到的數字是四百萬社員），今年却只有一百五十萬了。組織在農業合作社裏的人數減少了，這是毫無疑問的。在消費合作社中央的領導機關中，黨員去年佔百分之八十七，現在佔百分之八十六。減少了。在省社和區社中，共產黨員過去佔百分之六十八，現在佔百分之八十六。影響加強了。但是，如果提出的不是關於『領導』機關的問題，而是關於真正担任領導工作的負責工作人員的問題，那末在所有一切負責工作人員中間，共產黨員只佔百分之二十六。這個數字我認為是比較確實的。農業合作社領導機關中的黨員數字，去年是百分之四十六，今年是百分之五十五。如果再深入一步，拿担任負責工作的領導人員來看，那末其中共產黨員只佔百分之十三。

請看我們的某些統計人員多麼會裝飾門面，裝飾外表，把腐朽的東西遮蓋起來。

(丙)共青團。團員和候補團員數去年是三十一萬七千（可是我在俄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簽署的去年的數字材料上看到的是四十萬），今年是五十七萬。儘管數字有些出入，加入共青團的人數增加了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在俄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工人去年佔百分之三十四，今年佔百分之四十一；農民去年佔百分之四十二，今年佔百分之四十。工廠藝徒學校的學生去年是五萬人，今年是四萬七千人。俄共（布）黨員在整個共青團中的人數去年大約是百分之十，今年是百分之十一。增加也是毫無疑問的。

(丁)女工和農婦的團體。這方面的主要組織是代表大會。這裏的混亂數字要多少有多少，簡直太多了。但是，如果好好地清理一下，那就可以看出，城市中去年有三萬七千名代表，今年有四萬六千名，就是說，比去年多了一些。農村中去年有五萬八千名代表，現在有十萬名。這些代表所團結的廣大的農婦和女工羣衆有多少，這方面我沒有得到稍微準確的數字。

由於吸收女工和農婦參加蘇維埃工作和黨的工作的問題特別重要，研究一下女工和農婦參加工會機關、蘇維埃、黨的省委員會和縣委員會的百分數不會是多餘的。在村蘇維埃中，婦女去年大約只佔百分之一（少得可怕），今年佔百分之二點九（還是太少），但是總算增加了。在鄉執行委員會中，婦女去年佔百分之零點三，今年佔百分之零點五，增加得太少了，簡直不值得提。在縣執行委員會中，婦女去年約佔百分之二，今年比百分之二多了一點（我提出的是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

國的數字，因為我沒有所有共和國的數字）。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和省執行委員會中，婦女去年佔百分之二強，現在佔百分之三強。在工會會員中，今年婦女佔百分之二十六，沒有去年的材料。在工廠委員會中，婦女佔百分之十四。在省工會委員會中，婦女佔百分之六，在各工會中央委員會中，婦女佔百分之四強。在黨內，婦女去年約佔百分之八，現在約佔百分之九。在候補黨員中，婦女過去約佔百分之九，現在約佔百分之十一。這一切都是為紀念列寧而吸收黨員以前的情況。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以前，在省委員會中，婦女佔百分之三，在縣委員會中，婦女約佔百分之六。在最重要的婦女團體中，即在代表大會中，共產黨員過去佔百分之十，現在佔百分之八。減少的原因是非黨員代表數增加了。必須承認，佔我們蘇聯人口半數的婦女仍然站在蘇維埃建設和黨的建設的大道旁邊，或者幾乎站在旁邊。

（戊）軍隊。在陸軍、軍事學校和海軍中，共產黨員的總數從六萬一千名減少到五萬二千名。這是一個必須消除的缺點。同時黨員指揮人員的總數却增加了。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以前，共產黨員在指揮人員中佔百分之十三，現在佔百分之十八。從黨齡來看軍隊中的黨員是很有意思的。在軍隊中工作的五萬二千名共產黨員中，地下黨員佔百分之零點九，不到百分之一；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後到十月入黨的佔百分之三強；一九一九年以前入黨的佔百分之十一；一九一九年入黨的佔百分之二十二；一九二〇年入黨的佔百分之二十三；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入黨的佔百分之二十。你們可以看出，在我們軍隊中服務的即使不完全是新黨員，也主要是新黨員。

(己)社會發起的自願組織。引人注意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即今年出現了一種新型的組織——自願的組織，社會發起的組織：各種文化教育小組和團體、體育組織、協會、工人通訊員和農民通訊員的組織等等。這些組織的數目不斷增加，同時應當指出，其中不僅有同情蘇維埃政權的組織，而且也有敵視蘇維埃政權的組織。就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來說，這種社會發起的組織去年約有七十八個至八十個，今年超過了三百個。拿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體育組織來說，這個組織的會員去年是十二萬六千名，今年是三十七萬五千名。這個組織的社會成分如下：工人去年佔百分之三十五，現在佔百分之四十二。這些組織的基本核心是工廠委員會和工廠俱樂部以及農村中的農民互助委員會(註)。引人注意的是工人通訊員和農村通訊員的組織，這些組織的目的是要成為無產階級輿論的表達者。工人通訊員組織擁有二萬五千人，農村通訊員組織擁有五千人。如果看一看這些組織的省機關的成分，那就可以看出，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共產黨員去年佔百分之十九，今年佔百分之二十九強。最後，不能不提到昨天在列寧墓前舉行慶祝遊行(註)的新組織，即少先隊組織。根據我們的統計材料(我已經說過，我們的統計工作有點蹩腳)，少先隊組織的人數在去年六月以前是七萬五千人，在今年四月以前已經超過十六萬一千人。在工業省份的少先隊員中，工人子弟佔百分之七十一，農民子弟佔百分之七。在民族區域的少先隊組織中，工人子弟佔百分之三十八。在農業省份，工人子弟佔百分之三十六。

圍繞在黨周圍並把黨和本階級聯系起來的羣衆組織的情況就是這樣。大體上說來，黨在這些組

織中的影響增長了，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二、國家機關

(甲)職員人數。根據統計材料，各人民委員部的職員，即列入國家預算的機關的職員，去年有一百五十多萬人，今年似乎剩下一百二十萬人了。減少了三十萬人。但是，如果看一看實行經濟核算的機關，那就可以看到，今年我們在這方面大約減少了二十萬人（沒有去年的數字），就是說，在減少職員方面，我們在列入國家預算的機關中取得了成績，而在實行經濟核算的機關中遭到了很大的失敗。至於一部分職員轉入地方預算，就是說沒有算入上面的數字，我就不談了。職員的人數大體上沒有改變，也許還增加了。此外，合作社的職員去年是十萬零三千人，現在是十二萬五千人，增加了；工會的職員過去是二萬八千人，現在是二萬七千人，黨機關的職員過去是二萬六千人，現在是二萬三千人。不算列入地方預算的職員，總共有一百五十七萬五千人。可見現在還沒有根據來談減少一般職員，特別是減少國家機關職員的成績。

(乙)國家高級機關的黨員數。就高級機關的人員、各委員會的人員、各主要部門的領導人員及其助手（工業除外）來說，一九二三年共產黨員佔百分之八十三，今年佔百分之八十六。如果同兩年前的情況比較，無疑是有某些進步的。在這些領導機關中，工人去年佔百分之十九，今年佔百分之二十一。很少，但是總算增加了。

(丙) 工業機關的黨員數。至於工業機關、托拉斯、辛迪加和最大的企業，它們的情況如下：在蘇聯托拉斯的全部機關中，共產黨員去年佔百分之六強，今年佔百分之十強。在托拉斯、辛迪加和最大的企業的領導機關中，共產黨員去年佔百分之四十七強，今年佔百分之五十二強。如果拿最大的企業的經理來說，共產黨員去年佔百分之三十一，今年佔百分之六十一。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托拉斯的全部機關中，共產黨員過去佔百分之九點五，今年佔百分之十二強（將近百分之十三）。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托拉斯的領導人員中，共產黨員過去佔百分之三十七，現在佔百分之四十九。在辛迪加的全部機關中，共產黨員去年佔百分之九，今年佔百分之十。在辛迪加的領導人員中，共產黨員過去佔百分之四十二，現在佔百分之五十五。

總之，必須承認，如果拿經濟機關的領導人員來說，共產黨員約佔百分之四十八至五十。

(丁) 商業和信用機關的黨員數。目前在我國整個經濟中具有特別意義的我國商業和信用機關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例如拿在我們整個發展中具有極重要的意義的國內商業人民委員部來說吧。在最近改組以前，在那裏的中央機關的領導人員中，共產黨員只佔百分之四。拿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最重要的機關——國家進出口貿易局來看，在那裏的負責工作人員中，共產黨員只佔百分之十九；而這是一些什麼共產黨員呢，根據國家進出口貿易局中央機關內的共產黨員百分之百被清洗了這個事實，你們就可以判斷了。（笑聲）在整個經濟中具有重大意義的第二個重要機關——糧食公司的情況如下：不算中央機關和派駐在分公司的正副全權代表，糧食公司的五十八個分公司共有九千九百名

工作人員。其中共產黨員佔百分之五點九，俄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員佔百分之零點七，其餘的是非黨羣衆。在和農民最接近的機關中，即在穀物收集站中，在一切輔助採購站和代購員中，共產黨員只佔百分之十七。在糧食公司的中央機關中，負責工作人員有一百三十七人，其中俄共（布）黨員是十三人，佔百分之九。應當指出，在糧食公司中，黨員的使用極不合理，其中只有百分之二十担任負責工作，而其餘的百分之八十則是下級職員。像國家銀行這種信用機關的情況也並不好些。這是在我們整個經濟生活中具有重大意義的最重要的信用機關。你們知道信貸的力量，這是一種可以用來（只要發放優惠貸款就行）使任何一個居民階層破產或上升的力量。正是在這個國家銀行的全部機關中，共產黨員只佔百分之七，在領導人員中間只佔百分之十二，而國家銀行却決定着許多企業和很多經濟機關的命運。

（戊）蘇維埃的黨員數。這裏有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材料。在村蘇維埃中，共產黨員去年約佔百分之六，現在達到百分之七強。在鄉執行委員會中，共產黨員過去佔百分之三十九強，現在達到百分之四十八。在縣執行委員會中，共產黨員過去佔百分之八十強，現在達到百分之八十七強。在縣轄市的市蘇維埃中，共產黨員過去佔百分之六十一，現在減少到百分之五十八。在省執行委員會中，共產黨員過去佔百分之九十，現在佔百分之八十九。在省轄市的市蘇維埃中，共產黨員過去佔百分之七十八，現在佔百分之七十一。在後面這三種蘇維埃中，即在縣轄市的市蘇維埃、省執行委員會和省轄市的市蘇維埃中，非黨羣衆的影響不大，但是畢竟在增長着。至於省執行委員會全

會，這裏有六十九個省的材料，上面有關於二千六百二十三個工作人員的統計數字。這些數字說明什麼呢？說明非黨羣衆在省執行委員會全會中約佔百分之十一。非黨羣衆百分數最高的是西伯利亞和遠東區域，那裏非黨羣衆佔百分之二十。至於各民族共和國，那裏非黨羣衆佔百分之七。這是非黨羣衆在省執行委員會中所佔的最低的百分數。而這是民族共和國的情況，一般說來，那裏黨員很少！

三、黨員成分。爲紀念列寧而吸收黨員

(甲)人數。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以前，我們的黨員和候補黨員共計有四十八萬五千餘名。現在，不算爲紀念列寧而吸收的黨員，共計有黨員四十七萬二千名。加上爲紀念列寧而吸收的黨員，拿五月一日的材料（到這一天已經接收了十二萬八千人）來看，可以肯定我們的黨員有六十萬人。假定再過兩星期左右，爲紀念列寧而吸收的黨員至少有二十萬人，那就可以肯定黨員總數爲六十七萬至六十八萬人。

(乙)黨員的社會成分。工人去年佔百分之四十四點九，今年佔百分之四十五點七五（爲紀念列寧而吸收的黨員不算在內），增加了百分之零點八。農民過去佔百分之二十五點七，現在佔百分之二十四點六，即減少了百分之一點一。職員及其他成分過去佔百分之二十九強，現在佔百分之二十九多一點，即增加了不多。加上到五月一日爲紀念列寧而吸收的黨員，在俄共（布）黨員和候補黨員中，工人佔百分之五十五點四，農民佔百分之二十三，職員及其他成分佔百分之二十一點六。

(丙)黨員的黨齡。一九〇五年以前入黨的去年是百分之零點七，現在是百分之零點六。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六年入黨的去年是百分之二，現在仍然是百分之二。一九一七年入黨的過去是百分之九強，現在比百分之九稍微弱一些。一九一八年入黨的過去是百分之十六點五，現在是百分之十五點七。一九二〇年入黨的過去是百分之三十一點五，現在是百分之三十點四。一九二一年入黨的過去是百分之十點五，現在是百分之十點一。一九二二年入黨的（沒有當年的數字）現在是百分之三點二。一九二三年入黨的是百分之二點三。所有這些數字都沒有把爲紀念列寧而吸收的黨員計算在內。

(丁)民族成分和性別。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召開前，大俄羅斯人在黨內佔百分之七十二，在爲紀念列寧而吸收黨員以後，百分數顯然還會增加。第二位是烏克蘭人，佔百分之五點八八。第三位是猶太人，佔百分之五點二。其次是突厥語系各民族，佔百分之四強。再其次是其他民族，如拉脫維亞人、格魯吉亞人、阿爾明尼亞人等等。女黨員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以前佔百分之七點八，現在是百分之八點八。女候補黨員過去佔百分之九，現在是百分之十點五。在爲紀念列寧而吸收的黨員中，婦女佔總數的百分之十三，這稍微增加了上述婦女的百分數。

最後，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以前，產業工人黨員（黨員和候補黨員）佔百分之十七，加上爲紀念列寧而吸收的黨員（以十二萬八千人計算），則佔百分之三十五點三。

(戊)工人階級中的黨員數。如果計算一下我們黨內的工人黨員總數，就是說，計算一下五月一日以前的數目和再過兩星期左右爲紀念列寧而吸收的黨員總數將達到（大概還會超過）二十萬人的

那個數目，那末我們黨內的工人黨員總數將是黨員總數六十七萬二千人中的四十一萬。這個數字佔蘇聯工業和農業無產階級總人數四百一十萬的百分之十。

我們達到了每一百個工人中有十個黨員。

四、黨的領導機關的成分。幹部和新黨員

(甲) 地方機關的成員。我拿四十五個省委員會和區域委員會的全會來說。在省委員會和區域委員會全會中，地下黨員佔百分之三十二強，其餘百分之六十七是入黨較晚的：一九一七年入黨的佔百分之二十三，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入黨的佔百分之三十三，一九二〇年入黨的佔百分之九。在地方領導機關中，即在省委員會和區域委員會中，佔多數的不是地下黨員，而是十月革命以後入黨的黨員。拿五十二個省委員會和區域委員會的主席團來說（這裏有這些組織的黨齡材料），在革命前入黨的佔百分之四十九，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後入黨的佔百分之十九，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入黨的佔百分之二十六，其餘的佔百分之六。在這裏，二月以後加入我們黨的黨員還是佔多數。担任省委員會和區域委員會組織部長的地下黨員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以前佔百分之二十七點四，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以前佔百分之三十；担任宣傳鼓動部長的地下黨員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以前佔百分之三十一，現在佔百分之二十三。至於省委員會和區域委員會的書記，我們可以看到相反的趨向。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以前，地下黨員在省委員會和區域委員會的書記中佔百分之六十二點五，在這次代表大會

以前則佔百分之七十一。

任務很清楚：應當降低省委書記的黨齡條件。

六十七個縣的縣委員會全會的成員如下：地下黨員佔百分之十二；一九一七年入黨的佔百分之二十二；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入黨的佔百分之四十三。根據二百四十八個縣的材料，在我們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以前，縣委書記中地下黨員佔百分之二十五，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前）入黨的佔百分之二十七，一九一九年以前入黨的佔百分之三十七。二十八個省的支部書記（有六千五百四十一個書記的材料）中地下黨員只佔百分之三強，大部分——百分之五十五是在十月革命以後，即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入黨的。

根據四十五個省委員會和區域委員會的社會成分來看，工人今年佔百分之四十八。在五十二個省委員會和區域委員會的主席團中，工人佔百分之四十一。在省委員會和區域委員會的書記中，工人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以前佔百分之四十四點六，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以前佔百分之四十八點六。在六十七個縣的縣委員會全會中，工人佔百分之六十三點四。在二百四十八個縣的縣委書記中，工人佔百分之五十。

所有這些都是最近召開的省和縣的黨代表會議以前的材料。

但是在這次黨的代表大會以前，我收到了若干關於最近召開的一些代表會議的結果的材料。這些有關十一個省和十六個區域的材料表明：在省委員會全會和區域委員會全會中的地下黨員數減少

到百分之二十七，工人數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三。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現在有兩種趨向：一方面是提拔新黨員做幹部並擴大幹部的隊伍，另一方面是改善黨組織的社會成分。

(乙) 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成分。拿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共有五十六人）來看，其中工人佔百分之四十四點六，農民和知識分子佔百分之五十五點三。因此，必須增加工人成分來擴大中央委員會。在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委員和候補委員中，工人佔百分之四十八，農民和知識分子佔百分之五十二。這裏也得出同樣的結論。按黨齡來看，地下黨員在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佔百分之九十六。所有這些人都是在二月以前入黨的。五十六個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只有兩個人是入黨較晚的，佔百分之四。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情況也是這樣。在六十個人中，有五十七個地下黨員，三個非地下黨員（佔百分之五）。因此，應當增加新黨員。

(丙) 這次代表大會的成分。共計有七百四十二名代表。其中工人佔百分之六十三點二，地下黨員佔百分之四十八點四。其餘都是入黨較晚的黨員。

五、黨的宣傳鼓動工作

(甲) 共產主義教育。黨內政治文盲的百分數大得惹人注目：某些省的政治文盲竟達百分之七十。俄羅斯中部某些省的政治文盲平均佔百分之五十七（調查了六萬人）；去年約佔百分之六十。這

是我們工作中的主要缺點之一。顯然，工作進行得與其說是深入，不如說是廣泛。蘇維埃和黨務幹部學校的數目，確切些說，蘇維埃和黨務幹部學校的學員數目，由於一部分蘇維埃和黨務幹部學校轉入地方預算而減少了一些。共產主義大學的學生數比去年增加了。但是爲了按現有的經費來改善學生的物質生活狀況和盡力加強共產主義教育，必須把學生減少一些。特別應該強調列寧主義的宣傳，因爲這種宣傳在共產主義教育方面具有決定意義。

(乙)報刊。我國報紙去年有五百六十種，今年減少到四百九十五種，但是發行份數却從一百五十萬份增加到二百五十萬份。非俄羅斯文報紙的增加是值得注意的。有些共和國連一份俄文報紙也不出版，例如阿爾明尼亞，那裏百分之百的報紙都是用阿爾明尼亞文出版的。格魯吉亞有百分之九十一的報紙是用格魯吉亞文出版的。白俄羅斯有百分之八十八的報紙是用非俄羅斯文出版的。可以說在所有的民族區域和民族共和國內，民族報紙的數目都增加了。應當注意我們定期機關刊物編輯部的成分。調查了二百八十七個報刊機關，發現在這些報刊機關中地下黨員担任編輯的只佔百分之十。爲數最多的是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入黨的黨員。這是一個缺陷，應當派老的更有經驗的報刊工作人員去幫助年輕的報刊工作人員，消除這個缺陷。

(丙)農民工作。這方面有許多缺點。村和鄉的蘇維埃目前還是稅務機構的機關。農民首先把它們看做收稅的機關。根據了解農村的工作人員的一般反應，農村地方機關的工作是這樣：我們的政策是正確的，但是地方上執行得不正確。村和鄉的蘇維埃機關的人員缺點很多。農村支部的行政工

作人員對工作發生不好的影響。發生更壞的影響的是接近農村的工作人員不懂蘇維埃法律，不會向貧農解釋這些法律，不會根據蘇維埃法律，根據蘇維埃法律給予貧農的優待來維護貧農和中農的利益，反對富農的橫霸勢力。其次，一般的錯誤是：人們只想從口頭鼓動方面去接近農民，不了解農民需要的是實物鼓動，而不是口頭鼓動，需要的是提供直接利益的鼓動。吸收收入合作社，對貧農實行優待，農業貸款，農民互助委員會組織的互助，——這些就是最能使農民關心的問題。

六、黨在登記、分配和提拔工作人員方面的工作

(甲)登記和分配。去年登記的負責工作人員約有五千名，今年我們登記的各級負責工作人員約有一萬五千名。我們的登記工作改善了，這是毫無疑問的。數字表明，去年分配了一萬名各種工作人員，其中負責工作人員有四千多名。今年分配了六千名，其中負責工作人員有四千名。過去黨在分配方面的主要工作中心是：首先把工作人員供給黨，其次供給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各機關，最後供給財政人民委員部各機關，主要是它的稅務機關。供給其餘一切工作部門的共產黨員為數極少。這是在我們工作中的很大的錯誤。當經濟生活的中心轉到商業的時候，我們在轉而以最積極的工作人員大量供給商業和信用機關及其地方和國外代表機關方面表現得不够主動，不够堅決。我指的特別是國家進出口貿易局和糧食公司這樣的機關。

七、黨內生活

我不想列舉中央委員會和它的機關處理了多少問題和哪幾類問題，因為這沒有重大意義，並且在分發給你們的書面報告中已經講到了。我只想請你們注意下述情況。

第一、我們組織的內部生活無疑是改善了。現在得到的印象是：各組織安定了，爭吵少了，實際工作在進行。在邊疆地區有例外情況，那裏除了對共產主義不很堅定的老工作人員，進過斯維爾德洛夫大學和其他學校的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工作人員正在成長，他們在黨的工作方面很強，在蘇維埃工作方面却非常弱。邊疆地區的這些年輕工作人員和老工作人員之間的衝突是不會很快就消除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邊疆地區是例外。至於俄羅斯中部的多數省份，可以說那裏的組織已經安定了，實際工作向前進展了。我們在上次代表大會上講得那裏多的最愛爭吵的共和國——格魯吉亞，現在在黨內關係上已經和睦了。過去的傾向分子中的優秀人物，如菲力浦·馬哈拉澤和奧庫札夫，已經徹底同極端的傾向分子斷絕關係，並聲明有決心同心協力地進行工作。

第二、在這一年裏，在省委員會特別是黨中央委員會中，工作重心由常務局或主席團移到全會了。以前中央全會轉託政治局解決基本問題。現在已經不是這樣了。現在我們政策和我國經濟的基本問題由全會解決。你們看一看我們全會的日程和分發給各省委的速記稿，就會知道重心由政治局和組織局移到全會了。從下面的意義上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在我們的全會上聚集了一百至一百

二十人（這些人是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委員和候補委員），由於重心移到了全會，全會就變成了培養工人階級的領袖即工人階級的政治領導者的最大的學校。新的人材，工人階級明天的領導者在我們眼前成長壯大起來，——我們擴大全會的不可估量的重要性就在這裏。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上也出現了這種趨向。最重要的問題由省委員會常務局轉到全會，全會擴大了，全會會議的時間更長了，全會會議吸收了省的所有的優秀工作人員，省委員會全會因而變成了培養地方和區域的領導者的學校。必須使地方即省和縣的這個趨向變成事實。

第三、在這一年裏，我們黨的內部生活空前熱烈，可以說是沸騰的。我們布爾什維克已經習慣於處理大事情，因而往往在完成極巨大的事業時看不到它的偉大。用不着證明，像爭論和為紀念列寧而吸收黨員這樣的事實是國內和黨內的最大的事件，這些事件當然不能不使黨內生活活躍起來。

這兩個事實說明什麼呢？說明我們黨經過了爭論，現在已經堅如磐石。說明我們黨既然按照整個工人階級的意志並得到他們的贊同接收了二十萬新黨員，它實質上就是工人階級選舉出來的黨，工人階級選舉出來的機關。

八、結 論

一、在圍繞着我們黨的羣衆組織中，應當特別注意合作社、女工和農婦的團體。我所以提出這些組織，是因為這些組織在目前最令人耽心。

(甲)毫無疑問，消費合作社機關沒有很好地完成自己的把國營工業和農民經濟聯系起來的使命。農民社員在消費合作社社員總數中只佔三分之一，這個明顯的事實說明了這一點。應該使農民在消費合作社中佔應有的地位。共產黨員必須把工作中心從省移到縣和區，以便同農民羣衆建立聯系，從而把消費合作社變成聯系工業和農民經濟的環節。

(乙)農業合作社的情況並不好些。數字混亂，一年來社員數減少了，——這都是必須加以考慮的事實。在這裏，也同在消費合作社一樣，共產黨員應當把重心移到縣和區——更接近農民羣衆，抱定目的使農業合作社總社的地方機關不致成爲富農橫霸勢力的掩護所。但是這還不够。應當用共產黨員的力量來加強農業合作社總社的領導機關，因爲那裏的情況最近已經開始大大惡化了。

(丙)婦女工作方面的情況更壞。固然，女工和農婦的代表大會正在增多和擴大，但是，婦女運動的工作人員在鼓動方面取得的成績還遠沒有在組織方面鞏固起來，連必要的最低限度的百分之一都沒有鞏固起來。女工和農婦參加蘇維埃、工會和黨的百分數明顯地證明了這一點。黨應當採取一切辦法在最近的將來彌補這個缺陷。蘇聯居民的半數仍然站在蘇維埃和黨的發展大道的旁邊，這種情況是不能容忍的。

(丁)社會發起的自願組織，尤其是工人通訊員和農村通訊員的組織，特別引人注意。工人通訊員和農村通訊員的組織有很大的前途。在一定的發展條件下，這些組織能够起無產階級輿論的意志的最偉大的表達者和強有力的傳播者的作用。你們知道無產階級輿論在揭發和糾正我們蘇維埃社會

的缺點方面的力量，這個力量比行政壓力的力量大得多。正因為如此，黨應當盡力幫助這些組織。

二、國家機關的情況特別引人注意。這方面不能令人滿意的情況是無可懷疑的。

(甲)列寧的關於精簡國家機關的遺訓只執行了一部分，執行了一點點。各人民委員部機關減少了二三十萬職員，可是另一方面新的機關——托拉斯、辛迪加以及其他機關增加了，老實說，這不能叫做精簡機關。黨應當採取一切辦法，以堅定的手段使列寧在這方面的遺訓得以實現。

(乙)我向你們列舉了一些數字，說明非黨羣衆參加我們蘇維埃的百分數非常低。同志們，再這樣下去是不行的，再這樣建設新國家是不可能的。不特別注意吸收非黨羣衆參加省和縣的蘇維埃工作，進行巨大的建設工作是不可能的。這裏可以指出各種方法。下面是一個合適的可以採用的方法：在省和縣的蘇維埃的各部門下面設立一些小組，更好的是定期召開非黨羣衆——城市的工人，縣的農民的業務會議，以便吸收非黨羣衆參加各個管理部門的業務工作，然後再從被吸收參加業務工作的非黨工人和農民中挑選優秀的最有能力的人，派他們擔任國家工作。不這樣擴大市和縣的蘇維埃的基礎，不擴大蘇維埃工作的基礎，不吸收非黨羣衆，蘇維埃就會大大喪失自己的威信和影響。

(丙)我們黨內有一種見解，認為省委員會、區域委員會、縣委員會和支部的工作才是真正的黨的工作。至於其他各種工作，好像都不是純粹的黨的工作。人們常常譏笑那些在托拉斯和辛迪加工作的人：『他們同黨脫離了。』(有人喊道：『他們還受到清洗。』)無論在經濟機關或在黨組織裏，都必須清洗某些同志。但是我講的不是特殊情況，而是帶有普遍性的情況。在我們這裏通常把黨的工作分

成兩類：高級的，這是省委員會、區域委員會、支部、中央委員會的純粹的黨的工作；低級的，帶引號的所謂黨的工作，這是一切蘇維埃機關特別是商業機關的工作。同志們！這種對待經濟工作人員的態度是極端違反列寧主義的。在最討厭的店舖裏，在最討厭的商業機關裏工作的每一個經濟工作人員，只要他是在建設並推動事業前進，他就是真正的黨的工作人員，應當受到黨的全力支持。如果對商業採取這種老爺式的知識分子的態度，我們的建設事業就一步也不能前進。不久以前我在斯維爾德洛夫大學做過一次演講，我說也許我們必須從黨的方面或者工業方面調一萬來個共產黨員到商業工作方面去。他們哈哈大笑。不願意搞商業！可是很明顯，如果我們不在黨內根除對商業的老爺式的知識分子的偏見，如果我們共產黨員不掌握所有的商業部門，那末我們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切言論就有變成空談的危險。

(丁) 同志們：任何建設工作，任何國家工作，任何計劃工作，沒有正確的計算是不可想像的。而沒有統計，計算是不可想像的。沒有統計，計算就一步也不能前進。不久以前李可夫在代表會議上說，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他們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裏有一個統計人員，他今天對一個問題提出一種數字，明天對同一個問題又提出另一種數字。可惜這樣的統計人員在我們這裏還沒有絕跡。整體的各個部門是互相腳接的環節，如果有一個環節弄壞了，那末整個工作就會有搞壞的危險，統計工作就是這樣。在資產階級國家裏，統計人員具有某種起碼的職業榮譽感。他不會撒謊。他可能有某種政治信念和政治傾向，但是涉及事實，即涉及數字，他寧可犧牲自己，不說假話。這樣的資產階級統計人

員，尊重自己並具有某種起碼的職業榮譽感的人，我們最好盡量多一些！如果我們不這樣組織統計工作，那末我們的建設工作就不能前進一步。

關於報表，也必須這樣說。任何經濟工作沒有報表就不能前進。可是遺憾得很，我們的會計員不總是具有普通資產階級的誠實會計員的那種起碼的長處。我尊重他們之中的某些會計員，在他們中間有誠實的忠心耿耿的工作人員，但是也有惡劣的會計員，他們會弄虛作假，他們比革命分子還危險，——這是事實。不克服這些缺點，不消除這些缺點，我們就不能把國家的經濟和國家的商業向前推進。

（戊）在某些國家機關的領導機關中，工人和共產黨員的百分數仍然很低，很不够。在商業機關（對外貿易、國內貿易、辛迪加）的領導機關和駐國外的代表機關方面，以及在目前國民經濟生活中和國民經濟首先是國營工業的發展中具有決定意義的信用機關方面，這個缺點特別明顯。黨應當採取一切辦法來彌補這個缺陷。不這樣做，就休想實現黨的經濟和政治的指示。

（己）以前，經濟建設的最重要的問題是組織和成立托拉斯的問題。現在，當中心轉到商業方面的時候，組織國內貿易和對外貿易的合營公司和股份公司（三）的問題就提到日程上來了。實際情況表明，我們解決了托拉斯問題，可是我們的機關在解決合營公司和股份公司的問題上却做得很差。現在有一種趨向，竭力要組織一種把這個大事業中的國家監督作用縮小到最低限度的商業機關。毫無疑問，黨將用一切方法同這種趨向作鬥爭。

三、應當繼續改善黨的一般成分，特別是黨的領導機關的成分。無論如何不應當把黨的幹部看做一個小圈子。幹部的隊伍應當靠提拔新黨員來逐步擴大。新黨員應當補充幹部。不這樣做，幹部的存在就是沒有目的的了。

四、宣傳方面：

(甲)黨員的政治知識很差(政治文盲佔百分之六十)。為紀念列寧而吸收黨員使政治文盲的百分數增加了。需要在消滅這個缺點方面進行有系統的工作。任務在於推進這個工作。

(乙)電影方面的情況不好。電影是進行羣衆性宣傳的最重要的工具。任務在於掌握這個事業。

(丙)報刊事業正在發展，但是還不够。任務在於把『農民報』(三)的發行份數增加到一百萬份，『真理報』的發行份數增加到六十萬份，創辦為紀念列寧而吸收黨員的通俗報紙，發行份數至少要達到五十萬份。

(丁)牆報工作正在發展，但是還不够。任務在於支持牆報通訊員，把工作向前推進。

(戊)農村工作的情况不好。農村的鼓動主要應當是實物鼓動：給予貧農和中農各種幫助，包括優惠貸款，像烏克蘭的貧苦農民委員會(二)那樣發展集體經濟的萌芽(不是農業公社)，烏克蘭現在約有五千個集體農莊；吸引農民參加合作社，首先是參加農業合作社。應當認為，掌握農民互助委員會是特別重要的任務。應當記着，地方組建部隊(五)對農村的鼓動具有巨大意義。

五、在登記、分配、提拔黨員和非黨員工作人員方面：

(甲)登記工作多少走上了軌道。

(乙)分配工作稍微差些，因為列寧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1]上所提出的在國內發展的新情況下重新配備力量的基本任務還沒有完成。給所有一切商業組織大量配備優秀幹部的當前任務尚待解決。老實說，去年登記分配局是為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和財政人民委員部特別是財政人民委員部的稅務機關工作的，它主要是把工作人員供給這些機關的。現在的任務在於把舵轉向商業機關和信用機關，把工作人員優先供給這些機關。這裏也許需要五千來個共產黨員。

同時，任務在於用新的方法，即用自願的方法，用徵召志願人員在蘇維埃建設特別重要的地方組織工作的方法，來補充現行的分配力量的方法。這個方法對在某些地區組織典型工作的問題有直接關係，在現階段不這樣做（不組織典型工作）是不行的。列寧在『糧食稅』^[2]中提出的關於典型工作的思想應當實現。

(丙)應當特別注意提拔黨員和非黨員工作人員。僅僅從上面來提拔新人的方法是不够的。應當用在實際工作過程中，在吸收新力量參加實際工作的過程中從下面提拔的方法來補充這個方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生產會議、工廠會議和托拉斯會議在提拔工人担负工廠和托拉斯的負責職務方面應當起很大的作用。必須發展省轄市和縣轄市蘇維埃各部門下面的小組，把它們變成定期的業務性會議，並吸收蘇維埃委員特別是非委員的男女工人和男女農民參加這些會議。只有在這種廣泛的實際工作過程中才能從非黨工人和農民中提拔出新人。城市中為紀念列寧而吸收黨員的熱潮和農民政

治積極性的提高明顯地說明：這種提拔的方法必然會產生很大的效果。

六、黨內生活方面的兩個結論：

（甲）所謂擴大黨中央委員會的『原則』是正確的。經驗證明，擴大中央委員會有很大的好處，堅持縮小中央委員會『原則』的同志是站在不正確的道路上。

（乙）現在大家都很清楚，反對派在爭論期間說黨正在瓦解是極端錯誤的。在我們黨內，找不到一個嚴肅的組織，它在注視黨內生活的進程和黨的蓬勃發展的時候會不這樣說：還在不久以前報喪說我們黨要滅亡的人事實上是不了解黨，同黨離得很遠，很像那種應當叫做黨內異己分子的人。

總結：我們的黨在發展，它在前進，它在學習管理，它正在成爲工人階級的最有信心的機關。爲紀念列寧而吸收黨員就直接表明了這一點。（鼓掌經久不息）

結 論

(五月二十七日)

同志們！我在所有發言人的講話中沒有看出對中央委員會的組織報告有反對的意見。我認爲這表明代表大會同意這個報告的結論。(鼓掌)

我在報告中有意不談我們黨內的意見分歧，我所以不談，是因爲我不想觸動看來已經長好了的傷口。但是，既然托洛茨基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談到了這些問題，講了很多不確切的話並進行了挑戰，那就不應當保持沉默了。在這種情況下，保持沉默就會是不可理解的了。

克魯普斯卡婭同志在這裏反對重新討論意見分歧。我也堅決反對這樣做，正因爲如此，我在報告中沒有談到意見分歧。但是，既然反對派同志談到了這個問題並進行了挑戰，我們就沒有權利保持沉默了。

托洛茨基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兩人講到意見分歧的時候，把代表大會的注意力集中在一個決議上，即十二月五日的決議上。他們忘記除了這個決議以外，還有另外一個決議——關於爭論總結的決議^(四)，他們忘記曾經召開過代表會議，在十二月五日中央委員會通過決議以後曾經發生過新的爭論

浪潮，這個浪潮在第十三次代表會議關於爭論總結的專門決議中得到了自己的評價。他們忘記了，避而不談第十三次代表會議對反對派是不會有所裨益的。

我請代表大會注意：在第十三次代表會議上，關於經濟政策通過了一個決議，關於黨的建設却通過了兩個決議。這是爲什麼呢？本來有一個爲全黨所確認的並在十二月五日經中央委員會通過的決議，後來又認爲必須對同一個問題——關於小資產階級傾向的問題再做出一個決議。怎麼會有這種不幸的事，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因爲整個爭論有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以一致通過的十二月五日的決議告結束的，第二個時期是以關於小資產階級傾向的決議而告結束的。當時，即在第一個時期，我們預料黨內爭論大概會以十二月五日的決議而告結束，正因爲如此，我在上一次即在第十三次代表會議的報告中談到這個時期的時候說，只要反對派願意，十二月五日的決議就能夠結束黨內鬥爭。我說過這一點，我們大家也都是這樣想的。但是問題在於在這個時期爭論沒有結束。在十二月五日的決議以後，出現了托洛茨基的信，即出現了提出新問題的新政綱，並且掀起了比這以前更激烈的新的爭論浪潮。因此，黨內和平的可能性被破壞了。這就是反對派分子現在竭力避而不談，想迴避過去的第二個時期。

問題在於：在第二個時期的爭論和在十二月五日的決議中反映出來的第一個時期的爭論之間有很大的差別。在十二月五日的決議中沒有提出幹部蛻化問題。當時我們和托洛茨基一起起草這個決議，他也沒有提到幹部蛻化。看來他爲了自己以後的發動而把這個附加物收起來了。其次，在十二月

五日的決議中，也沒有提到學生青年是最可靠的晴雨衣的問題。看來托洛茨基也把這個問題留下來作爲在爭論中進行新的發動的後備了。在十二月五日的決議中並沒有攻擊機關的傾向，也沒有提出對黨的機關採取懲罰辦法的要求，而這些在他後來的幾封信裏却講得非常多。最後，在十二月五日的決議中根本沒有講過需要集團，然而關於這一點，即關於集團，托洛茨基在他後來的幾封信裏却講得非常多。

請看反對派在十二月五日以前的立場和它的首領們在十二月五日以後的立場之間有多麼大的差別。

現在托洛茨基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竭力保持沉默，隱藏自己在爭論的第二個時期的第二個政綱，他們大概是想欺騙黨。不，這一點你們是做不到的！你們用愚蠢的花招和外交手腕是欺騙不了代表大會的。我相信代表大會會談到在十二月五日的決議中反映出來的爭論的第一個階段，也會談到在代表會議關於小資產階級傾向的決議中反映出來的第二個階段。

這兩個決議是叫做爭論的這一個整體的兩部分。誰想把這兩部分混淆起來，並想這樣來欺騙代表大會，那他就錯了。黨成長起來了，黨的覺悟提高了，用外交手腕是欺騙不了黨的。反對派的一切錯誤就在於他們不了解這一點。

讓我們看一看，在關於十二月五日以後的反對派的政綱問題上誰是對的？在托洛茨基的信中提到的四個新問題上誰是對的？

第一個問題：幹部蛻化。我們一向都要求指出幹部蛻化的事實。但是，他們沒有給我們提供這種事實，而且也提不出來，因為天地間沒有這種事實。經過切實的考察，我們都看出蛻化在我們這裏是沒有的，而某些反對派首領傾向於小資產階級政策的傾向倒是有的。究竟誰是對的呢？似乎不是反對派。

第二個問題：學生青年似乎是最可靠的晴雨表。在這個問題上誰是對的呢？似乎又不是反對派。如果看一看我們黨在這期間的發展，看一看接收了二十萬新黨員的事實，那就可以得出結論：晴雨表不應當在學生青年中間尋找，而應當在無產階級中間尋找；黨不應當依靠學生青年，而應當依靠黨的無產階級核心。二十萬新黨員——這就是晴雨表。反對派在這裏又錯了。

第三個問題：懲罰機關，攻擊黨的機關。誰是對的呢？仍然不是反對派。他們已經捲起攻擊機關的旗幟而轉為防禦了。你們在這裏親眼看到他們在反對黨的機關的鬥爭中是怎樣狼狽退却，掙扎脫身的。

第四個問題：關於派別組織，關於集團。托洛茨基聲明說，他堅決反對集團。這很好。但是，如果必須談談經過，那末請允許我再提一下某些事實。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在十二月成立了起草十二月五日公佈的那個決議的小組委員會。這個小組委員會是由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三個人組成的。你們是否注意到，在十二月五日的決議中沒有關於集團的字句？在這個決議中提到禁止派別組織，但是一點也沒有講到禁止集團。我們只是援引了第十次代表大會關於黨的統一的著名決議。這

是什麼原因呢？是偶然的嗎？這不是偶然的。我和加米涅夫曾經堅決提出禁止集團的問題。托洛茨基最後通牒式地抗議禁止集團，說他不能在這種情況下贊同決議。於是我們就只限於引用第十次代表大會的決議，而托洛茨基當時大概沒有讀過這個決議，因為在這個決議中不僅講到禁止派別組織，而且還講到禁止集團。（笑聲，鼓掌）托洛茨基在當時是主張集團自由的。他在這裏讚揚十二月五日的決議。而在通過關於黨的建設的決議後過了四天，即十二月九日，托洛茨基在他給俄共（布）中央的一封信中寫道：「政治局委員們在集團和派別組織問題上所採取的純粹形式主義的立場使我感到特別憂慮。」你們怎麼看呢？一個滿口稱讚這個決議的人，原來在內心中却因政治局對集團和派別組織問題的態度而感到特別憂慮。這就不像他當時是主張禁止集團的了。不，托洛茨基當時是主張成立集團的，是主張集團自由的。

其次，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莫斯科提出了一個大家都知道決議，要求把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已經解決的派別組織問題提得更明確，即要求取消某些限制，這有誰不記得呢？這是莫斯科所有的人都記得的。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他的一些小品文裏要求在黨內恢復布列斯特和約時期存在過的那些制度，這你們有誰不記得呢？我們知道，黨在布列斯特和約時期曾經不得不容許派別組織存在。這一點我們知道得很清楚。在第十三次代表會議上，當我提出了最簡單的事情——要黨員回憶一下關於統一即關於禁止集團的決議的第七條的時候，所有的反對派分子如何大嚷大叫，要求不提出這一條，這有誰不記得呢？可見反對派在這個問題上完全持着集團自由的觀點，他們以為他們說不要求

派別組織的自由而要求集團的自由就能麻痺黨的警惕性。他們現在向我們聲明說，他們反對集團，這很好。但是我無論如何不能把這叫做他們的進攻，因為這是狼狽退却，這是中央委員會在這個問題上正確的標誌。

同志們，在說明了這些事實以後，讓我對托洛茨基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他們關於黨的組織問題的發言中所犯的某些原則性的錯誤講幾句話。

托洛茨基說，民主的實質歸結起來就是新一代和老一代的問題。這是不對的，是在原則上不對的。民主的實質完全不能歸結為這一點。新一代和老一代的問題是次要的問題。我們黨的生活中的數字說明，我們黨的生活說明，黨的青年一代逐步地被培養成為幹部，——幹部的隊伍是靠提拔青年來擴大的。黨一向站在並且今後還是站在這條道路上。只有那種把幹部看成一個小圈子，看成不讓新的成員加入自己的隊伍的特權階層的人，只有那種把幹部看成以爲其他一切黨員都「低我一等」的舊時軍官的人，只有那種想在幹部和新黨員之間製造罅隙的人，才會在黨的新一代和老一代的問題上強調民主問題。民主的實質歸結起來不是新一代和老一代的問題，而是主動性問題，是黨員積極參加黨的領導的問題。當然，如果指的不是形式上民主的黨，而是和工人階級羣衆有密切聯繫的真正無產階級的黨，那就只能這樣提出民主問題。

第二個問題。托洛茨基說，最大的危險就在於黨的機關官僚主義化。這也不對。危險不在這裏，而在於黨有真正脫離非黨羣衆的可能性。你們可以有一個按民主形式建立機關的黨，但是，如果黨不

同工人階級聯系起來，那末這種民主將是微不足道的，一錢不值的。黨是爲階級而存在的。因爲黨和階級結合在一起，和階級有聯系，有威信並得到非黨羣衆的尊敬，所以它即使有官僚主義的缺點也能生存和發展。如果沒有這一切，不管建立怎樣的黨組織，官僚主義的還是民主的，黨也一定要滅亡。黨是階級的一部分，它不是爲自己本身，是爲階級而存在的。

第三個論點也有原則性的錯誤：托洛茨基說，黨是不犯錯誤的。這不對。黨是常常犯錯誤的，伊里奇教導我們拿黨本身的錯誤來教黨學習正確的領導。如果黨不犯錯誤，那就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教黨學習了。我們的任務在於發現這些錯誤，揭露錯誤的根源，並向黨和工人階級指出我們怎樣犯了錯誤，我們今後怎樣不應當重犯這些錯誤。不這樣，黨就不可能發展。不這樣，黨的領導者和幹部就不可能形成，因爲他們是在自己的錯誤作鬥爭中，在克服這些錯誤中形成和培養起來的。我認爲托洛茨基的這種說法是帶有某種嘲弄企圖（實在是不高明的企圖）的某種恭維話。

其次，關於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他談到了清黨。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認爲清黨是黨的多數對付反對派的手段，看來他是不贊同清黨這一方法的。這是一個原則問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嚴重錯誤就是不懂得不定期清洗動搖分子，黨就不能鞏固。列寧同志教導說，只有逐步地把鑽進黨內來的而且今後還會鑽進來的動搖分子驅逐出去，黨才能鞏固。如果我們對清黨完全採取否定態度，那就是違反了列寧主義。至於目前的清黨，它有什麼壞處呢？據說有個別的錯誤。當然是有的。什麼時候有過在一個大的事件中沒有個別錯誤的情況呢？這種情況是從來沒有的。會有而且必定有個別的錯誤，但

是清黨基本上是正確的。有人對我說，知識分子和職員中的某些非無產階級分子以害怕和恐懼的心情等待清黨。有人給我講過這樣一種情景：在一間辦公室裏坐著一些應受清黨審查的人。這是一個蘇維埃機關的支部。在另一間辦公室裏是清黨委員會。支部的一個成員經過清黨審查，渾身大汗，像箭一樣衝出來。有人請他講講是怎麼回事。那個人回答說：『讓我喘口氣，讓我喘口氣，我現在講不出來。』（笑聲）對於那些如此感到痛苦和渾身大汗的人來說，清黨也許是不好的，可是對黨來說，這是很好的。（鼓掌）很遺憾，在我們這裏還有少數黨員，他們一個月拿一千或者兩千盧布，被算做是黨員，却忘記了黨的存在。我知道這樣的事實：一個有這樣的黨員工作的人民委員部，在它的支部成員中也有汽車司機，當支部派汽車司機去做清黨工作的時候引起了許多責難，說汽車司機不應當對蘇維埃要人進行清黨審查等等。這樣的事情就發生在我們莫斯科。這些顯然離開了黨的黨員大發脾氣，不能容忍『一個汽車司機』對他們進行清黨審查。對這樣的黨員應當進行教育和改造，有時要採取開除出黨的辦法。清黨的主要目的就是使這一種人感覺到主人存在，有能夠要求他們說明反黨罪過的黨存在。我認為有時候主人確實應當拿著掃帚在黨的行列中走一遭。（鼓掌）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說：你們的政策是正確的，而組織路線是不正確的，黨可能滅亡的根本原因就在這裏。同志們，這是胡說。黨的政策是正確的，可是它由於組織路線上的缺點而滅亡了，這樣的事情是沒有的。這樣的事情是從來沒有的。黨的生活和黨的工作的基礎不在於目前黨採取的或者可能採取的那些組織形式；而在於黨的政策，在於黨的對內政策和對外政策。如果黨的政策是正確的，如

果黨正確地提出對工人階級具有決定意義的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那末組織方面的缺點就不會有決定意義，因為政策會挽救它的。過去一向是這樣，將來也會是這樣。不懂得這一點的人是拙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起碼知識。

在進行爭論的那些問題上，即在經濟性的問題和黨的建設問題上，黨是不是正確的呢？如果誰想很快地直截了當地檢查這一點，他就應當向黨和工人羣衆提出如下問題：非黨工人羣衆是怎樣對待黨的，同情還是不同情呢？如果反對派分子這樣提出問題，如果他們問問自己：工人階級是怎樣對待黨的，同情還是不同情呢？——那末他們就會了解，黨走的是正確的道路。爲紀念列寧而吸收黨員就是了解有關爭論總結的一切事物的鑰匙。既然工人階級選出二十萬最忠誠最堅定的人送入黨內，那末這就是說，這樣的黨是不可戰勝的，因為黨實際上成了工人階級選舉出來的享有工人階級完全信任的機關。這樣的黨將生存下去而使敵人胆顫心驚，這樣的黨是不會瓦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根據黨在羣衆中的影響來判定黨的威信的，因為黨的存在是爲了羣衆，而不是相反。我們的反對派糟糕的地方就在於他們不是用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而是用形式主義的觀點，用『純粹的』機關的觀點來對待黨的一些問題，對待爭論總結的問題。爲了找到了解爭論總結的簡單而直接的鑰匙，需要注意的不是關於機關的空話，而是已經參加了黨從而揭示了黨的深刻民主性的二十萬新黨員。反對派分子在演說中提到的民主是無聊的空談，而工人階級向黨輸送二十萬新黨員，這才是真正的民主。我們的黨已經成了工人階級選舉出來的機關。請指給我看另外一個這樣的黨吧。你們是指不出來的，因

爲世界上還沒有另外一個這樣的黨。但是，我們的反對派分子連這樣強大的黨也不喜歡，這真是怪事。他們究竟在地球上的什麼地方能找到更好的黨呢？他們要找更好的黨，恐怕就得搬到火星上去。

（鼓掌）

最後一個問題——關於反對派的小資產階級傾向的問題，即關於責備小資產階級傾向似乎不公平的問題。這對不對呢？不，不對。這種責備來自何處，這種責備的根據何在呢？責備的根據在於：反對派分子在無限制地鼓吹黨內民主的時候不知不覺地不由自主地成了新資產階級的某種傳聲筒。新資產階級不是重視我們黨的民主，而是想得到國內的民主，非常想得到國內的民主。圍繞着民主問題叫嚷的那一部分黨員不知不覺地成了新資產階級在國內進行鼓動的傳聲筒和孔道，而這種鼓動的目的是削弱專政，『擴大』蘇維埃憲法，恢復剝削者的政治權利。無疑是愛黨……的反對派分子變成了那些站在黨外的、想削弱和瓦解專政的人的傳聲筒，而自己竟沒有覺察到這一點，其主要原因和秘密就在這裏。

無怪乎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同情反對派。這是偶然的嗎？不，不是偶然的。國際範圍內的力量配置是這樣的：減低我們黨的威信和削弱我國專政的鞏固性的任何嘗試，不管是我們的反對派的嘗試還是社會革命黨人同孟什維克的嘗試，都一定會被革命的敵人看做對自己有利的東西而加以支持。誰不了解這一點，誰就不了解我們黨內派別鬥爭的邏輯，誰就不了解這個鬥爭的結局不是取決於人和願望，而是取決於在蘇維埃分子和反蘇維埃分子的鬥爭的總結算中得出的結果。我們說反對

派有小資產階級傾向的根據就在這裏。

列寧有一次講到黨的紀律和我們隊伍的團結的時候說：『誰只要稍微削弱無產階級政黨的鐵的紀律（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那他事實上就是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二十七頁）反對派同志們用自己對莫斯科組織和黨中央委員會的攻擊來削弱黨的紀律，破壞專政的基礎（因為黨是專政的基本核心），這難道還需要證明嗎？

正因爲如此，我認爲第十三次代表會議說我們這裏有小資產階級政策的傾向是正確的。這還不是小資產階級政策。決不是！列寧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解釋說，傾向還是一種未完成的和未形成的東西。反對派同志們，如果你們不再堅持這種小資產階級傾向，不再堅持這些不大的錯誤，那末一切都能糾正，黨的工作也會進展。如果你們堅持下去，那末小資產階級傾向就能發展成小資產階級政策。因此，反對派同志們，一切事情都取決於你們。

結論是什麼呢？結論是這樣：我們今後也應當在黨的完全統一的基礎上進行黨內工作。請看一看一致擁護中央委員會路線的代表大會，這就是黨的統一。反對派在我們黨內是不足道的少數。我們黨是統一的，它將來還是統一的，這次代表大會、它的統一、它的團結證明了這一點。我們不是能和黨內那個叫做反對派的不足道的集團統一，這要取決於他們。我們同意和反對派同心協力地工作。在去年爭論最激烈的時候，我們做過必須和反對派共同工作的聲明。我們在這裏再一次肯定這一點。但是這個統一能不能實現，我就知道了，因爲以後的統一完全取決於反對派。在目前的情況

下，統一，是兩個因素即黨的多數和少數相互作用的結果。多數願意團結一致地工作。少數是不是真誠地願意這樣，我就知道了。這完全取決於反對派同志們。

總結。總結就是：肯定第十三次代表會議的決議並同意中央委員會的工作。我相信代表大會會肯定這些決議並同意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工作和組織工作。（鼓掌多時）

關於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總結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在俄共（布）中央
縣委書記訓練班的報告）

同志們！我不準備詳細分析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大會的決議很多，可以編成一本小冊子，現在未必有可能來詳細分析它們，況且我和你們現在都沒有時間這樣做。因此，我認為比較合適的是在報告中指出一些基本出發點並加以解釋，使你們回去以後容易自己研究這些決議。

如果把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拿來詳細研究，那末決議中所涉及的各种問題可以歸結為四個基本問題，這四個問題像一條紅綫似地貫穿着全部決議。

這是一些什麼問題呢？

第一個基本問題或者說第一類問題是有關我們共和國的外部狀況的問題，即關於鞏固我們共和國的國際地位的問題。

第二個基本問題或者說第二類問題是有關國營工業和農民經濟結合的問題，即無產階級和農民聯盟的問題。

第三類問題包括以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的精神教育和改造勞動羣衆的問題。屬於這一類問題的有國家機關、農民工作、勞動婦女工作、青年工作這樣一些問題。

最後，第四類問題是有關黨本身、黨內生活、黨的存在、黨的發展的一些問題。

在報告的最後部分，我將要特別談一下因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決議而產生的縣級工作人員的任務。

外部狀況

過去一年在蘇維埃俄國的國際地位方面有什麼新的變化呢？從舊的一年轉到新的一年時候，必須估計到的而且是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不能不估計到的國際間的新的基本變化是什麼呢？

第一、這個新的變化是：在過去一年，我們有機會看到想使西歐在國內政策方面公開法西斯化的一些企圖，這些企圖原來是沒有根據的，它們都失敗了。如果撇開法西斯主義正在解體的意大利不談，在歐洲的主要國家裏，即在法國和英國，使歐洲政治法西斯化的企圖已經失敗了；而這些企圖的製造者彭加勒和克遜，乾脆說，是已經被轟下台去了。

這是過去一年所發生的第一個新的變化。

過去一年所發生的第二個變化是：好戰的英法帝國主義者幾次企圖孤立我國，這些企圖都失敗

了。幾乎用不着懷疑，彭加勒的無數次反蘇陰謀和大家知道的克遜的最後通牒，目的都是孤立我國。結果怎樣呢？結果不是蘇聯被孤立了，而是它在事實上被承認了。不僅如此，結果不是蘇聯被孤立了，而是孤立別人的人孤立了，是彭加勒和克遜辭職了。我國的威信比某些帝國主義政客所能想像的要高得多了。

這是過去一年對外政策方面的第二個新的變化。

怎樣來解釋這一切呢？

有些人愛用我們政策的英明來解釋。我並不否認，我們的政策即使不英明，至少也是正確的，這是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已經肯定了。但是僅僅用我們政策的英明或正確來解釋是不行的。這裏的問題與其說在於我們的政策正確，不如說在於近來歐洲形成了一種形勢，這種形勢決定了我們政策的成功。這裏必須指出三個情況。

第一、帝國主義列強無力處理自己的軍事勝利的果實，無力在歐洲確立像樣一點的和平，它們不掠奪戰敗國和殖民地、不為分贓而互相傾軋就不能繼續發展。因此又在擴充軍備。因此產生了新戰爭的危險。但是，人民羣衆不要戰爭，因為他們還沒有忘記爲了資本家的利潤而遭受的犧牲。因此，各國人民愈來愈不滿意好戰的帝國主義的政策。

這就是帝國主義內部虛弱的原因。爲什麼克遜和彭加勒被趕下台去呢？因爲輿論認爲他們是新戰爭的挑撥者。因爲他們用公開好戰的政策激起了羣衆對整個帝國主義的不滿，從而造成了對帝國

主義的危險。

第二、蘇維埃政權在國內鞏固了。資本主義國家採取了等待我國蘇維埃政權垮台的方針。唱讚美詩的人說，上帝有時候通過小孩的嘴說實話。如果把西方帝國主義看做上帝，那末它自己沒有一個小孩自然是不行的。於是它就找到了並非無名的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長貝奈斯作為自己的小孩，通過貝奈斯的嘴宣稱：由於蘇維埃政權不穩固，不應該急於承認共和國聯盟；因為蘇維埃政權很快就會被新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權所代替，最好暫時『抑制一下』，不要同蘇聯建立『正常關係』。這還是不久以前的事情。但是，帝國主義通過它的小孩的嘴說出來的『實話』只不過維持了幾個月，因為大家知道，許多國家很快就以『承認』政策代替了『抑制』政策。為什麼呢？因為事實勝於雄辯，而事實是蘇維埃政權堅如磐石。首先，即使是一個庸人，不管他在政治上多麼幼稚，也不能不看到蘇維埃政權大概是比任何一個資產階級政府都鞏固，因為在無產階級專政的七年中，資產階級政府上台下台，而蘇維埃政權依舊存在。其次，這個庸人也不能不看到，我國的經濟正在發展，例如我國的出口就在步步增加。這些情況都對蘇聯有利無害，這還用得着證明嗎？有人責備我們，說我們在西歐進行反資本主義的宣傳。我必須說，我們不需要這種宣傳，我們用不着進行這種宣傳。在歐洲工人中間，蘇維埃政權的存在、它的成長、它的物質繁榮、它的無可置疑的鞏固就是有利於蘇維埃政權的最好的宣傳。任何一個工人來到蘇維埃國家，看一看我們的無產階級制度，就會看到什麼是蘇維埃政權，看到工人階級一旦掌握政權就能做出什麼來。這才是真正的宣傳，然而這是用事實宣傳，這種宣傳對工人的

影響比用語言或報刊來宣傳要大得多。有人責備我們，說我們在東方進行宣傳。這也是胡說。我們用不着在東方進行宣傳。附屬國或殖民地的任何一個公民，只要來到蘇維埃國家看一看我國人民怎樣管理國家，只要看一看黑人和白人，俄羅斯人和非俄羅斯人，不同膚色和各個民族的人們怎樣同心協力地共同管理這個偉大的國家，他就會深信這個國家是唯一的民族友愛不是空話而是事實的國家。既然我們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一事實作宣傳，我們也就不需要任何文字的或口頭的宣傳。

第三、蘇維埃政權的威信提高了，它在資本主義國家人民羣衆中間的聲望增高了。這首先是因爲我們的國家是世界上唯一的能够執行並且真正執行和平政策的國家，它不是虛偽地而是真誠公開地、堅決徹底地執行和平政策。現在，不論敵人或朋友，全都承認我們的國家是唯一的配稱全世界和平政策的堡壘和旗手的國家。這種情況不能不加深歐洲人民羣衆對蘇維埃政權的同情和好感，這還用得着證明嗎？你們有沒有注意到，歐洲某些當權者竭力把自己的官運建立在同蘇聯的「友好」上，他們中間連墨索里尼這樣的人有時也不反對靠這種「友好」來「撈一把」呢？這正是表明蘇維埃政權在資本主義國家廣大羣衆中是真正有聲望的。但是，蘇維埃政權所以有聲望，主要是因爲它在資本主義包圍的困難條件下真誠而勇敢地執行了和平政策。

過去一年決定我們的對外政策獲得成功的情況大致就是這樣。

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在決議中批准了中央委員會在對外關係方面的政策。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代表大會贊成黨今後繼續執行和平政策，執行堅決反對新戰爭的政策，執行無情地揭露各種各

樣擁護或縱容新的軍備擴充和新的衝突的分子的政策。

結合問題

什麼是結合呢？結合就是城市和鄉村之間、我們的工業和農民經濟之間、我們的工業品和農民經濟的糧食與原料之間的經常聯系，經常交換。農民經濟不把糧食和原料拿到城市市場上去出賣，不藉此從城市得到必需的工業品和勞動工具，就不能生存，不能存在。同樣，國營工業不把自己的產品拿到農民市場上去出賣，不從農村取得糧食和原料的供應，也就不能發展。可見我國社會主義工業所賴以生存的是國內市場，首先是農民市場，即農民經濟。因此，結合問題是我國工業的生存問題，是無產階級本身的生存問題，是我們共和國的存在問題，是我國社會主義的勝利問題。

我們還沒有做到通過工業品和農產品的直接交換來實現城市和鄉村間、工業和農民經濟間的這種結合，這種經常聯系。所以沒有做到，是因為我們的工業不夠發達，我們還沒有遍佈全國各地的供應機關，而整個國民經濟在戰後又處於破壞狀態。因此，我們不得不實施所謂新經濟政策，就是說，不得不宣佈貿易自由，商品流轉自由，容許資本主義存在，動員千百萬農民和小業主的力量，在國內建立商品流轉的巨流，發展商業，然後佔領商業方面的主要陣地，通過商業來建立工業和農民經濟間的結合。這就是用迂迴的方法，如列寧所說的，不是直接地，不是通過農產品和工業品的直接交換，

而是通過商業來建立這種結合。

任務就在於利用千百萬小業主的力量，掌握商業，把鄉村和城市的主要供應網掌握到國家和合作社的手裏，從而在工業和農民經濟間建立起不可分割的聯系，不可分割的結合。

不能說這種任務是我們力不勝任的。所以不能這樣說，是因為掌握政權的無產階級具有通過商業用迂迴的方法來實現這種結合的一切主要手段。第一、無產階級掌握着政權。第二、它有工業。第三、它握有信貸，而信貸是國家手中極大的力量。第四、它有自己的商業機構，不管這種機構是好是壞，它畢竟是在日益發展，日益鞏固。最後，它握有一定的商品，隨時可以拋到市場上去，以平服或穩定市場的波動；影響物價等等。工人國家擁有這一切手段，所以不能說通過商業來實現結合是我們力不勝任的任務。

建立城鄉結合的問題和這種結合的可能性就是這樣。

那末，從建立城鄉結合來看，過去一年有什麼新的重要變化呢？

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在解決結合問題的時候根據什麼新的材料呢？

一年來在這方面的新變化是：過去一年我們在實際工作中第一次碰到一個廣泛的鬥爭，即我國國民經濟中社會主義成分同私人資本主義成分間的大規模的鬥爭，我們碰到這個鬥爭以後才第一次把結合問題極爲具體地提到實踐上來了。結合和商業問題在我們面前已經不是理論問題，而是迫切地要求立即解決的直接實踐的問題了。

你們可記得列寧還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就說過^(四)，用國家和合作社的力量來控制市場，掌握主要的貿易網，將不是通過和平的工作，而是通過社會主義成分同私人資本主義成分間的鬥爭，這種工作將通過我國國民經濟中這兩種對立成分間拚命競爭的方式來進行。後來這個鬥爭激烈起來了。它主要是在兩方面展開的：一方面是城鄉間的貿易，另一方面是信貸，主要是農村中的信貸。

這個鬥爭的結果究竟怎樣呢？

第一、事實上私人資本並沒有投入冒險性比較大而資金周轉比較慢的生產，而是投入了商業，投入了列寧所說的構成我國過渡時期發展過程鍊條的基本環節的那個商業。並且，私人資本投入商業以後，就在那裏鞏固下來，竟掌握了全國約百分之八十的零售商業，約百分之五十的批發零售商業。這是由於我們的商業機構和合作社機構還年輕，還沒有安排好；我們的辛迪加實行了不正確的政策，濫用自己的專營權，抬高物價；我們的負責從國家的角度來調節商業的國內商業委員會軟弱無能；我們當時的蘇維埃貨幣不穩定，主要打擊了農民，因而降低了他們的購買力。

第二、事實上農村中的信貸完全落在富農和高利貸者的手中，沒有農具的力量單薄的農民不得不去受高利貸者的盤剝，不得不付出極高的利息，忍氣吞聲地受高利貸者的支配。這是由於我們還沒有基層的農業信貸網，不能夠供給農民低息貸款，把高利貸者排擠到後面去，結果高利貸者就佔據了全部陣地。

這樣，在國家和農民經濟之間鑽進了商人和高利貸者；社會主義工業和農民經濟間的結合因而

困難和混亂起來了。去年夏季的銷售危機就是這種困難和混亂的表現。

還在代表大會以前，黨就採取措施來消除銷售危機和奠定農業信貸的基礎。發行了新的穩定的貨幣，這使情況有了好轉。爲了降低物價，把大批商品拋到市場上去，這也產生了良好的影響。根據保證勝利地同私人資本作鬥爭的原則改組了國內商業委員會。提出了從結合的角度來改造商業機構和合作社機構的工作問題。銷售危機基本上消除了。

但是，黨不能只限於採取這些措施。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任務在於把結合問題重新全部提出來，並制定在銷售危機消除後的新情況下解決這個問題的基本路線。

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在這方面究竟給我們做了些什麼呢？

第一、代表大會提出了進一步擴大工業首先擴大輕工業和金屬工業的口號。因爲很明顯，以我們現有的工業品儲備，我們是不能滿足農民對商品的渴求的。更不用說，失業現象的增長迫切地要求擴大工業。因此，進一步擴大工業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問題。（見代表大會就中央總結報告所通過的決議（第六））

第二、代表大會提出了進一步擴大農民經濟的口號，幫助農民經濟進一步擴大耕地的口號。這也是建立結合所必需的措施，因爲很明顯，農民所關心的不僅是滿足我們工業的需要（當然是爲了換取工業品），而且是滿足國外市場的需要（當然是爲了換取機器）。因此，進一步擴大農民經濟是黨的政策的前途任務。（見『關於農村工作』的決議（第七））

第三、代表大會批准成立國內商業人民委員部，並向我們的一切商業機構和合作社機構提出了同私人資本作鬥爭的主要任務，掌握市場的任務，用經濟性質的措施，即用降低物價和改進商品質量的辦法，用調撥大批商品、實行優惠貸款等等辦法，把私人資本排擠出商業領域的任務。（見『關於國內貿易』和『關於合作社』的決議（四））

第四、代表大會提出並解決了最重要的農業貸款問題。這裏指的不僅是中央農業銀行，甚至不僅是各省農業貸款委員會。這裏指的主要是在縣和鄉建立基層信用合作社網，這裏指的是使信貸工作民主化，使農民可以得到農業貸款，以國家的低息貸款來代替高利貸者的盤剝性的貸款，而把高利貸者逐出農村。這是我國整個經濟中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不解決這個問題，無產階級和農民間就不能有比較鞏固的結合。正因為如此，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特別注意這個問題（見『關於農村工作』的決議）。中央委員會曾經撥出四千萬盧布作為農業銀行的基金，以便在同國家銀行保持一定的配合下把這四千萬盧布增加到八千萬盧布。我想只要再努一把力，就可以使這筆款項達到一億盧布。當然，這個數目對於我們蘇聯這樣一個大國來說是不算大的，但是這畢竟能使農民易於改善自己的經濟並打破高利貸者的盤剝。我在上面說到了基層農民信用合作社對於力量單薄的農民的意義，對於農民和工人國家結合的意義。但是基層信用合作社不僅能夠幫助農民，在一定的條件下，它能夠成為不僅國家幫助農民而且農民幫助國家的極大泉源。的確，如果我們在各地，在各縣各鄉撒開一個廣大的農業信貸網，而且這些信用機關在農民羣衆中享有威信，那末農民將不但向國家借錢，而且還會把錢存入

信用機關，就是說：這些機關將不但有資產業務，而且還有負債業務。不難設想，在基層信用機關的業務順利開展的情況下，負債業務能够成爲國家從千百萬農民得到可靠援助的來源，這是任何外債都比不上的。由此可見，代表大會特別注意在農村中組織低息貸款是不錯的。

第五、代表大會再次宣佈對外貿易壟斷制是不可動搖的。我想，沒有必要解釋這種制度對於工業和農業以及對於工農業結合的意義。對外貿易壟斷制的根本意義是無須再加證明的。（見就中央總結報告所通過的決議）

第六、代表大會認定必須增加一般出口，首先是糧食的出口。我想，這個決定也是無須加以解釋的。（見就中央總結報告所通過的決議）

第七、代表大會決定採取一切辦法，使幣制改革徹底實行，因爲它能促進商品流轉，便於建立工業和農民經濟間的鞏固的聯系；使中央和地方都盡力實現幣制改革的一切必要條件。（見就中央總結報告所通過的決議）

這就是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在結合問題上的口號，這些口號的目的在於掌握商業，建立我國工業和農民經濟間的牢固的結合，從而爲國民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成分戰勝資本主義成分準備條件。

勞動羣衆的教育和改造問題

黨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重大任務之一，就是開展以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的精神改造老一代和教育新一代的工作。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舊的習氣、習慣、傳統和偏見是社會主義最危險的敵人。這些傳統和習氣控制着千百萬勞動羣衆，它們有時籠罩着無產階級各階層，有時給無產階級專政的存在造成極大的危險。因此，同這些傳統和習氣作鬥爭，在我們各方面的工作中必須克服這些傳統和習氣，並且以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精神教育新一代，——這就是我們黨的當前任務，不執行這些任務，就不能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國家機關的改善工作、農村工作、勞動婦女工作、青年工作，——這就是黨在實現這些任務時的主要活動範圍。

(甲)爲改善國家機關而鬥爭。代表大會在國家機關問題上花的時間很少。中央監察委員會關於同國家機關的缺點作鬥爭的報告沒有討論就批准了。『關於監察委員會的工作』的決議⁽²⁾也沒有討論就通過了。在我看來，這是由於時間不夠，提交代表大會的問題又很多。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結論說，黨不把國家機關問題看做極重要的問題，那就完全不對了。恰恰相反，國家機關問題是我國整個建設中最重要問題之一。國家機關是廉潔奉公，還是貪污受賄；是實行節約，還是浪費人民財產；是在工作中弄虛作假，還是全心全意爲國家服務；是勞動者的累贅，還是幫助勞動者的機關；是培植無產階級的法制思想，還是以否定這個思想的精神腐化人民的意識；是在向過渡到沒有國家的共產主義社會這個方向前進，還是向普通的資產階級國家的腐朽官僚制度倒退，——正確地解決這一切問題，對於黨和社會主義不能沒有決定意義。我們的國家機關有很多缺點，機構臃腫，開支浩大，十

分之九已經官僚主義化，而國家機關的官僚主義又在對黨和黨的組織施加壓力，妨礙我們為改善國家機關而鬥爭，——這些情況是未必可以懷疑的。同時很明顯，只要我們的國家機關擺脫了某些主要的缺點，它就會成為無產階級手中以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的精神教育和改造廣大人民階層的極強大的工具。

正因為如此，列寧特別注意改善國家機關的問題。

正因為如此，黨成立了由工人和農民組成的專門組織（改組過的工農檢查院和擴大了的中央監察委員會）來和我們國家機關的缺點作鬥爭。

任務在於幫助中央監察委員會和工農檢查院進行自上而下地改善、精簡和在精神上健全國家機關的艱鉅工作。（見代表大會『關於監察委員會的工作』的決議）

（乙）關於農村工作。這個問題是我們黨的實踐中最複雜最困難的問題之一。代表大會通過了一個關於我們農村工作的基本路線的出色決議。只要拿這個決議同第八次代表大會關於農村工作的決議比較一下，就可以了解黨在這方面前進多少了。但是，如果以為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在今年已經全部解決或者能够全部解決最複雜的農村問題，那就錯了。這些問題，如集體農莊的組織形式，國營農場的改造，中央地區和邊疆地區的土地規劃工作的調整，同農業合作社工作相關聯的新的勞動組織形式，對我國各種不同地區的特點的掌握和在工作中對這些特點的照顧，——所有這些問題，由於很明顯的原因，都不能在代表大會的決議中得到全部解決。代表大會決議重要的地方在於它制定了

基本的工作路綫，便於我們進一步研究這些問題。你們大概知道，中央全會（三）已經成立了一個農村工作常務委員會來詳細研究這些問題。

決議的中心是農民羣衆合作化的口號。合作化應當從消費合作社、農業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這三方面來進行。這是在農民中，在力量單薄的農民階層和中農階層中培植集體主義的思想和方法的最可靠的途徑之一。（見代表大會『關於農村工作』的決議）

（丙）關於勞動婦女工作。我在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就已經說過，這方面的工作在我們這裏是被輕視的，但這個工作對黨是非常重要的，在某些場合下是以社會主義精神教育新一代的工作的有決定意義的一面。現在當然不必把已經在代表大會上說過的話重複一遍。我只想請你們注意，代表大會可惜沒有能專門討論勞動婦女工作問題，但還是通過了一個特別的決議，這個決議說：『代表大會提請全黨特別注意，必須加強女工和農婦工作，並把她們提拔到選舉出來的黨和蘇維埃的機關裏去。』（見就中央總結報告所通過的決議）我認為在下一大代表大會上必須專門研究這個問題。中央全會按照代表大會的決議，已經在代表大會閉幕後立即決定委託我們的中央組織局採取特別措施，把勞動婦女工作提到應有的高度。

（丁）關於青年工作。代表大會對青年工作特別注意。在我看來，代表大會關於這個問題的決議是代表大會所有的決議中最完善最詳盡的決議。因此，這個決議對於黨和青年都是很寶貴的。

青年（我說的是工農青年）的作用在於他們是建設未來的極良好的基礎，他們是我國的未來，他

們是我國的未來的體現者。如果說，我們國家機關的工作、農民工作、勞動婦女工作在克服舊習氣和舊傳統方面，在改造勞動羣衆的老一代方面具有很大的作用，那末在多少是不受這些傳統和習氣拘束的青年中進行工作，對於以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的精神教育勞動者的新幹部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因為這裏的基礎不言而喻是十分良好的。

因此，共青團和少先隊就有了極重大的作用。

共青團是工農青年的自願組織。它的中心、它的核心是青年工人。它的支柱是青年農民。工農青年的團就是青年組織的基礎。把一切忠實的革命的青年農民聚集在無產階級核心的周圍，吸引自己的團員參加經濟、文化、軍事、行政各方面的工作，把他們培養成爲我們國家的戰士和建設者、勞動者和領導者，——這就是共青團的任務。（見『關於青年工作』的決議（三））

黨

這裏有四個問題：關於反對派，關於爲紀念列寧而吸收黨員，關於黨的領導的民主化，關於一般理論特別是關於列寧主義的宣傳。

（甲）關於反對派。現在，當反對派問題已經由代表大會解決，事件因而業已平息的時候，可能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反對派是什麼？爭論時期的鬥爭究竟是什麼鬥爭？同志們，我認爲這是有關黨

的生死存亡的鬥爭。反對派自己也許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是問題不在這裏。問題不在於某個同志或某個反對派集團抱着什麼目的。問題在於這個集團的行動必然要產生的客觀結果。要知道，向黨的機關宣戰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破壞黨。唆使青年反對幹部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瓦解黨。爲集團自由而鬥爭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企圖粉碎黨，粉碎黨的統一。用蛻化的胡說來誣蔑黨的幹部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企圖推翻黨，打斷它的脊椎骨。是的，同志們，這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一場爭論。我們爭論得那樣熱烈，原因就在這裏。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出現了這次代表大會一致斥責反對派的綱領這個空前未有的事實，原因也在這裏。極嚴重的危險使黨緊密地團結起來了。

從歷史上考察一下反對派是有意義的。就從我們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說起吧。這是蘇維埃政權出現以後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一九一八年初）。在那次代表大會上領導反對派的就是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領導反對派的那些人物。當時所爭論的是戰爭與和平，是布列斯特和約。當時擁護反對派的人佔代表大會人數的四分之一。這總算不少了。難怪當時人們說到分裂。

兩年以後，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以同樣一些人物爲首的反對派在工會問題上又掀起了黨內鬥爭。那時擁護反對派的人佔代表大會人數的八分之一。這當然比四分之一少了。

此後又過了兩年，在閉幕不久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又爆發了新的鬥爭。在這次代表大會上也有反對派，但是他們在代表大會上連一票也沒有了。可見這對反對派已經十分不利了。

總之，反對派曾經三次企圖同黨的主要幹部作戰。第一次是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第二次是在第

十次代表大會上，第三次是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可是，反對派總是遭到失敗，每次都失去一些人，一步步縮小自己的隊伍。

所有這些事實說明什麼呢？第一、說明最近六年來我們黨的歷史是我們黨的多數黨員日益團結在黨的主要幹部周圍的歷史。第二、說明一批又一批的人逐步離開了反對派，而加入黨的基本核心，補充這一核心。由此得出一個結論：和以往的情形一樣，若干同志有可能脫離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沒有代表（我們這裏沒有比例選舉制）但在黨內無疑還有自己的擁護者的反對派，而加入黨的基本核心。

我們對這些反對派分子，或者確切些說，對這些過去的反對派分子的政策應當怎樣呢？應當完全以同志的態度對待他們。應當採取一切辦法，促使這些同志轉向黨的基本核心，和這個核心同心協力地進行工作。

（乙）關於爲紀念列寧而吸收黨員。爲紀念列寧而吸收黨員，即把二十五萬工人接收爲我們黨的新黨員這個事實說明了我們黨具有深刻的民主性：說明了我們黨實質上是工人階級選舉出來的機關，這一點我不打算多談。在這方面，爲紀念列寧而吸收黨員的意義無疑是巨大的。但是我今天要講的不是這一點。我要請你們注意的是最近我們黨內由於爲紀念列寧吸收黨員而出現的那種危險的迷戀。有些人說，必須再進一步，使黨員人數達到一百萬。另外一些人想前進得更遠些，硬說達到兩百萬才好。我相信還會有第三種人，他們想前進得更遠。同志們，這是危險的迷戀。世界上最大的軍隊

之所以覆滅，往往是由於過分迷戀，過多地佔有，後來不能消化所佔有的東西而土崩瓦解。最大的黨如果迷戀起來，過多地佔有，後來不能包容和消化所佔有的東西，也是會滅亡的。你們自己判斷吧。我們黨內政治文盲達到百分之六十。有百分之六十的政治文盲，這是在爲紀念列寧而吸收黨員以前的情況，在這以後恐怕要達到百分之八十了。同志們，不是該停止的時候了嗎？不是該以八十萬黨員爲限，尖銳而肯定地提出改善黨員質量，以列寧主義基礎教育那些爲紀念列寧而吸收的黨員，使他們成爲覺悟的列寧主義者等等問題的時候了嗎？我認爲是時候了。

(丙)關於黨的領導的民主化。爲紀念列寧而吸收黨員這件事說明了我們黨的深刻的民主性，說明了黨的基本支部的無產階級成分，說明了千百萬非黨羣衆對我們黨的無可置疑的信任。但是，我們黨的民主性不限於此。這僅僅是民主性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是黨的領導本身正在逐步民主化。在代表大會上已經表明，黨的領導的重心日益由狹小的上層和各個局向廣大的組織，向地方組織和中央組織的全體會議轉移，同時這些全體會議本身在擴大，它們的成分在改善。你們大概知道，我們領導組織的發展中的這種趨向，代表大會是完全贊同的。這一切說明什麼呢？說明我們的領導組織已經開始把自己所有的根伸展到無產階級羣衆的深處去。從我們黨的中央委員的數量和社會成分方面來考察一下我們黨中央最近六年來的發展是很有意義的。在第七次代表大會時期（一九一八年），我們中央由十五個委員組成，其中工人只有一個（佔百分之七），而知識分子有十四個（佔百分之九十三）。這是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情形。而現在，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以後，中央已經由五十四個委員

組成，其中有二十九個工人（佔百分之五十三）和二十五個知識分子（佔百分之四十七）。這是黨的基本領導民主化的鮮明標誌。

（丁）關於一般理論，特別是關於列寧主義的宣傳。我們黨的危險的缺點之一，就是黨員的理論水平低落。原因是實際工作過於繁忙，打消了理論學習的熱望，滋長了某種至少是不關心理論問題的危險的態度。舉幾個例子來談。

不久以前，我在報上讀到了一位同志關於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報告（大概是加米涅夫），上面清清楚楚地寫着，我們黨的當前口號是變『耐普曼的俄國』為社會主義的俄國。而且更壞的是把這個奇怪的口號便加在列寧身上而不是硬加在別人身上。正是這樣！可是大家知道，列寧沒有說過而且也不會說這樣的話，因為大家知道，『耐普曼的』俄國在天地間是不存在的。固然，列寧說過『新經濟政策的』俄國。但是，『新經濟政策的』俄國（即實行新經濟政策的蘇維埃俄國）是一回事，而『耐普曼的』俄國（即耐普曼統治的俄國）完全是另一回事。加米涅夫是否懂得這個原則上的差別呢？當然是懂得的。那末，為什麼他當時脫口說出這個奇怪的口號呢？因為平常不關心理論問題，不關心確切的理論定義。但是，如果錯誤不加糾正，這個奇怪的口號就很可能在黨內產生一大堆誤解。

再舉一個例子。常常有人說，在我國是『黨的專政』。有人說我贊成黨的專政。我記得在我們代表大會的一項決議中，似乎是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中，曾經用過這樣的語句，這當然是由於疏忽。看來同志們中間有人認為我國是黨的專政，而不是工人階級專政。但是，同志們，這是胡說。如

果這是對的，那末列寧當時教導我們說蘇維埃實現專政而黨領導蘇維埃，就是錯的了。列寧當時說無產階級專政而不說黨的專政，也是錯的了。如果這是對的，那末當時就不需要蘇維埃了，當時列寧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就不用不着說必須『劉清黨的機關和蘇維埃機關的界限』了。可是，這種胡說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是怎樣滲入黨內的呢？這是由於對『黨性』的迷戀，而這種迷戀正是對不帶引號的黨性爲害最大；這是由於不關心理論問題；這是由於在提出口號以前缺乏思考的習慣，因爲只要稍微想一想，就會明白用黨的專政來頂替階級專政是十分荒謬的。這種荒謬的做法會在黨內產生混亂思想和糊塗觀念，這還用得着證明嗎？

還有，大家知道，在爭論期間，我們黨內一部分人上了反對派分子反對列寧主義組織原則的反黨宣傳的當。任何一個進過最短期的列寧主義理論學校的布爾什維克都會一下子看出，反對派的說教和列寧主義毫無共同之點。但是，大家知道，黨內一部分人未能一下子看清反對派的真面目。這是什麼原因呢？這仍然是因爲不關心理論，因爲我們黨員的理論水平低。

爭論已經把研究列寧主義的問題提到日程上來了。列寧的逝世使這個問題更感到迫切，加強了黨員對理論的興趣。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在若干決議中肯定了研究和宣傳列寧主義的必要性，不過是反映了這種情緒。黨的任務在於利用對理論問題的日益增長的興趣，採取一切辦法把黨的理論水平終於提到應有的高度。不應當忘記列寧的話：沒有明白而正確的理論就不會有正確的實踐。

關於縣級工作人員的任務

同志們！我特地來給你們做關於代表大會的報告，這不是偶然的。我來給你們做報告，不僅是爲你們希望這樣，而且還因爲在發展的現階段，縣特別是縣級工作人員是黨和農民間、城市和鄉村間的聯系的基本環節。而你們知道得很清楚，建立城鄉間的結合是現在我們黨和國家的實踐的基本問題。

我在上面說過，建立國營工業和農民經濟間的結合必須從消費合作社、農業合作社和基層信用合作社這三個主要方面做起。我說過，這三條孔道是建立結合的基本孔道。但是，如果以爲現在就可以越過縣而直接通過鄉來把工業同農民經濟結合起來，那就是幻想。用不着證明，我們沒有足夠的人力、本領和財力來這樣做。因此，目前城鄉結合的樞紐還是縣和專區。爲了在商業方面鞏固起來，完全不需要把最後一個店主從最後一個鄉擠出去，只需要把縣變爲蘇維埃商業的基地，使所有的店主都不得不圍繞縣的合作社和蘇維埃商店轉，就像行星圍繞太陽轉一樣。爲了掌握信貸，現在也完全不需要把信用合作社網撤滿鄉和村，只要在縣裏建立基地，就足以使農民立即開始脫離富農和高利貸者。如此等等。

簡單地說，在最近期間，縣（專區）應當變爲建立城市和鄉村間、無產階級和農民間的結合的主

要基地。

這種轉變的快慢取決於你們縣級工作人員同志們。現在你們有三百人。這是一支大軍。只有依靠你們和你們在全國各縣的同志，才能在最近期間使縣成爲我們黨和國家在建立工業和農民經濟間的結合方面的工作樞紐。我相信縣級工作人員一定能履行自己對黨和國家的義務。

載於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九日和二十日

『真理報』第一三六號和第一三七號

論工人通訊員

(和「工人通訊員」雜誌(舊)工作人員的談話)

工人參加辦報的意義首先在於使報紙這樣一個銳利的階級鬥爭武器能够從奴役人民的武器變爲解放人民的武器。只有工人通訊員和農村通訊員才能實現這個偉大的轉變。

只有作爲有組織的力量，工人通訊員和農村通訊員才能在報刊發展的進程中起無產階級輿論的表達者和傳播者的作用，起蘇維埃社會缺點的揭發者的作用，起改進我們建設的不知疲倦的戰士的作用。

工人通訊員是由工人大會選舉呢，還是由編輯部挑選？依我看，第二種方法（由編輯部挑選）是比較合適的。基本原則應該是通訊員有獨立性，他不受在自己的工作中與之有某種接觸的機關和人們的支配，然而這決不是說他不受那種叫做無產階級輿論的、不可捉摸的但是不斷發生作用的力量支配，因爲工人通訊員應該是這種力量的傳播者。

不能把工人通訊員和農村通訊員看做僅僅是狹義的將來的新聞記者或者工廠的社會活動家。他們首先是我們蘇維埃社會的缺點的揭發者，是消除這些缺點的戰士，是無產階級輿論的指揮員，他們

竭力引導這個莫大的動力的無窮力量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困難事業中幫助黨和蘇維埃政權。

由此就產生了工人通訊員和農村通訊員的教育問題。教給工人通訊員和農村通訊員某些最低限度的新聞技術當然是必要的。但是主要的不在這裏。主要的在於使工人通訊員和農村通訊員在自己的工作進程中學習，並鍛鍊出新聞記者——社會活動家的敏銳，沒有這種敏銳，通訊員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而這種敏銳是不可能用人工訓練的技術方法培養出來的。

對工人通訊員和農村通訊員的直接的思想領導應當由同黨有聯系的報紙編輯部來進行。通訊檢查應當集中在報紙編輯部手中。

迫害工人通訊員和農村通訊員是野蠻行為，是資產階級習氣的殘餘。報紙應當擔負起保護自己的通訊員不受迫害的責任，因為只有報紙才能够展開激烈的揭露性的鼓動來反對黑暗勢力。

祝『工人通訊員』雜誌在各方面獲得成就。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二四年六月

『工人通訊員』雜誌第六期

關於波蘭共產黨

(一九二四年七月三日在共產國際

波蘭委員會(委員會)的演說)

同志們！我沒有足夠的材料能像某些發言人那樣肯定地談。雖然如此，根據我終於得到的材料和這裏的討論，我有了一定的看法，我想把我的看法和你們談談。

毫無疑問，波蘭共產黨正處在不正常的狀態中。波蘭黨的內部存在着危機，這是事實。瓦列茨基承認這一點，你們大家也承認這一點，並且這一點也清清楚楚地表現出來了，因為這裏已經確認為波蘭黨中央委員會內部，在擔任實際工作的中央委員和中央委員會的領導者之間不協調。不僅如此，波蘭黨中央委員會本身在去年十二月全會和今年三月全會的決議中也承認了自己一系列行動的機會主義性，並直截了當地斥責了這些行動。看來已經儘够了。我再重複一遍，這一切都說明波蘭共產黨內確實存在着危機。

產生這個危機的原因何在呢？

原因在於波蘭共產黨的正式領導者在實際工作中有某些機會主義錯誤。

請允許我舉出幾個例子來證實這種說法。

『俄國』問題。有些波蘭同志說，這個問題是對外交政策問題，對波蘭黨沒有重大意義。這是不對的。『俄國』問題對西方和東方的一切革命運動都有決定意義。爲什麼呢？因爲俄國的蘇維埃政權是全世界革命運動的根據地，堡壘和保護者。如果在這個根據地，即在俄國，黨和政權開始動搖，那就是說，全世界的整個革命運動必然會遭到極嚴重的損害。

在我們俄國共產黨（布）內發生爭論的期間，黨內開始動搖了。具有機會主義本質的反對派以其反黨的鬥爭來動搖黨，削弱黨，從而削弱蘇維埃政權，因爲我們黨是執政黨，它是國家政權的基本領導力量。俄國共產黨（布）內的動搖自然會進而導致蘇維埃政權的動搖和削弱。而蘇維埃政權的動搖就是對全世界革命運動的損害。正因爲如此，俄國共產黨（布）內的意見分歧和俄國共產黨（布）的整個命運對其他國家革命運動的命運不能沒有直接的關係。這就是爲什麼『俄國』問題雖然對波蘭來說是一個外部問題，但對各國共產黨（其中包括波蘭共產黨）來說却是一個頭等重要的問題。

那末，波蘭黨的領袖們是怎樣對待『俄國』問題的呢？他們支持了誰？支持了機會主義的反對派還是支持了俄國共產黨（布）內的革命的多數呢？我很清楚，在俄共（布）黨內鬥爭的初期，即同機會主義的反對派作鬥爭的初期，波蘭黨的領袖們毫不含糊地支持了反對派。我不來詳細分析瓦爾斯基或瓦列茨基，因爲瓦爾斯基在他起草波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支持俄國共產黨（布）內的反對派的那個大家都知道的決議時所想的是什麼，對我來說並不重要。對我來說重要的首先不是個人的意願，而

是這個決議的客觀效果。這個決議的客觀效果歸結起來就是助長了反對派的聲勢。這個決議是對俄國共產黨（布）內的機會主義派的支持。全部問題就在這裏。在波蘭黨中央委員會通過了這個決議並把它送交俄國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的時期，波蘭黨中央委員會就成了俄國共產黨（布）內的機會主義反對派的波蘭支部。如果把俄國共產黨（布）內反對派看做必須在各國設有分公司的某個公司，那末波蘭共產黨當時就是這個公司的波蘭分公司。波蘭黨的領導者們在「俄國」問題上的機會主義罪行的實質就在這裏。這是令人痛心的，但可惜這是事實。

德國問題。德國問題是繼「俄國」問題之後的一個具有極重大意義的問題，第一、因為在所有的歐洲國家中，德國孕育着革命的程度最大，第二、因為德國革命的勝利就是整個歐洲的勝利。如果歐洲的革命動盪要從某一端開始，那就是從德國開始。只有德國能够在這方面首先發動，德國革命的勝利就是國際革命勝利的保證。

你們知道，去年在德國共產黨內，革命的多數和機會主義的少數之間的鬥爭激烈起來了。你們知道，德國共產黨的左翼或右翼的勝利對整個國際革命進程會有多大的意義。結果怎樣呢？在這場鬥爭中波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領導者們支持了誰呢？他們支持了布蘭德勒集團（等），反對德國共產黨的革命的多數。現在所有的人，不論是朋友或敵人都承認這一點。結果也同「俄國」問題上的情況一樣。假定說，在德國存在着一個共產黨機會主義反對派的公司，那末波蘭的領導者就是這個公司的波蘭分公司。這也是令人痛心的，但事實是不能違拗的：事實是必須承認的。

關於同機會主義反對派鬥爭的方法。柯斯特爾熱瓦說，他們，即波蘭中央委員會的領導者們，實際上支持俄國中央委員會，大概也支持由現在的成員組成的德國中央委員會，但是在同反對派鬥爭的方法問題上和這兩個機關有分歧。你們看到沒有，他們要求對反對派採取溫和的鬥爭方法。他們贊成同反對派作戰，但是他們贊成的是不會招致犧牲的戰爭。瓦列茨基竟叫喊說：請原諒，我們支持『三人小組』！我必須說明，誰也沒有要求瓦列茨基在一切問題上都附和俄國中央委員會。並且，我不知道瓦列茨基如此賣力討好的『三人小組』是什麼。他忘記了，誰也不一定要在一切問題上都附和俄國中央委員會。（瓦列茨基在座位上說：『不一定要這樣做，但是我可以這樣做。』）當然，你可以這樣做，但是也應當懂得，這樣做既使瓦列茨基也使俄國中央委員會處於難堪的境地。問題完全不在於附和與否，而在於俄國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產生了新資產階級，他們不可能在政治舞台上公開活動，於是就在俄國共產黨（布）的領導者中間尋找自己的英雄，竭力從內部來突破共產主義戰綫。而這種情況就使俄國共產黨（布）內部產生了反對派的情緒，給機會主義傾向建立了基礎。因此，問題在於我們的兄弟黨要確定自己對這種情況的態度，採取明確的立場。我再重複一遍，問題在這裏，而不在於附和俄國中央委員會與否。

至於柯斯特爾熱瓦的溫和的方法，那末應當說，它是經不起一駁的。柯斯特爾熱瓦贊成同機會主義反對派作鬥爭，但是他贊成的是不會破壞反對派首領的威信的鬥爭。然而，第一、歷史上未曾有過這種不會招致某些犧牲的鬥爭；第二、要戰勝反對派，就不能不估計到勝利會破壞反對派首領的威

信，否則就只好不同反對派作任何鬥爭；第二、徹底戰勝反對派是避免分裂的唯一保障。黨的實踐不知道有其他的保障。俄國共產黨（布）的全部歷史說明了這一點。

還在戰前，當德國社會民主黨是正統派的時候，它就是用柯斯特爾熱瓦在這裏所說的那種溫和的方法同機會主義進行鬥爭的。但是它這樣做的結果，機會主義成了勝利者，而分裂成爲不可避免的。

俄國共產黨（布）是用堅決孤立機會主義首領這個久經考驗的方法同機會主義進行鬥爭的。結果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取得了勝利，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

我認爲俄國共產黨（布）的教訓對我們應該是有大教益的。柯斯特爾熱瓦推薦的鬥爭方法是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的復活。它孕育着黨內分裂的危險。

最後，關於黨的領導問題。日前西方共產黨發展中的特點是什麼呢？特點是：黨面臨着按照新的革命的軌範改變黨的實踐的問題。這裏不是指通過共產主義綱領和宣佈革命口號。這裏指的是把黨的日常工作、黨的實踐加以改變，使黨的每一個步驟和黨的每一個行動自然而然導向對羣衆進行革命教育，導向準備革命。現在問題的實質就在這裏，而不在於通過革命的指示。

普魯赫尼亞克昨天在這裏宣讀了波蘭中央委員會領導者們通過的一大串革命決議。他以勝利的神情宣讀了這些決議，認爲黨的領導就在於制定決議。他並沒有想到制定決議只是黨的領導的第一步，黨的領導的開始。他不懂得領導的基礎不在於制定決議，而在於執行決議，在於實現決議。因此，

他在冗長的演說中竟忘記告訴我們這些決議的命運，他不認為有必要談談波蘭共產黨是不是執行了這些決議，執行的程度如何。但是，黨的領導的實質正是在於執行決議和指示。看着他，我就想起了在檢查委員會面前『答辯』的常見的蘇維埃官僚。檢查委員會問：『某個指示執行了嗎？』官僚回答說：『採取了措施。』檢查委員會問：『採取了什麼措施。』官僚回答說：『下了命令。』檢查委員會要文件。官僚以勝利的神情拿出了命令的副本。檢查委員會問：『命令的命運怎樣，它是不是執行了，什麼時候執行的？』這位官僚瞪大了眼睛說：『還沒有消息。』當然，檢查委員會給了這樣的官僚以處分。當普魯赫尼亞克在這裏以勝利的神情宣讀執行情況還『沒有消息』的革命決議的時候，他使我想起的就是這位蘇維埃官僚。這不是黨的領導，而是對一切領導的嘲笑。

結論究竟是什麼呢？結論歸結如下：

第一、我堅決反對在波蘭即將舉行的黨的爭論中，在過去的波蘭社會黨和波蘭社會民主黨之間築起一道分水嶺。這對黨是危險的。過去的波蘭社會黨和波蘭社會民主黨早就融合為統一的黨了，它們在共同進行反對波蘭的地主和資產階級的鬥爭，現在如果追溯以往而把它們分成兩個部分，那就是極大的錯誤。鬥爭不應該按照波蘭社會黨和波蘭社會民主黨的舊路綫進行，而應該按照孤立波蘭共產黨內的機會主義派的新路綫進行。徹底戰勝機會主義派就是避免分裂的保障，就是黨的團結的保證。

第二、我堅決反對所謂割除的辦法，即反對取消某些中央委員的中央委員資格。我根本反對從上

而來改組中央委員會。完全應該考慮到，沒有特別需要而施行外科手術會在黨內留下不好的後果。讓波蘭共產黨自己在即將舉行的代表大會或代表會議上改組自己的中央委員會。日益發展的黨不會不選拔出新的領袖。

第三、我認爲溫什里赫提出的實際建議是完全正確的。推選出由現在的波蘭中央委員組成的政治上和實踐上統一領導的中央來代替彼此分離的組織局和政治局，是完全合理的。

這裏有人對波蘭革命鬥爭中產生的新領導者的理論知識和黨的經驗表示懷疑。我認爲這種情況不會有決定意義。在俄國共產黨（布）的生活中往往有這樣的情況：理論知識和政治知識不足的工人成了一些最大的區域組織的領導者。可是這些工人和許多缺乏必要的革命嗅覺的知識分子相比，却是優秀的領導者。在最初一個時候，新領導者的工作進行得不十分順利，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這沒有什麼關係，跌一兩次交，就能學會領導革命運動。成熟的領導者決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他們只是在鬥爭進程中成長起來的。

載於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日

「布爾什維克」雜誌第十一期

給傑米楊·別德內依同志的信

親愛的傑米楊！

給你的信寫得太遲了。你有權利罵我。可是你一定知道，說到寫信，我是一個少有的懶漢。我逐點來談。

一、你有『愉快的情緒』，這很好。『厭世』哲學不是我們的哲學。讓衰亡的人和垂死的人去悲哀吧。美國人惠特曼十分確切地表達了我們的哲學：『我們活着！未用盡的力量的火燄使我們的鮮血沸騰。』正是這樣，傑米楊。

二、你寫道：『又怕得罪人，又得去治病。』我的意見是：得罪幾個來訪的人比不去好好地治病要好些。治病，治病，一定要治病。不得罪來訪的人，這是片刻的利益。稍微得罪他們一下，去認真治病，這却是比較長遠的利益。本來，機會主義者和他們相反的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們把第一種利益置於第二種利益之上。不用說，你是不會學機會主義者的樣子的。

三、你寫道：『你給縣委書記們做的報告』裏的寬恕的口氣不是沒有權變的成分的。『確切些說，其中是有政策的，一般說來，政策總不免帶有某種權變的成分。我認為既然把反對派首領們打得落花

流水了，我們，就是說黨，對普通的和中等的反對派分子的語氣應該溫和一些，好促使他們離開反對派首領們。讓將軍沒有軍隊——主要目的就在這裏。現在反對派在黨內有四五萬人，其中大多數想丟開自己的首領們，但是，他們的自尊心或者某些擁護中央的人的粗暴和驕矜妨礙他們這樣做。某些擁護中央的人的冷嘲熱諷觸怒了普通的反對派分子，因而妨礙了他們轉到我們這方面來。我的報告的『語氣』就是針對這些擁護中央的人的。既然反對派首領們在全世界面前丟盡了臉，這樣做而且只有這樣做才能擊潰反對派。

四、你問：『收成會不會使我們困難。』收成已經使我們有些困難了。去年我們收穫了（總收穫量）二十七億多普特，今年預料要少收兩億普特。這對出口當然是一個打擊。歉收的農戶現在確實比一九二一年少了五分之四，因此，我們不用特別費力就能靠我們自己的力量來對付這個不幸。這一點你不必懷疑。但是打擊仍然是打擊。然而人們常常會因禍得福。我們決定利用農民的堅定的決心盡一切可能來預防將來意外的旱災，我們將竭力設法利用這種決心來實行（同農民一起）改良土壤，改進農業技術等等果斷的措施。我們打算首先在薩馬拉——薩拉托夫——察里津——阿斯特拉罕——斯塔夫羅波里地區建立一個最低限度必要的土壤改良區。我們爲這個事業準備了一千五百萬至兩千萬盧布。明年我們要轉向南方各省。這將是我國農業革命的開端。地方上的人說，農民是會大力支持的。天不

打雷，農民是不會劃十字的。爲了把農業提到最高程度，爲了使我國能够時刻預防意外的天氣，讓旱災鞭撻我們一下看來是必要的。高爾察克教會了我們建立步兵，鄂尼金教會了我們建立騎兵，旱災正在教我們建設農業。這就是歷史的道路。這裏並沒有什麼不自然的東西。

五、你寫道：『請來吧。』可惜我不能來，因爲沒有時間。我勸你安排『到巴庫去玩一趟』，——這是必要的。梯弗里斯並不怎麼有意思，雖然它在外表上比巴庫誘人。如果你還沒有看見過林立的石油井架，那末你就是『什麼也沒有看到過』。我相信巴庫能提供你極豐富的材料來創作像『牽引力』^(五)這樣的傑作。

在我們莫斯科，一連串代表大會的時期還沒有過去。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和討論當然是好的，但是老實說，這不過是裝飾品。我們大家在這裏同西方的代表（以及東方的代表）進行的親切談話要有意思想得多。我同德國的、法國的、波蘭的工人作了長時間的談話。極好的革命『材料』從各方面都可以看出，在西方，真正的革命仇恨，對資產階級制度的仇恨，正在日益加深。我很高興聽到他們希望在本國『按照俄國方式實行革命』的純樸而有力的話。這是一些新型的工人。這樣的工人在我們的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上還不會有過。當然，距離實行革命還不怎麼近，但是正在走向革命，——這一點是不必懷疑的。這些工人還有一個特點使我感動：他們對我們國家懷着熱誠而強烈的幾乎是母性的愛，對於我們黨的正確、能力和威力無限信任。不久以前的懷疑已經消失殆盡了。這也不是偶然的。這也是革命日益發展的標誌。

正是這樣，傑米揚。

好吧，談得夠了，再見。緊握你的手。

• 你的 約·斯大林

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五日

第一次刊印

論雅·米·斯維爾德洛夫

有些無產階級的領袖，報刊上並不宣揚他們，也許因為他們本人不喜歡宣揚自己，但他們却是革命運動的血液和真正的領導者。雅·米·斯維爾德洛夫就屬於這一類領袖。

一個十全十美的組織者，按性格，按作風，按革命教育，按敏覺性來說都不愧為一個組織者；在自己的全部沸騰般的活動中都表現出自己是一個組織者，——這就是雅·米·斯維爾德洛夫的形象。

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的我國條件下做一個領袖和組織者是什麼意思呢？這不是挑選助手，建立辦公室並通過辦公室來發號施令。在我國條件下做一個領袖和組織者，就是第一、了解工作人員，善於掌握他們的優缺點，善於使用工作人員；第二、能够這樣配備工作人員；

(一) 使每一個工作人員感到自己適得其所；

(二) 使每一個工作人員一般能按他們個人的才能對革命做出最大的貢獻；

(三) 這樣配備工作人員的結果不是使整個工作停頓，而是使整個工作協調、一致、普遍提高；

(四) 這樣組織起來的工作的總方向是要體現和實現把工作人員配備到合適的崗位上去的那種政治思想。

雅·米·斯維爾德洛夫正是我們黨和我們國家的這種領袖和組織者。

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這段時期是黨和國家的轉變時期。黨在這個時期第一次成爲執政力量。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新的政權——蘇維埃政權，即工農政權。把以前秘密的黨轉到新的軌道上，建立新的無產階級國家的組織基礎，找出黨和蘇維埃之間的相互關係的組織形式，從而保證黨的領導，保證蘇維埃的正常發展，——這就是當時擺在黨面前的極複雜的組織任務。黨內沒有人敢否認，雅·米·斯維爾德洛夫是巧妙地順利地解決建設新俄國這個組織任務的最初幾個人中的一個，甚至是第一個。

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和代理人喜歡重複他們的陳詞濫調：布爾什維克不會建設，他們只會破壞。雅·米·斯維爾德洛夫和他的全部工作就是對這些胡說的生動有力的駁斥。在我們黨內，出現雅·米·斯維爾德洛夫和他的工作並不是偶然的。產生了像雅·米·斯維爾德洛夫這樣偉大的建設者的黨能够大胆地說：它既善於破壞舊制度，也善於建設新制度。

我決不是認爲我完全熟悉我們黨的所有組織者和建設者，但是我必須說，在我所熟悉的一切傑出的組織者中間，我知道繼列寧之後只有兩個人是我們黨可以而且應該引以自豪的：一個是在土魯漢斯克流放地逝世的約·費·杜勃洛文斯基，一個是在黨和國家的建設工作中燃燒盡了的雅·

米·斯維爾德洛夫。

載於一九二四年十二月

「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第十一期

(總第三十四期)

署名：約·斯大林

論國際形勢

我認爲，爲了說明目前的國際形勢，絲毫沒有必要把所有稍微重大的事情和現今國際事務中的一切特點都加以估計。爲了說明目前的國際形勢，只需要估計一下目前基本的有決定意義的問題。依我看來，現在這樣的問題有三個：

(甲) 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和平主義』『時代』的到來；

(乙) 美國對歐洲事務的干涉和協約國的倫敦賠款協定；

(丙) 歐洲工人運動中左的因素的加強和蘇聯國際威信的提高。

我們來看看這幾個基本問題。

一 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和平主義』時代

協約國已經顯得無力處理自己的軍事勝利的果實。擊潰德國和包圍蘇聯，它完全做到了。制定掠奪歐洲的計劃，它也做到了。協約國各國無數的會議和條約都證明了這一點。但是要執行掠奪計

劃，它就顯得無力了。爲什麼呢？因爲協約國各國之間的矛盾太大了。因爲它們在分贓問題上過去沒有談好，今後也不能談好。因爲被掠奪的國家的反抗越來越厲害。因爲掠奪計劃的實現包含着軍事衝突，而羣衆是不願意打仗的。現在『大家』都很清楚，爲了消滅德國而進行的對魯爾的帝國主義正面攻擊，對帝國主義本身也是危險的。同樣很清楚，爲了孤立蘇聯而實行的露骨的帝國主義最後通牒政策，只能得到相反的結果。已經形成了這種局面：彭加勒和克遜雖然忠心耿耿地爲帝國主義效勞，但是他們的『工作』加劇了歐洲日益增長的危機，激起了羣衆對帝國主義的反抗，推動了羣衆去進行革命。因此，資產階級必然會從正面攻擊的政策轉到妥協政策，從露骨的帝國主義轉到隱蔽的帝國主義，從彭加勒和克遜轉到麥克唐納和赫里歐。明目張胆地掠奪世界已經不無危險了。英國的工黨和法國的左派聯盟〔英〕必須掩飾帝國主義的真面目。這就是『和平主義』和『民主主義』的來源。

有些人認爲資產階級奉行『和平主義』和『民主主義』不是由於必要，而是出於自願，出於所謂自由的選擇。並且推想，資產階級在決定性的戰鬥中（意大利和德國）擊潰了工人階級以後感到自己是勝利者；因而現在能够奉行『民主主義』。換句話說，當決定性的戰鬥進行的時候，資產階級需要戰鬥的組織，即需要法西斯主義，而現在當無產階級已被擊潰的時候，資產階級就不再需要法西斯主義，它可以川『民主主義』這一鞏固自己勝利的更好的方法來代替法西斯主義。由此就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資產階級的政權鞏固了，『和平主義的時代』應該認爲是長期的，而歐洲的革命則將無限期地擱置下來。

這種推想是完全不正確的。

第一、認為法西斯主義只是資產階級的戰鬥組織是不對的。法西斯主義不只是一種軍事技術範疇。法西斯主義是依靠社會民主黨積極支持的資產階級的戰鬥組織。社會民主黨在客觀上是法西斯主義的溫和派。沒有根據推想，資產階級的戰鬥組織沒有社會民主黨的積極支持，而能在戰鬥中或者在管理國家中獲得決定性的勝利。同樣也很少有根據認為，社會民主黨沒有資產階級戰鬥組織的積極支持，而能在戰鬥中或者在管理國家中獲得決定性的勝利。這些組織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補充的。它們不是死對頭，而是雙生子。法西斯主義是這兩個主要組織的無形的政治聯盟，它是在戰後帝國主義危機的情況下產生的，它的目的在於同無產階級革命作鬥爭。資產階級沒有這種聯盟就不能保住政權。因此，如果認為『和平主義』意味着法西斯主義的消滅，那就錯了。在目前情況下，『和平主義』意味着法西斯主義隨着它的溫和派社會民主黨的顯露頭角而鞏固起來。

第二、認為決定性的戰鬥已經發生過了，無產階級在這些戰鬥中已被擊潰，資產階級政權因此鞏固了，這是不對的。決定性的戰鬥還沒有發生過，這至少是因為還不會有能够引導無產階級實行專政的羣衆性的真正布爾什維克黨。沒有這樣的黨，要在帝國主義條件下進行爭取專政的決定性戰鬥是不可能的。西方的決定性戰鬥還是將來的事情。發生過的僅僅是被資產階級擊退了的最初幾次嚴重攻擊，僅僅是對力量的最初一次嚴重檢驗，這次檢驗表明，無產階級還不能推翻資產階級，而資產階級也已經不能忽視無產階級了。正因為資產階級已經不能使工人階級屈服，它就不得不放棄正面攻

擊而採取迂迴的方法，實行妥協，奉行『民主主義的和平主義』。

最後，認為『和平主義』是資產階級強大的標誌而不是它軟弱的標誌，認為實行『和平主義』一定會使資產階級政權鞏固而使革命無限期地延遲，這也是不對的。目前的和平主義意味着第二國際各黨直接或間接地執掌政權。但是，第二國際各黨執掌政權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它們必然會揭露自己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是無產階級的叛徒，因為這些政黨的執政活動只會產生一個結果：使它們在政治上破產，使它們的內部矛盾加劇，使它們土崩瓦解。而這些政黨的瓦解必然會導致資產階級政權的瓦解，因為第二國際各黨是帝國主義的支柱。沒有特別的必要，資產階級會不會出於自願地來進行這種冒險的奉行和平主義的試驗呢？當然不會！在帝國主義戰爭以後的時期內，資產階級進行過兩次奉行和平主義的試驗：第一次是在戰爭剛剛結束以後，當革命似乎已經迫在眉睫的時候；第二次是現在，在彭加勒和克遜的冒險試驗以後。資產階級這樣從和平主義投向狂妄的帝國主義和從狂妄的帝國主義投向和平主義，對帝國主義不會沒有影響，它把千百萬工人羣衆推出他們習慣的平常的軌道，它把無產階級中最落後的階層捲入政治，它促使他們革命化，這些有誰敢否認呢？當然，『民主主義的和平主義』還不是克倫斯基統治，因為克倫斯基統治是以兩個政權的並存爲前提，即以資產階級政權的瓦解和無產階級政權基礎的產生爲前提的。但是，和平主義意味着人民羣衆的高度覺醒，他們被捲入政治，和平主義動搖着資產階級的政權並爲革命動盪準備條件，——這一點是未必可以懷疑的。正因爲如此，和平主義一定會使資產階級政權削弱，而不會使它鞏固，一定會加速革命的到

來，而不會使它無限期地延遲下去。

當然，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和平主義對革命不是嚴重的危險。和平主義會破壞資產階級政權的基礎，它爲革命準備有利條件。但是，只有違反『和平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本身的意志，只有在共產黨對赫里歐、麥克唐納的和平主義民主主義政權的帝國主義和反革命的本質進行有力的揭露工作的條件下，和平主義才能產生這種結果。至於和平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本身的意志，至於帝國主義分子本身的政策，那末他們奉行和平主義只是追求一個目的：爲了準備新的戰爭而用和平這種響亮的詞句來欺騙羣衆；爲了確立資產階級的專政而用『民主主義』的光輝來眩惑羣衆；爲了更有效地準備對中國進行武裝干涉，在阿富汗和蘇丹進行屠殺，瓜分波斯，而用關於民族和國家的『主』權的高調來麻醉羣衆；爲了同那些被驅逐出俄國的反革命陰謀家更緊密地勾結起來在白俄羅斯、烏克蘭、格魯吉亞進行土匪式的騷擾，而用同蘇聯建立『友好』關係，同蘇維埃政權締結某些『條約』這種冠冕堂皇的廢話來愚弄羣衆。資產階級需要和平主義是爲了打掩護。和平主義的主要危險就在於這種掩護作用。資產階級能不能達到欺騙人民的目的，這取決於西方和東方的共產黨進行揭露工作的能力，取決於西方和東方的共產黨摘下穿着和平主義法衣的帝國主義分子的假面具的本領。毫無疑問，事變和實踐在這方面將有利於共產黨員，因爲它們將暴露出資本的民主主義奴僕的和平主義言論和他們的帝國主義行動是不符合的。共產黨員的任務就是不落後於事變，無情地揭露第二國際各黨爲帝國主義效勞和背叛無產階級的每一個步驟和每一個行動。

二 美國對歐洲事務的干涉和協約國的倫敦賠款協定

協約國倫敦會議(2)非常充分地表現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和平主義的欺騙和虛偽。如果說麥克唐納和赫里歐的上台執政和關於同蘇聯『建立正常關係』的喧嚷是掩飾和隱蔽歐洲殘酷的階級鬥爭和資產階級國家對蘇聯的勢不兩立的敵意，那末協約國的倫敦協定就是掩飾和隱蔽英國和法國奪取歐洲領導權的殊死鬥爭，英國和美國在爭奪世界市場的霸權中日益增長的矛盾以及德國人民反對協約國壓迫的非凡鬥爭。麥克唐納之流和列諾得爾之流叫喊說：階級之間再也沒有戰爭了，革命結束了，現在事情可以用階級合作來了結了。倫敦協定的朋友們和背叛工人階級事業的弟兄們，即和平主義的社會民主黨英雄們隨聲附和說：法國和英國之間、美國和英國之間、德國和協約國之間再也沒有鬥爭了，戰爭結束了，現在事情可以用美國領導下的普遍和平來了結了。

但是在協約國倫敦會議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在倫敦會議以前，賠款問題是由法國單獨決定的，在相當程度上是不取決於『盟國』的，因為法國在賠款委員會中佔有可靠的多數。佔領魯爾是在經濟上瓦解德國的手段，是法國從德國取得賠款，取得法國冶金工業用的煤炭和焦炭、法國化學工業用的化學半成品和顏料的保證，是亞爾薩斯的新織品免稅輸入德國的保證。這個計劃的目的是為法國在歐洲的軍事和經濟領導權建立物質基礎。但

是大家知道，這個計劃沒有實現。估領的方法只是產生了相反的結果。法國連稍微令人滿意的數量的賠款或實物賠償都沒有得到。最後，估領的發起人彭加勒本人也由於他的孕育着新戰爭和革命的露骨的帝國主義政策而被轟下台了。至於法國在歐洲的領導權所以沒有實現，那末這不僅由於估領和公開掠奪的方法取消了法國工業同德國工業之間的經濟結合的可能性，而且由於英國堅決反對這種結合，因為英國不會不知道，德國煤炭同法國金屬的結合不會不破壞英國的冶金工業。

協約國倫敦會議提出了什麼方法來代替這一切呢？

第一、會議擯棄了法國單獨決定賠款問題的方法，認為爭執的問題應當由美國代表主持的協約國代表組成的仲裁委員會最後解決。

第二、會議反對估領魯爾，認為必須進行經濟撤退（立即）和軍事撤退（一年後或一年內）。理由是：在現階段估領魯爾，從歐洲的政治情況來看是危險的，從有組織有步驟地掠奪德國來看是不合適的。而協約國是準備徹底地有步驟地掠奪德國的，——這一點是不必有任何懷疑的。

第三、會議擯棄了軍事干涉，完全贊同進行財政經濟的干涉，認為：

（甲）必須在德國設立由外國專員監督的發行銀行；

（乙）把在外國專員監督下經營的國家鐵路移交私人；

（丙）設立由協約國代表組成的所謂『移交委員會』，該委員會集中以德國貨幣支付的全部償付金，分撥德國賠款總額中的實物賠償部分，可以把某些償付金（在這些錢交給法國不合適的情況下）

投資到德國工業中去，從而獲得掌握德國金融市場的充分機會。

未必用得着證明，這就是把德國變為協約國的殖民地。

第四、會議承認法國在一定期間有向德國強制取得煤炭和化學製品的權利，但是會議又附帶說明，德國有向仲裁委員會要求減少甚至停止這種強制的實物賠償的權利。這樣就把法國的權利化為烏有，或者幾乎化為烏有了。

如果再加上英國銀行家和主要是美國銀行家貸給德國的八億馬克借款，如果再注意到在會議上發號施令的是銀行家，首先是美國銀行家，那末就會看到一個完整的情景：法國的領導權已經消失殆盡；法國的領導權為美國的領導權所代替了。

協約國倫敦會議的總結就是這樣。

有些人根據這一點認為：今後歐洲內部的利害矛盾在美國領導權面前一定會減弱；關心向歐洲輸出資本的美國為了使本國銀行家大發其財，能够使歐洲各國仰其配給，並迫使它們唯命是聽；因此，歐洲的和平，固然是強制的和平，可以認為在相當長的時期中是比較有保障的。這種推想是完全不正確的。

第一、會議是在主人即德國人民不在場的情況下解決德國問題的。當然可以『計劃』把德國變成永久的殖民地。但是現在，連落後的殖民地都很難使之順從的時候，企圖把德國這樣的國家變成真正的殖民地，那就是在歐洲埋下地雷。

第二、會議把推進太遠的法國往後拉了一些，因此，英國自然而然在歐洲佔了實際上的優勢。但是認為法國能够容忍英國佔優勢，那就是不顧事實，不顧事物的邏輯，而事物的邏輯通常比任何別的邏輯都顯得更有力量。

第三、會議承認了美國的領導權。但是美國資本所關心的是以資金供給法德工業，是最合理地利用法德工業，例如把法國的冶金工業和德國的煤礦工業聯合起來。未必可以懷疑，美國資本正是在這個對它最有利的方面利用它的優越地位。但是認為英國會容忍這種情況，那就是不了解英國，不了解英國如何重視自己的冶金工業的利益。

最後，歐洲不是孤立的地區，它和自己的殖民地聯系着，它靠榨取這些殖民地的脂膏活命。認為會議能使歐洲和殖民地之間的關係有什麼『好』轉，會議能制止或延緩它們之間的矛盾的發展，那就是相信奇蹟。

由此究竟得出什麼結論呢？

結論只有一個：倫敦會議沒有解決歐洲任何一個舊矛盾，反而給舊矛盾添加了一些新矛盾，即美國和英國之間的矛盾。毫無疑問，英國將用老辦法來加深法國和德國之間的對抗，以保證自己在大陸上的政治優勢。毫無疑問，美國也將加深英國和法國之間的對抗，以保證自己在世界市場上的領導權。至於德國和協約國之間極深刻的對抗，我就不談了。

世界的事變將由這些對抗來決定，而不由該處絞刑的尤茲和愛吹牛的赫里歐的『和平主義』言論

來決定。關於帝國主義國家發展不平衡和帝國主義戰爭不可避免的規律，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有效。倫敦會議只是掩飾這些對抗，爲它們空前未有的尖銳化造成新的前提。

三 歐洲工人運動中革命因素的加強。 蘇聯國際威信的提高

『和平主義的民主主義制度』不穩固的一個最可靠的標誌，這個『制度』本身是漂浮在工人階級內部極深刻的革命過程上面的泡沫的一個最明顯的標誌，應當認爲是德國、法國和俄國共產黨內的革命派的決定性勝利，英國工人運動中的左派的積極性的提高，以及蘇聯在西方和東方勞動羣衆中的威信的提高。

西方的共產黨是在特殊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第一、它們的成員是複雜的，因爲它們是由受過舊的訓練的以前的社會民主黨人和還沒有受過足夠的革命鍛鍊的年輕黨員組成的。第二、那裏的幹部不是純粹的布爾什維克幹部，因爲担任負責工作的是一些脫離其他黨派的人，他們還沒有徹底和社會民主主義的殘餘斷絕關係。第三、在它們面前有像閱歷很深的社會民主黨這樣老練的敵人，這個敵人在工人階級的隊伍中還是一個巨大的政治力量。最後，和它們對峙的有像歐洲資產階級這樣強大的敵人，這個敵人擁有可靠的國家機關和萬能的報刊。如果認爲這樣的共產黨『一夜工夫』就能够推

翻歐洲的資產階級制度，那就大錯特錯了。因此，當前的任務是：使西方的共產黨成為真正的布爾什維克黨，在這些黨內培養出能够以對羣衆進行革命教育的精神，以準備革命的精神來改變整個黨的實踐的真正的革命幹部。

還在不久以前，西方共產黨的情況就是這樣。但是最近半年來情況開始好轉了。最近半年來的情況值得注意的是：就肅清社會民主主義的殘餘來說，就黨的幹部布爾什維克化來說，就孤立機會主義分子來說，在西方共產黨的生活中起了根本變化。

共產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殘餘對革命會有什麼危險，這在薩克森工人政府(三)的慘痛經驗中很明顯地表現出來了，當時機會主義首領們企圖把統戰綫思想這個對羣衆進行革命動員和組織羣衆的手段變成社會民主主義議會活動的方法。這是喚醒黨員羣衆並激起他們反對機會主義首領們的轉折點。

破壞右派首領的威信而提拔新的革命的領袖的第二個問題應當認為是所謂「俄國」問題，即俄共(布)內的爭論。大家知道，德國的布蘭德勒集團和法國的蘇瓦林集團(二)堅決支持俄共(布)的機會主義反對派反對俄共(布)的主要幹部；反對俄共(布)的革命的多數。這是對顯然同情蘇維埃政權及其領導者——俄共(布)的西方革命工人羣衆的挑戰。這是對西方共產黨的黨員羣衆和革命派的挑戰。無怪乎這種挑戰的結果是布蘭德勒集團和蘇瓦林集團的徹底粉碎。無怪乎這個問題在西方其他一切共產黨內得到了反應。如果再加上俄共(布)內的機會主義派別完全孤立的事實，那末情況就全

面了。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三)只是確認了共產國際各主要支部的革命派的勝利。

毫無疑問，機會主義首領們的錯誤在加速西方共產黨的布爾什維克化方面起了顯著的作用。但是同樣毫無疑問，在這裏起作用的還有其他更深刻的原因：最近幾年來資本的順利進攻，工人階級生活條件的惡化，失業大軍的存在，資本主義的普遍的經濟不穩定，廣大工人羣衆中革命義憤的增長。工人正在走向革命，他們希望有革命的領袖。

總結：歐洲未來革命的支柱——西方真正的布爾什維克黨的最終形成過程開始了。這就是最近半年的總結。

西方工會的發展條件更艱難更特殊。

第一、它們局限於自己的『試驗過的』行會實踐並敵視社會主義，因為它們是在社會主義政黨建立以前產生的，是在沒有社會主義政黨幫助之下發展起來的，它們慣於以自己的『獨立性』自傲，把行會利益置於階級利益之上，除了『在一個盧布上加幾個戈比』以外什麼也不願意承認。

第二、它們在精神上保守並敵視一切革命創舉，因為領導它們的是舊的、賣身求榮的、受資產階級豢養的工會官僚，這些人隨時準備使工會爲帝國主義效勞。

最後，這些工會團結在阿姆斯特丹改良主義者的周圍，成爲現代資本主義制度所依恃的一支千百萬人的改良主義軍隊。

當然，除了阿姆斯特丹的反動工會，還有靠近工會國際（三）的革命工會。但是，第一、相當一部分革命工會不願造成工會運動的分裂，仍舊留在阿姆斯特丹工會聯合會（四）內，服從後者的紀律；第二、在歐洲的一些主要國家（英國、法國和德國）中，阿姆斯特丹分子仍然代表着工人的多數。不應當忘記，阿姆斯特丹團結着下一千四百萬按行業組織起來的工人。如果認為可以違反這千百萬工人的意志而在歐洲爭得無產階級專政，那就是犯了嚴重的錯誤，離開了列寧主義的基礎，使自己必然遭到失敗。因此，任務在於把這千百萬羣衆爭取到革命和共產主義方面來，使他們擺脫反動的工會官僚的影響，或者至少做到使他們對共產主義採取善意的中立立場。

最近以前的情況就是這樣。但是最近幾年來情況開始好轉了。曾經在世界市場上掌握工業資本主義領導權的英國是閉關自守的反動工會的故鄉。這種壟斷權的失落是同財政資本的發展相關聯的，因為財政資本的特徵是許多大國爭奪殖民地壟斷權。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為狹隘的反動工會擴大了地區，但是卻縮小了反動工會的物質基礎，因為帝國主義的超額利潤是許多國家爭奪的對象，而殖民地却越來越不甘心繼續處於殖民地的地位。也不應當忘記，戰爭大大地破壞了歐洲的生產。大家知道，現在歐洲的生產總額不超過戰前生產總額的百分之七十。因此，生產縮減，資本對工人階級的進攻取得勝利。因此，工資減少，八小時工作制實際上被取消，再一次表明工會官僚背叛工人階級的許多次防禦性的罷工遭到失敗。因此，大批工人失業，工人對反動工會的不滿日益加劇。因此，產生了工人階級在經濟鬥爭方面的統一戰綫思想和把兩個工會國際聯合成一個能夠對資本組織

反擊的工會國際的計劃。改良主義者在阿姆斯特丹國際維也納代表大會（一九二四年六月）上關於同『俄國』工會進行談判的講話和英國工會在工聯代表大會（一九二四年九月初）上關於工會統一的號召，只是反映了羣衆對反動的工會官僚的壓力日益加強。在這一切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應該認為是下面的事實：正是英國工會這個保守主義的巢穴和阿姆斯特丹的基本核心倡議把反動的工會和革命的工會聯合起來。英國工人運動中左的因素的出現是說明『在他們那裏』，即在阿姆斯特丹並不是諸事如意的最可靠的標誌。

有些人認為聯合工會的運動正是目前所必需的，因為在阿姆斯特丹出現了絕對需要一切力量和一切方法予以支持的左的因素。這是不對的，或者確切些說，這只有一部分是對的。問題在於西方的共產黨正在成為羣衆性的組織，它們正在變成真正的布爾什維克黨，它們正在隨着廣大工人羣衆的不滿情緒的增長而發展起來並準備奪取政權，因而形勢正在向無產階級革命發展。但是不使資產階級失去反動的阿姆斯特丹這個支柱，要推翻資產階級是不可能的，不把阿姆斯特丹這個資產階級的堡壘爭取到革命方面來，要取得專政是不可能的。要做到這一點，單靠外面的工作是不行的。在目前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在保證工會運動的統一方面進行裏外配合的工作。正因為如此，關於工會的聯合和加入各國國際生產聯合組織的問題就成為迫切的問題了。支持和推動左派前進當然是應該的。但是只有不把革命工會的旗幟捲起來，只有斥責反動的阿姆斯特丹首領們的背叛和分裂行為，只有這批評左派首領們在對反動首領的鬥爭中的不徹底性和不堅決性，才能有對左派的真正支持。只有這

樣的政策才能够準備工會的真正聯合。否則就會發生和去年十月在德國發生過的同樣情況，當時列維左派集團〔卷〕被反動的右派社會民主黨巧妙地利用來包圍德國的革命工人。

最後，談談蘇聯在資產階級國家人民中的聲望的提高。也許『和平主義的民主主義制度』不穩固的最可靠的標誌應當認為是下述明顯的事實：蘇聯在西方和東方勞動羣衆中的影響和威信不僅沒有減弱，反而逐年逐月地提高。問題不在於蘇聯得到一些資產階級國家的『承認』。這種『承認』本身還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因為第一、它是由力圖在蘇聯市場上佔得『自己的地盤』的各資產階級國家的資本主義競爭的需要促成的，第二、它是由要求和蘇維埃國家建立『正常關係』，至少和蘇聯簽訂某種『條約』的和平主義的『綱領』促成的。問題在於現在的『民主主義者』和『和平主義者』由於有某種『承認』蘇聯的政綱而在議會選舉中擊敗了資產階級競選者，麥克唐納之流和赫里歐之流由於（除其他原因外）常把『和俄國友好』掛在嘴邊而掌握了政權並能繼續執政，這些『民主主義者』和『和平主義者』的威信是蘇維埃政權在人民羣衆中的威信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連墨索里尼這樣有名的『民主主義者』也認為必須經常在工人面前拿和蘇維埃政權『友好』來炫耀自己。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像現在的日本當權者這樣一些大家都知道的掠奪別人財物的人也不願意不和蘇聯『友好』了。至於蘇維埃政權在土耳其、波斯、中國和印度人民羣衆中有極高的威信，那就更不用說了。

像蘇維埃政權這樣一個『專政的』和革命的政權，為什麼在別國人民羣衆中有這種空前的威信和

這種非常的聲望呢？

第一、因為工人階級厭惡資本主義，他們渴望擺脫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國家的工人同情蘇維埃政權，這首先因為它是推翻了資本主義的政權。英國鐵路員工的代表，並非無名的布朗雷不久以前在工聯代表大會上說：

「資本家們知道，全世界工人的眼睛都注視着俄國，既然俄國革命會勝利，那末其他國家覺悟的工人就會問自己，——為什麼我們不能同樣地消滅資本主義呢？」

布朗雷當然不是布爾什維克。但是他所說的話却表達了歐洲工人的期望和想法。的確，既然「俄國人」沒有資本家也已經過了六年多，而且過得很好，那末，為什麼不能推翻歐洲的資本主義制度呢？這就是蘇維埃政權在廣大工人階級羣衆中有極大聲望的根源。因此，蘇聯國際聲望的提高意味着世界各國工人階級對資本主義的厭惡的加深。

第二、因為人民羣衆厭惡戰爭，他們渴望粉碎資產階級的戰爭計劃。人民羣衆知道，蘇維埃政權首先向帝國主義戰爭展開了攻擊，因而加速了戰爭的結束。人民羣衆看到，蘇聯是進行反對新戰爭的鬥爭的唯一國家。他們同情蘇維埃政權，因為它是各國人民之間的和平旗手，是反對戰爭的可靠支柱。因此，蘇維埃政權國際聲望的提高說明了全世界人民羣衆對帝國主義戰爭及其組織者的厭惡的加深。

第三、因為附屬國和殖民地的被壓迫羣衆厭惡帝國主義的枷鎖，他們渴望粉碎這個枷鎖。蘇維埃

政權是粉碎『本國』帝國主義鎖鍊的唯一政權。蘇聯是根據各民族平等合作的原則建設自己生活的唯一國家。蘇聯政府是世界上堅決捍衛土耳其、波斯、阿富汗、中國以及全世界殖民地 and 附屬國的統一和獨立、自由和主權的唯一政府。被壓迫羣衆同情蘇聯，因為他們認定蘇聯是他們在擺脫帝國主義的事業中的同盟者。因此，蘇維埃政權國際聲望的提高意味着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對帝國主義的厭惡的加深。

事實就是這樣。

未必可以懷疑，這三種厭惡是不會鞏固現代帝國主義的『和平主義的民主主義制度』的。

前幾天，美國外交部長、『和平主義者』、高爾察克的支持者尤茲發表了一篇反蘇的黑幫宣言。毫無疑問，彭加勒的桂冠使尤茲睡不着覺了。但是未必可以懷疑，尤茲的黑幫和平主義的宣言只會進一步加強蘇聯在全世界勞動羣衆中的影響和威信。

說明目前國際形勢的主要問題就是這樣。

載於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日

『布爾什維克』雜誌第十一期

署名：約·斯大林

關於黨在農村中的當前任務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在俄共(布)中央委員會

召集的農村支部書記會議(卷上的演說)

各地報告的缺點

同志們！首先我想談談在這裏所聽到的報告中的缺點。我認為主要的缺點有兩個。

第一個缺點是：代表們總是談工作的成績，對於我們農村工作的缺點幾乎沒有提到，而這種缺點是多不勝數的。計算計算黨齡，誰是什麼時候出生的，支部裏有多少黨員等等，而對於我們工作的缺點幾乎一點也沒有談到。但是，關於我們農村工作中的缺點問題却是我們實際工作中的基本問題。因此，這些報告帶有一些官樣文章的味道，——請原諒我這樣說。任何一個旁觀者聽了都會以為，人們到這裏來是爲了向中央做報告，說『工作進行得令人滿意』，或者說『一切都順利』。同志們，這是不行的，因為我們大家，無論是我們或你們都知道，不論在你們那裏，在地方上，或者在我們這裏，在中央，工作都不是十分順利的。

報告的第二個缺點是：報告中談到的主要是支部本身，支部中的情緒，而千百萬非黨農民的情緒不知爲什麼被忽略了。原來共產黨員最關心的是自己；他們的內部生活過得怎樣，做過多少次講演，進行着什麼樣的宣傳等等。原來共產黨員越來越注意自己，而忘記了他們的周圍是非黨員的汪洋大海，沒有這些非黨員的支持，支部的整個工作就會弄得一場糊塗。黨組織和非黨羣衆之間的相互關係怎樣，——這一點完全沒有談到或者幾乎完全沒有談到。決不能只注意自己。首先應當注意千百萬非黨農民，研究他們的需要和願望，重視他們的要求和情緒。報告的枯燥無味和某些官僚主義氣息就是由此產生的。

這就是我要指出來請同志们注意的兩個主要缺點。

同志们，請再一次原諒我對你們直言不諱。但是我真摯地請求你們也對我們直言不諱地談談中央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

現在來談本題吧。

黨的主要缺點是黨的農村工作薄弱

目前，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當農民的政治積極性已經提高，而他們對黨的要求，比如說，已經比兩年前多得多的時候，我們黨的主要缺點何在呢？

我們黨的主要缺點在於我們黨的農村工作薄弱，在於黨的農村工作沒有上軌道，在於黨的農村工作做得很壞。怎麼會這樣薄弱呢？為什麼黨的城市工作在突飛猛進，而黨的農村工作却寸步難行呢？難道農業不在發展嗎？難道農民的狀況在餘糧收集制廢除以後的兩年中沒有得到改善嗎？難道工業的發展和工業品的輸送不在改善農民的狀況嗎？難道穩定的通貨沒有改善農民的狀況嗎？我們黨的農村工作究竟怎麼會這樣薄弱呢？爲了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必須解決另一個問題：我們黨在城市中的力量是從哪裏來的？

我們黨在城市中的力量在哪裏？

那末，我們黨在城市中的力量在哪裏呢？我們黨的基本力量在於：在我們城市中，黨的周圍有爲數幾十萬的廣大的非黨工人積極分子，這些積極分子就是黨和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之間的橋梁。我們黨在城市中的力量在於：黨和千百萬工人羣衆之間存在的不是——一堵牆，而是一座起連接作用的橋梁，即工人羣衆中爲數幾十萬的非黨積極分子。黨是從這些積極分子中汲取力量的。黨通過這些積極分子取得羣衆的信任。你們已經聽說，半年前有二十多萬工人加入了我們的黨。他們是從哪裏來的呢？是從非黨積極分子中來的，這些積極分子對我們黨充分信任，把黨和其餘的非黨羣衆聯系起來。因此，非黨積極分子不僅是一座起連接作用的橋梁，並且是一個我們黨從中汲取新的力量的最豐

富的來源。沒有這種積極分子，我們黨就不可能發展。如果黨周圍的廣大的非黨積極分子在發展和鞏固，那末黨也會發展和鞏固。如果沒有這種積極分子，那末黨就會衰敗和枯萎。

我們農村工作的薄弱表現在哪裏？

那末，我們黨的農村工作的薄弱表現在哪裏呢？

表現在黨在農村中沒有廣大的能够把黨同我國千百萬勞動農民聯系起來的非黨農民積極分子。

農村的情況是怎樣的呢？在農村中有一根很細的黨支部的綫。此外還有一根同樣很細的同情黨的非黨農民的綫。可是在這根綫的後面却牽着非黨員的，即千百萬農民的汪洋大海，而非黨積極分子這根很細的綫沒有而且也不能把千百萬農民同黨聯系起來。這自然也就說明，爲什麼這根綫支持不住，常常扯斷，於是在農村中，在黨和非黨羣衆之間形成的往往不是一座起連接作用的橋梁，而是一堵密不透風的牆。

基本任務是在黨的周圍培養農民積極分子

因此，我們黨在農村中的基本任務是：培養爲數幾十萬的、能够把黨同千百萬勞動農民連接起來

的大批非黨農民積極分子。同志們！或者我們培養這種積極分子，從而使我們黨在農村中的狀況趕上城市中的狀況，那末任何問題和任何困難都不可怕；或者我們不培養這種積極分子，那末我們的全部農村工作就寸步難行。現在我們全部工作的重心就在這裏。沒有這種積極分子（一定要人數衆多，一定要由真正的農民組成），我們黨在農村中就必然會害慢性病。當然，這個工作是困難的，而且一兩年內是培養不出這種積極分子的。但是必須把這種積極分子培養出來，而且培養的工作開始得愈快愈好。

必須使蘇維埃活躍起來

但是怎樣培養這種積極分子呢？怎樣才能解決這個任務呢？如果以爲雙手捧着書本進行口頭宣傳就能解決這個任務，那就大錯特錯了。只有在圍繞着農村實際需要而進行羣衆工作的過程中，在農村進行廣泛的蘇維埃建設的過程中，通過吸引農民參加管理鄉、區、縣、省的工作，才能在黨的周圍培養廣大的非黨農民積極分子。使蘇維埃活躍起來，使它站立起來，把農民中的一切優秀分子吸引到蘇維埃裏來，——這就是可以用來培養廣大的非黨農民積極分子的方法。

列寧說過，蘇維埃是工農結合的機關，是工人領導農民的機關。所以，如果我們要使勞動農民的政治積極性不致離開工人的領導，那末我們就應當採取一切辦法，把農民吸引到蘇維埃裏來，使蘇維

埃活躍起來，使它站立起來，使農民的政治積極性在切實參加管理國家的工作中找到出路。只有在這樣的工作過程中，才能從農民中選拔出廣大的非黨積極分子幹部。只有從這樣的積極分子中，黨才能挑選出成萬的農村黨員。

必須改變對待農民的态度

但是要使蘇維埃活躍起來，除其他一切外，還需要有一個條件。這就是必須根本改變對待農民的态度。而這種改變的關鍵何在呢？在於共產黨員要學會以平等態度對待非黨員。在於不要發號施令，而要傾聽非黨員的呼聲。在於不僅要教導非黨員，而且也要向他們學習。非黨員是有東西值得我們學習的。黨員和非黨員間的相互關係問題是我們黨的實際工作中極重要的問題。列寧給這種相互關係下定義的時候用了相互信任這個詞。但是在不能以平等態度對待非黨農民的地方，是不會得到他們的信任的。在這種情況下形成的不是信任，而是不信任，並且結果往往是在黨和非黨員之間建立起一堵密不透風的牆，黨脫離羣衆，工農的結合變爲結合的破裂。

格魯吉亞暴動的教訓

不久以前的格魯吉亞暴動^{〔註〕}就是這種變化的實際例子。我們的報紙報道說格魯吉亞發生的是虛假的暴動。這是對的，因為格魯吉亞的暴動一般說來是人爲的，不是人民發動的。但是在某些地方，由於共產黨和羣衆的聯系很差，孟什維克得以引誘一部分農民羣衆參加暴動。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地方是共產黨力量最雄厚的地方。這些地方的共產黨員比其他地方要多得多。就是在這些地方，人們大意了，疏忽了，沒有覺察到農民中有波動，農民將有所舉動，農民中間有不滿情緒，這種不滿情緒一天天地積累起來了，而黨却一點也不知道。原來共產黨員最多的地方竟是對非黨農民的情緒、思想和希望最隔膜的地方。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怎麼會發生這種不相稱的現象呢？因為共產黨員不善於用列寧式的態度去對待農民，他們造成的不是信任的氣氛，而是相互不信任的氣氛，這樣就使黨脫離了非黨農民。格魯吉亞的一個最積極的工作人員的話是值得注意的，他說，這種不相稱現象的發生是因為地方蘇維埃薄弱和黨脫離了非黨員。他說：『毫無疑問，使我們對日漸成長起來的暴動疏忽大意的最重要的原因，應該到地方蘇維埃的薄弱中去尋找。』列寧說，蘇維埃是農民情緒的最可靠的晴雨表、最可靠的指標。而在格魯吉亞的某些縣裏，正是這個晴雨表沒有掌握在共產黨手裏。

同志們，應當把格魯吉亞事件當做前車之鑒。如果我們不根本改變對待農民的態度，如果我們不在黨和非黨員之間造成充分信任的氣氛，如果我們不傾聽非黨員的呼聲，最後，如果我們不使蘇維埃活躍起來，給農民勞動羣衆的政治積極性開闢一條出路，那末俄國各地都會重演格魯吉亞發生過的

事件。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我們能够確立正確的列寧式的對待非黨農民的态度，把農民日益增長的政治積極性納入蘇維埃建設的軌道，從而保證工人對農民的領導；或者，我們不能做到這一點，那末羣衆的政治積極性就會不通過蘇維埃，越過蘇維埃而流爲類似格魯吉亞暴動的土匪式的騷擾。

同志們，問題就是這樣。

必須以敏銳的態度對待農民

爲了說明有時對待農民不敏銳到什麼程度，應當稍微談談反宗教的宣傳。某些同志有時把農民看做唯物主義的哲學家，以爲只要做一次自然科學的講演，就足以使農夫相信上帝是不存在的。他們往往不了解，農夫是從經濟觀點去看上帝的，就是說，農夫有時並不反對擯棄上帝，但是懷疑往往使他們苦惱：『誰知道呢，也許真有上帝，既敬拜共產黨員，又敬拜上帝，使莊稼更靠得住些，不是更好嗎。』誰不估計到農民心理的這個特點，誰就完全不懂得黨員和非黨員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誰就不懂得在反宗教的宣傳問題上即使對農民的偏見也需要謹慎小心。

黨的基本任務

這樣，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

(一) 黨的農村工作的主要缺點是：黨和千百萬非黨農民之間缺少廣大的非黨農民積極分子。
(二) 黨的當前任務是：在農村黨的周圍培養這種積極分子，使黨能够從他們那裏汲取新的力量。

(三) 只有使蘇維埃活躍和吸引農民參加管理國家的工作，才能培養這種積極分子。

(四) 爲了使蘇維埃活躍，必須根本改變對待非黨農民的态度，摒棄發號施令的作風，在黨員和非黨員之間造成相互信任的氣氛。

黨的任務就是這樣。

工作的條件

實現這些任務的有利條件是否存在呢？無疑是存在的。這樣的條件（我指的是主要的條件）有三個。

第一、貧農的政治積極性日益增長。應當注意農業發展的某些特點。工業的發展團結了工人，消滅了工人階級中喪失階級性的現象，使工人階級重新成爲一個整體；相反地，農村中農業的發展却引起農民的瓦解和分化，形成兩個陣營：力圖佔據農村領導地位的富農陣營和尋求同盟者反對富農的貧農陣營。毫無疑問，使蘇維埃活躍起來就能給貧農的日益增長的積極性開闢一條出路，來建立以工人爲首的反對富農、投機分子和高利貸者這些橫霸勢力的統一戰綫。

第二、編造地方預算是使蘇維埃活躍起來的物質基礎。不用說，預算、徵稅和開支方法等問題對農民是有頭等意義的。因此，農民現在參加蘇維埃建設比任何時候都更有現實意義。

第三、蘇維埃政權對我國災區給予及時的救濟。毫無疑問，這種救濟已經在農民中造成信任蘇維埃政權的氣氛。幾乎用不着證明，這種氣氛是有助於使蘇維埃活躍起來的。

主要是和千百萬非黨羣衆保持聯系

總之，擺在我們面前的不僅有我們黨在農村中的某些當前任務，而且也有許多便於完成這些任務的有利條件。現在的問題在於更加同心協力地來着手執行這些任務。

這裏應該記住列寧的不朽名言：我們黨的力量在於保持黨和千百萬非黨羣衆之間的活的聯系，這種聯系愈實際，我們的成就就愈可靠。他這些話是在我們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說的。請聽：

『在人民羣衆中，我們（共產黨人。——斯大林註）到底是滄海一粟，只有當我們正確地表現人民所意識到的東西時，我們才能管理國家。否則共產黨就不能引導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就不能引導羣衆，於是整個機器就要毀壞。』①（六）

載於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真理報』第二四二號

①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關於黨在農村中的當前任務

關於黨在農村中的任務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在俄共(布)中央

全會(全蘇)上的演說)

同志們！因為前面幾位同志已經很詳細地談到了農村工作，所以我只就目前形勢的特點發表幾點意見。

從農民的狀況來看，目前形勢的特點是什麼呢？

第一個特點是：我們在把農民從地主的壓迫下解放出來的鬥爭中所獲得的舊資本，即精神資本，已經開始枯竭。有些同志說：『為什麼叫嚷起農民工作來呢？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談到農民，我們從來沒有忘記農民，——這種關於農民的叫嚷究竟是從哪裏來的呢？』看來這些同志不了解我們黨在十月革命時期和廢除餘糧收集制時期所積蓄起來的舊的精神資本已經快要用光了。他們不了解現在我們需要新資本。我們必須在新的鬥爭條件下為黨創造一筆新資本。我們必須重新爭取農民。這就是問題的所在。我們幫助農夫打倒了地主並得到了土地，我們結束了戰爭，沙皇已經沒有了，沙皇的爪牙也同沙皇一起被打倒了，——關於這一切，農民已經忘掉了。現在靠這一筆舊資本，已經不能維

持多久了。誰不了解這一點，誰就不了解新環境中，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的任何事物。我們要重新爭取農民，——這就是我國內部狀況的第一個特點。

由此應當得出結論說，重新談到農民不僅不是多餘的，而且談得有點遲了。

第二個特點是：在這個時期內，我國的主要階級——工人和農民已經發生了變化，他們成了另一種樣子了。從前無產階級是喪失階級性的，散漫的，而農民則殷切希望保持住從地主那裏剝奪來的土地並贏得對地主戰爭的勝利。從前的情況是這樣，現在的情況却不同了。戰爭再也沒有了。工業在增長。農業在發展。現在的無產階級已經不是喪失階級性的工人階級，而是文化和需求日益提高的健壯的無產階級了。至於農民，它已經不是深恐喪失土地而甘願犧牲一切來擺脫地主壓迫的受折磨的舊農民了。它已經是一個自由的積極的新階級，它已經忘掉了地主，它現在關心的是獲得廉價的商品和以高價出賣自己的糧食。它的特徵是政治積極性日益增長。現在已經不可以說：『黨會料理好一切』，『黨會給大家安排好一切』。這樣的話現在農民不懂，工人更不懂。現在必須更加深入羣衆，必須比過去更多地進行說明、解釋和說服。現在必須重新爭取千百萬非黨員的信任，必須從組織上，首先通過蘇維埃來鞏固這種信任。羣衆日益增長的政治積極性要求這樣做。

但是不僅階級發生了變化，鬥爭場所也發生了變化，因為鬥爭場所不同了，完全不同了。從前引起鬥爭的是什麼問題呢？是需要餘糧收集制還是不需要？更早以前是需要地主還是不需要？現在這些問題已經解決了，因為地主和餘糧收集制再也沒有了。現在的問題已經不是地主和餘糧收集制，而

是糧食價格了。這是一個廣闊而又非常複雜的嶄新的鬥爭場所，需要認真研究和認真鬥爭。現在的問題甚至不在於稅收，因為只要糧食價格有『足夠的提高』，布疋和其他工業品的價格有『足夠的』降低，農民是會納稅的。現在的基本問題是市場以及工業品和農產品的價格問題。

請看哥美里省省委書記給中央的報告：

『有三個鄉發生羣衆拒絕接受稅單的事件。納稅速度比應有的速度慢了三分之二。召開過的非黨的鄉代表會議開得都很激烈，以致有的不得不中途閉會，有的提出了修正案：請求中央減稅和提高糧價。我不知道其他省份的情況怎樣，但是我們省的情況和你（即我）在最近那封不公開的信中所做的那些結論是不相符的。我們的地方工作人員的情緒不大好。農村好像受了驚動的蜂房，紛紛談論稅收和糧價。』

西伯利亞、東南區、庫爾斯克省、土拉省、下新城省、烏里楊諾夫斯克省和其他省份也送給中央同樣的報告。

所有這些報告的意義是：我們的價格政策使農民感到困難，他們想削弱甚至拋掉實行這個價格政策的槓桿，可是沒有這種槓桿，我們的工業就一步也不能前進。農民似乎在對我們說：『你們惟恐把工業品的價格降低到極點，你們害怕外國商品充斥，因此，你們築起重重的關稅壁壘來保護我國年輕的工業不受競爭的侵襲，但是你們的工業和我毫不相干，我需要的是廉價的商品，不管這些商品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還說：『你們害怕提高糧價，惟恐破壞工資制度，因此，你們發明了各種收購機

關，建立了對外貿易壟斷制等等，但是你們的壁壘與槓桿和我毫不相干，我需要的是提高糧價。」

這就是價格政策方面的鬥爭的意義。

最近的格魯吉亞暴動特別可以證明這一點。這種暴動當然是虛假的，但是在某些縣，特別是在古里亞縣，這種暴動無疑是具有羣衆性的。古里亞農民爭取的是什麼呢？是廉價的商品和提高玉蜀黍的價格。古里亞和西方國家接壤，當地的人看到外國商品比我們蘇維埃商品便宜，於是希望我們商品的價格至少減低到和外國商品的價格一樣，或者是玉蜀黍的價格提高到保證購買蘇維埃商品不吃虧的程度。格魯吉亞古里亞縣暴動的經濟基礎就在這裏。正因為如此，這個暴動證明整個蘇維埃國家正處在新的鬥爭條件下。正因為如此，不能把格魯吉亞的暴動和唐波夫的暴動混爲一談，因為後者涉及的不是工業品和農產品的價格問題，而是取消餘糧收集制的問題。

在市場上和在農村中煽動對蘇維埃價格政策進行這個新鬥爭的是富農、投機分子和其他反蘇維埃分子。這些人竭力使千百萬農民羣衆脫離工人階級，藉以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因此，我們的任務是孤立富農和投機分子，使勞動農民脫離他們並吸引勞動農民參加蘇維埃建設，從而給勞動農民的政治積極性開闢一條出路。我們能够做到這一點，而且我們已經在這樣做，因為勞動農民羣衆特別是貧農願意同工人建立聯盟，願意保存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說，願意保存專政所賴以支持的那些經濟槓桿。

爲此必須做些什麼呢？首先必須關心到在農村黨的周圍培養大批能够把我們黨同千百萬農民連

接起來的非黨農民幹部。否則就談不上使農民脫離富農和投機分子，就談不上爭取千百萬農民並把他們鞏固在黨的周圍。這當然是件困難的事情。但是困難不能成為我們不可克服的障礙。必須把數百個也許數千個（這裏的問題不在於數量）能够發動和培養非黨農民積極分子的、熟悉農村的、有經驗的工作人員派到農村去幫助我們的支部。同時應當考慮到農民對城裏人的那種自然的、不信任的心理，這種不信任的心理還在農村中存在，而且大概不是很快就會消失的。你們知道，農民對待城裏來的人，特別是對待很年輕的人總是這樣：『從城裏又來了一個二流子，他是要騙我們的。』這是因為農民最相信的是那些自己經營農業並且多少懂得農業的人。正因為如此，我認為我們農村工作的中心應當是培養黨可以從中汲取新力量的農民積極分子。

但是怎樣進行這個工作呢？據我看來，為此首先必須使蘇維埃活躍起來。必須吸引所有生氣勃勃的、誠實的、覺悟的、有首創精神的人，特別是過去的紅軍戰士（他們是農民中最覺悟最有首創精神的人）參加蘇維埃工作。為什麼正是參加蘇維埃工作呢？第一、因為蘇維埃是政權機關，而吸收勞動農民參加管理國家的工作是黨的當前任務。第二、因為蘇維埃是工農結合的機關，是工人領導農民的機關，而工人領導農民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有必要。第三、因為地方預算是蘇維埃中編制的，而預算是農民的切身問題。最後，因為蘇維埃是農民情緒的最可靠的晴雨表，而傾聽農民的呼聲是絕對必要的。農村中也有其他極為重要的非黨組織，例如農民互助委員會、合作社、共青團組織等。然而危險的是：這些組織在一定條件下會變成可能脫離工人的純農民聯合會。爲了使這種情況不致發生，

必須把這些組織的工作統一在蘇維埃中，因為蘇維埃的結構本身保證了工人對農民的領導。因此，現在當農民組織像雨後春筍般地發展起來的時候，使蘇維埃活躍起來是頭等重要的任務。

不久以前，我在農村支部會議上號召同志們無情地批評我們黨的農村工作的缺點。這引起了某種不滿。原來有這樣的共產黨員，他們害怕批評，不願意揭露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同志們，這是危險的。說得重一些：害怕自我批評或非黨員的批評是現在最危險的病症。因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我們自己批評自己，並讓非黨員嚴厲地批評我們的工作，那末就可以指望把我們的農村工作向前推進；或者我們不允許有這樣的批評，那末就會有喀琅施塔得、唐波夫、格魯吉亞的暴動這類事件來批評我們。我認為我們寧願採取第一種批評而不採取第二種批評。因此，我們不應當害怕黨員的批評，更不應當害怕非黨員的批評。

第一次載於約·斯大林「農民問題」一書

一九二五年莫斯科：列寧格勒版

○ 見本卷第二六一頁至第二七一頁。——編者註

關於黨在農村中的任務

在『狄納莫』工廠留言簿上的題詞

我對『狄納莫』工廠的工人和全俄國的工人的希望是：使我國工業向前發展，使俄國無產者的人數在最近時期內增加到兩千萬至三千萬，使農村的集體經濟繁榮並使個體經濟接受它的影響，使高度發展的工業和農村的集體經濟把工廠中的無產者和田地上的勞動者最終團結成一支社會主義軍隊……

約·斯大林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七日

第一次載於一九三〇年六月四日

『真理報』第一五二號

致騎兵第一集團軍

向光榮的騎兵集團軍，克拉斯諾夫、鄧尼金、弗蘭格爾和皮爾蘇茨基的白衛軍隊的大災星致敬！
向騎兵集團軍的領導者，農民出身的紅色將軍布瓊尼同志和工人出身的紅色將軍伏羅希洛夫同志致敬！

騎兵戰士們！四年國內戰爭的各條戰綫上的輝煌勝利給你們的紅旗增添了不朽的光榮。在慶祝五周年紀念日的時候，你們應該宣誓：你們至死忠實於這些紅旗，當工人階級的意志號召你們為爭取共產主義的勝利而投入新的戰鬥的時候，你們一定能光榮地履行對社會主義祖國的義務。

你們的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真理報】第二六一號

致『農民報』

向忠實地捍衛偉大的工農聯盟事業的『農民報』致敬！

『農民報』！要記住三個訓條：

- (一) 要像愛護眼珠一樣愛護自己的農村通訊員，——這是你的軍隊；
- (二) 要更鞏固地聯系最忠誠最覺悟的農民特別是過去的紅軍戰士，——這是你的支柱；
- (三) 要在農村中傳播真理，要向全世界宣揚，不倦地宣揚：不同工人結成兄弟般的聯盟，農民的解放是不能想像的；沒有工人對農民的領導，勞動對資本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農民報』第五十二號

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

共產黨黨團全會上的演說）

同志們！在加米涅夫做了詳細的報告以後，我要講的話就不多了。因此，我只來揭露托洛茨基及其同夥所散佈的關於十月起義，關於托洛茨基在起義中的作用，關於黨和十月革命的準備等等的某些奇談。在這裏我也想談談托洛茨基主義這個同列寧主義不相容的特殊思想體系和因托洛茨基最近的一些著作而產生的黨的任務。

一 關於十月起義的一些事實

首先來談談十月起義。有人在黨員中間加緊散佈謠言，說整個中央委員會曾經反對在一九一七年十月舉行起義。他們老是說，十月十日，當中央委員會通過關於組織起義的決議的時候，大多數中央委員最初反對起義，就在這個時候似乎有一個工人闖進中央委員會的會場說：『你們決定反對起義，但是我告訴你們，不管怎麼樣，起義終究是要舉行的。』中央委員會受到這樣的威脅以後似乎害

怕了，於是重新提出了起義問題，通過了關於組織起義的決議。

同志們，這不單是謠言。有名的約翰·里德在他的『十日』一書中就寫到這件事。約翰·里德離我們黨很遠，當然不會知道我們十月十日秘密會議的經過，因而就上了蘇漢諾夫之流的先生們編造的謠言的當。這個故事後來在托洛茨基分子所寫的許多小冊子中傳述和重複着，最近出版的塞爾金所寫的論述十月革命的小冊子便是其中的一本。這些謠言在托洛茨基最近的一些著作中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未必用得着證明，諸如此類的阿拉伯故事是不合乎實際情況的，事實上在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沒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類似的事情。因此，我們可以對這些荒謬的謠言置之不理。一般說來，在反對派分子或者離黨很遠的人的辦公室裏所編造的謠言還少嗎？我們以前確實沒有注意到像約翰·里德那樣的錯誤，也沒有設法糾正這些錯誤。但是在托洛茨基最近的一些著作發表以後，對這些奇談已經不能再置之不理了，因為現在有人正力圖用這些奇談來教育青年，並且不幸的是他們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一些效果。因此，我必須拿真正的事實來駁斥這些荒謬的奇談。

現在拿我們黨中央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二十三日）的會議記錄來看。出席會議的有列寧、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托洛茨基、斯維爾德洛夫、烏里茨基、捷爾任斯基、科隆泰、布勃諾夫、索柯里尼柯夫和洛莫夫。討論關於目前形勢和起義的問題。討論以後，表決列寧同志提出的關於起義的決議。決議以十票對兩票的多數通過。看來很清楚：中央委員會是以十票對兩票的多數決定立

即轉入組織起義的實際工作的。就在這個會議上，中央委員會選出了名爲政治局的領導起義的政治總部，其成員如下：列寧、季諾維也夫、斯大林、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勃諾夫。

事實就是這樣。

這些記錄一下子就揭破了某些奇談。這些記錄揭破了說大多數中央委員似乎反對起義的那種奇談。這些記錄也揭破了說中央委員會在起義問題上似乎面臨分裂的那種奇談。從記錄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反對立即舉行起義的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同贊成起義的同志一樣參加了起義的政治領導機關。這裏根本談不上什麼分裂。

托洛茨基肯定說：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在十月革命時是我們黨內的右翼，差不多是社會民主黨人。只是令人不能理解：黨在這種情況下怎麼沒有發生分裂；我們同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的意見分歧怎麼只繼續了幾天；既然有意見分歧，這些同志怎麼還是被黨放到最重要的崗位上去，還是被選進了領導起義的政治總部等等？列寧對待社會民主黨人的無情在黨內是大家都清楚地知道的，黨知道，列寧一分鐘也不會同意把有社會民主主義情緒的同志留在黨內，何況是把他們放到最重要的崗位上去。黨沒有發生分裂的原因何在呢？原因在於儘管有意見分歧，這些同志還都是站在布爾什維主義共同基礎上的老布爾什維克。這個共同的基礎是什麼呢？是在俄國革命的性質、革命的動力、農民的作用、黨的領導原則等等基本問題上的觀點的一致。沒有這種共同的基礎，分裂就會是不可避免的。分裂所以沒有發生，意見分歧所以只延續了幾天，是因為而且僅僅是因為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

夫是列寧主義者，是布爾什維克。

現在來談談關於托洛茨基在十月起義中的特殊作用的奇談。托洛茨基分子在加緊散佈謠言，說托洛茨基是十月起義的鼓舞者和唯一的領導者。所謂托洛茨基文集的編輯連茨涅爾特別賣力地散佈這些謠言。托洛茨基自己經常不提黨、黨中央委員會和黨的彼得格勒委員會，抹殺這些組織在起義中的領導作用，竭力把自己捧成十月起義的中心人物，有意無意地幫助散佈關於托洛茨基在起義中的特殊作用的謠言。我決不否認托洛茨基在起義中所起的明顯的重要作用。但是必須說，托洛茨基在十月起義中沒有起而且不可能起任何特殊的作用，他當時担任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只是執行了領導他的每一個行動的相應的黨機關的意志。蘇漢諾夫一類的庸人會覺得這一切都很奇怪，但是事實，真正的事實却完全證實了我的說法。

現在我們來看看中央緊接着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六日（二十九日）舉行的會議的記錄。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加上彼得格勒委員會的代表，軍事組織、工廠委員會、工會和鐵路員工的代表。出席會議的除中央委員外，還有克雷連柯、紹特曼、加里寧、沃洛達爾斯基、施略普尼柯夫、拉齊斯等等，共二十五人。討論起義的純粹屬於實際組織方面的問題。列寧提出的關於起義的決議以二十票對兩票的多數通過，三票棄權。選出了在組織上領導起義的實踐總部。被選入這個總部的有哪些人呢？被選入這個總部的有五個人：斯維爾德洛夫、斯大林、捷爾任斯基、布勃諾夫和烏里茨基。實踐總部的任務是：根據中央委員會的指示領導起義的一切實踐機關。由此可見，在這次中央委員會會議上

發生了一件『可驚的』事情，即起義的『鼓舞者』、『首要人物』、『唯一的領導者』托洛茨基『奇怪地』沒有被選入這個負有領導起義使命的實踐總部。這同關於托洛茨基的特殊作用的流行說法怎能符合呢？無論蘇漢諾夫怎麼說，無論托洛茨基分子怎麼說，這一切都有些『奇怪』，這難道不對嗎？但是，這裏其實並沒有什麼奇怪，因為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時期是我們黨內比較後起的人物，他無論在黨內或在十月起義中都沒有而且不可能起什麼特殊作用。他和所有的負責工作人員一樣，只是中央委員會及其機關的意志的執行者。誰熟悉布爾什維克的黨的領導實質，誰就不難了解事情只能是這樣：只要托洛茨基違反中央委員會的意志，他就會失掉對事物進程的影響。關於托洛茨基的特殊作用的說法是喜歡效勞的『黨的』長舌婦所散佈的奇談。

這當然不是說，十月起義沒有鼓舞者。不，十月起義是有鼓舞者和領導者的。但這是列寧，而不是其他什麼人，就是這個列寧，他提出的決議案在中央委員會決定起義問題時被通過了，就是這個列寧，與托洛茨基的武斷相反，地下狀態並沒有阻礙他成為起義的真正鼓舞者。現在企圖以地下狀態為辭來抹殺黨的領袖弗·伊·列寧是起義的鼓舞者這個無可置疑的事實，是愚蠢可笑的。

事實就是這樣。

有人對我們說：就算是這樣，但是總不能否認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時期很會打仗吧。是的，這是事實，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時期確實很會打仗。但是在十月革命時期很會打仗的不只是托洛茨基一人，甚至像當時同布爾什維克站在一起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那樣的人也打得不壞。總之，我應當說，

在敵人陷於孤立而起義趨於高漲的勝利的起義時期，會打仗並不難。在這種時候連落後的人也會成爲英雄。

但是，無產階級的鬥爭不是不間斷的進攻，不是一個接着一個的勝利。無產階級鬥爭也有困難和失敗。真正的革命者不是那些在勝利起義時期表現勇敢的人，而是那些在革命勝利進攻時很會打仗，在革命退却時期，在無產階級失敗時期也能够表現勇敢的人，是那些在革命失利時，在敵人勝利時不失去理智、不畏縮後退的人，是那些在革命退却時期不張皇失措、不悲觀失望的人。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在十月革命時期支持布爾什維克，打得也不壞。但是誰不知道，這些『英勇的』戰士在布列斯特時期就張皇失措了，當時德帝國主義的進攻使他們悲觀失望，歇斯底里了。在十月革命時期很會打仗的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時期，即在革命暫時失利時期却没有足夠的勇氣在這個困難關頭表現出充分的堅定而不步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後塵，這是非常可悲的，但這是無可置疑的事實。無可爭辯，這是個困難關頭，需要表現出特別的勇敢和高度的冷靜，才不致張皇失措，才能及時退却，及時接受和約，把無產階級的軍隊從德帝國主義的打擊下撤出來，保存農民の後備力量，從而取得喘息時機，然後再以新的力量去打擊敵人。但是，很遺憾，托洛茨基在這個困難關頭並沒有表現出這種勇敢和這種革命的堅定性。

照托洛茨基看來，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教訓是：在十月革命時要『不畏縮後退』。這不對，因爲托洛茨基的這種說法只包含革命教訓的一小部分真理。無產階級革命教訓的全部真理是：不僅在革命

進攻的日子裏要『不畏縮後退』，而且在革命退却的日子裏，當敵人佔上風而革命失利的時候，也要『不畏縮後退』。革命不以十月革命爲限。十月革命只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開端。如果在起義日趨高漲的時候畏縮後退，那是不好的。如果在取得政權以後，革命遭到嚴重困難的時候畏縮後退，那就更壞了。在革命的第二天保住政權，和奪取政權同樣重要。既然在布列斯特時期，即在我國革命遭到嚴重困難的時期，情勢發展到幾乎要『交出』政權的時候，托洛茨基表現畏縮後退，那末他自己就應當明白，這同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的十月錯誤是毫不相干的。

關於十月起義的奇談問題就是這樣。

二 黨和十月革命的準備

現在來談談十月革命的準備問題。

聽了托洛茨基的話，會使人以爲布爾什維克黨在三月到十月的整個準備時期只是躊躇不決，被內部的矛盾所腐蝕，百般阻撓列寧，如果不是托洛茨基，那就不知道十月革命會有怎樣的結局。聽了托洛茨基關於黨的這些奇怪言論，使人感到有些可笑，因爲托洛茨基在文集第三卷的同『序言』中寫道：『無產階級革命的主要工具是黨』，『沒有黨，離開黨，繞過黨，只通過黨的代替物，無產階級革命就不能取得勝利』。既然『無產階級革命的主要工具』不中用，而『繞過黨』看來又決不可能取得勝

利，那末老天爺自己也不了解我們的革命如何能够取得勝利了。但是，托洛茨基以奇談妙論款待我們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應當認為，關於我們黨的那些可笑言論是屬於托洛茨基通常發表的奇談妙論一類的。

現在我們按時期來簡單地看一看十月革命準備的歷史。

(一) 黨的新方針時期（三月至四月）。這個時期的主要事實是：

(甲) 沙皇制度被推翻；

(乙) 臨時政府成立（資產階級專政）；

(丙) 工兵代表蘇維埃出現（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

(丁) 兩個政權並存；

(戊) 四月遊行示威；

(己) 政權的第一次危機。

這個時期的特點是：資產階級專政同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同時並存，而且後者對前者抱着信任態度，相信前者的和平意圖，自願地把政權交給資產階級，因而使自己變成資產階級的附屬品。兩個專政之間還沒有嚴重的衝突。相反地，却有『聯系委員會』⁽²⁾存在。

這是俄國歷史上最大的轉變，是我們黨的歷史上空前的變化。直接推翻政府，這個革命以前的舊政綱是很明確的，但是它已經不適合新的鬥爭條件了。現在已經不能直接去推翻政府，因為它和處於

護國派影響下的蘇維埃聯系着；現在如果直接去推翻政府，黨就不得不進行既反對政府又反對蘇維埃的力不勝任的戰爭。但是也不能實行支持臨時政府的政策，因為它是帝國主義的政府。在新的鬥爭條件下，黨必須有新方針。黨（黨的多數）就探索這個新方針。黨在和約問題上採取了蘇維埃對臨時政府施加壓力的政策，而沒有決定立刻由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的舊口號邁到蘇維埃政權的新口號。這個不徹底的政策是指望使蘇維埃在和約的具體問題上認清臨時政府的真正帝國主義本質，從而使蘇維埃離開臨時政府。然而這是一個極端錯誤的立場，因為這種立場滋長了和平主義幻想，幫助了護國主義，阻礙了對羣衆的革命教育。當時我和黨內其他同志贊同這個錯誤的立場，只是在四月中旬，同意了列寧的提綱後，才完全拋棄了這個立場。需要有新方針。列寧在他的有名的四月提綱〔二〕中向黨提出了這個新方針。我不來多談這個提綱，因為這個提綱是盡人皆知的。當時黨和列寧之間是不是有過意見分歧呢？是的，是有過的。這些意見分歧延續了多久呢？不到兩個星期。通過列寧提綱的彼得格勒組織的市代表會議〔三〕（四月下半月）是我們黨的發展中的轉折點。全俄四月代表會議〔四〕（四月底）只是在全俄範圍內完成了彼得格勒代表會議的事業，把十分之九的黨員團結在黨的統一的立場的周圍。

在七年後的今天，托洛茨基對布爾什維克過去的意見分歧幸災樂禍，把這些意見分歧描繪成幾乎是布爾什維主義內部的兩個黨的鬥爭。但是，第一、托洛茨基在這裏無恥地把事情誇大了，因為這些意見分歧絲毫沒有引起布爾什維克黨的震動。第二、如果我們黨不容許在自己成員中間有不同的

意見，那末我們黨就是幫會，而不是革命政黨了，而且大家知道，在過去，例如在第三屆杜馬時期，我們也曾有過意見分歧，但是那並沒有妨礙我們黨的團結。第三、不妨問一下，現在得意洋洋地對布爾什維克過去的意見分歧幸災樂禍的托洛茨基自己當時採取了什麼立場呢？所謂托洛茨基文集的編輯連茨涅爾硬說，托洛茨基的美國來信（三月）『完全先知』列寧的成為他的四月提綱基礎的『遠方來信』（三）（三月）。居然這樣說：『完全先知。』這種比擬托洛茨基並沒有反對，大概是很感激地接受了。但是，第一、托洛茨基的信無論在精神上或在結論上『完全不像』列寧的信，因為托洛茨基的信完全反映着托洛茨基的『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這個反布爾什維主義的口號，這個口號就是鼓吹不要農民參加革命。只要看一看這兩類信，就會相信這一點。第二、列寧在他從國外回來後的第二天就認為必須同托洛茨基劃清界限，這該怎樣解釋呢？列寧不止一次地聲明，托洛茨基的『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號是企圖『跳過尚未失去作用的農民運動』，這個口號就是『以工人政府奪取政權為兒戲』^①，這有誰不知道呢？

在列寧的布爾什維主義提綱和托洛茨基的『以奪取政權為兒戲』的反布爾什維主義方案之間能有什麼共同之點呢？人們這樣把小茅舍同勃朗峯相比的熱情是從哪裏來的呢？為什麼連茨涅爾要這樣冒險地給關於我國革命的一堆舊的奇談再加上一個關於托洛茨基的美國來信『先知』列寧有名的

① 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二十八頁和第二十九頁，並見在彼得格勒市代表會議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全國代表會議上的報告（一九一七年四月中旬和四月底）。

『遠方來信』的奇談①呢？

①

應當列入這一類奇談的還有一種散佈很廣的說法，說托洛茨基似乎是國內戰爭各個戰綫上勝利的「唯一的」或者「主要的組織者」。同志們，爲了揭示真相，我應當聲明，這種說法是完全不合乎實際情況的。我決不否認托洛茨基在國內戰爭中的重要作用。但是應當十分堅決地聲明，我們勝利的組織者的崇高榮譽不屬於個別人物，而屬於我國先進工人的偉大集體——俄國共產黨。舉幾個例子也許不是多餘的。你們知道，高爾察克和鄧尼金被認爲是蘇維埃共和國的主要敵人。你們知道，我們國家只有在戰勝這些敵人以後才能自由呼吸。而歷史證明，我們軍隊擊潰這兩個敵人，即高爾察克和鄧尼金，是違反托洛茨基的計劃的。

請你們自己判斷吧。

(一)關於高爾察克。事情發生在一九一九年夏天。我們的軍隊向高爾察克進攻，並在烏發附近作戰。中央委員會開會。托洛茨基建議停止沿白河綫（烏發附近）進攻，讓烏拉爾留在高爾察克手裏，把一部分軍隊從東方戰綫撤出來調到南方戰綫去。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中央委員會不同意托洛茨基的意見。認爲不能讓烏拉爾和它的工廠以及鐵路網留在高爾察克手裏，因爲他在那裏容易重整旗鼓，糾集兵力並重新出現在伏爾加河；必須先把高爾察克驅逐出烏拉爾山脈，趕到西伯利亞草原去，只有這樣做以後才能把力量調往南方。中央委員會否決了托洛茨基的計劃。托洛茨基提出辭職。中央委員會不接受辭職，擁護托洛茨基計劃的總司令瓦采齊斯辭職了。他的職位由新的總司令加米涅夫接替。從這個時候起，托洛茨基不再直接參予東方戰綫的事務。

(二)關於鄧尼金。事情發生在一九一九年秋天。向鄧尼金的進攻沒有成功。包圍馬蒙托夫（馬蒙托夫的襲擊）的「錢圈」顯然被突破了。鄧尼金拿下庫爾斯克。鄧尼金逼近奧勒爾。托洛茨基從南方戰綫上被召回出席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中央委員會認爲情況危急，決定召回托洛茨基，派新的軍事工作人員到南方戰綫去。新的軍事工作人員要求托洛茨基「不干預」南方戰綫的事務。於是托洛茨基不再直接參預南方戰綫的事務。南方戰綫的各個戰役，直到我們拿下頓河岸羅斯托夫和放德薩，都是在沒有托洛茨基參加的情況下進行的。

讓他們來試試推翻這些事實吧。

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

難怪人們說，喜歡效勞的熊比敵人更危險^①。

(二) 對羣衆進行革命動員的時期（五月至八月）。這個時期的主要事實是：

(甲) 彼得格勒的四月遊行示威，有『社會主義者』參加的聯合政府成立；

(乙) 俄國各主要中心的以『民主的和平』爲口號的五一遊行示威；

(丙) 彼得格勒的以『打倒資本家部長！』爲基本口號的六月遊行示威；

(丁) 前綫的六月進攻和俄國軍隊的失利；

(戊) 彼得格勒的七月武裝遊行示威，立憲民主黨人部長退出政府；

(己) 反革命軍隊從前綫調回，『真理報』編輯部被搗毀，反革命同蘇維埃進行鬥爭，以克倫斯基

爲首的新聯合政府成立；

(庚) 我們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提出準備武裝起義的口號；

(辛) 反革命的國務會議和莫斯科的總罷工；

(壬) 科爾尼洛夫進攻彼得格勒失敗，蘇維埃活躍，立憲民主黨人辭職，『執政內閣』成立。

這個時期的特點是：危機尖銳化了，蘇維埃和臨時政府之間的那種不穩固的均勢打破了。這種均勢，不論是好是壞，在前一時期是存在的。兩個政權並存對雙方來說都是不可忍受的了。『聯系委員會』這座搖搖欲墜的大廈已面臨末日。『政權危機』和『更換閣員的把戲』已成爲當時最流行的話。前綫的危機和後方的破壞加強了兩端的側翼，從兩方面對護國派妥協分子施加壓力。革命動員起來

了，因而引起了反革命的動員。反革命又轉過來激發革命，引起革命來潮的新浪潮。政權轉歸新的階級的問題成了當時的迫切問題。

當時在我們黨內是否有過意見分歧呢？是的，是有過的。但是同企圖發現黨內『右』翼和『左』翼的托洛茨基的說法相反，這種意見分歧僅僅是實際問題上的分歧。就是說，這是這樣一種意見分歧，沒有它就根本不會有活躍的黨的生活和真正的工作。

托洛茨基硬說彼得格勒的四月遊行示威引起了中央委員會內部的意見分歧，這是不正確的。中央委員會在這個問題上是完全一致的，它譴責了一些同志常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和軍隊中還佔少數的時候要逮捕臨時政府的企圖。如果托洛茨基不是根據蘇漢諾夫的看法，而是根據真實的文件來寫十月革命的『歷史』，他就不難相信自己的說法是錯誤的。

托洛茨基斷言『根據列寧的倡議』準備在六月十日舉行遊行示威的意圖被中央委員會的『右派』委員責備爲『冒險主義』，這是絕對不正確的。如果托洛茨基不是根據蘇漢諾夫的看法來寫，他就一定知道，六月十日遊行示威是在列寧完全同意下延期的；而且列寧在大家知道的彼得格勒委員會會議上發表的長篇演說（見彼得格勒委員會記錄^(註)）中是認爲必須延期的。

托洛茨基說中央委員會內部的『悲劇性』意見分歧是由七月武裝遊行示威引起的，這是完全不正確的。托洛茨基認爲中央委員會領導集團的某些成員『想必把七月事件看做有害的『冒險行爲』』，這簡直是捏造。托洛茨基當時還沒有參加我們中央委員會，他當時只是我們的蘇維埃委員，當然不一定知

道中央委員會只是把七月遊行示威看做試探敵人力量的方法，中央委員會（和列寧）不願意也不打算在首都的蘇維埃還擁護國派分子的時候把遊行示威變為起義。個別布爾什維克確實由於七月的失敗而灰心，這是完全可能的。比如，我就知道當時被捕的布爾什維克之中有人竟準備離開我們的隊伍。但是由此做出不利於某些似乎是『右派』，似乎是中央委員的人的結論，這就是無恥地歪曲歷史。

托洛茨基聲言，在科爾尼洛夫暴動的日子裏，在黨的一部分上層分子中暴露出同護國派聯盟的趨向，支持臨時政府的趨向，這是不正確的。這裏指的當然是使托洛茨基睡不着覺的那些似乎是『右派』的人。托洛茨基是不正確的，因為世界上還有像當時的黨中央機關報這樣的文件可以駁倒托洛茨基的說法。托洛茨基援引了列寧給中央委員會的警告不要支持克倫斯基的信。但是托洛茨基不了解列寧的信，不了解這些信的意義和使命。列寧在他的信中有時候故意跑在前面，把那些可能犯的錯誤提到首位，預先批評這些錯誤，目的是警告黨，防止黨犯錯誤；他有時候誇大『小事情』，『把蒼蠅說成大象』，這也是為了達到教育的目的。黨的領袖，特別是當他處在地下狀態的時候，只能這樣做，因為他應當比自己的戰友看得遠一些，他必須對每一個可能犯的錯誤，甚至對『小事情』也都敲起警鐘。但是從列寧的這樣一些信（他有不少這樣的信）中做出關於『悲劇性』意見分歧的結論，並且對這一點大加宣揚，這就是不了解列寧的信，不懂得列寧。托洛茨基有時候犯了很大的錯誤，大概就是這個原因。簡單地說：在科爾尼洛夫暴動的日子裏，中央委員會內部根本沒有任何意見分歧。

七月失敗以後，中央委員會和列寧之間在蘇維埃的命運問題上確實發生過意見分歧。大家知道，

列寧希望把黨的注意力集中到在蘇維埃外面準備起義，警告不要迷戀蘇維埃，他認為被護國派玷污了的蘇維埃已經變成空架子了。中央委員會和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採取了更謹慎的路綫，做出決定說，沒有根據認為使蘇維埃活躍起來是不可能的。科爾尼洛夫的發動證明這個決定是正確的。但是這個意見分歧對黨沒有重大影響。列寧後來承認第六次代表大會的路綫是正確的。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沒有抓住這個意見分歧，也沒有把它誇大到『驚人的』程度。

團結一致的黨成了對羣衆進行革命動員的中心，——這就是我們黨在這個時期的情景。

(三) 組織衝擊的時期（九月至十月）。這個時期的主要事實是：

(甲) 民主會議的召開，同立憲民主黨人聯盟的思想的破產；

(乙) 莫斯科蘇維埃和彼得格勒蘇維埃轉向布爾什維克；

(丙) 北方區域蘇維埃代表大會^(五)，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反對軍隊撤出的決定；

(丁) 黨中央關於起義的決定和彼得格勒蘇維埃軍事革命委員會的成立；

(戊) 彼得格勒衛戍部隊關於武裝支持彼得格勒蘇維埃的決定和軍事革命委員會的政治委員制度的建立；

(己) 布爾什維克武裝力量的發動和臨時政府閣員的被捕；

(庚) 彼得格勒蘇維埃軍事革命委員會奪取政權，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成立人民委員會。

這個時期的特點是：危機迅速加劇，執政集團張皇失措，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陷於孤立，動

搖分子大批投向布爾什維克。應該指出這個時期革命策略的一個奇異的特點。這個特點就是：革命進攻的每一個步驟，或者幾乎每一個步驟，都竭力在防禦的形式下進行。毫無疑問，拒絕從彼得格勒撤出軍隊是革命進攻的一個重要步驟，但是這個進攻是在保衛彼得格勒以防外敵可能的進攻的口號下進行的。毫無疑問，軍事革命委員會的成立是對臨時政府進攻的一個更重要的步驟，但是軍事革命委員會的成立是在建立蘇維埃對軍區司令部的行動的監督的口號下實現的。毫無疑問，衛戍部隊公開轉向軍事革命委員會和蘇維埃政治委員綱的建立標誌着起義的開始，但是這些步驟都是在保衛彼得格勒蘇維埃以防反革命可能的發動的口號下進行的。革命似乎用防禦的外貌來掩蓋自己的進攻行動，以便更容易地把不堅定的動搖的分子拉到自己方面來。大概就是這個原因，這個時期的演說、文章和口號在外表上都帶有防禦性質，而在內容上却具有深刻的進攻性質。

這個時期在中央委員會內部是否有過意見分歧呢？是的，是有過的，並且是相當重大的。起義問題上的意見分歧我已經談過了。這些意見分歧在中央委員會十月十日和十六日的會議記錄中完全反映出來了。因此，我不再重複過去已經講過的話。現在必須談談下面三個問題：關於參加預備國會，關於蘇維埃在起義中的作用和關於起義的日期。因為托洛茨基只想顯露頭角而『無意中』歪曲了列寧對後面兩個問題的立場，所以就更需要談談這三個問題。

毫無疑問，預備國會問題上的意見分歧是具有嚴重性質的。所謂預備國會的目的是什麼呢？目的是幫助資產階級把蘇維埃排擠到後面去，奠定資產階級議會制的基礎。預備國會在革命已經成熟

的情況下不能完成這樣的任務，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事變證明這個目的是實現不了的，而預備國會本身則是科爾尼洛夫叛亂的流產兒。但是很明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建立預備國會正是追求這個目的。在這種條件下，布爾什維克參加預備國會有什麼意義呢？只會使無產階級羣衆看不清預備國會的眞面目。主要就是這個原因，列寧在他的信中激烈地抨擊主張參加預備國會的人。參加預備國會無疑是嚴重的錯誤。

但是，如果像托洛茨基那樣認爲主張參加預備國會的人是爲了進行正常的工作，是爲了『把工人運動引導』『到社會民主主義的軌道上來』而參加預備國會的，那就錯了。這完全不是事實。這是謊話。如果這是事實，黨就不能用退出預備國會這種表示抗議的方法來『一下子』消除這個錯誤。我們黨瞬息之間就糾正了這個錯誤，這是我們黨的生命力和革命威力的一種表現。

其次，讓我來糾正托洛茨基文集的『編輯』連茨涅爾在關於解決預備國會問題的布爾什維克黨團會議的敘述中夾雜的一個小小的不確切的地方。連茨涅爾說，這個會議上的報告人有兩個——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這不是事實。事實上報告人有四個：兩個主張抵制預備國會（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兩個主張參加預備國會（加米涅夫和諾根）。

當托洛茨基提到列寧在起義形式問題上的態度時，他的說法更糟。照托洛茨基的說法，列寧認爲黨在十月起義時應當『不依靠蘇維埃並且背着蘇維埃』來奪取政權。托洛茨基然後又來批評這個硬加在列寧身上的胡說，他『手舞足蹈』，最後還說了一句寬容的話：『這或許是一個錯誤吧。』托洛茨基在

這裏造列寧的謠，他在歪曲列寧對蘇維埃在起義中的作用的看法。可以引證一大堆文件來證明列寧曾經建議要通過蘇維埃（彼得格勒蘇維埃或莫斯科蘇維埃）而不要背着蘇維埃來奪取政權。托洛茨基爲什麼要編造這種非常奇怪的關於列寧的奇談呢？

常托洛茨基『分析』中央委員會和列寧在起義日期問題上的態度時，他的說法並不好些。托洛茨基在敘述中央委員會十月十日的有名會議時，肯定說在這個會議上『通過了一個起義不得遲於十月十五日舉行的決議』。這樣說來，中央委員會規定了起義的日期是十月十五日，後來自己又破壞了這個決定，把起義日期拖延到十月二十五日了。這是不是事實呢？不，不是事實。中央委員會在這個時期內只通過了兩個關於起義的決議——十月十日的決議和十月十六日的決議。現在我們來讀一下這兩個決議。

十月十日中央委員會的決議：

『中央委員會認爲，俄國革命的國際形勢（德國海軍中的起義，這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在全歐洲增長的最高表現；其次，帝國主義者爲窒息俄國革命而媾和^①的威脅）和軍事狀況（俄國資產階級和克倫斯基及其同夥已經明確地決定把彼得堡讓給德國人），無產階級政黨在蘇維埃中獲得多數，再加上農民起義和人民轉而信任我們黨（莫斯科的選舉），以及第二次科爾尼洛夫叛

① 顯然，這可能是『單獨媾和』。——斯大林

亂顯然已在準備（軍隊撤出彼得堡、哥薩克調入彼得堡、哥薩克包圍明斯克等等），——這一切都把武裝起義提到日程上來了。

所以，中央委員會認為，武裝起義是不可避免的，並且業已完全成熟。中央委員會指示各級黨組織以此為指針，並從這個觀點出發去討論和解決一切實際問題（北方區域蘇維埃代表大會、軍隊撤出彼得堡、莫斯科人和明斯克人的發動等等）。『七』

十月十六日有負責工作人員參加的中央委員會會議的決議：

『會議十分擁護並完全支持中央委員會的決議，號召一切組織，號召全體工人和士兵全面地加緊準備武裝起義，支持中央委員會為此而成立的總部；會議表示完全相信中央委員會和蘇維埃會及時指出進攻的有利時機和適當方法。』『八』

你們看，托洛茨基竟把起義的日期和中央委員會關於起義的決議忘記了。

托洛茨基斷言，列寧對蘇維埃的合法性估計不足，列寧不了解今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在十月二十五日奪取政權的重大意義，似乎正因為如此，列寧會堅持在十月二十五日以前奪取政權，這是完全不正確的。這不是事實。列寧是根據兩個原因建議在十月二十五日以前奪取政權的。第一、因為反革命分子隨時可能讓出彼得格勒，這就會使高漲的起義受到挫折，因此每一天都是寶貴的。第二、因為彼得格勒蘇維埃公開規定並公佈起義日期（十月二十五日）的錯誤，只能用在這個公開的起義日期以前舉行起義來糾正。因為列寧把起義看做藝術，他不會不知道，敵人曉得了起義日期（由於彼得格勒蘇

維埃的不謹慎），一定要竭力準備對付這一天，所以必須搶在敵人前面，就是說，一定要在公開的起義日期以前舉行起義。主要就是這個原因，列寧在他的信中痛斥了日期（十月二十五日）拜物教徒。事變證明列寧是完全正確的。大家知道，起義是在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以前開始的。大家知道，政權實際上是在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開幕以前奪取的，而且奪取政權的不是蘇維埃代表大會，而是彼得格勒蘇維埃，是軍事革命委員會。蘇維埃代表大會只是從彼得格勒蘇維埃手中把政權接受過來。正因爲如此，托洛茨基關於蘇維埃合法性的意義的長篇大論完全是多餘的。

生氣勃勃而強有力的黨領導着革命羣衆去衝擊並推翻資產階級政權，——這就是我們黨在這個時期的狀況。

關於十月革命準備的奇談問題就是這樣。

三 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

我們在上面談到了托洛茨基及其同夥所散佈的有關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準備的許多反黨的和關於列寧的奇談。我們揭穿了和駁斥了這些奇談。這裏就產生一個問題：托洛茨基爲什麼要編造所有這些關於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準備、關於列寧和列寧的黨的奇談呢？托洛茨基爲什麼要發表那些反黨的新著作呢？現在，當黨不願意進行爭論的時候，當黨正爲一大堆緊急任務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

當黨需要團結一致地進行恢復經濟的工作，而不需要對老問題進行新鬥爭的時候，這些著作的用意、任務和目的何在呢？托洛茨基爲什麼要把黨拉回去進行新的爭論呢？

托洛茨基要我們相信，這一切都是爲『研究』十月革命所必需的。但是，難道不再一次侮辱黨和黨的領袖列寧就不能研究十月革命了嗎？這部十月革命的『歷史』從頭至尾都在破壞十月起義的主要活動家的威信，破壞組織和舉行這次起義的黨的威信，這算什麼十月革命的『歷史』呢？不，這裏的問題不在於研究十月革命。不是這樣來研究十月革命的。也不是這樣來寫十月革命的歷史的。顯然，這裏是別有『用心』的。根據一切材料來看，這個『用心』就是：托洛茨基在他的著作中還有一個（還有一個！）企圖，想準備條件用托洛茨基主義頂替列寧主義。托洛茨基所以『急切』需要破壞黨的威信，破壞舉行起義的黨的幹部的威信，是爲了從破壞黨的威信轉到破壞列寧主義的威信。而所以必須破壞列寧主義的威信，又是爲了偷運托洛茨基主義這個『唯一的』『無產階級的』（不要笑！）思想體系。爲了使偷運的程序『極爲平安地』進行，所有這一切當然（呵，當然！）都打着列寧主義的旗幟。

托洛茨基最近發表的著作的實質就在這裏。

因此，托洛茨基的這些著作直截了當地提出了關於托洛茨基主義的問題。

那末，什麼是托洛茨基主義呢？

托洛茨基主義有三個特點，這些特點使它和列寧主義發生不可調和的矛盾。這是些什麼特點呢？

第一、托洛茨基主義是『不斷』（不間斷）革命論。按照托洛茨基主義的解釋，不斷革命是什麼呢？這是一種不把力量單薄的農民估計爲革命力量的革命。正如列寧所說的那樣，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就是『跳過』農民運動，『以奪取政權爲兒戲』。它的危險在哪裏呢？它的危險在於：如果企圖實行這種革命，那末結果必然是破產，因爲它會使俄國無產階級的同盟者，即力量單薄的農民離開俄國無產階級。這也就說明列寧主義爲什麼從一九〇五年起就同托洛茨基主義進行鬥爭了。

從這個鬥爭的角度來說，托洛茨基是如何評價列寧主義的呢？他把列寧主義看做含有『反革命特徵』的理論。對列寧主義的這種氣憤的批評的根據是什麼呢？根據是：列寧主義當時捍衛了並且捍衛住了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的思想。

但是，托洛茨基還不限於這種氣憤的批評，他還更進一步斷定說：『現在列寧主義的整個大廈建築在謊言和捏造上面，它本身帶有腐蝕自己的毒素。』（見一九一三年托洛茨基給齊赫澤的信）可見擺在我們面前的是兩條對立的路綫。

第二、托洛茨基主義不信任布爾什維克的黨性、布爾什維克的團結一致和布爾什維克對機會主義分子的敵意。托洛茨基主義在組織方面是主張革命者和機會主義者在一個黨內共處並組織各種大小集團的理論。你們想必知道托洛茨基的八月聯盟的歷史。在這個聯盟中，馬爾托夫派、召回派、取消派和托洛茨基派安然合作，把自己裝扮成爲一個『真正的』黨。大家知道，這個七拼八湊的『黨』追求的目的是破壞布爾什維克黨。當時『我們的意見分歧』是什麼呢？『我們的意見分歧』是：列寧主義

認為消滅八月聯盟是發展無產階級政黨的保證，而托洛茨基主義則把這個聯盟看做建立『真正的』黨的基礎。

可見又是兩條對立的路綫。

第三、托洛茨基主義不信任布爾什維主義的領袖，它企圖損害他們的聲譽，破壞他們的威信。我不知道黨內還有哪一個派別，在損害列寧主義的領袖或黨的中央機關的聲譽方面能够同托洛茨基主義相比。例如：托洛茨基把列寧評定為『慣於利用俄國工人運動中一切落後性的老行家』（見一九一三年托洛茨基給齊赫澤的信）的這種『客氣的』批評有什麼價值呢？要知道，在托洛茨基所有的『客氣的』批評中，這還遠不是最『客氣的』批評。

在十月運動期間，背着這種討厭貨色的托洛茨基怎麼還能留在布爾什維克的隊伍裏呢？這是因為當時托洛茨基拋棄了（真正拋棄了）自己的貨色，把它藏到櫃子裏去了。沒有這個『行動』，同托洛茨基真正合作是不可能的。八月聯盟的理論，即同孟什維克保持統一的理論已經被革命粉碎和拋掉了，因為在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展開武裝鬥爭的情況下還談得上什麼保持統一呢？托洛茨基只好承認這個理論沒有用處。

不斷革命論也『碰到了』同樣不幸的事情，因為在布爾什維克中間誰也沒有打算在二月革命後的第二天立刻奪取政權，而且托洛茨基不會不知道，布爾什維克是不容許他——用列寧的話來說——『以奪取政權為兒戲』的。托洛茨基只好承認布爾什維克的爭取在蘇維埃中擴大影響和努力爭取農

民的政策。至於托洛茨基主義的第三個特點（不信任布爾什維克的領袖），由於頭兩個特點顯然已經破產，它當然也退到後面去了。

托洛茨基已經沒有像樣一點的集團而作爲一個失去軍隊的政治上的孤立者走到布爾什維克方面來了，在這種情況下，他能够不把自己的貨色藏到櫃子裏去，能够不跟着布爾什維克走嗎？當然不能！

由此得到什麼教訓呢？教訓只有一個：列寧主義者和托洛茨基的長期合作，只有在後者完全拋棄舊的貨色，完全贊成列寧主義的情況下才有可能。托洛茨基寫十月革命的教訓，但是他忘記了除其他一切教訓以外，十月革命還有一個教訓，就是我剛才講過的並且對於托洛茨基主義具有頭等意義的教訓。托洛茨基主義不妨也考慮一下十月革命的這個教訓。

但是這個教訓看來對托洛茨基主義並沒有什麼益處。原來，在十月運動的日子裏被藏進櫃子裏去的托洛茨基主義的舊貨色現在又重新搬出來想找銷路——恰好我們這裏的市場正在擴大。毫無疑問，托洛茨基的新著作企圖恢復托洛茨基主義，『戰勝』列寧主義，偷運和培植托洛茨基主義的一切特點。新托洛茨基主義不是舊托洛茨基主義的簡單的重複，它十分自慚形穢和狼狽不堪，它比舊托洛茨基主義在精神上柔和得多，在形式上溫和得多，但是它在實質上無疑保存着舊托洛茨基主義的一切特點。新托洛茨基主義不敢作爲好戰力量來反對列寧主義，它寧願在列寧主義這個共同的旗幟下行事，在解釋和改進列寧主義的口號下活動。這是因爲新托洛茨基主義是軟弱無力的。新托洛茨基

主義恰好在列寧逝世的時候出現，這個事實決不能認為是偶然的。列寧在世時，它是不敢採取這個冒險步驟的。

新托洛茨基主義的特點是什麼呢？

(一)關於『不斷』革命問題。新托洛茨基主義不認為有必要來公開捍衛『不斷』革命論。它『只是』斷定，十月革命完全證實了『不斷』革命的思想。它由此做出下面的結論：列寧主義在戰後，在十月革命時期的東西是重要的和可以接受的，相反地，列寧主義在戰前，在十月革命以前的東西是不正確的，是不能接受的。由此就產生了托洛茨基派把列寧主義分割為兩個部分的理論：一部分是戰前的列寧主義，『不中用的』『舊』列寧主義，它持有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的思想；另一部分是戰後的、十月革命時期的新列寧主義，托洛茨基派想使它適合於托洛茨基主義的要求。托洛茨基主義需要這個分割列寧主義的理論作為第一個比較『可行的』必要步驟，以便於採取下幾個反對列寧主義的步驟。

但是，列寧主義不是由各色各樣的成分拼湊起來的可以分割的折衷主義理論。列寧主義是一個完整的理論，它產生於一九〇三年，經歷了三次革命的考驗，現在正作為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戰鬥旗幟而向前行進。

列寧說：『布爾什維主義作為一個政治思潮和一個政黨而存在，是從一九〇三年開始的。只有布爾什維主義在其存在的整個時期內的歷史，才能令人滿意地說明，為什麼布爾什維主義能夠制定為無產階級勝利所必需的鐵的紀律，並在最困難的條件下堅持這種紀律。』（見『列寧全

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八頁）

布爾什維主義和列寧主義實質上是一樣的。這是同一個東西的兩個名稱。因此，把列寧主義分割爲兩個部分的理論是破壞列寧主義的理論，是用托洛茨基主義頂替列寧主義的理論。

不用說，黨是不能容忍這種奇怪的理論的。

（二）關於黨性問題。舊托洛茨基主義用同孟什維克保持統一的理論（和實踐）來破壞布爾什維克的黨性。但是這個理論已經丟醜到這種地步，現在竟沒有人願意回憶它了。爲了破壞黨性，現今的托洛茨基主義想出了一套新的、不大丟醜的、幾乎是『民主的』理論，即把老幹部和新黨員對立起來的理論。在托洛茨基主義看來，我們黨的統一的完整的歷史是不存在的。托洛茨基主義把我們黨的歷史分成兩個不同價值的部分，即分成十月革命以前的歷史和十月革命以後的歷史。我們黨的十月革命以前部分的歷史其實不是歷史，而是『史前史』，是我們黨的不重要的或者至少是不很重要的準備時期。而我們黨的十月革命以後部分的歷史則是實在的真正的歷史。屬於前一個時期的是我們黨的『史前史的』、不重要的『老』幹部；屬於後一個時期的是新的、真正的、『有歷史的』黨。未必用得着證明，這種劃分黨史的奇特方法是破壞我們黨的新老幹部之間團結的方法，是破壞布爾什維克黨性的方法。

不用說，黨是不能容忍這種奇怪的方法的。

（三）關於布爾什維主義領袖問題。舊托洛茨基主義竭力用某種公開的方式破壞列寧的威信，不

怕後果如何。新托洛茨基主義做得比較謹慎。它竭力以讚揚列寧、稱頌列寧的姿態來幹舊托洛茨基主義的勾當。我認爲有必要舉幾個例子。

黨知道列寧是一個無情的革命者。但是黨也知道列寧是謹慎的，他不喜歡輕舉妄動的人，他經常堅決地制止迷戀恐怖手段的人，包括托洛茨基本人在內。托洛茨基在他的『論列寧』一書中提到了這個問題。但是從他的評述看來，列寧的全部活動只是『在每一個適當的場合灌輸恐怖手段不可避免的思想』。於是使人得到一個印象：列寧是所有殘暴的布爾什維克中最殘暴的一個。

托洛茨基爲什麼要說出這種不必要的和沒有根據的荒謬言論呢？

黨知道列寧是一個模範黨員，他不喜歡不通過領導集團而單獨地、不經過仔細研究和檢查而突然地決定問題。托洛茨基在他的書中也提到了這一方面。但是從他的書中看到的不是列寧，而是一個在幽靜的辦公室裏憑靈感決定極重要問題的中國官吏。

你們想知道我們黨是怎樣決定解散立憲會議問題的嗎？請聽托洛茨基的話吧：

『列寧說：「當然應該解散立憲會議，但是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態度怎樣呢？」』

然而，納坦松老人很使我們感到安慰。他來找我們「商量」，開口就說：

「要知道，也許不得不用武力解散立憲會議。」

列寧喊道：「好極了！說得真對！你們的人都贊成嗎？」

納坦松回答說：「我們有些人正在動搖，但是我想他們終究是會同意的。」』

歷史就是這樣寫的。

你們想知道黨是怎樣決定最高軍事委員會問題的嗎？請聽托洛茨基的話吧：

『每一次到參謀部去以後，我就向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說：「沒有真正的有經驗的軍事人員，我們就不能脫出這種混亂狀態。」』

「這想必是對的。他們千萬可別叛變……」

「給他們每個人派一個政治委員。」

列寧喊道：「派兩個更好一些，並且要精明強幹的。我們決不會沒有精明強幹的共產黨員。」最高軍事委員會的機構就是這樣產生的。』

托洛茨基就是這樣寫歷史的。

托洛茨基爲什麼要編造這些破壞列寧聲名的阿拉伯故事呢？難道是爲了頌揚黨的領袖弗·伊·列寧嗎？不大像。

黨知道列寧是我們時代的一個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一個深湛的理論家和最有經驗的革命家，是一個絲毫沒有布朗基主義陰影的人。托洛茨基在他的書中也提到了這一方面。但是從他的評述中看到的不是巨人列寧，而是一個在十月革命的日子裏建黨『不依靠蘇維埃並且背着蘇維埃，用自己的手奪取政權』的渺小的布朗基主義者。但是我已經講過，這種評述是一點也不合乎實際情況的。托洛茨基爲什麼要做這種令人憤怒的……不確切的評述呢？這裏沒有『稍微』破壞列寧的威信

的企圖嗎？

這就是新托洛茨基主義的特點。

新托洛茨基主義的危險在哪裏呢？它的危險在於：托洛茨基主義按其全部內容來說，有一切可能成爲力圖削弱和瓦解無產階級專政的非無產階級分子的中心和集合點。

你們要問：今後怎麼辦呢？由於托洛茨基發表了新著作，黨的當前任務是什麼呢？

現在托洛茨基主義的發動是爲了破壞布爾什維主義的威信，摧毀它的基礎。黨的任務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義這一思潮。

有人談到懲罰反對派和分裂的可能性。同志們，這是胡說。我們黨是堅強有力的。它不容許任何分裂。至於懲罰，我是堅決反對的。現在我們需要的不是懲罰，而是展開思想鬥爭來反對正在復活的托洛茨基主義。

我們不願意也不力求進行這種論戰。托洛茨基主義現在用它的反列寧主義的發動來強迫我們進行這種論戰。好吧，同志們，我們準備着！

載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真理報』第二六九號

① 克雷洛夫的寓言「隱士和熊」描寫熊爲隱士效勞，用大石頭驅除隱士頭上的蒼蠅，結果反把他打死。——譯者註

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

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

(『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書序言(七))

一 十月革命的內外環境

有三個外部情況使俄國無產階級革命能够比較容易地打斷了帝國主義鍊條，從而推翻了資產階級政權。

第一個情況：十月革命是在兩個主要帝國主義集團，即英法集團和德奧集團進行殊死鬥爭的時期開始的，當時這兩個集團忙於決死鬥爭，既沒有時間，也沒有物力來認真注意撲滅十月革命。這個情況對於十月革命有巨大的意義，因為它使十月革命能够利用帝國主義內部的激烈衝突來鞏固和組織自己的力量。

第二個情況：十月革命是在帝國主義戰爭進行中開始的，當時苦於戰爭而渴望和平的勞動羣衆被事物的邏輯引到無產階級革命這條擺脫戰爭的唯一出路。這個情況對於十月革命有極重大的意義，因為它使十月革命掌握了強有力的和平工具，使十月革命易於把蘇維埃革命和結束可恨的戰爭

聯結起來，因而使十月革命在西方工人和東方被壓迫民族中間獲得廣大的同情。

第三個情況：在歐洲有雄偉的工人運動，在西方和東方有長期的帝國主義戰爭所造成的日益成熟的革命危機。這個情況對於俄國革命有不可估量的意義，因為它保證了俄國革命在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鬥爭中有可靠的國外同盟者。

可是，除了外部情況，十月革命還有許多使它易於獲得勝利的內部有利條件。

其中主要的條件如下：

第一、十月革命受到俄國工人階級絕大多數人的最積極的擁護。

第二、它受到渴望和平與土地的貧農和大多數士兵的最可靠的擁護。

第三、它有布爾什維克黨這樣一個久經考驗的政黨為統帥，為領導力量，而這個政黨所以有力量，不僅因為它有經驗和多年來形成的紀律，而且因為它和勞動羣衆有密切的聯系。

第四、十月革命遇到的是這樣一些比較容易戰勝的敵人，如較為軟弱的俄國資產階級、被農民『騷動』弄得頹喪不堪的地主階級、在戰爭進程中完全破產的妥協政黨（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第五、它擁有新國家的廣大地域，它在這個地域內能夠自由迴旋，能够在環境要求退却時實行退却，能够暫時休息，能够集結力量等等。

第六、十月革命在反對反革命的鬥爭中能够指望得到國內充足的糧食、燃料和原料。這些內外情況配合起來，就造成一種特殊環境，使十月革命比較容易地獲得勝利。

這當然不是說，十月革命在內外環境方面沒有不利的條件。例如十月革命處於相當孤獨的地位，它旁邊和鄰近沒有一個可以依靠的蘇維埃國家，這個不利條件該有多麼重大的意義呢？毫無疑問，例如德國未來的革命在這方面就會處於比較有利的狀況，因為它鄰近有我們蘇聯這樣一個實力強大的蘇維埃國家。至於無產階級在國內不佔多數，這個對十月革命不利的條件我就不談了。

可是，這些不利條件只是使十月革命上述內外特殊條件的巨大意義更加明顯了。

一分鐘也不可以忘記這些特殊條件。在分析一九二三年秋季的德國事變時，特別應當記住這些特殊條件。托洛茨基首先應當記住這些特殊條件，因為他竟籠統地把十月革命跟德國革命類比，並放肆地痛斥德國共產黨的真正的和虛構的錯誤。

列寧說：『俄國在一九一七年那種非常獨特的具體歷史條件下開始社會主義革命是容易的，而要把這個革命繼續下去並貫徹到底，就比西歐各國困難了。我還在一九一八年初就已經指出這一點，此後兩年來的經驗也完全證實這種論斷是正確的。俄國當時的特殊條件是：（一）有可能把蘇維埃革命和通過這個革命來結束使工農痛苦萬分的帝國主義戰爭這件事聯系起來；（二）有可能在一定時期內利用世界上兩個強大的帝國主義強盜集團間的決死鬥爭，這兩個集團當時不能聯合起來反對它們的蘇維埃敵人；（三）有可能堅持比較長期的國內戰爭，這多少是因為我國幅員廣闊和交通不便；（四）當時在農民中有非常深刻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使無產階級政黨能够接受農民政黨（社會革命黨，其大多數是極端敵視布爾什維主義的）的革命要求，並通

過無產階級奪得政權而立即加以實現；——這些特殊條件目前在西歐是沒有的，而且這樣的或類似的條件的重新出現是不很容易的。正因爲如此——除其他許多原因以外——西歐開始社會主義革命要比我們困難。』（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四十五頁至第四十六頁）

列寧的這些話是不可以忘記的。

二 論十月革命的兩個特點，或十月革命和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

十月革命有兩個特點。要了解十月革命的內容和歷史意義，首先必須認清這兩個特點。這是些什麼特點呢？

第一、在我國誕生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在以無產階級爲領導的無產階級和勞動農民羣衆聯盟的基礎上產生的政權。第二、在我國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是社會主義在一個資本主義不大發達的國家裏獲得勝利的結果；而在其他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國家仍然保存着資本主義。這當然不是說十月革命沒有其他特點。可是，現在對於我們重要的正是這兩個特點，這不僅因爲它們清楚地表現出十月革命的實質，而且因爲它們十分明顯地揭露了『不斷革命』論的機會主義本性。

我們來簡略地研究一下這兩個特點。

關於城鄉小資產階級勞動羣衆的問題，關於把這些羣衆爭取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的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極重要的問題。在奪取政權的鬥爭中，城鄉勞動人民支持誰，支持資產階級還是支持無產階級，城鄉勞動人民成爲誰的後備軍，成爲資產階級的後備軍還是成爲無產階級的後備軍，——革命的命運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堅固性要由這一點來決定。法國一八四八年革命和一八七一年革命所以失敗，主要是因爲農民後備軍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十月革命所以勝利，是因爲它從資產階級那裏奪下了農民後備軍，它把這個後備軍爭取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中成了城鄉千百萬勞動人民的唯一領導力量。

誰不了解這一點，誰就永遠不了解十月革命的性質、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我國無產階級政權對內政策的特點。

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老練的戰略家』用心地『巧妙地』『挑選出來』並『合理地依靠』某些居民階層的普通政府的上層機關。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和勞動農民羣衆在以無產階級爲領導力量的條件下，爲推翻資本和取得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而結成的階級聯盟。

所以，這裏所說的不是對農民運動的革命能力『稍微』估計不足或『稍微』估計過高，像某些要外交手腕的『不斷革命』論者現在愛說的那樣。這裏所說的是十月革命勝利後產生的新的無產階級國家的本質。這裏所說的是無產階級政權的性質，是無產階級專政本身的基礎。

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是勞動者的先鋒隊——無產階級同人數衆多的非無產階級的勞動

階層（小資產階級、小業主、農民、知識分子等等）或同他們的大多數結成的特種形式的階級聯盟，是反資本的聯盟，是爲徹底推翻資本、徹底鎮壓資產階級反抗並完全粉碎其復辟企圖而成立的聯盟，是爲最終建成並鞏固社會主義而成立的聯盟。」（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三五〇頁至第三五一頁）

其次：

『如果我們把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歷史學的、哲學的、科學的拉丁名詞譯成普通話，那就是說：

在推翻資本壓迫的鬥爭中，在推翻這種壓迫的過程中，在保持和鞏固勝利的鬥爭中，在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的事業中，在完全消滅階級的全部鬥爭中，只有一個階級，即城市的和一般工廠的工人，即產業工人，才能領導全體被剝削的勞動羣衆。」（同上，第三八七頁）

列寧所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就是這樣。

十月革命的特點之一在於這個革命是實現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典範。

有些同志以爲這個理論只是和俄羅斯實際情形有關的純粹『俄國的』理論。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列寧說到無產階級所領導的非無產階級勞動羣衆時，指的不僅是俄羅斯農民，而且是蘇聯境內那些不久以前還是俄國殖民地的邊疆地區的勞動分子。列寧始終不倦地一再說，俄國無產階級不和這些異民族羣衆結成聯盟就不能獲得勝利。列寧在他論述民族問題的文章中以及在共產國際各

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再三說過，沒有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和被奴役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間的革命聯盟，革命同盟，世界革命是不可能勝利的。而殖民地豈不就是被壓迫的勞動羣衆，首先就是勞動農民羣衆嗎？誰不知道，殖民地解放問題實質上就是非無產階級勞動羣衆擺脫財政資本的壓迫和剝削的問題呢？

由此應當得出結論：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並不是純粹『俄國的』理論，而是世界各國必須採用的理論。布爾什維主義不只是俄國的現象。列寧說，『布爾什維主義』是『可供各國效法的策略模範』（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七〇頁）。

十月革命第一個特點的特徵就是這樣。

從十月革命的這個特點來看，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是怎麼一回事呢？

我們不來多講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的立場，當時他『簡直』忘掉了農民是革命力量，提出了『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號，即不要農民參加革命的口號。現在，甚至拉狄克這位愛要外交手腕的『不斷革命』論者也不得不承認，『不斷革命』在一九〇五年是離開現實而『向空一躍』。現在，看來大家都認為不值得再理會這個『向空一躍』了。

我們也不來多講托洛茨基在大戰時期的立場，例如在一九一五年的立場，當時他在他的『爲政權而鬥爭』一文中，根據『我們生活在帝國主義時代』，帝國主義『不是把資產階級民族和舊制度對立起來，而是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民族對立起來』這一點，做出結論說農民的革命作用一定會減少，

沒收土地的口號已經沒有它從前所有的那種意義。大家知道，列寧在評論托洛茨基的這篇文章時，責備托洛茨基『否認』『農民的作用』，說『托洛茨基實際上是幫助俄國那些把「否認」農民的作用理解爲不願意發動農民起來革命的自由主義的工人政治家！』（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八二頁）

我們最好來看看托洛茨基關於這個問題的較晚的著作，看看他在無產階級專政已經確立，他已經有可能根據事實來檢查他的『不斷革命』論並改正他的錯誤的時期內所發表的著作。就拿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二年爲『一九〇五年』一書所寫的『序言』來看吧。托洛茨基在這篇『序言』中關於『不斷革命』是這樣說的：

『正是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事變到十月罷工這個期間，本書作者對於俄國革命發展的性質形成了獲得「不斷革命」論名稱的那些觀點。這個奇妙的名稱表達了這樣一個意思：直接擺在俄國革命面前的雖然是資產階級的目的，可是它不能停留在這些目的上面。除非使無產階級執掌政權，革命就不能解決它當前的資產階級任務。而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後，又不能以革命的資產階級範圍來限制自己。恰恰相反，無產階級先鋒隊正是爲了保證自己的勝利，還在它統治的初期，就不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資產階級所有制。在這種情形下，它不僅會和那些在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初期支持過它的一切資產階級集團發生敵對的衝突，而且會和那些協助過它取得政權的廣大農民羣衆發生敵對的衝突。在農民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落後國

家內，工人政府所處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國際範圍內即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決。』^①

托洛茨基關於他的『不斷革命』就是這樣說的。

只要把這段引文和上面從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的著作中引出的幾段話對照一下，就會看出橫在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和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之間的鴻溝了。

列寧說無產階級和勞動農民階層的聯盟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而托洛茨基却說『無產階級先鋒隊』會和『廣大農民羣衆』發生『敵對的衝突』。

列寧說無產階級領導被剝削的勞動羣衆。而托洛茨基却說『在農民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落後國家內，工人政府所處地位有矛盾』。

列寧認為革命首先要從俄國本國的工人和農民中間汲取力量。而托洛茨基却認為只有『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汲取必要的力量。

如果國際革命竟來遲了，那又怎麼辦呢？我國革命有沒有什麼光明的前途呢？托洛茨基認為沒有任何光明的前途，因為『……工人政府所處地位的矛盾，只有……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決』。按照這個計劃看來，我國革命只有一個前途：在本身所有各種矛盾中苟延殘喘，在等

待世界革命中連根腐爛。

在列寧看來，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呢？

無產階級專政是依靠無產階級和勞動農民羣衆的聯盟來『徹底推翻資本』和『最終建成並鞏固社會主義』的政權。

在托洛茨基看來，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呢？

無產階級專政是和『廣大農民羣衆』發生『敵對的衝突』而只有『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設法解決『矛盾』的政權。

這個『不斷革命』論和否定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的著名的孟什維主義理論有什麼區別呢？

實質上是毫無區別的。

這是不容置疑的。『不斷革命』論並不是對農民運動的革命能力的一種簡單的估計不足。『不斷革命』論是對農民運動的一種會導向否定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估計不足。

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是變相的孟什維主義。

十月革命的第一個特點就是這樣。

十月革命的第二個特點的特徵怎樣呢？

列寧在研究帝國主義特別是戰爭時期的帝國主義時，發現了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政治不平衡發展、躍進式發展的規律。按照這個規律的含義說來，各個企業、各個托拉斯、各個工業部門、各個國

家的發展是不平衡的，不是按照既定的次序，不是一個托拉斯、一個工業部門或一個國家始終走在前面，其他托拉斯或其他國家依次跟在後面，而是躍進式的，在一些國家的發展中發生停頓，在另一些國家的發展中却發生躍進。同時，落伍的國家『完全合乎情理地』力圖保持舊陣地，而躍進的國家也同樣『合乎情理地』力圖奪取新陣地，結果就使帝國主義國家的軍事衝突成爲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事情。例如德國的情形就是這樣，在半世紀以前，德國同英法比較起來還是一個落後的國家。日本當時同俄國比較起來也是這樣。可是大家知道，在二十世紀初期，德國和日本已經躍進很遠，德國超過了法國，並開始在世界市場上排擠英國，日本超過了俄國。大家知道，不久以前的帝國主義戰爭就是從這些矛盾中產生的。

這個規律的出發點是：

(一)『資本主義已成爲極少數「先進」國對地球上大多數居民施行殖民壓迫和財政扼制的世界體系。』（見列寧『帝國主義』法文版序言，『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一七九頁）

(二)『瓜分這種「贓物」的是世界上兩三個強大的全身武裝的強盜（美、英、日），它們把全世界捲入它們爲瓜分自己的贓物而進行的戰爭。』（同上）

(三)財政壓迫的世界體系內部的矛盾的增長和軍事衝突的必然性使帝國主義世界戰綫容易被革命攻破，使這條戰綫很可能被個別國家突破。

(四)這種突破最可能發生在帝國主義戰綫的鍊條最薄弱的地方和國家，即在帝國主義防衛最差

而革命最容易展開的地方和國家。

(五) 因此，在其他國家（即使這些國家的資本主義比較發達）還保存着資本主義的情況下，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即使這個國家的資本主義不大發達）內勝利是完全可能的，是可以肯定的。

簡單說來，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基礎就是這樣。

十月革命的第二個特點何在呢？

十月革命的第二個特點在於這個革命是實際運用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模範。

誰不了解十月革命的這個特點，誰就永遠不了解這個革命的國際性質，這個革命的雄偉的國際力量，這個革命的獨特的對外政策。

列寧說：『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這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既然剝奪了資本家並在本國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就會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把他國家的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掀起反對資本家的起義，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去反對剝削階級及其國家。』因為『沒有各社會主義共和國對各落後國家的相當長期的頑強鬥爭，便不能實現各民族在社會主義中的自由聯合。』（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頁）

各國機會主義者斷言，無產階級革命只能在工業發達的國家開始（如果按照他們的理論說來，無

產階級革命一般會在什麼地方開始的話)；這些國家的工業愈發達，社會主義勝利的機會就愈多。在他們看來，在一個國家內，何況是在資本主義不大發達的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的勝利是完全不合乎情理的，是絕對不可能的。還在戰爭期間，列寧就依據帝國主義國家發展不平衡的規律，提出他的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即使這個國家的資本主義不大發達）內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來駁斥機會主義者。

大家知道，十月革命完全證實了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是正確的。

從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理論來看，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是怎麼一回事呢？

就拿托洛茨基的小冊子『我們的革命』（一九〇六年）來看吧。

托洛茨基寫道：

『沒有歐洲無產階級直接的國家援助，俄國工人階級就不能保持政權，就不能把自己暫時的統治變成長期的社會主義專政。這是一分鐘也不能懷疑的。』

這一段話說明什麼呢？說明『沒有歐洲無產階級直接的國家援助』，就是說，在歐洲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前，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這裏說的是在俄國）內勝利是不可能的。

這個『理論』和列寧的社會主義可能『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勝利的論點有什麼共同之點呢？

很明顯，這裏沒有任何共同之點。

假定說，因為托洛茨基的這本小冊子是在一九〇六年出版的，當時還難於確定我們的革命的性質，所以其中含有一些無意的錯誤，而不完全符合托洛茨基較晚時期的觀點。那末我們就拿托洛茨基的另一本小冊子，他的『和平綱領』來看吧。這本小冊子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夜出版的，現在（一九二四年）編入『一九一七年』一書再版了。托洛茨基在這本小冊子裏批評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並拿歐洲聯邦口號來和它對立。他斷言：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是不可能的，社會主義勝利只能是歐洲幾個聯合為歐洲聯邦的主要國家（英、俄、德）的勝利，否則社會主義勝利是完全不可能的。他直截了當地說：『德國不發生革命，俄國或英國就不能有勝利的革命，反過來說也是一樣。』

托洛茨基說：『為反對聯邦口號而提出的唯一的多少是具體的歷史性的理由，曾由在瑞士出版的『社會民主黨人報』（當時布爾什維克的中央機關報。——斯大林註）歸結為下面的一句話：「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社會民主黨人報」由此得出結論說：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因而每一個別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無須以建立歐洲聯邦為其先決條件。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平衡的，這是完全無可爭辯的意見。可是，這個不平衡本身又是非常不平衡的。英國、奧國、德國或法國的資本主義水平是不一樣的。可是，跟非洲和亞洲比較起來，所有這些國家都是已經成熟到實現社會革命的資本主義「歐洲」了。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應當

在自己的鬥爭中「等待」其他國家，這是一個淺顯的道理，爲使國際間同時行動的思想不致爲國際間消極等待的思想所代替，把這個道理反覆加以說明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我們不等待其他國家而在本國的基礎上開始鬥爭並繼續下去，深信我們的倡導會推動其他各國的鬥爭；假如事實並不如此，就休想革命的俄羅斯能在保守的歐洲面前站得住腳，或社會主義的德意志能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孑然獨存，這是歷史上的經驗和理論上的推論都證明了的。」

可見在我們面前的還是那個社會主義在歐洲主要國家內同時勝利的理論，這個理論通常是排斥列寧的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革命論的。

不用說，爲了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爲了有免除舊制度恢復的完全保障，必須有幾國無產者的共同努力。不用說，沒有歐洲無產階級對我國革命的援助，俄國無產階級就抵擋不住總進攻；同樣，沒有俄國革命對西方革命運動的援助，西方革命運動就不能像它在俄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後那樣迅速地發展。不用說，我們是需要援助的。但什麼是西歐無產階級對我國革命的援助呢？歐洲工人對我國革命的同情，他們破壞帝國主義者武裝干涉計劃的決心，——這是不是援助，是不是很大的幫助呢？當然是很大的幫助。沒有這種不僅來自歐洲工人，而且還來自殖民地國家和附屬國家的幫助，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處於困難的境地。到現在爲止，這種同情和這種幫助，再加上我們紅軍的實力和俄國工農挺身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決心，——這一切是不是足夠擊退帝國主義者的進攻，取得必要的環境來進行真正的建設工作呢？是足夠的。這種同情是在增強還是在減弱呢？無疑是在增強。這

樣，我們有沒有有利條件來不僅推進組織社會主義經濟的工作，並且援助西歐工人和東方被壓迫民族呢？是有的。俄國無產階級專政七年的歷史明顯地說明了這一點。能不能否認我國已經開始了雄偉的勞動高潮呢？不，不能否認。

既然如此，托洛茨基的關於革命的俄羅斯不能在保守的歐洲面前站得住腳的說法能有什麼意義呢？

只能有一個意義：第一、托洛茨基沒有感覺到我國革命的內部力量；第二、托洛茨基不了解西方工人和東方農民給予我國革命的精神援助的不可估量的意義；第三、托洛茨基沒有覺察到現在腐蝕着帝國主義的那種內部虛弱症。

托洛茨基因為熱中於批評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便在他的一九一七年出版、一九二四年再版的小冊子『和平綱領』中不知不覺地徹底粉碎了自己的論據。

也許托洛茨基的這本小冊子也陳舊了，也由於某種原因而不再符合他現在的觀點了吧？那末我們就拿托洛茨基在無產階級革命在一個國家內即在俄國勝利以後所寫的最近的著作來看吧。例如，我們就拿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二年給他的小冊子『和平綱領』新版所寫的『跋』來看吧。他在這篇『跋』中寫道：

「在『和平綱領』中一再重複的關於無產階級革命不能在一國範圍內勝利完成的論斷，在某些讀者看來也許已被我們蘇維埃共和國將近五年的經驗推翻了。但這樣的結論是沒有根據的。

工人的國家在一國而且是在落後的一國抗住了全世界，這個事實證明無產階級有雄偉的力量，這種力量在其他比較先進比較文明的國家裏是真能做出奇蹟來的。可是，我們雖然在政治上和軍事上保持爲一個國家，但是我們並沒有達到甚至還沒有走近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階段……

當其餘的歐洲國家還是資產階級掌握着政權的時候，我們爲了打破經濟孤立的局面，不得不設法和資本主義世界達成協議；同時可以確信地說：這種協議至多只能幫助我們治愈某些經濟創傷，獲得某些進展，可是俄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真正高漲只有無產階級在歐洲幾個最重要的國家內獲得勝利以後^①，才會是可能的。」

托洛茨基這樣說，顯然是違背實際情況，頑固地想把『不斷革命』論從完全破產中挽救出來。

原來，不管怎樣辯解，也是不懂『沒有達到』甚至還『沒有走近』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階段。原來有人曾希望『和資本主義世界達成協議』，但是這些協議原來也不會有絲毫結果，因爲不管怎樣辯解，只要無產階級還沒有『在歐洲幾個最重要的國家內』獲得勝利，『社會主義經濟的真正高漲』是不會有的。

那末，既然西方還沒有勝利，俄國革命也就只能『二者取其一』：或者連根腐爛，或者蛻化爲資產階級國家。

①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無怪乎托洛茨基說我們黨『蛻化』已經說了兩年。

無怪乎托洛茨基在去年預言我們國家定會『滅亡』。

這個奇怪的『理論』怎能和列寧的『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理論相容呢？

這個奇怪的『前途』怎能和列寧所說的新經濟政策使我們能够『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的前途相容呢？

這種『不斷』絕望的思想怎能和列寧的下面一段話相容呢？

列寧說：『社會主義現在已經不是一個遙遠將來，或是什麼抽象幻景，或是什麼神像的問題了。我們對神像依然保持着非常不好的舊有的看法。我們把社會主義拖進日常生活中了，我們應當弄清這一點。這就是我們當前的任務，這就是我們這時代的任務。讓我在結束講話時表示一個信念：不管這個任務是多麼困難，不管它和我們從前的任務比起來是多麼生疏，不管它會給我們帶來多少困難，只要我們大家同心協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幾年以內，我們大家同心協力無論如何會解決這個任務，這樣，新經濟政策的俄國將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〇五頁）

托洛茨基的這種前途『不斷』黯淡的思想怎能和列寧的下面一段話相容呢？

列寧說：『的確，國家支配着一切大生產資料，無產階級掌握着國家權力，無產階級和千百萬小農及最小農結成聯盟，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已有保證等等，難道這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一

切，難道這不是我們通過合作社，而且僅僅通過合作社，通過我們從前鄙視爲買賣機關，並且現時在新經濟政策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視的合作社來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嗎？這還不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這已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八頁）

很明顯，這裏沒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相容的地方。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是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否定；反過來說，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是『不斷革命』論的否定。

不相信我國革命有力量和有本領，不相信俄國無產階級有力量和有本領，——這就是『不斷革命』論的根源。

直到現在，通常都只指出『不斷革命』論的一方面——不相信農民運動具有革命能力。現在爲了公允起見，除這一方面以外還須補充以另一方面——不相信俄國無產階級有力量和有本領。

托洛茨基的理論和孟什維主義的沒有無產階級革命『在西歐幾個主要國家內』預先勝利；社會主義在一國而且還是在落後的一國內就不可能勝利這個普通的理論有什麼區別呢？

實質上是毫無區別的。

這是不容置疑的。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是變相的孟什維主義。

近來在我們的刊物上出現了一些腐敗的外交家，他們力圖偷運『不斷革命』論，說它是和列寧主義相容的東西。他們說，這個理論在一九〇五年當然是不適用的。可是，托洛茨基的錯誤在於他當時

跑得太遠，企圖在一九〇五年的環境裏運用當時不能運用的理論。他們說，可是後來，例如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當革命已經完全成熟的時候，托洛茨基的理論就完全適用了。不難猜到，這些外交家中最主要的是拉狄克。不妨聽聽他的話：

『戰爭在渴望爭得土地與和平的農民和小資產階級政黨之間掘了一道深溝；戰爭把農民交給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了。可能實現的已經不是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專政，而是依靠農民的工人階級的專政。羅莎·盧森堡和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提出來反對列寧的那個主張（即『不斷革命』。——斯大林註），事實上成了歷史發展的第二個階段。』這裏每字每句都是顛倒是非。

在戰爭時期『可能實現的已經不是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專政，而是依靠農民的工人階級的專政』，這話不對。實際上，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所實現的是按特殊方式同資產階級專政交織在一起的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專政。

拉狄克不好意思提到的『不斷革命』論是羅莎·盧森堡和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提出的，這話不對。實際上，這個理論是帕爾烏斯和托洛茨基提出的。現在，過了十個月，拉狄克來自行更正，認為應當罵帕爾烏斯不該提出『不斷革命』論。可是要做到公道，拉狄克應當也把帕爾烏斯的同伴托洛茨基罵一頓。

被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擯棄了的『不斷革命』論在『歷史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即在十月革命時期是

正確的，這話不對。十月革命的全部進程，十月革命的整個發展，表明並證明『不斷革命』論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是和列寧主義基礎完全不相容的。

用甜蜜的話和腐敗的外交手腕是掩蓋不了『不斷革命』論和列寧主義之間的鴻溝的。

三 關於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的策略的幾個特點

要了解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的策略，至少必須弄清楚這個策略的幾個特別重要的特點。所以必須這樣，尤其是因為在許多論述布爾什維克策略的小冊子中往往正是把這些特點忽略了。

這是些什麼特點呢？

第一個特點。聽了托洛茨基的話，會以為在十月革命準備史中只有兩個時期，即偵察時期和起義時期，此外的都是由於誤信邪說。一九一七年的四月遊行示威是什麼呢？『比預定『更左的』四月遊行示威，是檢驗羣衆的情緒和羣衆與蘇維埃內大多數人的相互關係的一次偵察性攻擊。』而一九一七年的七月遊行示威是什麼呢？按照托洛茨基的說法，『實質上這一次遊行示威也不過是在運動的新的更高階段上的一次新的規模更大的偵察』。不用說，依照我們黨的要求舉行的一九一七年的六月遊行示威，在托洛茨基看來，更應當稱為『偵察』了。

這樣說來，布爾什維克還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就有了由工農組成的現成的政治軍隊，布爾什維克在四月、六月、七月都沒有調用這支軍隊舉行起義，而只進行了『偵察』，這是因為而且只是因為當時的『偵察情報』沒有提供有利的『材料』。

不用說，這種對我們黨的政治策略的簡單化的看法無非是把通常的軍事策略和布爾什維克的革命策略混爲一談罷了。

實際上，所有這些遊行示威首先是羣衆自發施加壓力的結果，是羣衆激於反戰義憤而湧現街頭的結果。

實際上，當時黨的作用在於給予自發產生的羣衆發動以一定形式並加以領導，使之按照布爾什維克的革命口號進行。

實際上，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三月沒有而且不可能有現成的政治軍隊。布爾什維克只是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至十月間的鬥爭和階級衝突進程中才建立這支軍隊（到一九一七年十月終於建立了這支軍隊），它是通過四月遊行示威、通過六月遊行示威和七月遊行示威、通過區杜馬和市杜馬的選舉、通過反科爾尼洛夫叛亂的鬥爭、通過對蘇維埃的爭奪來建立這支軍隊的。政治軍隊不是軍事軍隊。軍事指揮部在開始作戰時就已經擁有現成的軍隊，而黨却要在鬥爭進程中，在階級衝突進程中，在羣衆根據親身經驗相信黨的口號正確，相信黨的政策正確的時候建立自己的軍隊。

當然，每一次這樣的遊行示威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眼睛看不見的力量對比，在一定程度

上起偵察作用，但是偵察在這裏不是遊行示威的動機，而是遊行示威的自然結果。

列寧分析十月起義前的事變並拿這些事變和四月至七月間的事變比較時說道：

『這時的情形恰巧跟四月二十日——二十一日前夜、六月九日前夜、七月三日前夜的情形不同，因為當時所發生的是自發激動，而這種激動是我們黨沒有察覺到的（如四月二十日），或者是加以制止而使它形成爲和平遊行示威的（如六月九日和七月三日）。因為當時我們清楚地知道，蘇維埃還不是我們的，農民還相信李伯爾唐恩和切爾諾夫的道路，而不相信布爾什維克的道路（起義），所以大多數人民還不能跟着我們走，所以起義還爲時過早。』（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一七九頁）

很明顯，單靠『偵察』是做不出大事的。

問題顯然不在於『偵察』，而在於：

- （一）黨在十月革命整個準備時期的鬥爭中始終依靠羣衆革命運動的自發高漲；
 - （二）黨依靠自發高漲，同時保持了自己對運動的獨掌領導；
 - （三）對運動的這種領導使黨易於編制羣衆政治軍隊去舉行十月起義；
 - （四）這樣的政策不能不使十月革命的全部準備工作在一個黨即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進行；
 - （五）十月革命的這種準備工作又使政權在十月起義勝利後落到一個黨即布爾什維克黨的手裏。
- 總之，一個黨即共產黨的獨掌領導是十月革命準備工作的基本要素，——這就是十月革命的特

徵，這就是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的策略的第一個特點。

未必用得着證明，沒有布爾什維克策略的這個特點，無產階級專政在帝國主義環境中的勝利就會是不可能的。

這就是十月革命優異於法國一八七一年革命的地方。法國一八七一年革命的領導由兩個黨分担，而其中哪一個黨也不能稱為共產黨。

第二個特點。這樣，十月革命的準備工作是在一個黨即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進行的。可是，黨是怎樣進行這種領導的，這種領導是循着什麼路線進行的呢？這種領導是循着使妥協政黨——在革命總爆發時期內最危險的集團陷於孤立的路綫，即循着使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陷於孤立的路綫進行的。

列寧主義的基本戰略原則是什麼呢？

這個原則是承認：

(一) 在革命即將爆發的時期，妥協政黨是革命敵人的最危險的社會支柱；

(二) 不使這些黨陷於孤立，就不能推翻敵人（沙皇制度或資產階級）；

(三) 因此，革命準備時期的主要鋒芒應當指向使這些黨陷於孤立，使廣大勞動羣衆離開它們。

在反對沙皇制度的時期，在準備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時期（一九〇五——一九一六年），自由保皇黨即立憲民主黨是沙皇制度的最危險的社會支柱。爲什麼呢？因爲立憲民主黨是妥協政黨，是主

張大多數人民即全體農民和沙皇制度妥協的黨。自然，黨在當時把主要打擊指向立憲民主黨人，因為不使立憲民主黨人陷於孤立，就不能指望農民和沙皇制度決裂，而不保證有這種決裂，就不能指望革命勝利。許多人當時不了解布爾什維克戰略的這一特點，而責備布爾什維克過分『仇恨立憲民主黨人』，斷言布爾什維克以反對立憲民主黨人的鬥爭『遮掩了』反對主要敵人即沙皇制度的鬥爭。可是，這些毫無根據的責備暴露出他們根本不了解布爾什維克的戰略，不了解這個戰略要求使妥協政黨陷於孤立，是爲了促進並加速對主要敵人的勝利。

未必用得着證明，沒有這樣的戰略，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就會是不可能的。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各種鬥爭勢力的重心移到新的方面來了。沙皇不存在了。立憲民主黨由妥協勢力變成當權勢力，變成帝國主義的統治勢力了。鬥爭已經不是在沙皇制度和人民之間進行，而是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進行了。在這個時期，小資產階級民主政黨即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是帝國主義的最危險的社會支柱。爲什麼呢？因爲這些黨在當時是妥協政黨，是主張勞動羣衆和帝國主義妥協的黨。自然，布爾什維克的主要打擊當時指向了這些黨，因爲不使這些黨陷於孤立，就不能指望勞動羣衆和帝國主義決裂，而不保證有這種決裂，就不能指望蘇維埃革命勝利。許多人當時不了解布爾什維克戰略的這一特點，而責備布爾什維克『過分憎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責備布爾什維克『忘記了』主要目標。可是，十月革命整個準備時期雄辯地說明，布爾什維克只有採用這樣的策略，才得以保證十月革命的勝利。

這個時期的特徵是勞動農民羣衆更加革命化，他們對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失望，他們離開這些黨，他們轉而直接團結在無產階級這一能把國家導向和平的唯一徹底的革命力量的周圍。這個時期的歷史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同布爾什維克爭奪勞動農民羣衆，爭取掌握這些羣衆的歷史。聯合政府時期，克倫斯基統治時期，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拒絕沒收地主土地，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爭取繼續作戰，前綫六月進攻，士兵死刑，科爾尼洛夫暴動，——這些事實決定了這場鬥爭的命運。而這些事實是以證實布爾什維克戰略的正確來決定這個命運的。因為當時不使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陷於孤立，就不能推翻帝國主義者的政府，不推翻這個政府，就不能擺脫戰爭。使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陷於孤立的政策原來是唯一正確的政策。

總之，使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陷於孤立是十月革命準備工作的基本領導路線，——這就是布爾什維克策略的第二個特點。

未必用得着證明，沒有布爾什維克策略的這個特點，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羣衆的聯盟就會懸在空中。

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在他的『十月革命的教訓』中一點也沒有說到，或者幾乎一點也沒有說到布爾什維克策略的這個特點。

第三個特點。這樣，黨對十月革命準備工作的領導是循着使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陷於孤立的路綫，循着使廣大工農羣衆離開這些黨的路綫進行的。可是，黨是怎樣具體實現了這種孤立，以什

變形式，在什麼口號下實現了這種孤立的呢？這種孤立是以爭取建立蘇維埃政權的羣衆革命運動的形式，在『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下，通過把蘇維埃由動員羣衆的機關變爲起義的機關、變爲政權機關、變爲新的無產階級國家機關的鬥爭來實現的。

爲什麼布爾什維克正是抓住蘇維埃作爲能够促使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陷於孤立、能够推進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並負有把千百萬勞動羣衆引導到無產階級專政勝利的使命的基本組織槓桿呢？

蘇維埃是什麼呢？

列寧還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就說過：『蘇維埃是新式國家機關，第一、它保證有工農武裝力量，並且這個武裝力量不是像過去的常備軍那樣和人民隔離，而是和人民極密切地聯系着的；在軍事方面，這個武裝力量比從前的軍隊強大得不可比擬；在革命方面，它是無可替代的。第二、這個機關保證和羣衆，和大多數人民有極其密切的、不可分離的、容易檢查和更新的聯系，這樣的聯系從前的國家機關是根本沒有的。第三、這個機關的成員是不經過官僚手續而依民意選出和更換的，所以它比從前的機關要民主得多。第四、它保證和各種各樣的職業有緊密的聯系，所以它能够不要官僚而使各種各樣的極深刻的改良易於實行。第五、它保證有先鋒隊即被壓迫工農階級中最覺悟、最有力、最先進的部分的組織形式，所以它是被壓迫階級的先鋒隊能够用來發動、教育、訓練和領導這些階級全體廣大羣衆的機關，而這些羣衆向來都是完全處在政治生活以外，處在歷史以外的。第六、它保證能够把議會制的長處和直接民主制的長處結合起來，就是

說，把立法權和法律執行權在選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結合起來。同資產階級議會制比較起來，這是在民主發展過程中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一大進步……

假如革命階級的民衆創造力沒有建立起蘇維埃，那末無產階級革命在俄國就是沒有希望的事情，因爲毫無疑義，無產階級決不能利用舊的機關保持政權，而新的機關要一下子建立起來是不行的。（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七十九頁至第八十頁）

正因爲如此，布爾什維克就抓住蘇維埃作爲便於組織十月革命和建立無產階級國家的新式強大機關的基本組織環節。

『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個口號從它的內部發展方面來看經過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在布爾什維克的七月失敗以前，在兩個政權並存時期）和第二個階段（在科爾尼洛夫暴動失敗以後）。

在第一個階段，這個口號意味着使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同立憲民主黨人的聯盟破裂，由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組織蘇維埃政府（因爲當時蘇維埃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使在野黨（即布爾什維克）有自由鼓動權，使各政黨在蘇維埃內可以自由鬥爭，預期布爾什維克能够按革命和平發展的方式通過這種鬥爭來奪取蘇維埃並改變蘇維埃政府的成分。這個計劃當然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但是它無疑有助於準備保證專政所必需的條件，因爲它既然使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執掌政權，迫使他們實施他們的反革命政綱，就更快地揭露了這些黨的真正本質，使它們更快地陷於孤立，使它們更快地脫離羣衆。可是，布爾什維克的七月失敗中斷了這個發展過程，使反革命勢力（將

軍和立憲民主黨）佔了優勢，把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拋入反革命勢力的懷抱。這個情況使黨不得不暫時收回『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個口號，等到革命再度高漲時再把它提出來。

科爾尼洛夫暴動的失敗是第二個階段的開始。『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個口號重新提到日程上來了。但是現在這個口號已經跟第一個階段不同了。它的內容根本改變了。現在這個口號意味着和帝國主義完全決裂並使政權轉歸布爾什維克，因為大多數蘇維埃已經是布爾什維克的了。現在這個口號意味着革命經過起義直接進到無產階級專政。而且，現在這個口號意味着組織無產階級專政並使無產階級專政具有國家形式。

把蘇維埃變為國家政權機關這一策略的不可估量的意義在於它使千百萬勞動羣衆擺脫帝國主義，揭露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是帝國主義的工具，並把千百萬勞動羣衆直接引向無產階級專政。

總之，把蘇維埃變為國家政權機關這一政策是使妥協政黨陷於孤立而使無產階級專政獲得勝利的最重要的條件，——這就是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的策略的第三個特點。

第四個特點。如果我們不說明布爾什維克怎樣和爲什麼能把自已的黨的口號變成了千百萬羣衆的推進革命的口號，布爾什維克怎樣和爲什麼不僅能使先鋒隊和大多數工人確信黨的政策正確，而且能使大多數人民確信黨的政策正確，那末情況就不全面了。

問題在於：要取得革命的勝利（如果這個革命是有千百萬羣衆參加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單只黨的口號正確是不夠的。要取得革命的勝利，還必須有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就是使羣衆根據親身經驗

確信這些口號的正確。只有這樣，黨的口號才會成爲羣衆自己的口號。只有這樣，革命才會成爲真正的人民革命。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的策略的特點之一在於它能够正確地確定道路和轉折點，這樣就自然而然把羣衆引到黨的口號下，可以說是引到革命的門口，從而使羣衆易於根據親身經驗感到、察知並認清這些口號的正確。換句話說，布爾什維克的策略的特點之一在於它不把對黨的領導和對羣衆的領導混爲一談，它清楚地看見第一種領導和第二種領導之間的差別，因而它不僅是領導黨的科學，而且是領導千百萬勞動羣衆的科學。

召開和解散立憲會議的經驗是表現出布爾什維克策略的這個特點的明顯例子。

大家知道，布爾什維克還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就提出了蘇維埃共和國這一口號。大家知道，立憲會議是根本和蘇維埃共和國基礎相矛盾的資產階級議會。布爾什維克向着蘇維埃共和國前進，同時又要求臨時政府立刻召開立憲會議，怎麼會有這種事情呢？布爾什維克不僅參加選舉，而且自己召開立憲會議，怎麼會有這種事情呢？在舉行起義前一個月，在由舊制度向新制度過渡時，布爾什維克竟認爲蘇維埃共和國可以和立憲會議暫時配合，怎麼會有這種事情呢？

所以『會有』這種事情，是因爲：

- (一) 立憲會議思想是當時在廣大民衆中間最得人心的思想之一；
- (二) 立刻召開立憲會議的口號易於揭露臨時政府的反革命本性；
- (三) 要使立憲會議思想在人民羣衆心目中威信掃地，就必須引導這些羣衆帶着他們對土地、和

平和蘇維埃政權的要求走到立憲會議門前，使他們和實際存在的立憲會議接觸；

(四) 只有這樣才能使羣衆易於根據親身經驗確信立憲會議的反革命性和把它解散的必要性；

(五) 這一切自然就預定了蘇維埃共和國和立憲會議暫時配合是可以容許的，因為這是消除立憲會議的手段之一；

(六) 這種配合如果是在全部政權轉歸蘇維埃的條件下實現的，那就只能使立憲會議服從蘇維埃，使立憲會議變爲蘇維埃的附屬品，使立憲會議無能爲害地消亡。

未必用得着證明，沒有布爾什維克的這種政策，立憲會議的解散就不會進行得那樣順利，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後來在『全部政權歸立憲會議！』這個口號下的發動就不會遭到那樣可恥的破產。

列寧說：『我們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參加了俄國資產階級議會即立憲會議的選舉。我們當時的策略是否正確呢？……我們俄國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不是比西方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人都更有理由認爲議會制度在俄國是政治上過了時的嗎？當然，我們更有理由這樣認爲，因爲問題不在於資產階級議會是否早已存在，而在於廣大勞動羣衆對於採用蘇維埃制度和解散（或容許解散）資產階級民主議會的準備（思想上、政治上、實踐上）達到什麼程度。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俄國城市工人階級、士兵和農民，由於一系列特殊的條件，已

有了極好的準備來採用蘇維埃制度和解散最民主的資產階級議會，——這是完全不容爭辯、完全確定的歷史事實。雖然如此，但布爾什維克並沒有抵制立憲會議，而是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

前和以後都參加了選舉。」（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四十一頁）

爲什麼布爾什維克沒有抵制立憲會議呢？列寧說，這是因爲：

『甚至在蘇維埃共和國勝利以前幾個星期，甚至在這個勝利以後，參加資產階級民主議會，不僅對革命無產階級無害，反而會使革命無產階級易於向落後羣衆證明這種議會爲什麼應該解散，易於把這種議會解散，易於使資產階級議會制度成爲「政治上過時的東西」。（同上；第四十二頁）

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不了解布爾什維克策略的這個特點，把立憲會議和蘇維埃配合的『理論』看做希法亭主義而嗤之以鼻。

他·不·了解，在舉行起義的口號下，在蘇維埃可能勝利的條件下，容許這種配合而召開立憲會議是唯一革命的策略，和把蘇維埃變成立憲會議附屬品的希法亭主義策略毫無共同之點；某些同志在這個問題上所犯的錯誤並不能使他有理由指責列寧和黨主張在一定條件下成立『配合國體』的那個完全正確的立場。（參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一七〇頁）

他·不·了解，布爾什維克如果沒有對立憲會議採取這種特殊政策，就不能把千百萬人民羣衆爭取到自己方面來，而布爾什維克如果沒有把千百萬人民羣衆爭取過來，就不能把十月起義變爲深入的人民革命。

有趣的是，托洛茨基甚至對那些在布爾什維克的文章中出現的『人民』、『革命民主派』等等字眼

也嗤之以鼻，認為使用這些字眼是有傷馬克思主義者的體面的。

托洛茨基顯然忘記了，列寧這位不容置疑的馬克思主義者甚至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即在無產階級專政勝利前一個月就寫道：『必須使全部政權立即轉歸革命無產階級所領導的革命民主派掌握。』（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八頁）

托洛茨基顯然忘記了，列寧這位不容置疑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引證馬克思給庫格曼的一封信（寫於一八七一年四月）時，清清楚楚地寫過下面一段話：

『馬克思所說的毀壞官僚軍事國家機器是「任何一個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這個非常深刻的意見是值得特別注意的。『人民』革命這一概念出自馬克思的口中似乎是奇怪的，而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分子和孟什維克，這些想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司徒盧威的信徒，也許會說馬克思的這句話是「失言」。他們把馬克思主義曲解成非常鄙陋的自由主義，在他們看來，除了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對立以外，再沒有任何東西，而且他們對於這種對立的理解也是極端僵硬的……』

一八七一年，歐洲大陸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也沒有佔人民的多數。當時的革命只有使無產階級和農民都參加進來，才能成為把真正人民的多數吸引到運動中來的「人民」革命。當時的「人民」就是由這兩個階級構成的。這兩個階級因為都受「官僚軍事國家機器」的壓迫，摧

殘和剝削而聯合起來。打碎這個機器，摧毀這個機器，——這就是「人民」，人民的多數，即工人和大多數農民的真正利益，這就是貧苦農民和無產者的自由聯盟的「先決條件」，而沒有這個聯盟，民主制就不穩固，社會主義改造就不可能。」（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八八頁）列寧的這些話是不可以忘記的。

總之，善於用引導羣衆走上革命立場的方法使羣衆根據親身經驗確信黨的口號的正確，這是把千百萬勞動者爭取到黨的方面來的最重要的條件，——這就是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的策略的第四個特點。

我認爲上面所說的完全足以使人認清這個策略的特徵了。

四 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開端和前提

毫無疑問，革命在歐洲主要國家內同時勝利的萬能理論，社會主義不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理論，是編造的沒有生命力的理論。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七年的歷史不是證實了這個理論，而是推翻了這個理論。這個理論不僅不可採用來作爲世界革命發展的方案，因爲它和有目共睹的事實抵觸。它尤其不可採用來作爲口號，因爲它不是發揮而是限制那些由於一定的歷史條件而有可能獨立突破資本戰綫的個別國家的主動性；因爲它不是推動個別國家積極進攻資本，而是推動個別國家消極等待『總

爆發』的時機；因為它不是在個別國家的無產者中間培養堅決革命的精神，而是培養哈姆雷特式的耽心『萬一別人不來援助』的猶疑心理。列寧說得十分正確，無產階級在一國內勝利是『典型現象』，『幾國同時發生革命』只能是『罕有的例外』（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三二頁）。

可是，大家知道，列寧的革命論並不僅僅限於這一方面。它同時還是世界革命發展論^①。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不是獨立自在的任務。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革命不應當把自己看做獨立自在的東西，而應當看做用以加速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勝利的助力和工具。因為革命在一個國家（這裏說的是在俄國）內勝利不僅是帝國主義不平衡發展和日益崩潰的產物，而且是世界革命的開端和前提。

毫無疑問，世界革命的發展道路已不像從前革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以前，發達的帝國主義即『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出現以前所能想像的那樣簡單了。因為出現了在發達的帝國主義條件下發生作用的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不平衡的規律這樣一個新因素，這個規律說明軍事衝突不可避免，世界資本戰綫全綫削弱，社會主義可能在個別國家內勝利。因為出現了處在西方和東方之間，處在世界財政剝削中心和殖民地壓迫舞台之間的強大的蘇維埃國家這樣一個新因素，單是這個國家的存在就能使全世界革命化。

所有這些都是在研究世界革命道路時不能不估計到的因素（其他次要的因素我就不談了）。

① 參看上面的『論列寧主義基礎』。——斯大林

從前人們通常認為革命將經過社會主義成分首先在那些最發達的『先進』國家內平衡『成熟』的道路發展起來。現在這個見解要大加改變了。

列寧說：『國際關係體系現在已成爲這樣：歐洲的一個國家受着各戰勝國的奴役，這個國家就是德國。其次，西歐的一些國家，而且是一些最老的國家，因獲得勝利而能够利用勝利向本國被壓迫階級做一些不大的讓步，這些讓步終究能把這些國家裏的革命運動推延下去，造成某種『社會和平』的局面。』

『同時東方許多國家，如印度、中國等等，正是由於最近這次帝國主義戰爭的影響而完全被拋出了自己的常軌。這些國家的發展已完全按照一般歐洲式資本主義的標準進行。在這些國家裏開始了一般歐洲式的波動。現在全世界的人都清楚，這些國家已經捲入了不能不引起整個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發展漩渦。』

因此，『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到社會主義……不會是像我們從前所期待的那樣完成的。它們這一種發展的過程，不會是經過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裏平衡『成熟』，而會是經過一些國家對另一些國家進行剝削，經過對帝國主義戰爭中第一個戰敗國家進行剝削，再加上對整個東方進行剝削的道路來完成的。另一方面，正是由於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的影響，東方已經最終加入了革命運動，最終捲入了全世界革命運動的總漩渦。』（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五六頁至第四五七頁）

除此以外，不僅戰敗國和殖民地受戰勝國的剝削，而且一部分戰勝國也落入美國和英國這兩個最強大的戰勝國的財政剝削的羅網中；所有這些國家之間的矛盾是世界帝國主義解體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除這些矛盾以外，這些國家中每一個國家內部還有一些極深刻的矛盾，而且這些矛盾正在發展，所有這些矛盾又由於偉大的蘇維埃共和國同這些國家並存而日益加深和尖銳化，——如果注意到這一切，那就可以比較全面地看到國際形勢的特點了。

最可能的是，世界革命將經過許多新國家的無產者在帝國主義國家無產階級的援助下用革命手段使這些國家脫離帝國主義國家體系的道路發展起來。我們看見，第一個脫離出來的國家，第一個獲得了勝利的國家，已經取得其他國家的工人和勞動羣衆的援助。沒有這種援助，它就不能支持住。毫無疑問，這種援助將會增強和發展起來。同樣毫無疑問，第一個獲得勝利的國家內的社會主義鞏固得愈徹底，這個國家變成進一步擴展世界革命的基地，變成進一步瓦解帝國主義的槓桿愈迅速，世界革命的發展，許多新國家脫離帝國主義體系的過程就進行得愈迅速，愈徹底。

沒有幾國無產者的共同努力，第一個獲得解放的國家內的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就不可能，這個論點是對的；同樣，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給予其餘各國工人和勞動羣衆的幫助愈切實，世界革命的發展就愈迅速愈徹底，這個論點也是對的。

這種幫助應當表現在什麼地方呢？

第一、這種幫助應當表現在獲得勝利的國家『最大限度地實現一個國家內所能實現的一切，以便

發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國的革命」（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六九頁）。

第二、這種幫助應當表現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既然剝奪了資本家並在本國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就……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把其他國家的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掀起反對資本家的起義，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去反對剝削階級及其國家』（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頁）。

獲得勝利的國家所給予的這種幫助的特點不僅在於它加速其他國家無產者的勝利，而且還在於它以促進這個勝利來保證社會主義在第一個獲得勝利的國家內的最後勝利。

最可能的是：在世界革命的發展進程中，與個別資本主義國家的帝國主義策源地和這些國家的全世界體系並列，會出現個別蘇維埃國家的社會主義策源地和這些策源地的全世界體系，而這兩個體系間的鬥爭將充滿世界革命發展的歷史。

列寧說：因為『沒有各社會主義共和國對各落後國家的相當長期的頑強鬥爭，便不能實現各民族在社會主義中的自由聯合』（同上）。

十月革命的世界意義不僅在於它是一個國家在衝破帝國主義體系這一事業中的偉大創始，它是帝國主義國家汪洋大海中的第一個社會主義策源地，而且還在於它是世界革命的第一階段，它是世界革命進一步發展的強大基地。

因此，不僅那些忘掉了十月革命的國際性質，說革命在一國內勝利純粹是一國的而且僅僅是一

國的現象的人是不對的，而且那些雖然記得十月革命的國際性質，但是竟把這個革命看做一種只應接受外援的被動現象的人也是不對的。實際上，不僅十月革命需要其他國家革命的援助，而且其他國家革命也需要十月革命的援助，以便加速和推進推翻世界帝國主義的事業。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約·斯大林「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

一九二五年國家出版局版

註 釋

(一)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會議於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在莫斯科舉行。出席代表會議的有一百二十八名有表決權的代表和二百二十二名有發言權的代表。代表會議討論了黨的建設問題、國際形勢問題和經濟政策的當前任務。代表會議根據約·維·斯大林「關於黨的建設的當前任務」的報告通過了「關於黨的建設」和「關於爭論總結和黨內小資產階級傾向」兩項決議。

代表會議斥責了托洛茨基反對派，宣佈黨內存在着以托洛茨基反對派為代表的脫離馬克思主義的小資產階級傾向，並建議中央委員會公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根據弗·伊·列寧的提議通過的「關於黨的統一」的決議的第七條。代表會議的這些決議經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和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批准。(代表會議的各項決議，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卷第七七一頁至第八〇三頁)——(正文第五頁)

(二) 指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五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聯席會議通過的，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七日「真理報」第二七八號上發表的關於黨的建設的決議。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四日至十五日舉行的俄共(布)中央全會做出了黨內爭論的總結，並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提交黨的第十三次代表會議的關於黨的建設的決議(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卷第七六九頁至第七七八頁)。——(正文第七頁)

(三) 關於四十六個反對派分子的文件，見「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五一頁至第三五三頁。——(正文第二十六頁)

(四) 英國外交大臣克遜於一九二三年五月八日向蘇聯政府提出帶有誣蔑性質的最後通牒。最後通牒要蘇聯政府召回蘇聯駐波斯和阿富汗的全權代表，釋放在蘇聯北部領海內非法捕魚而被扣留的英國漁船等等。克遜威脅說，如果在十天內

拒絕接受最後通牒的條件，那就斷絕貿易關係。克遜的最後通牒造成新的武裝干涉的威脅。蘇聯政府拒絕了英國政府的無理要求，同時表示完全準備以和平方式調整兩國之間的相互關係，並且採取了加強國防力量的措施。——（正文第三十三頁）

〔五〕指一九一八年二月德國軍隊在霍夫曼將軍指揮下向蘇聯領土的進攻（關於霍夫曼的進攻，見「斯大林全集」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四卷第三十五頁至第四十四頁）。——（正文第三十四頁）

〔六〕指一九二一年喀琅施塔得的反革命叛亂和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庫波夫省的富農暴動。——（正文第三十四頁）

〔七〕「日報」是白俄社會革命黨人的日報，於一九二二年十月在柏林創刊。——（正文第四十頁）

〔八〕「曙光」是白俄右派孟什維克的雜誌，於一九二二年四月至一九二四年一月在柏林出版。——（正文第四十一頁）

〔九〕全蘇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至二月二日在莫斯科舉行。約·維·斯大林在代表大會為追悼弗·伊·列寧而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上發表了演說，在演說中代表布爾什維克黨做了遵守和執行列寧遺訓的偉大宣誓。代表大會為列寧逝世而通過了「告勞動人民書」。代表大會為永久紀念列寧做出下列決定：出版「列寧全集」，將彼得格勒城改名為列寧格勒城，規定悼念日，在莫斯科紅場建造列寧墓，在各加盟共和國首都以及在列寧格勒和塔什干城內建立列寧紀念像。代表大會討論了蘇聯政府的工作報告，蘇聯預算問題和設立中央農業銀行問題。一月三十一日，代表大會批准了在約·維·斯大林領導下擬定的第一部蘇聯憲法（根本法）。代表大會選出了中央執行委員會——聯盟蘇維埃和民族蘇維埃。約·維·斯大林被選為聯盟蘇維埃委員。——（正文第四十二頁）

〔一〇〕指一九二三年德國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當時德國國內展開了羣衆革命運動，結果在薩克森和紹林吉亞成立了工人政府，在漢堡發生了武裝起義。德國革命運動被鎮壓下去以後，資產階級反動勢力在整個歐洲猖獗起來，對蘇維埃共和國進行新干涉的危險也增大了。——（正文第四十五頁）

〔一一〕「火星報」是第一個全俄馬克思主義的秘密報紙，於一九〇〇年十二月由列寧在國外創辦，從國外秘密運入俄國。關於「火星報」的意義和作用，見「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八頁至第四十九頁。——（正文第四十八頁）

〔一二〕黨的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是俄國社會民主黨第四次（統一）代表大會，於一九〇六年四月十日至二十五日（四月二十三日至五月八日）舉行。（關於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見「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

社版第一一〇頁至第一一三頁)——(正文第五十頁)

(三)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倫敦)代表大會於一九〇七年四月三十日至五月十九日(五月十三日至六月一日)舉行。(關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大會,見「斯大林全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四十九頁至第七十五頁,「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一六頁至第一一九頁)——(正文第五十一頁)

(四) 一九二四年四月三日俄共(布)中央召開了青年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黨中央委員、俄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以及十個大省的俄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的代表。會議做了一九二四年初展開的關於共產黨當前任務的爭論的總結。俄共(布)中央討論了會議的決議以後,建議黨的地方組織和共產黨的地方組織努力使俄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結一致,協調工作,號召共產黨的領導人員同心協力地完成黨所提出的任務。——(正文第五十八頁)

(五) 約·維·斯大林的講演「論列寧主義基礎」發表在一九二四年四月和五月的「真理報」上。一九二四年五月出版了約·維·斯大林的小冊子「論列寧和列寧主義」,其中編入了回憶錄「論列寧」和講演「論列寧主義基礎」。約·維·斯大林的著作「論列寧主義基礎」編入了約·維·斯大林的「列寧主義問題」一書的各次版本中。——(正文第六十二頁)

(六)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一九五四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第四十一頁。——(正文第七十頁)

(七) 指卡·馬克思於一八五六年四月十六日給弗·恩格斯的信中所說的話(見「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一九四七年俄文版第八十六頁)。——(正文第七十四頁)

(八) 指弗·恩格斯「行動中的巴枯寧主義者」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三年俄文版第十五卷第一〇五頁至第一二四頁)。——(正文第七十五頁)

(九) 弗·伊·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九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六九三頁)。——(正文第七十六頁)

(一〇) 弗·伊·列寧「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主義者?」(見「列寧全集」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二七四頁至第二七五頁)。——(正文第七十六頁)

(一一) 第二國際巴黎爾代表大會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舉行。這次代表大會是由於巴黎爾戰爭和世界大戰危險的迫近而召開的。代表大會討論了國際形勢和共同反對戰爭這一個問題。代表大會在通過的宣言中號召工人運用

無產階級的組織和力量進行了反對戰爭危險的革命鬥爭，宣佈「以戰爭對付戰爭」。——（正文第七十六頁）

〔三〕見卡爾·馬克思「資本論」一九三五年俄文版第一卷序言第二十三頁。——（正文第七十八頁）

〔三〕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一九五五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三七〇頁。——（正文第八十一頁）

〔四〕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四卷。——（正文第八十一頁）

〔五〕卡·馬克思「費爾巴哈論提綱」（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一九五五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四〇一頁至第四〇四頁）。——（正文第八十二頁）

〔六〕弗·伊·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一七三頁至第二九〇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九一八頁至第一〇三三頁）。——（正文第八十三頁）

〔七〕約·維·斯大林援引的是弗·伊·列寧在一九〇五年所寫的文章：「社會民主黨和臨時革命政府」（從這篇文章中引了一段話），「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和「前臨時革命政府」（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八卷第二四七頁至第二六三頁，第二六四頁至第二七四頁，第四二七頁至第四四七頁）。——（正文第八十九頁）

〔八〕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一年俄文版第八卷第四八三頁，「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一九五四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第八十八頁）。——（正文第九十二頁）

〔九〕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一九五四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第二頁和「書信選集」一九四七年俄文版第二六三頁。——（正文第一〇三頁）

〔十〕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一九五五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四二二頁和第四三六頁。——（正文第一一七頁）

〔十一〕農業合作總社即全俄農業合作總社，於一九二二年八月成立，一九二九年六月撤銷。——（正文第一一九頁）

〔十二〕見弗·伊·列寧的著作「論金子在現時以及在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後的作用」（「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八十五頁至第九十二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九一一頁至第九一九頁）。——（正文第一四六頁）

〔十三〕「關於黨的統一」的決議由弗·伊·列寧起草，經一九二二年三月八日至十六日舉行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

通過。(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二一七頁至第二二〇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八二一頁至第八二四頁，並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卷第五二七頁至第五三〇頁)——(正文第一六〇頁)

(四)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是布爾什維克黨在弗·伊·列寧逝世以後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舉行。約·維·斯大林領導了代表大會的工作。出席代表大會的有七百四十八名有表決權的代表，代表七十三萬五千八百八十一名黨員，其中爲紀念列寧而吸收的黨員爲一十四萬一千五百九十一名，在爲紀念列寧而吸收黨員以前的候補黨員爲十二萬七千七百四十一名。有發言權的代表爲四百六十六名。代表大會討論了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和組織報告、中央檢查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中央監察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俄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總結報告、黨的組織問題、國內貿易和合作社問題、農村工作問題、青年工作問題等等。

代表大會一致斥責了托洛茨基反對派的政綱，肯定這個政綱是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小資產階級傾向，是對列寧主義的修正，批准了黨的第十三次代表會議「關於黨的建設」和「關於爭論總結和黨內小資產階級傾向」的決議。

代表大會指出爲紀念列寧而吸收黨員的巨大意義，並要黨注意加強以列寧主義基礎教育新黨員的工作。代表大會責成弗·伊·列寧研究院準備十分科學地和最精確地用蘇聯各民族的文字爲廣大工人羣衆出版「列寧全集」和「列寧選集」。——(正文第一六七頁)

(五) 農民社會互助委員會(農民互助委員會)是根據弗·伊·列寧簽署的人民委員會一九二一年五月十四日的指令在村蘇維埃和鄉執行委員會下面成立的，一九三三年撤銷。成立農民互助委員會的目的是改進對農民和紅軍家屬的社會援助的組織工作，發揮廣大農民羣衆的主動性和首創精神。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人民委員會於一九二四年九月批准的關於農民互助會的條例，又把促進各種形式的合作社在農村居民中的發展和鞏固以及吸引農村的貧農和中農羣衆參加合作社的任務委託給農民互助委員會。——(正文第一七四頁)

(六) 少年先鋒隊爲慶祝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召開和少年先鋒隊組織改名爲「弗·伊·列寧共產主義兒童團」，於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在莫斯科紅場舉行檢閱。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主席團檢閱了約有一萬名少年先鋒隊的隊伍。——(正文第一七四頁)

(三七) 蘇聯的股份公司(國營的、合營的和合作社營的)是經勞動國防委員會批准,由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國內商業人民委員部和財政人民委員部設立的。設立股份公司的目的是吸收資金,包括私人企業主的資金在內,以便最迅速地恢復國民經濟和發展商品交換。

合營公司是股份公司的一種,它吸收外國資本來收購國內出口貨物,把它們銷行國外,並輸入恢復國民經濟所必需的物品。合營公司在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的監督下經營業務。股份公司在於新經濟政策的初期。——(正文第一九〇頁)

(三八) 「農民報」是聯共(布)中央的機關報,是為農村辦的羣衆性報紙,於一九二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九年二月出版。——(正文第一九一頁)

(三九) 團結了烏克蘭少地和無地農民的貧苦農民委員會是為保護貧農和中農的利益而成立的。一九二〇年成立,一九三三年實行全盤集體化以後撤銷。貧苦農民委員會在其存在的初期(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是在農村中幫助鞏固蘇維埃政權的政治組織。實行新經濟政策後,貧苦農民委員會改組為生產性的社會組織,它的主要任務是吸引農民參加各種農業集體組織。貧苦農民委員會是黨和國家的農村政策的積極執行者。——(正文第一九一頁)

(四〇) 地方組建部隊是根據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蘇聯人民委員會於一九二三年八月八日頒佈的法令建立的,它和紅軍的正規軍並存。地方組建部隊是根據輪訓的原則組織起來的,其目的是通過短期集訓的方法對勞動者實行軍事訓練。——(正文第一九一頁)

(四一) 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二三一至第二九一頁。——(正文第一九二頁)

(四二) 指弗·伊·列寧的著作「論糧食稅」(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〇八頁至第三四三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八四五頁至第八八〇頁)。——(正文第一九二頁)

(四三) 指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八日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會議上根據約·維·斯大林「關於黨的建設的當前任務」的報告所通過的「關於爭論總結和黨內小資產階級傾向」的決議(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卷第七七八頁至第七八五頁)。——(正文第一九四頁)

(四四) 資本主義國家承認蘇聯的政策表現在:英國、意大利、挪威和奧地利在一九二四年二月,希臘和瑞典在三月,丹麥在六月,法國在十月,日本及其他許多國家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先後同蘇聯建立了外交關係。——(正文第二〇九頁)

〔四三〕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二三一頁至第二九一頁。——（正文第二一三頁）

〔四六〕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四年版第二卷第十頁至第十四頁。——（正文第二一四頁）

〔四七〕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四年版第二卷第四十四頁至第五十七頁。——（正文第二一四頁）

〔四八〕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四年版第二卷第三十四頁至第四十四頁。——（正文第二一五頁）

〔四九〕幣制改革是以有穩定的黃金保證的切爾文來代替貶值的蘇維埃紙幣，這次改革是蘇聯政府在一九二四年內完成的。——（正文第二一六頁）

〔五〇〕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四年版第二卷第二十八頁至第三十四頁。——（正文第二一七頁）

〔五一〕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卷第四四七頁至第四五二頁。——（正文第二一八頁）

〔五二〕指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後於一九二四年六月二日舉行的俄共（布）中央全會。約·維·斯大林被選為政治局委員、組織局委員、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書記，並再次當選為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全會討論了俄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團問題、工資問題、金屬工業問題、旱災問題等等。爲了詳細研究農村工作問題，全會通過了成立俄共（布）中央全會農村工作常務委員會的決定。中央政治局受全會的委託成立了由維·米·莫洛托夫（主席）、約·維·斯大林、米·伊·加里寧、拉·莫·卡岡諾維奇和娜·康·克魯普斯卡婭等人組成的委員會。該委員會根據一九二四年九月俄共（布）中央全會的決定改組為俄共（布）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正文第二一九頁）

〔五三〕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四年版第二卷第七十五頁至第八十七頁。——（正文第二二〇頁）

〔五四〕『工人通訊員』雜誌（月刊）於一九二四年一月至一九四一年六月出版。自一九二五年一月起改名爲『工農通訊員』

雜誌。——（正文第二二八頁）

〔五〕波蘭委員會是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至七月八日於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上成立的。約·維·斯大林是代表大會各個最重要委員會的委員，並且是波蘭委員會的主席。委員會提出的關於波蘭問題的決議，在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二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全會第一次會議上一致通過。——（正文第二三〇頁）

〔六〕布爾德勒集團是德國共產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集團。布爾德勒分子和德國社會民主黨上層實行了無原則的合作，使德國工人階級在一九二三年的革命事變中遭到失敗。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一九二四年）斥責了布爾德勒集團的投降路線。一九二五年四月四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五次擴大全會決定禁止布爾德勒集團干預德國共產黨的事務和參加共產黨的工作。一九二九年布爾德勒因派別活動而被開除出共產黨。——（正文第二三二頁）

〔七〕指傑·別德內依的詩「牽引力」（見「傑·別德內依全集」一九二八年版第九卷第八十六頁至第九十三頁）。——（正文第二三九頁）

〔八〕法國的「左派聯盟」是以愛德華·赫里歐為首的激進黨人和激進社會黨人的聯盟，於一九二四年五月上台執政。「左派聯盟」政府以「左的」詞句為掩護，實際上在對外和對內政策方面積極幫助法帝國主義。赫里歐政府執政到一九二五年四月。——（正文第二四五頁）

〔九〕協約國倫敦會議於一九二四年七月十六日至八月十六日舉行，參加會議的有英國、法國、美國和其他國家。會議是為討論和解決德國賠款問題而召開的。——（正文第二四九頁）

〔一〇〕薩克森工人政府是在整個德國展開了羣衆革命運動後於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一日成立的。參加這個政府的是五個社會民主黨人和兩個共產黨員。政府由「左派」社會民主黨人采格涅爾領導。參加薩克森政府的共產黨員實行了德國共產黨布爾德勒領導集團的投降政策，和「左派」社會民主黨人一起破壞了武裝無產階級和發展德國革命的事業。一九二三年十月三十日帝國軍隊解散了薩克森工人政府。——（正文第二五四頁）

〔一一〕蘇瓦林集團是法國共產黨內的機會主義集團，由托洛茨基的熱烈擁護者蘇瓦林領導。蘇瓦林集團支持俄共（布）內的托洛茨基反對派，誣蔑法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粗暴地破壞黨的紀律。一九二四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四次擴大全會滿足了法國共產黨關於把蘇瓦林開除出法國共產黨的要求，一九二六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因為蘇瓦林進

行反革命宣傳而把他開除出共產國際隊伍。——（正文第二五四頁）

〔六二〕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至七月八日在莫斯科舉行。出席代表大會的代表有五百一十人，代表四十九個國家的六十個組織。

代表大會討論了關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活動、關於世界經濟狀況、關於蘇聯經濟狀況和俄共（布）黨內爭論、關於法西斯主義、關於工會運動中的策略、關於生產單位的支部等問題，討論了個別國家的黨的問題、綱領問題、民族問題、土地問題和其他問題。約·維·斯大林是代表大會主席團委員，是代表大會最重要的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綱領委員會、關於列寧主義的決議起草委員會的委員，並且是波蘭委員會的主席。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一致支持布爾什維克黨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代表大會批准了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會議和第十三次代表大會「關於爭論總結和黨內小資產階級傾向」的決議，並決定把它作為代表大會的決定公佈。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加強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的決定，關於使這些黨布爾什維克化並使它們變為依靠工會的真正羣衆性的黨的決定。——（正文第二五五頁）

〔六三〕工會國際即紅色工會國際，於一九二一年成立，一九三七年底解散。工會國際團結了革命的工會，堅持了共產國際的立場。——（正文第二五六頁）

〔六四〕阿姆斯特丹工會聯合會（阿姆斯特丹國際）是工會的國際聯合組織，於一九一九年七月在阿姆斯特丹國際代表大會上成立。它包括西歐許多國家和美國的改良主義工會，它在自己的綱領和策略中採取了敵視共產主義的反革命立場。由於在世界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一九四五年九月至十月）上成立了世界工會聯合會，阿姆斯特丹工會聯合會就不復存在了。——（正文第二五六頁）

〔六五〕列維左派集團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集團。在一九二二年十月薩克森工人政府成立的時候，列維集團害怕失去在工人羣衆中的影響，聲明準備和共產黨人共同工作，但事實上却掩護社會民主黨的反革命政策，幫助資產階級鎮壓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正文第二五八頁）

〔六六〕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召開的農村支部書記會議於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舉行。出席會議的地方工作人員有六十二人，其中中央各區域和省委員會代表四人，專區委員會和區委員會代表十五人，鄉委員會代表十七人，村支部代表十一人，共青團支部代表十一人，鄉農婦組織員代表四人。會議聽取了維·米·莫洛托夫的「關於農村支部的當前任

務」、米·伊·加里寧的「農民互助委員會的新條例」、拉·莫·卡岡諾維奇的「關於下層蘇維埃機關」、娜·康·克魯普斯卡婭的「農村中的政治教育工作」等報告、各地的報告和其他問題的報告。約·維·斯大林參加了會議的工作，並在十月二十二日的會議上發表了「關於黨在農村中的當前任務」的演說。——（正文第二六一頁）

〔六〕指一九二四年八月底的格魯吉亞反革命暴動，這次暴動是格魯吉亞孟什維克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在第二國際首領和外國代理人的支持下組織的。在格魯吉亞工人和勞動農民羣衆的積極協助下，暴動很快就平息了。——（正文第二六七頁）

〔六〕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二七三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九六九頁。——（正文第二七一頁）

〔六〕俄共（布）中央全會於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舉行，全會討論了經濟問題和維·米·莫洛托夫的「農村工作的當前任務」的報告。全會通過了「關於農村工作的當前任務」的決議，在決議中向各級黨組織做了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關於農村工作的決定的補充指示。約·維·斯大林主持了全會的工作，並在十月二十六日的會議上發表了「關於黨在農村中的任務」的演說。——（正文第二七二頁）

〔七〕「聯系委員會」由齊赫澤、斯切克洛夫、蘇漢諾夫、菲里波夫斯基和斯柯別列夫組成（稍後加入的有切爾諾夫和策烈鐵里）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把持的彼得格勒兵工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爲了同臨時政府建立聯系、「影響」臨時政府和「監督」它的活動而於一九一七年三月七日設立的。事實上「聯系委員會」幫助了臨時政府實行資產階級政策，阻擋了工人羣衆進行爭取全部政權轉歸蘇維埃的積極革命鬥爭。一九一七年五月，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代表直接參加臨時政府，「聯系委員會」就撤銷了。——（正文第二七八頁）

〔七〕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一頁至第七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十七頁至第二十二頁。——（正文第二八九頁）

〔七〕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彼得格勒市代表會議於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四月十四日至二十二日）舉行。出席代表會議的代表有五十人。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參加了代表會議的工作。弗·伊·列寧做了關於目前形勢的報告，這個報告是以他的四月提綱爲基礎的。約·維·斯大林是關於弗·伊·列寧的報告的決議起草委員會委

員。——（正文第二八九頁）

〔七〕關於全俄布爾什維克第七次（四月）代表會議，見『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四八頁至第二五二頁。——（正文第二八九頁）

〔八〕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三卷第二八九頁至第三三三頁。——（正文第二九〇頁）

〔九〕見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十一日）『弗·伊·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布）彼得格勒委員會會議上關於取消遊行示威的演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六十二頁至第六十三頁）。——（正文第二九三頁）

〔十〕北方區域工兵代表蘇維埃代表大會在布爾什維克領導下於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十一日至十三日）在彼得格勒舉行。參加代表大會的有彼得格勒、莫斯科、喀琅施塔得、諾夫哥羅德、列維里、赫爾辛福斯、維波爾格及其他城市的代表共九十四人，其中有布爾什維克五十一人。代表大會通過了必須立即把全部政權轉歸中央和地方的蘇維埃的決議，號召農民支持爭取蘇維埃政權的鬥爭，而蘇維埃本身要積極行動並成立軍事革命委員會，以便用軍事來保衛革命。代表大會成立了北方區域委員會，委託該委員會籌備召開全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和統一領導各區域蘇維埃的活動。——（正文第二九五頁）

〔十一〕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一六二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一五五頁。——（正文第二九九頁）

〔十二〕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一六五頁。——（正文第二九九頁）

〔十三〕約·維·斯大林『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書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和五月出了兩版。收入這本書中的文章和演說編入了『斯大林全集』第三卷。作者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寫完該書序言，序言全文只在『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書中發表。序言的大部分用『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的標題在約·維·斯大林的『列寧主義問題』一書各版中刊載過，此外還刊載在各種文集中和出過單行本。序言的另一部分作為『反對聯邦制』一文作者註發表在『斯大林全集』第三卷中。——（正文第三一〇頁）

〔十四〕見『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一九四七年俄文版第二二二頁至第二六四頁。——（正文第三四二頁）

年 表

一九二四年

一月四日

約·維·斯大林被俄共(布)紅色勃列斯尼亞黨代表會議選爲出席黨的莫斯科省代表會議的代表。

一月九日

約·維·斯大林和羅斯塔塔記者談黨內狀況問題的爭論。

一月十四日至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俄共(布)中央全會的工作。

一月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全會上做關於提交黨的第十三次代表會議的『關於黨的建設的當前任務』決議草案的報告。

一月十五日

俄共(布)中央全會批准約·維·斯大林爲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會議『關於黨的建設的當前任務』問題的報告人。

一月十六日至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會議的工作。

一月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被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會議選入代表會議主席團。

一月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會議上做『關於黨的建設的當前任務』的報告。

一月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會議上做「關於黨的建設的當前任務」報告的結論。

一月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被全俄蘇維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選入代表大會主席團。

一月二十一日晚六時五十分

弗·伊·列寧逝世(在哥爾克村)。

晚九時三十分

約·維·斯大林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員前往哥爾克村。

一月二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修改全俄蘇維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因弗·伊·列寧逝世而發表的「告蘇聯全體勞動者書」的草稿。

約·維·斯大林電告布哈拉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弗·伊·列寧逝世，號召擁護列寧的鞏固工農聯盟的路綫並更緊密地團結在蘇維埃政權的周圍。

一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時

約·維·斯大林同俄共(布)中央委員把弗·伊·列寧的靈柩抬出哥爾克村寓所。

下午一時三十分至二時四十五分

約·維·斯大林同全蘇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和全俄蘇維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黨中央委員和政府委員、工人、各種組織的代表把弗·伊·列寧的靈柩從帕維列茨車站抬至工會大廈。

晚六時十分

約·維·斯大林在工會大廈圓柱大廳弗·伊·列寧的靈旁守靈。

一月二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簽署的建議保存關於弗·伊·列寧的一切資料並把這些資料送交俄共(布)中央弗·伊·列寧研究院的俄共(布)中央告各級黨組織、機關、出版機關書，在「真理報」第二十號上發表。

一月二十六日晚八時四十分至八時四十分

一月二十七日上午八時

上午八時三十分

上午九時

下午四時

一月二十八日

一月二十九日

一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

一月三十日

二月二日

約·維·斯大林在蘇聯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的追悼會上發表「悼列寧」的演說，並代表布爾什維克黨做遵守和執行列寧遺訓的宣誓。

約·維·斯大林在工會大廈圓柱大廳弗·伊·列寧的靈旁守靈。

約·維·斯大林在工會大廈圓柱大廳站在弗·伊·列寧靈旁。

約·維·斯大林和工人代表把弗·伊·列寧的靈柩抬出工會大廈。

約·維·斯大林、維·米·莫洛托夫等人在紅場的追悼大會結束後把弗·伊·列寧的靈柩從台座上抬入陵墓中。

約·維·斯大林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克里姆林軍校學員為紀念弗·伊·列寧逝世而舉行的晚會上發表演說。

約·維·斯大林在全俄蘇維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會議上被選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約·維·斯大林主持俄共（布）中央全會的工作。

約·維·斯大林被選為蘇聯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主席團委員。

約·維·斯大林在全蘇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會議上被選為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聯盟蘇維埃委員。

約·維·斯大林在蘇聯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被選為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

約·維·斯大林在全俄第十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被選爲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

二月三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全會會議上就紅軍狀況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發言。

三月五日和十二日

根據約·維·斯大林的指示，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永久紀念弗·伊·列寧委員會舉行有國內卓越的科學家參加的關於保存弗·伊·列寧遺體問題的會議。

三月二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寫完『列寧主義課堂討論計劃』。『列寧主義課堂討論計劃』發表在一九二四年五月『紅色青年』雜誌第一期上。

三月二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關於國內貿易和消費合作社的報告發言。

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二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俄共(布)中央全會的工作。

四月一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全會會議上就關於國內貿易和消費合作社的報告發言。

四月二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全會會議上就米·伊·加里寧關於農村工作的報告發言。

四月三日

約·維·斯大林簽署的俄共(布)中央關於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召開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通知在『真理報』第七十六號上發表。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召開的青年工作會議上發表演說。

四月初

約·維·斯大林在斯維爾德洛夫大舉做『論列寧主義基礎』的講演。

四月二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同其他老巴庫工作人員電賀巴庫共產黨組織成立二十五周年。

五月九日

約·維·斯大林電告波羅的海艦隊革命軍事委員會，因為準備即將舉行的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不能應邀參加艦隊的紀念日。該電報發表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五日『紅色波羅的海艦隊報』第一〇六號上。

五月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被俄共（布）列寧格勒省第二十次代表會議選為黨的列寧格勒省委員會委員，並被選為出席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代表。

五月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被南高加索共產黨組織第三次代表大會選為出席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代表。

五月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被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二次代表會議選為出席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代表。

五月二十三日
至三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弗·伊·列寧逝世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工作。

五月二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同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主席團委員在莫斯科紅場檢閱慶祝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少年先鋒隊的隊伍。

約·維·斯大林把『論列寧和列寧主義』一書送給謝·米·基洛夫，書上的題詞是：『送給我的朋友和親愛的兄弟。作者約·斯大林。』

五月二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做中央委員會的組織報告。

五月二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做關於中央委員會組織報告的結論。

五月二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青年工作委員會委員。

五月三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會議上被選為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委員。

六月二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全會上被選為政治局委員、組織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並再次當選為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六月四日

約·維·斯大林和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主席團其他委員簽署的祝賀巴庫工人在蘇拉漢內發現新石油噴泉的賀電在『巴庫工人報』第一二五號上發表。

六月十二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約·維·斯大林為中央全會農村工作委員會委員。

六月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縣委書記訓練班上做『關於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總結』的報告。

六月十七日至七月八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的工作。

六月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被選為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主席團委員。

六月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被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選為代表大會的關於列寧主義的決議起草委員會、政治委員會和綱領委員會的委員。

六月二十日

約·維·斯大林在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會議上被批准為波蘭委員會主席。

六月二十七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約·維·斯大林為中央委員會女工和農婦工作委員會委員。

六月

約·維·斯大林和『工人通訊員』雜誌工作人員關於工人通訊員和農村通訊員的任務的談話

在該雜誌第六期上發表。

七月一日至三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波蘭委員會的各次會議。

七月三日

約·維·斯大林在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波蘭委員會會議上發表『關於波蘭共產黨的演說』。

七月五日

約·維·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主席團其他委員簽署代表大會通過的『共產國際告世界無產階級書』。

七月八日

約·維·斯大林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

七月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寫信給傑米揚·別德內依。

七月二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簽署的俄共（布）中央關於抗旱和防止旱災後果的措施的告各級黨組織書在『真理報』第一六七號上發表。

七月二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組織局會議上就組織局委員會關於紅軍工作的報告發言。

七月三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在致曼努伊里斯基的信中表示他對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關於中歐和巴爾幹的民族問題、關於東方和殖民地問題的決議的看法。

七月

約·維·斯大林修改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告波蘭共產黨各級組織書』的草稿。

八月二日

約·維·斯大林寫完『論雅·米·斯維爾德洛夫』一文。

八月四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組織局會議上就組織局少先隊運動委員會的報告發言。

八月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組織局會議上就爲紀念列寧而吸收的黨員教育委員會的報告發言。

八月十六日至二十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俄共（布）中央全會的工作。

九月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寫完『論國際形勢』一文。這篇文章在九月二十日『真理報』第二一四號和『布爾什維克』雜誌第十一期上發表。

十月二十日

約·維·斯大林和『青年建設者』雜誌的青年通訊員談話。

十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召開的農村支部書記會議的工作。

十月二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召開的農村支部書記會議上發表『關於黨在農村中的當前任務』的演說。

十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俄共（布）中央全會的工作。

十月二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全會上發表『關於黨在農村中的任務』的演說。

十一月七日以前

約·維·斯大林接見『狄納莫』工廠工人代表團，這個代表團邀請他出席該廠全體人員紀念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七周年的慶祝大會。

十一月七日

約·維·斯大林在『狄納莫』工廠全體人員紀念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七周年和舉行弗·伊·列寧一九二一年訪問『狄納莫』工廠紀念碑揭幕典禮的慶祝大會上發表演說。約·維·斯大林在『狄納莫』工廠的留言簿上題詞。

十一月十五日

爲祝賀騎兵第一集團軍建軍五周年，約·維·斯大林向該集團軍致賀電。

十一月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受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的委託，爲德國即將舉行的國會選舉寫信給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揭露反革命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背叛行爲。

十一月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慶祝『農民報』創刊一周年的賀電在『農民報』第五十一號上發表。

十一月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在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共產黨黨團全會上發表『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的演說。

十一月二十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批准約·維·斯大林爲俄共（布）中央弗·伊·列寧研究院委員會委員。

十一月二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代表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向烏克蘭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發出關於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信。

十二月八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組織局會議上就爲紀念列寧而吸收的黨員教育委員會的報告發言。

十二月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寫完『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書的序言。

十二月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簽署俄共（布）中央給各級黨組織的關於認真實現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關於國內貿易問題的決議的通知信。